

萧克回忆录

第一章青少年时期

我的家乡是湖南省嘉禾县泮头乡小街田村。据 1946 年所修的家谱记载，我出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六月初五日戌时，即 1907 年 7 月 14 日。

嘉禾古名禾仓堡，秦朝时为戍五岭囤粮之所。由于这里地势险要，历代为兵防重地，故称堡。1639 年，明崇祯皇帝在镇压了刘新宇领导的香花岭矿工及九峰、蓝山瑶民大起义后，以“禾仓离州治甚远难以遥制”为由，决定设立嘉禾县。

嘉禾地处湘南，名为禾仓，实际是穷乡僻壤，禾不嘉，谷不丰。从我记事起，就看到父兄和村里人们为生计而辛劳、忧愁。

我的家庭算是书香门第。从我的曾祖父起一直到我的堂哥，四代读书、教书。听父辈们讲，曾祖父萧人杰是贡生，后选儒学正堂。我没有见过曾祖父，但看到他亲自用毛笔抄写的一本《书经》，字迹工整，全书万余字，只错了一个字。我的父亲和伯父、堂哥常用它来教导我，让我学习祖辈认真治学的精神。

祖父萧贡伯也是贡生，他教了一辈子书，直到去世前年，仍在教书。

父亲有五兄弟，其中三个是学子。三伯父考中拔贡，四伯父和我父亲为贡生，在我的父辈中，三伯父萧覃荫学历最高。不仅在本省，还到湖北、安徽一带讲学。三伯父家有很多书，不仅有旧书，还有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的书籍，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未教仁的《我之历史》等。我最爱到他家翻书看。记得读私塾时，三伯父写了一首四言韵文诗，有七八十句，记述了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言简意赅，辞句流畅，读后印象很深刻，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这样的文句“民国反正，不能善后，竟言共和，程度不够。四次革命，枪炮角斗，我诈尔虞，甲肥乙瘦。初次革命，推倒满清。铲除专制，帝室已倾。何人鼓吹，厥有孙文。谁能实行，克强宋卿……”。

三伯父写的文章和诗词，本地文人互相传抄，流传新旧学界，我也喜欢背诵他写的诗词韵文。他有着典型的旧知识分子的特点，有文才而又正直、清高。他曾在本乡第二高等小学当校长，后到桂阳第 8 中学任国文教员。他常常读报，喜欢谈论国家大事，但胆子小，不参加政治活动，

我父亲萧覃茂早年教书。民国 3 年，因参与反袁运动，坐牢 3 个月。出狱后，就在城里参加了一个名叫“嘉善堂”的组织，搞公共慈善事业，以后又在高等小学校当管理员，有时也到本地区政府中办事，还当过“征收员”，做的事情很杂。

我祖父活着时，家里大概有十来亩水田。他死前分家。续弦的祖母和 5 个儿子各分得两亩地，我父亲后来又购置了一些田产，但数量不多。我刚懂事，就到田里参加劳动。记得那时我家有 6 亩半水田，还有一点旱地。我们那里是山区，水稻只能种一季，产量也不高。旱地种些红薯、豆子、花生、棉花等。地不够，又租了地主 5 亩水田，但缴完租谷也剩不下多少了。

我们兄弟姐妹 9 个，只活下来 6 个：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和一个妹妹。8 口之家，开销不小。父亲是读书人，不参加农业劳动。母亲料理家务，也不能下田种地。大哥 12 岁便辍学参加家务杂事。二哥和我要读书，家里的田请长工种。我记得这个长工在我家住了 6 年。农活是有人干了，但要付工钱，吃饭也多了一张嘴，种的粮食不够吃，多数年份要买两三个月的口粮，生活颇为艰难。

尽管生活艰难，我家仍充溢着书香气。三伯父和我父亲经常在一起作诗对联，诵经讲史。特别是逢年过节，请他们写对联的人应接不暇。他们不停地写，我就在一边磨墨，他们的文事活动和那些辞令隽逸、对仗工整、字迹秀美的对联，对我的文学爱好，是个启迪。

我母亲不识字，但会背不少古诗。小时候，我常常依偎在母亲的怀里，跟着她一字一句地学着背。我现在仍然背得出的《木兰诗》，就是跟我母亲学的。

我家的男子差不多都入学读过书。三伯父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哥萧武惠（我称他为六哥）是广东大学学生，入学半年三伯父便去世了，在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他坚持读了下来。我的二哥萧克允是桂阳联合中学的学生，后进入长沙统计讲习所学习，以后又考入广东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我参加革命，受了他们的影响不小。

另一位堂哥萧克勤是我的开蒙老师。7岁那年，我入私塾，先生便是克勤堂哥。这位堂哥是祖父亲自教出的孙子，因而继承了祖父和三伯父教书的家传。堂哥教书正规、认真，要求严格。从认字、写字、背诵、作文，他都一丝不苟。我记得开始学写字时，他教我们要“四正”，即心正、身正，纸正、笔正，我从少养成这个习惯，直到耄耋之年，写字仍能坚持“四正”。

堂哥虽没有入过新学，但懂四则运算和分数。他不仅教四书，还教些数学、地理和历史。我一入学，他就让我先读初等小学国文，这是辛亥革命后教育部颁布的教科书，共8册，4年8学期的课程，两年读完，然后再读《孟子》、《论语》、《左传》等。在那个激烈动荡的年代，既读旧书，又不受旧教育制度的束缚，接受新思潮的洗礼，是很有意义的。

读了6年私塾后，我于1920年春，考入本县东、南、平田三区联办的社塘高等小学（第二年又转入太平庵小学），在高小读了三年。那时，军阀混战连年不断，湖南战乱更烈。大小军阀，你走他来，东征西杀。我上高小的第二年，学校新来一个教员，大讲“南北战争”。所谓南北战争，是指湖南军阀赵恒惕打湖北军阀王占元的战争。他夸赞作为曾国藩后代的湖南军队能打仗，但对军阀加捐加税，非常痛恨，对本地人“走兵”卫很同情。他还给我们讲五四运动反军阀的事，给我们好的影响。

对军阀混战的厌恶，也引起我对整个社会现状的不满，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恰在这时，我的家庭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大概是1922年3月间，我还在太平庵高等小学读书。当时，学校里住了一支车队。一天，4个军人荷枪实弹从学校出发。有个同学问他们去哪儿？他们说：“到萧覃茂家。”那个同学立刻跑来告诉我：“有兵去你家里了。”我一听很紧张，就跟在那些兵后面，看他们往哪里走。跟了约半里路，发现他们果然是朝我家方向走的。我插小路先跑回家，把这消息告诉父亲。父亲一听，慌忙躲避起来，并找人来办“招待”。我父亲当过小绅士，懂得这些兵是官家派来敲榨勒索的，只有找关系，用钱财打典一下，才能了事。这就是所谓的办“招待”。

关系找来了。我家杀鸡做饭，像招待贵客一样招待这几个兵，又给他们每人一些银两，名曰“草鞋钱”，才把他们打发走。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兵到我家，是因为我大哥和堂哥的事情。

我大哥萧克昌辍学后，帮助家里做事，有时干农活，有时当屠户，有时也做点生意。他脾气刚烈，因而得罪了大地主萧仁秋。萧仁秋家有良田300

多亩，是全区第一大户，平常横行霸道，欺压穷人。离我家不远的晋屏山上，有一支绿林武装，落草为寇者多是被逼无奈的农民。他们对晋屏山四周的地主、绅士，抢掠罚款，也曾到萧仁秋家下“片子”亲钱财。他们中有个头目叫李赞易，是我伯父教私塾的学生，在长沙住过法政学校，我大哥和堂哥与他有些交往，这也引起了萧仁秋的记忆。

嘉禾、临武、蓝山的旧政府和大地主对晋屏山的绿林非常仇视，由县长亲自带队联合会剿清乡。事也凑巧，我在放暑假中，一天父亲叫我送信到姐夫家（姐夫是小地主，与绿林中某些人有朋友关系）。到了姐夫家，他不在，据说去了七、八里外的大路蒋家了。我立即跑到那里，正碰上蓝山县的剿匪清乡队，他们抓住我，搜出父亲给姐夫的信，便说我是给土匪送信的，把我抓起来，连夜押到塘村墟。

临武、蓝山、嘉禾三县剿匪会议，正在塘村召开。本县的一个师爷见我是孩子，便让我写信通知家里。我立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过了一天，我们学校的校长黄谦信来了。他悄悄告诉我，是父亲托他来办“招待”的。第二天三县县长审问我，我就按黄校长的口径对答。县长找不出破绽，但还是不放过我，要让我父亲来。

父亲知道萧仁秋与县长有瓜葛，只有求萧仁秋出面，才能救我。父亲向离家百里的安源同姓宗族借了100块小洋，求萧仁秋交给县长。父亲是个有骨气的读书人，自然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气。但为了救我，只有向土霸王求情。我想象得出，他当时是忍受了莫大的屈辱。

萧仁秋出面后，我果然被释放了。但家里却无法偿还为救我而欠下的债务，就由二哥萧克允去债主处教书一年抵债。就在我被抓的那年，家里先后四次来兵，一次次地对付，总是不能了结，财物劫掠一空，我也无法继续上学。

祸事接连不断。第二年春，我们那个地区办了团防局，一个叫张汉清的劣绅当了团防局长。他与萧仁秋合谋，诱骗我大哥和堂哥到团防局，把他们抓了起来。开始，我家里对萧仁秋抱有幻想。父亲认为，自己当过塾师，又是个小绅士，萧仁秋曾是他的学生，不会把我们家人怎样的。我堂哥萧武想得更多天真，认为与萧仁秋是换帖兄弟，出不了大事。谁料到，心毒手辣的萧仁秋不讲情义，抓到我大哥和堂哥的当天就送到县政府杀害了。

大哥的死，使我家如同遭了雷轰。父亲悔恨不该轻信萧仁秋；母亲整日以泪洗面，思念养育了27年的长子。这时我已15岁了，我只想杀萧仁秋和那些狗官，报仇雪恨。

二哥这时在长沙读书（他以教书抵债后，考入长沙统计讲习所），接家中凶报，来信痛斥那些豪绅的反动行为。他知识面宽些，把这些事提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打倒的对象来认识。复仇和求知的渴望，驱使我两兄弟要去寻找新的出路。

不久，二哥来信说，他已到广东，考入建国湘军（1925年改为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官学校。二哥投笔从戎，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思想上开始向往军事活动。当然，这时主要还是出于报家仇的考虑。

1923年初秋，我看到一则广告：嘉禾县首次创办的甲种师范简习所招生。当时全国师范系统的学制分为国立高等师范、省立完全师范、县立简习师范。简习师范毕业后可任初等小学教师。我自1922年夏休学后，一直希望能继续读书。我认为，即使从军，也要完成中等教育。但当时无论是中学还

是师范，学制都是6年。我的家境不允许我读这么长时间的书。而简习师范能以较短的时间取得中等学校的学历；课本由学校发，学生每月只自备大米36斤（当时为16两秤），每日交4枚铜板的菜金即可。对于我来说，这种学校是比较经济的。

我就去报考，一考就考上了。当时父亲不在家，母亲听到这消息，并不高兴，她发愁地说：“家里粮食不够吃，哪有米给你拿到学校去呢？”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好在学校并不马上要，我就先去上学了。过了半个月，学校要米。恰好父亲回来了，他想方设法借了些钱，给我买米交了伙食费。这样坚持了一个学期，父亲再也借不到钱了，我又面临着辍学的危险。

校长李崇本对我的境遇很同情。说起来，我们两家还有些关系。他的父亲因为反对袁世凯，1914年被汤芑铭杀害了，我父亲也因此案坐了3个月牢。李校长知道我父亲坐牢、大哥被杀、家里遭劫，颇为同情。加上我学习用功，就有心帮助我完成学业。他让我和另一个也是家庭困难的同学，为学校刻蜡板，印讲义。我们白天上课；晚上刻蜡板，并按教师规定的份数油印。这样每人每学期可得小洋10元（大洋7元）。靠这个补助，我读完了简习师范。

学校生活是清苦的。每天4个铜板的菜金，校承包伙食的人还要赚一点，吃到我们嘴里的就更少了。我家里穷，没有钱加餐；就是有，也舍不得吃，而是用来买灯油或买书。平常，我总穿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和那些有钱人家的子弟站在一起，显得很寒酸，但我并不以为耻。我曾读过宋濂写的《送东阳马生叙》，深受文中“贫非罪”的观念影响，我不羡慕荣华富贵，不为贫穷自卑，而是如饥似渴地求知。

学校的课程很多，除了语文、数理化，还有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学校管理法等。我既要学好这些课程，又要刻蜡板，还要读大量的课外书籍，总感时间不够。星期天我很少回家，晚上常常自学到深夜。一盏小煤油灯和回荡在夜空中清幽的敲更声，陪伴着我苦读。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养成了“手不释卷”的习惯。以后，无论是戎马倥偬，还是在繁忙的领导岗位上，我都保持着这个习惯。

那时，我一心想报仇，想搞军队，对军事方面的书籍特别感兴趣。我花钱买了蔡锷编写的《曾胡治兵语录》，还买了《孙子兵法》、《七子兵法》等古代兵书。有位同学搞到一本《步兵操典》，我也贪婪地阅读了。我还喜欢读有关辛亥革命的书。孙中山写的《心理建设》、《伦敦蒙难记》，朱执信和邹鲁编写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等书，都读过，有些段落几乎能背下来。我还花三块大洋从上海邮购了一套蔡元培主编的《新文库》，读了许多当时文化名人的文章，有些观点至今还能记忆。

第二学期，学校来了一位叫谭步昆的老师，是湖南第二师范毕业生。他一来就为学校订了《响导》、《政治周报》、《社会科学讲义》、《小说世界》等书刊。我浏览这些书刊，思想开阔了许多。从书刊中我第一次看到了列宁的名字，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激动人心的学说。虽然在这以前，我也读过关于不平等条约、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等问题的文章，但真正对世界的环境和中国局势有些了解，是在此时。这使我能够从比较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包括我的家仇。

也就是这期间，在广东读大学的堂哥萧武惠，不断给我奇来有关广东革命的书刊。当时的广东是革命的根据地，国共合作掀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

如火如荼。我被那里强烈的革命气氛所感染。从广东革命中，我看到了中国的出路，也看到了自己的出路。我认识到，只有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潮中，才能报国恨家仇。

我们行动起来，在学校开展学生运动，当时学校某些教员不专心任教，钻营政界官职，还常向我们灌输功名、利禄等封建思想。在谭步昆老师推动下，我们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共学社”，抗议这些教员的官僚倾向，谭老师半公开他讲第三师范闹学潮的经验，我们仿效着做，比如，举行罢课斗争，驱逐那些腐败教员。县政府曾出面干涉，但也没有办法，只好依学生意见，撤换了些教员。我们取得了胜利，也经受了锻炼。

“共学社”没有社长，只设包括总务部在内的七个部，我任总务部长，开会都是我主持。“共学社”开会很多，经常研究运动情况。我们通过阅读各种报刊，了解国内、省内形势。遇有大事，就开展活动配合。孙中山逝世和五卅运动，我们都组织了较大的活动。由于有我堂哥这个关系，我们得到广东方面的消息很快，比如1924年冬孙中山在广东大学作题为“三民主义”的讲演，我堂哥拿到记录稿立即寄给我，约10天我便收到了。根据这个记录稿，我也在学校作了“三民主义”的讲演，引起人们的注意。

第三学期后，学校又来了一些进步教师，有黄益善、杨宗禧、李祖莲、唐朝英等，他们都是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后来我才知道，黄益善、李祖莲、唐朝英此时都已是共产党员。唐朝英后来成为衡阳地区共产党的负责人。他们带来了更先进的思想武器，也帮助我们吧革命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在李祖莲的引导和介绍下，我参加了嘉禾新建立的国民党组织。当时湖南属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不能公开。秘密国民党组织实际都是共产党员帮助建立的（现在也有材料说，这个组织就是共产党组织），参加的人员是进步的工农分子和青年学生。全县发展了十余名党员，我参加了。

这时，从广东传来东征胜利的消息，黄埔军校声威大振。我的志向是搞军事。如果说开始是出于报家仇的考虑，在经过革命陶冶后，我已把军事斗争看成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最重要的途径。早在1924年黄埔军校开办时，我就得到消息，很想去报考。但打听了一下，黄埔军校和广东的其他几个军校，都要中学毕业生，我当时连立甲种师范都还没有毕业，所以不敢去考。1925年冬，甲师的课程已全部学完。这时，我对中国大革命的形势，已有进一步认识。五卅运动后，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达到高潮，大部分城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南方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特别是广东革命战争的胜利，东征军打下惠州，攻下潮梅，使广东革命根据地达到统一。广东已成了我心目中的圣地，我再也按捺不住去广东参加革命军的热望了，因此，决心不等毕业考试结束就去广东。

行前，我去向已调到同德高等小学当教员的谭步昆老师借路费。我早就把去广东从军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完全支持。当我提出向他借路费时，他慨然应允，以成全我的志愿，这使我异常感动。

我又去找校长李崇本，向他谈了我的想法，并说明我不能等考试完毕去广东的理由。李先生非常赞成我的志愿，夸为“鸿鹄之志”。他不仅准许我不待毕业考试结束就走，而且灵活处理，提前给了我毕业证书。

这时，我还欠学校一个月膳费，不能不交就走。“钱账分明大丈夫”，我就是穷也应该分明，于是去找本校教员杨宗禧，他热情慷慨地说：“你尽管走，欠学校的伙食钱由我来付。”说完他就去找管理员，帮我把账结清了。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谭步昆、李崇本、杨宗禧三位先生的支持和帮助，我就不能到广东，也就不能及时参加国民革命军和北伐战争。虽然以后也可能会去，但不知何年何月，也不知何种境况。人生路程漫长，关键之时先生们帮助了我，每念及此，心中都充满深深的谢意。

1958年1月，我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时，曾到湖南衡阳参加一个高级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我特地去茶陵县，一为了解这个老苏区的情况，二为探望谭步昆教师。在这之前，我与他通过几次信，得知先生在茶陵。我带了两只火腿去看望他，师生久别重逢，情谊之笃，无以言喻。

李崇本老师，我一直未能再见到。红军时期，我曾以在学校的名字（萧武毅）给李崇本先生写过几封信，不想被国民党在邮局查获。湖南省清乡司令部发出训令，一方面通缉我，一方面以共党嫌疑案传讯李崇本先生。先生潜逃他乡，为我当红军而受累，未解放便去世了。1982年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嘉禾城，睹物思人，倍加怀念曾帮助我的李先生。第二天，我找到他弟弟李崇禄医生，一起回忆崇本先生，都叹惋不息。

杨宗禧老师在北伐战争时期，任宁远县农民协会秘书。1927年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农民协会，杨先生在家里躲藏，被一股土匪杀害了。解放以后，因他系土匪所杀，未被承认为烈士。1982年我去宁远，见到科学院院士乐天宇，他曾任宁远县农会委员长，从他那里我才得知，杨先生默默无闻于九泉已有55载。我问土匪是在什么情况下杀害杨先生的？他说是在反动派镇压农民协会的时候。我说这是国民党利用土匪杀害革命份子呀！他说就是如此。我们意见一致，认为应该承认杨先生为烈士。经向有关方面反映，终于承认了。我这样做，不仅仅是回报当年先生的资助之恩，更是为申张革命的正义。

三位老师的帮助，终于使我赴广东得以成行，我从谭先生处拿到路费后，第二天就上路了。我去广东的事，一直瞒着家里。一来是怕父母难过。大哥被杀，二哥远走，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儿，父母一定舍不得我走；二来更怕他们反对、阻拦。书香传人，投笔从戎，征战沙场，父母一时是难接受的。但我义无反顾，早已决心“先斩后奏”。出发前，我回了一趟家。告诉父母我要出门旅行。母亲问我何时回来，我说个把星期。母亲急忙找了两件衣服，我又拿了几本书，打成一个小包袱。临走，我深情地看了一眼已鬓角染霜的父母，默默地向他们辞行。

回到学校以后，我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请孀居城里的堂姐转交。信的开头先讲了一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道理，说广东国民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我准备去参加革命，打倒“率兽食人”、鱼肉百姓的军阀和土豪劣绅。又讲到我家多次受害，长兄被残杀，就是官兵与本地的豪绅勾结，欲报家仇，必去广东。我还讲，也许我尚年青，但唐太宗也是“以少年起兵”，18岁就帮助李渊打天下。后来堂姐把这封信转交给我父母时，二老尽管心里很难过，但并没有责怪我。父亲还对二伯父讲我能从大处落墨，有志向，有胆略。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回家再见父亲，同他讲了些革命道理，都能讲得通，他们对我从事革命活动从不干涉。我想，这就是父母亲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第一天我走了70里，到同宗的杉木桥村，向学友萧亮告别。萧亮的父亲曾当过私塾先生，后来经商。他听说我要去广东，表示反对。说：“你太年轻，还应该上学。”我说我去广东就是上学的，考军事学校，他又说，“你

从没出过门，怎么走啊？”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地图，对他说。“这是我从书本上描下来的地图，上面有许多地名，是我向出过远门的人调查后标上的。”萧父看后感到很惊奇，但还是不让我走，我又不敢顶撞他，就这样僵持了4天。

到第5天，我想，不能再拖下去了，消息传回家里，我父亲很可能来找我，那就不好了。于是，我对萧亮和他父亲说：“不管你们赞成不赞成，我是一定要走的。希望你们不要干涉。”他们见我态度坚决，也不再说什么，就让我走

我孤身一人，步行一天半，到了砵石。虽说早有思想准备，但头一次走出那个生活了18年的山沟沟，总还有点“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意味。我在街上溜达，遇到一个学生模样的人，他热情地向我打招呼，问我去哪里。听他口音是宁远人，我顿感亲切，就告诉他，要去广东找在第二军当兵的哥哥。那人马上说：“真巧了，我也要去广东。我还认识第二军的一个团长，叫李抱冰。你跟我一道走吧。”我见他是个学生，人又热情，就同意了。我们乘船到了韶关。

当时第二军第8团团部驻韶关，那人通过关系使我和他一起住进了团部。我急着要去广州，催他快买票。他说：“不急，先玩玩再说。”他每天出去赌钱，自己的钱赌完了就向我借。我不借，他便说：“去广州的一切都由我安排，你只管放心住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就把钱借给他。一会儿一元，一会儿几毛，借到我只剩下一元多钱了。我真后悔与他同行，但已到这一步，也没有法子可想，只好等着，一等就等了十几天。好在团部还有些书籍和广东出版的报刊，我一天到晚就蹲在那里看书，戴季陶的文章，还有反驳戴季陶的文章，都看了。

十几天以后，我们终于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当隆隆的车轮向南飞驶时，我的心早已飞到广州……

第二章投笔从戎

1926年2月，我到了广州。一下火车，就赶往广东大学（此时已改名为中山大学），找堂哥萧武惠。他见到我很高兴，忙把我安排在一个旅馆住下。又去通知我的二哥萧克允。在师范时，我曾给二哥写信，告诉他我要到广东从军。二哥开始不大赞成，说大哥不在了，他自己早已决定“以身许国”，我如果再出去，家中就没有人管了。但后来他还是表示，若志向定了，他当然支持。

晚上，克允兄也来到旅馆。兄弟三人相聚在南国名城，讲广东的形势，讲黄埔军校、东征军，还有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等。这时我才知道革命阵营中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党派的主张不大一样，而国民党中又分左派和右派。原来革命圣地，也并不那么纯净。但不管怎样，形势还是令人鼓舞的，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和南征，广东已经完全统一，与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央政府相对立的广东国民政府，于去年7月宣告成立。国民政府将黄埔军校校军（名为党军）和驻在广东的粤、湘、赣、滇、桂等各系部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支军队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制度建立的，军、师设党代表和政治部，团、营、连设政治指导员。这是一支不同于中国旧式军队的革命军。我想要投身的，正是这样一支军队。

唯一遗憾的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招生已经结束。我紧赶慢赶，也没有赶上。这时中央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第二期在招生。我看了招生简章，说毕业后可以当士官，便去报考，并考上了。

宪兵教练所原来直属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这时，已归并到黄埔军校。扩大后的黄埔军校更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还是蒋介石。宪兵教练所的地址在广州市。所长杭毅，党代表李安定，黄埔一期学生，是开学以后来的，我只见过他一面。我们第二期分三个大队，我编在第二大队，队长刘嘉树，湖南益阳人，黄埔一期生；大队党代表贺崇梯。我们大队住在广州飞来庙。这里设了小造弹厂，每天能造65口径子弹约万发。庙里又砌了些房子，全队百十人住在里面。1队和3队驻地离我们有里把路，平常很少见面。

教练所学制4个月，实际学了5个多月。学制虽短，学的内容却很多，也很正规，有6门课程：“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陆军礼节”、“内务条令”、“宪兵学”。课程排得很紧，除了课堂讲授外，大部分时间是实际操练，有队列教练，还有单兵和营以下的战术教练。政治教学也是很重要的内容，国共两党的一些名人经常来讲演，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恽代英，讲话极富感染力。

我带着国恨家仇从军，学习的欲望特别强烈，总想在有限的几个月中学到更多的军事知识。从军前，我读过几本古典兵书，有一些军事基础知识，因此，对教练所的课程总感到有些“吃不饱”。有一次，我因事到大队长刘嘉树房里，见到他桌上放着一些书，内有《战术学》、《筑城学》、《交通学》、《兵器学》，就问他：“我们怎么没有学这些教材？”他说，“这是黄埔军校的四大教程。”

我就向他借来看。借一本，读一本，送还再借。不管白天上课和操练有多紧张、劳累，晚上我都要挑灯读书。教程中大部分内容是我从未接触过的，有些需要中学数理基础知识，由于我在少年时代养成了自学习惯，也学会了一些自学的方法，因此，还能勉强读懂和领会。到毕业时，我读完了3本，

只剩一本《交通学》没有读完。这些知识在以后的战争生涯中得益不小。

说到这里，我很感谢刘嘉树大队长。后来，我曾遇到过他，但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相遇的。

1931年我任红一方面军独立第5师师长，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抓了很多俘虏，一天，我到兴国开会，路过一个关押国民党上高级军官的地方。出于好奇，我想看看是些什么人，就向着守人员要了一份名单，一看有刘嘉树的名字，便问：“他是哪里人？”看守告诉我：“是湖南益阳人。”我想，一定是刘大队长了。便进去，一看果然是他，他也认出我了。被俘前他是国民党韩德勤师的团长，面对当年曾是他的学生，如今穿红军军装的我，他很不自然。我见他被捆着，就问看守：“是不是都要捆起来？”看守不置可否。我说，“已经俘虏了，就可以不捆了。”看守给他松了绑。他揉着被捆麻的双手，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却没有说什么。我理解他的心情，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出来了。

我的部队有个医生，是第二次反“围剿”俘虏的，也是湖南益阳人，此时正在兴国办事。我问他认不认识刘嘉树，他说认识。我就从自己的零用钱中拿出一块光洋，让他送给刘嘉树。医生把钱送去，回来告诉我，刘拿到钱，十分感激，一再表示谢意。我说：“他与我有师生之谊，你知道我们红军的制度，不分官兵，只发点零用钱，我能做的仅此而已。”据说，后来他家里把他赎回去了。

1949年我任第4野战军参谋长，一次查看国民党的材料，发现刘嘉树任长沙绥靖公署参谋长（公署主任为程潜）。此时的国民党已兵败如山倒，而人民解放军则所向披靡，我们很快打到湖南。在湘西，时任国民党兵团司令的刘嘉树第二次被我军俘虏。不久，送北京关押。后来我也调北京工作。一天，有关单位告诉我，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兵团司令打听我。我猜想可能是刘嘉树，但当时的情况不一样了，我不便过问，也不便去看他，后来怎样，不得而知。

回想起来，我学军事是从宪兵教练所的学习起步的，刘嘉树引我走进军事知识的天地。但在战场上，我们始终是敌手。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作为老师的刘嘉树两次成了我军俘虏，这中间蕴含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与曲折。

开学一个多月后，有个星期天，嘉禾的黄益善到学校来找我。他也到了广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黄益善是共产党员，但他从未透露，我也不知道，只是从他的言谈话语中，感到他懂得多，会分析形势。他向我介绍了由毛泽东主办的这一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情况，并对农民运动的意义和作用大大宣传了一番。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名字。恰在这时，我从杂志上看到彭湃著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便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书中论述的农民求解放的道理，十分透彻，使我抑郁了两三年的胸怀顿觉豁亮。尤其令我敬佩的是，彭湃出身富豪之家，留过洋，做过官，却抛家舍业，为农民的解放而奋斗。彭湃的形象在我心目中熠熠生辉，成为我人生的楷模之一。

1926年3月20日，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总监蒋介石，借口共产党人李之龙私调“中山”号军舰，违背军令，突然在广州实行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苏联领事馆，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接着又把共产党人从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排除出去。我所在的宪兵教练所也充满了紧张空气。

事件发生后，各种说法都有。蒋介石在他的讲话稿中说，“中山舰事件”是有人图谋推倒他，所以在接到中山舰无故升火游弋的报告后，就采取了紧急的严厉措施。还说：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得到了很大利益，但他们还要对我们

学校（指黄埔军校）采取不友好的动作。还特别谈到共产党党员的政治教官高语罕。说高公开讲过，要打倒北洋军阀，还要打倒本校的军阀。本校的军阀是指谁呢？

日之前，我对于蒋介石还是很尊敬的。我从报纸上读过蒋的一篇辞职书，当时国民革命军攻下惠州城，蒋却辞

了第1军军长的职务，他在辞职书中说：“因兵力扩张，事权增大，诚有造成新式军阀之可能，故中正惴惴自惧……特于本月辞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职。”读了这篇辞职书，我颇为感动，当时认为他是诚实的革命军人。但“中

山舰事件”的发生，不正像他自己说的“兵力扩张，事权增大，诚有造成新式军阀之可能”吗？现在再看蒋介石，其中有不少疑问。

带着这些疑问，星期天，我去中山大学找武惠兄，想了解些情况，正巧黄益善和萧克允等都在，大家围绕“中山舰事件”，议论纷纷。说“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阴谋，目的是利用这一事件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并说蒋介石有野心。武惠对蒋是不满的，他和黄益善持相同的观点，认为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篡夺军权。他一再说：“蒋介石不好，不要听信他的话。”对这些后，我还是半信半疑。

7月间，我在宪兵教练所毕业，被分配到总司令部宪兵团当中士班长。这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5月间，国民革命军第7军一部和第4军叶挺独立团就作为北伐军的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被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6月，第4军和第7军主力也出动了。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市东教场举行北伐代替师大会，蒋介石就任总司令职并发表演说。我们也参加了大会。

那天的会场上，党政军民大约10万人，万头攒动，蓝旗蔽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的口号声，震天动地。穿着灰布军装，头戴大沿帽的北伐军将士，队伍整齐，威武雄壮。这场面使我感到了万众一心所产生的排山倒海的力量。

1840年以来，中国受尽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和封建势力的蹂躏，一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是用屈辱和痛苦写成的。人民盼望打倒列强，结束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如今，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出兵北伐，每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对这场战争都不会无动于衷，更何况我们这样一群热血青年。

北伐军出征后，我每天更注意看报，在激动和兴奋中日夜盼望我所在的部队早日开往前线。

武惠兄在上年冬从中山大学毕业，春天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4军，在政治部任社会股股长。6、7月间，他随4军主力出征湖南，临行前向我告别，相约北伐前线见。克允兄也随第2军升往前线。留在广州的我，心早已飞到硝烟弥漫的北伐战场。但是，命运好像故意跟我作对，我所在的宪兵团偏偏留守广州。真让我憋气。

前线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国民革命军第4军和第7军与第8军会合，打垮了吴佩孚的部队，于7月11日胜利进入了长沙，紧接着强渡汨罗，力克

平江，攻克岳州，整个湖南几乎都在北伐军的麾下了。我再也按捺不住了。离家从军，就是为了征战沙场，报效祖国。前方战事正酣，好男儿岂能安居于后？于是，我就以请假回家为名，实际是想到湖南追赶北伐部队。那时，从宪兵教练所新毕业 300 多学员，军士多，可以自谋职业，我的报告很快得到批准。

我又去找刘嘉树，请他帮助开一张免费乘车的证明，便登上开往韶关的火车。当时粤汉铁路尚未通车，火车只到韶关。我约了两三位朋友徒步经乐昌、九峰到郴州。

离家已有 8 个多月了，走时与父母不辞而别，如今，就要奔赴前线，我想该见上父母一面，给他们一点安慰。

大约在 8 月底 9 月初，我回到家乡，见到父母亲，他们自然十分高兴。母亲忙着给我做这做那；父亲也一改严肃的面目，热情地向我打听北伐军进军的情况。看来，我们这个小山沟也吹进了革命之风。父亲关心北伐战争，而且还知道不少北伐军的情况。一次，他同我说，北伐军中数第 4 军最能打硬仗，是“铁军”，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从报纸上和人们闲谈中知道的。

我离开广州时，黄益善也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回到了嘉禾。一天，他来找我，说想到前方去。我说：“我也正要到前方去，咱们一起走吧！”我们约定了出发的时间。在家住了约十天，我便同黄益善一起出发去衡阳，同行的还有蓝山县两个农讲所毕业的学员。

黄益善在衡阳三师读过书，对衡阳很熟悉。到了那里，就带我们去找熟人，正巧碰到了嘉禾同乡唐朝英。唐在我读师范的时候，当过我一年国文教员，这时是共产党衡阳区委的负责人，但和黄益善一样，是秘密的。唐朝英见到我非常高兴，在学校期间他就喜欢我，经常推荐一些进步书刊给我看，我读的文史兵书他也爱读，当他得知我要去追赶北伐军时，连连点头说：“你学了军事，应该搞军事运动。”但又说：“你搞农民运动也可以。”他告诉我，湖南农民运动已经掀起高潮，搞农运大有可为。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中国革命还得靠农民。他的话我很赞同，因为彭湃著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也是这样讲的，我觉得有道理。但我还是想搞军事，便对唐朝英说：“我先到长沙看看，如赶不上北伐军，就回来跟你搞农运。”唐朝英听我这样说，也不勉强，就说：“你去吧，什么时候想找我，就来。”

我们到了长沙，这时北伐军已打到武昌城下了。一天。我们在街上走，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来是宪兵教练所的同学周从颂，我们虽不在一个队，但彼此熟悉。我问他怎么会来这里？他说，经同学介绍到了补充第五团，这个团现驻长沙，不久将开往前线。他告诉我，补充团进步青年多，风气好，团长蒋先云是共产党人。他动员我也到这个团来。

我还是想到武昌去参加第 4 军，一来堂兄萧武惠早在那里；二来 4 军是铁军，名气大。我对周从颂说：“我先到武昌去，如找不到我堂兄，马上回来，你介绍我参加补充团，行不行？”他一口答应，说：“快去快回，我们就要上前线了。”

我立即乘火车去武昌。到那里，刚好是北伐军攻下武昌城的第 5 天。我忙打听 4 军政治部驻地，却得知 4 军这时已去江西，正在南浔路作战。找不到堂兄，我又返回长沙。这时大约是 10 月中旬。经周从颂介绍，我到补充第 5 团辎重队当了兵器员，经管枪支弹药。

补充第 5 团是北伐战争开始后以俘虏兵士为主建立的，团长蒋先云，黄

埔一期生，共产党员，他原是湖南第三师范的学生，曾在湖南水口山做工人运动，据说，蒋先云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深得校长蒋介石的器重，但在黄埔军校出现反共派别时，蒋先云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拒绝了蒋介石的利诱和拉拢，浩然正气，传为佳话。我到补充团后，没有见到蒋先云团长，听说他兼任总司令部秘书，跟总司令部一起走，部队由副团长傅维钰率领。傅维钰也是黄埔一期生，共产党员，安徽人。后来我参加南昌起义，曾见到过他，当时他任20军第6团团长的，南昌起义失败后，不知去向。后来听说他在上海一二八抗战时做秘密工作。我所在的辎重队分三个股；粮服股、会计股和兵器股。我们兵器股没有股长，只有两三个兵器员，由其中一个军衔高的指挥。

我到补充团没有几天，部队向江西方向开拔了，走醴陵、萍乡、高安、上高，到奉新。这时，北伐军攻打南昌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行军中曾发生了一件事。辎重队的武器、粮服在本队后四、五十里。一天，快要宿营的时候，因前线战斗紧张，团部命令全团辎重第二天赶到前面与本队一起走。天快黑

了，又刮风，白天行军60多里，大家已经疲劳，粮服股高股长派人去执行通知辎重队的任务。叫这个，这个说夜间不认识路；叫那个，那个又说有别的事，没有人去。

我目睹这个情景，很是生气：军队岂有不执行命令的道理？但又想，这支部队新组建，多数人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特别是辎重队，人员比较杂，有的年纪大了，如粮服股有一个军士已40多岁；有的在旧军队干了多年，有些“兵油子”味。

受一种责任感的驱使，我不由自主地进了队部。高股长对我冒然闯进，并未显出吃惊的样子，相反，期待地问我：“你去怎么样？”我马上回答，“可以。”他又问：“找得到路吗？”我说，“今天刚走过来的，怎么会找不到？”我提

出夜间单独走远路，要带个传令兵，另外自己带支步枪和一些子弹。辎重队的蒋铁铸队长刚好进来，马上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和传令兵简单收拾了一下就上路了。月黑风高，寒气袭人。我俩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疾走。路两旁黑乎乎的树丛中不时传来窸窣窸窣的声响，不知是野兽还是什么人。我顾不上细看，心想，反正有枪，遇到袭击就还手。走到下半夜，到达辎重队的宿营地，找着副队长，把命令交给他。稍微休息一下，集合的号音就响了。辎重队按团部命令出发追赶前面的部队，我又随辎重队从原路返回。

这段近五十里的路，我一天一夜走了三趟，大家对此赞许不已，尤其是蒋队长，称赞我军事素养好，胆子大，又吃苦耐劳。

我们从奉新出发，经乐化到了南昌附近的牛行车站，这时南昌已经攻下。不久，我们住进城里，高股长把我要到粮服股，同他一起做事。

补充团在南昌住了7、8天。这中间，北伐军总司令部宣传大队长胡公冕来接替蒋先云当团长，胡公冕曾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军衔为少将。资深衔高，不知为何调任补充团的团长。

在南昌期间，补充团从总司令部领了200支步枪和360箱子弹。不久，部队由南昌向浙江方向进军，蒋队长让我负责押运这些武器。我根据行军方向，雇了两条熟悉鄱阳湖和信江水路的民船，把枪支、子弹装上去，由鄱阳湖进信江，逆江而上，经贵溪、弋阳、上饶，到玉山。我只带个通信员在船

上，两人枪不离身，晚上停泊，注意与陆上部队联络，保障安全。我想到孙子说的“军无辎重则亡”的道理，所以非常认真。

到玉山后，船不能再前行了，我又雇请了一些民工，用独轮车推运那些枪支和子弹。到了浙江常山，有一个司务长阴谋策划兵变被发觉，团里把所有的武器都收起来，部队就在常山整顿。整顿完开始定职。我到补充团后一直接军士衔拿薪金，每月20元。常山定职时，高股长要给我定少尉军衔。由于我在上高夜间传令押运武器任务的圆满完成，辎重队的人对我有好感，蒋队长同意给我定少尉。这样，我就破格由军士直接提为少尉军官。

我们从常山出发，继续向杭州前进。但到金华后，不知为什么就不再往前走了，一住就是二十来天，中间还过了一个春节。

北伐战争开始以来，我千里迢迢追赶北伐军，为的是请缨杀敌。好不容易赶到前线，却一直在沙场的外围行动。攻打南昌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们停在奉新，等我们开上去，战斗结束了，现在北伐军夺取杭州，我们又停在金华。真弄不懂为什么。

我那时职位低，了解情况不多，心地单纯又充满热情，总以为上了战场就可以一展壮志豪情。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心急如焚地想上前线时，蒋介石越来越公开地暴露了反动面目。北伐军打下南昌后，蒋介石突然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企图以军队控制党和政府，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指使驻赣新编第1师诱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16日，他从南昌到九江，又指使青红帮捣毁了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革命阵营面临分裂的危险。

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驻在金华时，接到了堂兄萧武惠从武昌写来的信。那时，北伐军的通信保障很好，只要在信封右上角标上“探交”两个字，再写上某某地区某某部队，信就能收到。武惠兄在信中说，他已随第4军从南浔路回到武昌，说武昌那边好一些，叫我立刻请假到武昌来。

接到武惠兄的信后，我立即向团里请假，决心到“铁军”去。有个姓周的连副也去湖北，我们一起走从金华返回玉山，经南昌到九江，大约是2月底到了武昌。

第三章到“铁军”去

随着北伐战争从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大革命的中心也由广东转移到武汉。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政治会议正式决定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但由于当时粤汉铁路尚未全线通车，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成员从广州至武昌途中需时较多。因此，同年12月13日，已经到达武昌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成员，就组成了由宋庆龄、孙科、陈友仁、徐谦、吴玉章、邓演达、董必武等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最高职权。当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南昌公然扣留途经南昌前往武汉去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人员，企图以军队控制党和政府的时候，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就酝酿一场旨在反蒋的“党权运动”。

我到武昌正是“党权运动”将要发动的时候，开始还只是在内部讲，报纸上没有登，街上贴的大标语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我堂兄所在的第4军政治部共产党人和左派比较多，反蒋气氛也比较浓。我去找堂兄时，听到他们都在议论蒋介石，情绪十分激动。

堂兄一见我，便说：“你夹了就好，不能跟蒋介石走，他快要变成军阀了。”我这才知道为什么武惠兄写信让我立即到武昌来，也才知道曾经高喊革命，俨然以孙中山信徒自居的蒋介石，走上背叛国民革命、背叛孙中山遗志的反动道路了。

不久，“党权运动”由内部转向公开，武汉三镇到处可见反蒋的标语，报纸上也每天登载反蒋的文章。革命阵营出现了大分化。南京方面不少反对蒋介石镇压工农运动和不满意其搞军事独裁的革命军官，纷纷脱离蒋介石跑到武汉方面，我们补充团的两任团长蒋先云、胡公冕（胡在北伐军进到浙江时期改任由白崇禧任总指挥的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副团长傅维钰等都陆续到武汉来了。有些受蒋介石排挤的部队，也由南京转到武汉方面，我二哥萧克允所在的第2军；还有第6军，就是这个时期脱离蒋介石转到武汉的。而武汉方面一些比较有的军官，则脱离武汉国民政府跑到南京方面，追随蒋介石去了。

我是从浙江到南昌又转到武汉来的，当然，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对于政治天平的倾斜起不了多大作用，但那个时候，转到武汉，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政治态度。

武惠兄把我介绍给11军第24师政治部主任陈兴霖。11军是由4军一部扩编的，24师师长在戴戟走后，就由北伐名将、共产党员叶挺继任。

陈兴霖主任同我谈了两次话，一次是谈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认识，我没有刻意渲染，只是将平时所见所感，结合读过的一些书，实实在在地谈了自己的理想。陈主任听后，说我思想对路，约定再谈。这次谈话就涉及到对蒋介石的看法。我刚到武汉时，武惠兄就对我讲蒋介石的政治态度，原来我对蒋介石是尊敬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由崇拜孙中山转为尊敬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蒋在统一广东战争和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中有功，对他的尊敬日益上升。“中山舰事件”后，有些降低，但北伐后又回升；可是，蒋介石例行逆施，叛变革命，我对他的态度就彻底变了，由尊敬到反对，一直十分痛恨。关于这方面的谈话与陈主任也相投。

不久，陈兴霖把我分配到时挺部71团3连当政治指导员。从此，我就成为铁军的一名成员了。陈兴霖是徐州人，共产党员，参加了南昌起义，南下

途中我曾见到过他，起义失败后不知去向。直到前些年，我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工作，在一份材料中，看到有个叫陈子坚的、括号中注着陈兴霖。我要政协的秘书查询陈兴霖是不是任过铁军 24 师政治部主任。他查询后回答说，并告诉我，他现在是全国政协文史馆的馆员。后来我的见他，听他讲，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徐州老家，以后同党失去了联系，在方振武、冯玉祥、杨虎城的部队里来来往往，认识了共产党人南汉辰。解放后，南任中央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办报纸，就让他去编报，以后又到全国政协工作。

那次见面后不久，他就病故了。全国政协召开一个小型的追悼会，我去参加了。陈兴霖的后半生多少有些孤寂、落寞，而北伐战争时期的他却豪气勃发的。

我到 71 团 3 连当指导员不久，部队开始搞“党权运动”，经常开大会。军里开，师里开，团里也开，有时是军官会，有时是军人大会，记得有一次全军军官会议，几百人挤在不大的礼堂，军政治部主任徐铭洪主持会议，由政治部宣传科长屈凌汉演说，内容主要是说党权高于一切，反对蒋介石搞军事独裁。我至今印象深刻，屈凌汉是大学教授，知识面宽，讲话条理清楚，对党权运动做了很好的宣传。

那个时期，部队除了搞些军事训练外，政治上就是反蒋。我们连指导员的任务，便是根据军政治部发的提纲向连队进行宣讲。大约是 4 月上旬，我看到《武汉民国日报》上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文中揭露了蒋介石在赣州、九江、安庆指使流氓暴徒捣毁总工会，农民协会，杀害共产党人陈赞贤的暴行。我还记得这样的话：“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了，他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生动具体，就用作连队上课教材。文章一读完，全连官兵对蒋介石真是义愤填膺。那时，连队还挂着蒋介石的像，我就在他的像旁写了四句话：“昔日为英杰，今日为鬼蜮。尔像虽如前，人鬼已有别”。连里一些人看了，都笑赞说：“写得好。”后来，我在构思小说《浴血罗霄》时把这个情节也写进去了。

蒋介石是个善变的人，革命时如此，反革命后更是如此，而且变本加厉。4 月 12 日，他终于撕下最后一层假面具，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公然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紧接着，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清党”，大批共产党人如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以及无数革命群众被残杀。4 月 18 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

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讨蒋。大约是 4 月上中旬之交，驻武汉的军队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东征讨蒋誓师大会。会后出发，走了四、五十里，突然停止，接着又让我们返回武昌。住了 7、8 天，又在武昌的南湖开誓师大会，号召继续北伐，讨伐正从河南南下直接威胁武汉国民政府的奉系军阀。

这次誓师大会的规模，比上一次还大，武汉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重要人物谭延恺、徐谦、恽代英、廖乾吾、张发奎、郭沫若、彭泽民、唐生智等都参加了。过了几天，部队陆续出发去河南。

我们团是 4 月 26 日从汉口刘家庙乘火车走的。叶挺师长留在武汉任卫戍司令，24 师去河南两个团，第 70 团归 25 师指挥，第 71 团归 26 师指挥。26

师是新编的部队，直辖两个团：76团，团长沈久成；77团，团长是蒋先云。26师当时由副师长吴仲德指挥，吴是北伐军从广东出兵打到武汉的将领，有战争经验。

说起吴仲禧，还有一段故事。前些年我去广州，与当时广东省省长刘田夫同乘火车。闲聊中，他提到认识吴仲禧，说吴现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我本知其名，但不知是否为北伐时指挥我们的副师长，刘说他参加了北伐战争。我到广州就给吴仲禧打了个电话，说我要去看他。

他一听，忙说：“我去看您，我去看您。”

我说，“不要来，不要来，我已经准备好去您家了。”放下电话就去他家。

他惊喜之中似乎有些不安，总是称呼我“萧副主席”（当时我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说：“不要这样，按照咱们中国的习惯，您比我年长，我应该来看您。”

我们一起兴致勃勃地回忆了北伐往事，我记得在临颖大战中，他指挥得好，打了胜仗。第二天，在驻地广场上，他和张发奎向我们三个团讲话。进至开封，又集合连以上军官开会和吃饭。从河南回来后，张发奎成立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调他当副官长。我党发动南昌起义时，他随张发奎到了广东，参加军阀混战。张部在广州打败仗，被编为第4师，他脱离军队，回福建老家办学校。七七事变后，同我党有联系，一直在张发奎部做统战工作。据他说，董必武承认他1939年入党。

我在他家里坐了好久，后来他到北京，也到我家。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前几年他逝世。

向河南进军的部队，行动迅速。71团到河南驻马店下火车，就向汝南前进。当时汝南一带驻有武汉政府收编的军阀纪元林的一个师。这支部队虽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此时又叛变了。我们从汝南城过，他袭击行军队伍，我团立即还击，损失了二百多年步枪和五挺重机关枪。

这次战斗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卖战。耳边呼啸的子弹，眼前升腾的硝烟，令我激动、兴奋。我连奉令坚守城墙的一段，我协助连长指挥作战，一次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从上午直打到天黑。我虽是初次上战场、但早有思想准备，在连长指挥下执行任务。天黑后，接到撤退转移的命令，我协同连长带部队夜间顺利渡过河，连长郑鸣英非常高兴，他没有想到，我虽为政治指导员，也能打仗，而且第一次就能与他很好配合。

我团休整了几天，上蔡地区又大打起来。有天吃过晚饭，我们向上蔡前进，夜行军五、六十里路，天快亮时到了战场。还没等我们上去，仗打胜了。

这一位是打奉系军阀赵恩臻。赵部为奉系军阀的主力之一，归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统率，有战斗力。4军12师、11军24、25师部队参加了战斗。那真是一场恶战，双方都投入了强大的兵力。五、六年后我在江西苏区看到参与这一战役的苏军顾问戈烈夫写的《中国的军队》一书，其中对这一战役作了详细描写，并盛赞铁军的战绩。在这一仗中，4军12师36团打得很出色。

前些年，当时的36团团长宁汉魂从美国回来，中央让我接待他。我宴请他及其夫人、女儿。宁汉魂已八十多岁，眼花耳背，精神欠佳，我同他讲话，多由夫人和女儿传话。我想他一定还记得二期北伐打仗的情形，顺手在请柬上写了几个字：上蔡、东洪桥、西洪桥、临颖。他一看，马上兴奋起来，老

眼闪出光泽，话也多起来，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些地名？”我说：“当年北伐军在这一带打仗，你指挥 12 师 36 团打得好，全军都知道。”他更惊奇，又问：“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我说，“当时我在 24 师 71 团 3 连当指挥员，我们也赶来参加战斗，但未接触上，前面就把敌人打垮了。”

他听后，显得很高兴。老人喜欢怀念往事，更何况这是他一生中有光彩的一件事。后来他回美国，由其夫人吴菊芳写了一篇通讯，说我和他曾在一起战斗，洋溢着友好的气氛。

上蔡战斗结束后，我们向东北走，到了商水、周家口、又向西北打。临颖一仗是与张学良亲自率领的奉军精锐主力较量。那天，独立 15 师贺龙部打左翼，黄琪翔率 12 师打正面，26 师 76、77 团为右翼。我们团初为纵队预备队，中午进入 12 师与 26 师之间参加战斗。

这一仗是北伐军在河南战场上打得最激烈的一仗。北伐军从东、南两面进攻临颖城，前仆后继，奋勇冲杀，不日将奉军全部击败。但我军的伤亡也很大，特别是 26 师，76 团伤亡了一半，团长沈久成负伤；77 团伤亡了五分之四，团长蒋先云牺牲了；我们团上去的晚一些，也伤亡了一个营。

战斗胜利后的第二天，张发奎、徐铭洪、吴仲禧集合 26 师（含 71 团）讲话，张发奎很激动，说，“这一仗证明 26 师也是铁军。”对蒋先云的牺牲，深为叹惋。

蒋先云，我在补充第 5 团时，他是我们的团长。1927 年春“党权运动”时，他脱离蒋介石到了武汉，初任工人纠察队长，二期北伐时任 26 师 77 团团长，该团新组成，于 5 月 28 日参加临颖大战。战前，他向全团演说：“我团是新建立的，打仗有没有把握？”他肯定地说：“我觉得是有把握的。因为我有一条命去拼，有一腔血去流。”蒋先云在战斗中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身先士卒，直到阵亡。

临颖大战后两天，一营营长吕承文找我谈话。吕是广东人，云南讲武堂毕业，与叶剑英同学。他对我说：“这次战斗军事干部损失太多，二营四连连长又病了，你懂些军事，就去代理连长吧。”

我对工作调动倒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有点不愿与郑鸣英连长分开。郑连长鼓励我说：“去吧，我在三连，你在四连，咱们一块儿干。”

我到铁军近三个月，与郑鸣英连长朝夕相处，建立了革命的友谊。郑连长中学毕业后曾当了几年小学教员，又是黄埔三期毕业，共产党员，能干且热情。他在工作上支持我，帮助我。刚开始讲政治课，我没有经验，他就把军政治部发的提纲先看一遍，然后告诉我讲的重点。下课后，又帮助我分析总结。我发现，他虽然是军事干部，但懂得政治工作。我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到河南后，我们又一起带兵打仗，他看我军事上有基础，能指挥军队，很高兴，我们更加相投。

打临颖前，有一天，我看他拿着一份《响导》报读。我在师范和广东就看过《响导》报，非常喜欢，就向他借来看。送还时，他问我：“以前看过这类报纸吗？”

我说：“《响导》报早就看过，还看过《共产党宣言》，但不大懂。”他马上说：“有一本书你可以看看。”说着，从公文箱里拿出一本市哈林著的《共产主义 ABC》。这本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好看。个别不懂的地方，就问郑连长。我对郑连长尤其信任，有什么话愿意跟他说。

那时正是 5 月间，我们几乎每晚都在村庄外的小树林露营。我和郑连长

搭两个铺，中间放公文箱，面对面躺着，无拘无束地谈心。我把自己的家世、仇恨、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理解，都同他说。他则给我讲阶级斗争，讲社会发展史，讲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讲到激动处，就从铺上坐起来，挥动着手臂。夜色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想象得出，一定是神采飞扬的。

与郑连长的谈话，使我的思想产生了飞跃。在广东，我看彭湃著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一书时，就对书中关于铲除剥削者，实现天下大同的论述很感兴趣。但此时我的思想基本上还是三民主义的。我崇拜孙中山，对于他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最赞成。这不但因为我的家庭受过封建地主的压迫，更因为我看了中国历史和辛亥革命时期的书，观察视角从一个家庭，一个乡村扩展到整个社会，看到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就在于封建统治的黑暗腐朽和外国强权的侵略，认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就能铲除压迫，实现人人平等。这种观点也是受中国一些历史传统的影响，《礼记》中有一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中山多次引用过。中国人喜欢这种精神，也喜欢这样的境界。

在师范时期，我曾读过《独秀文存》，书中很多文章提倡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还有反对迷信等文章。其中有篇《偶像破坏论》，以一字开头，十字收昆。即：“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元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下动，十（实）是无用。”寥寥40字，形容确切，文词精炼，直到现在，我还能记下。

我从书报上读陈独秀的文章较多。“中山舰事件”后，他和高语罕写给蒋介石的信，我都认真读，也信他的话。后来得知陈独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我对共产党的主张开始注意。我觉得孙中山思想中的某些地方与共产党的主张相接近，而共产主义较之孙中山的思想似乎又更加合理。孙中山说过一句话：“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我望文生义地理解这句话，却也成为我由民主主义而信仰共产主义的桥梁。

在武汉的时候，我看了《共产党宣言》，尽管不全懂，但书中揭示的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规律，令我欢欣鼓舞。进军河南以来，在与郑连长的多次交谈中，我对共产党的主张、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知道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致的，而最后的目的则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记得有一次，我教部队唱在师范学的《卿云歌》（当时的国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郑连长听到后，就对我说：“我给你一首更好的歌，叫《国际歌》。你唱的国歌是中国的，这《国际歌》则是世界的。”说着，取出油印的歌词和歌谱，一边教唱，一边给我讲解，当唱到“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时，他说：“英特纳雄耐尔就是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一定会实现！”

共产主义理想像放射光芒的灯塔，把我的胸怀照亮。从这时起，我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并产生了要加入共产党的迫切愿望。

当时，共产党的组织是秘密的，党员不公开，我也不好打听。但我们有一种自然形成的看法：凡是思想作风好，工作负责，勇敢坚定的人，就会是共产党。比如，大家感觉叶挺师长好，就私下里议论他大概是共产党。在我们心目中，共产党员的形象是余高神圣的。

然而，这时的革命形势正在向低谷跌落。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屠杀共产党人已达疯狂程度，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5月20日，许克祥又在

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三湘大地血雨腥风。著名的共产党人郭亮被杀害后，头颅悬挂在电线杆上。这些情况我们进到开封时就从后方传来了。残酷的现实使意志不坚定者畏缩了，但真正的革命者却在血与火中经受考验。

有一天，我们正在行军，政治部下发印着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死的画报。李大钊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也读过他的一些文章，知道他是与陈独秀齐名的共产党领袖，叫“南陈北李”。看到他牺牲的消息，我们又悲痛又气愤。事也凑巧，东西洪桥和临颖战役时，奉军为扫清防御阵地的射界，把散兵壕前即将成熟的大片麦子，或割倒，或砸平，暴虐到顶，我们目睹此景，对奉系军阀恨得要死，同时对共产党的主张更为向往，我要求入党的愿望更加强烈。

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有一天，郑鸣英问我：“你不是想加入共产党吗？”我说：“当然想，可我找不到啊！”其实，我已猜到郑连长是共产党员，就有意试探：“你能帮我找找吗？”他神秘地一笑，说：“我想想办法吧。”就在决定调我去4连代理连长的那天晚上，郑连长告我：“你想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同意了。”

6月中旬我团回师武昌，途经许昌。一天晚上，他让我去参加一个会。我问：“什么会？”他低声说：“你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实现了，今晚就举行入党宣誓。”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郑连长带我到团部的一间房子里。2营营长廖快虎把一面画有镰刀斧头的小红旗挂在墙上。一会儿团参谋长刘明夏进来，会议就开始。廖营长主持会议，郑连长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讲完便由我表态。我简明扼要地谈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加入党组织的迫切愿望。接下来进行入党宣誓，我们都站起来。我向党旗举起右手，庄严而又坚定地宣读誓词：“努力革命，服从组织，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入党仪式结束了。从此，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走上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路。

这是1927年的6月中旬。

形势在继续恶化。武汉革命政府开始分化，曾经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的汪精卫，也开始走向反革命。正当我们与奉系军阀浴血奋战之时，汪精卫却与蒋介石、冯玉祥进行着一场政治交易，准备用共产党人和工人农民的鲜血来换取所谓的“宁汉合作人”。

临颖战斗结束后，部队经朱仙镇开往开封。我读小学时，就在课文中熟知朱仙镇这个地名。南宋时期的民族英雄岳飞在汝南、临颖一带与金兵大战，曾在朱仙镇打了一个大胜仗。我崇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尤其是岳飞。听人说，朱仙镇还有一块岳飞的石碑，我就去看看。

因郑州以南铁路被奉军破坏，北伐军回师时，就由开封步行到许昌，第一天在朱仙镇宿营，我同一位对历史有兴趣的同事去找岳飞的石碑，很快找到了，上面刻着岳飞的词《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这首词我小时就读过，此时看到它，心情格外激动。词中洋溢着的爱国激情和英雄气概，曾经激励了多少人！我们在北伐战场拼杀时，也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

这首词刻在朱仙镇的石碑上，似乎又在诉说着历史的悲伦。当年岳飞在

朱仙镇大败金兵，眼看就要进军漠北，收复半壁，宋高宗这个昏君连下 12 道金牌，将岳飞召回杀害。联想到眼下的形势，革命将士用血肉为北伐战争铺就了胜利之路，新军阀、右派却在胜利之后大打出手。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割据东南地区，许克祥在湖南的政变，夏斗寅、杨森反水，进攻武汉，破坏北伐军后方等。

历史的悲剧在重演。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我们于 6 月 21 日回到汉口刘家庙，就在长江边露营。武汉国民政府虽早已将市内的外国租界全都收了回来，但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军舰还赖在江面上。入夜，他们用探照灯向我军照射，刺眼的白光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我们恨得咬牙切齿，但我们这些步兵，对于帝国主义的兵舰有什么办法呢！

在武汉住了大约一个月，每天搞训练。一天，我从训练场回到连部，黄益善和一些嘉禾的乡亲来找我。我和黄益善是在长沙分别的，当时我参加了补充第 5 团，黄益善被派回嘉禾搞农民运动。半年多来，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他突然来找我，一定有什么事。黄益善说：“你六哥告诉我们你的工作单位和地址，听说你由连指导员改任连长，直接指挥打仗，我们就来找你谈谈。”接着，他讲述了家乡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事情。

黄益善回嘉禾后，组织农民协会，我姐夫黄相憬、我堂哥萧克勤的内弟彭邦俊，还有小学教员王锡球、何辅汉等都是农民协会的积极分子。他们发动农民与土豪劣绅作斗争，萧仁秋之流在农民运动的打击下，也威风扫地。正当农民挺起腰杆，扬眉吐气的时候，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原先打着革命旗帜的军队，突然调转枪口，对准农民协会。各乡的地主豪绅也跟着作乱，萧仁秋就在嘉禾组织镇压农协，他的叔叔带着军队捕杀人。当时区农协就设在我的家乡小街田村，由于农协无准备，反动派一来，黄相憬、彭邦俊、王锡球都被打死了。从此，家乡一片白色恐怖，黄益善和参加农民协会的人，就跑到武汉来找武惠兄和我。

听完黄益善的叙述，我气得两眼冒火。萧仁秋与我仇上加仇，此仇不报，怎对得起家乡父老？我拉着黄益善他们就去找我六哥，商量要回家报仇。

武惠兄也很气愤，他说：“是该回家乡去搞。这里的气氛不对头，汪精卫讲话也没有多少革命味道了。咱们弄些武器，回家乡拉一支队伍，再搞农民协会。”

我们都赞成他的意见，武惠这时担任武汉军用被服厂的中校指导员，同 4 军也还有联系，就去 4 军找了几箱手榴弹，加上我的一支驳壳枪，准备回家去拉队伍。

我们都很兴奋，分头准备。

过了两天，武惠兄大清早来找我，见面就说：“那个计划不能干了。”

我忙问：“为什么？”

他说：“现在形势大变，湖南已全被反动派占领，要通过长沙都困难。”

经他一说，我也冷静地考虑了一下，觉得有道理。又去找黄益善，他是个老练的同志，已经想清楚了。于是，我们就打消了这个计划。决心参加不久就会行动的东征讨蒋。我继续在部队工作，黄益善他们留在武汉（黄不久参加南昌起义）。

此后不久，我们接到出发命令，乘船去九江。

这时，汪精卫等在武汉分共，而我们并不知道国共分家的情况，也没有意识到将要参加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行动……南昌起义。

第四章参加南昌起义

我们从武昌乘轮船到了九江。这时，九江里里外外住满了军队，除了我们24师，还有黄琪翔的第4军、贺龙的第20军以及朱培德的部队。

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从此国共分裂，汪精卫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

我们在九江，虽不清楚国民党上层发生的这些变化，但已感到形势严峻。不久，党内开始批判汪精卫，政治部也半公开地进行反汪宣传。那时，多数连队有党员，营一级设党小组，团一级设党支部。党员身份、党内职务都不公开。2营营长廖快虎可能是我们营的党小组长，因为总是他召集我们开党的会议。到九江以后，廖营长经常找我们谈当时的政治形势，讲到汪精卫时，他的情绪特别激动，说：“汪精卫不是总理的真正信徒。现在国共已经分家，汪精卫背叛三大政策，同蒋介石一样，是我们的敌人。”

廖快虎营长是个很好的同志，在那段复杂艰难的日子，他隔一两天就找我们谈话，做了大量细致和卓有成效的思想动员工作，使大批像我这样有革命热情但又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青年党员，在革命的转变关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明确的方向。南昌起义南下广东时，廖营长在汤坑战斗中牺牲了。

快要离开九江的那几天，团里也开会，公开反对汪精卫。我们71团团长欧震不是党员。会议由参谋长刘明夏主持，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表示对汪精卫反革命的义愤。

有一个连指导员发言说：“汪精卫一路跟孙先生走，他还是好的嘛！”话音未落，大家群起反驳，说：“汪精卫现在反共反工农运动，没有一点革命的气味，好什么？”

我也在会上发言，说：“过去对汪先生非常崇拜，因为他革命，我特别喜欢他辛亥革命前在北京坐牢时写的一首诗：‘慷慨歌燕冀，从容作楚囚，举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但是，现在他还有一点‘慷慨歌燕冀’时期的气概么？”

有人插话说：“汪精卫反动了，国民党是不是都动摇了？”

我说：“不管是谁，他不好就不拥护他。”

刘明夏说：“蒋介石、汪精卫不好，不等于国民党不好。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好的，孙夫人也还是好的嘛！”

我那时年轻气盛，政策懂得不多，加上位在基层，对上面的情况也不很清楚，以为汪精卫一叛变，国民党就会坏了。后来我才知道，“七一五”汪精卫分共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曾在武汉发表声明，抗议汪精卫集团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的“新政策”，她宣布不再参加“本党政策的执行”。

南昌起义前后，我们党还没有完全放弃国民党这面旗帜，对于国民党上层人物，也还是区别对待的，比如对张发奎就采取争取的政策。张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握有兵权，当时他想把二方面军拉回广东另立“山头”。我们党利用他的这一心理，欲将左派掌握的部队带回广东，重新聚集和组织革命力量，同蒋汪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我记得，从武昌到九江，军、师政治部贴的大标语，都还是“拥护张总指挥”。

在离开九江前，有一天，欧震团长把全团集合起来，说是叶挺师长要来

训话。我们穿戴整齐，打着绑腿，精神抖擞地立正站好。一会儿，叶挺师长来了，一个马夫牵了匹马，跟在他身后。叶挺师长打着绑腿，军容严整。他讲话要我们继续执行总理的三大政策，坚持革命。又说，我们很快就要出发，铁军是有光荣传统的，要遵守纪律，爱护百姓。他还讲了几句赞扬张发奎的话，说相信张总指挥能继续领导我们干下去。

1927年7月下旬，我们从九江出发，向南昌开进。先坐了一段火车，又步行了一段路，在涂家埠还住了一夜，路上走了三四天。

一路上，党内又开了几次会，这时已明确动员要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廖营长在动员中说：“蒋介石、汪精卫屠杀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人，断送了国民革命，我们要重新干，打回广东，再来北伐。”

后来我听说，党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就是我们在九江这个时期。当时，我们党发现张发奎亲近汪精卫，也开始实行“分共政策”。7月20日，中央一些负责人在九江开了个碰头会，决定“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20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这个意见由瞿秋白带回武汉交中央。中央接到报告后，立即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确定起义后，部队南下广东，占领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进行二次北伐。中央还决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这次起义。

我们到南昌住了几天。31日下午，廖营长和1营营长魏权通知我们连以上党员干部上街看地形。

吃过晚饭，我们以走街为名，转了几个地方，把敌人的位置都搞清楚了。9点以后，开始做战斗准备。那晚，我们都没有睡觉，心情十分兴奋。虽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次行动对中国历史将发生具有转折意义的影响。但我们觉得，能够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继续高举革命旗帜，说明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地肩负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8月1日凌晨两点钟，战斗打响了。我团驻在城南松柏巷天主堂附近。天主堂内和距此不远的匡庐中学，驻扎着归附汪精卫集团的第6军57团，我们的任务就是消灭这个敌人。3营攻打天主堂，我们2营攻打匡庐中学。在营长廖快虎的率领下，我们一下子冲进学校，敌人撑不住，仓皇爬上城墙，企图逃跑。城墙上早已布置好了工人纠察队和公安局的警士，他们一阻击，敌人又退回原地。这时，我们就把敌人紧紧围住。天快亮时，敌人一个营全部缴械了。

南昌起义后，我团就住在离匡庐中学约两里路的一条小街上，25师75团与我们相邻。饭后在街上散步，我们常碰面，就在一起聊天。据他们讲，起义前，他们与25师师部一起住在南昌北面的马回岭，25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而75团团团长又是李汉魂的人。但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党组织比较健全。1营营长孙一中就是党员，当他接到党关于发动南昌起义的指示时，就找了几个党员干部和左派军官商量，决定以打野外的名义把部队拉出去。为了减小目标，按当时军队习惯，打野外不带背包、行李、伙食担子，只拿武器弹药。另外，卫生队、辎重队、特务连、机关枪连、侦察连等都是团部直接指挥的，也不便于行动。8月1日凌晨，南昌打响后，他们即按预先约定，以打野外为名向德安集中，开往南昌。

在起义中还有一件戏剧性的事。住在马回岭而建制又属25师的73团，前身是叶挺从广东率领参加北伐的第4军独立团，也是我党在北伐军中组织

健全战斗力强的部队。他们按党的指示南下起义时（前委派聂荣臻通知的），张发奎和李汉魂乘火车追来，但部队已向南昌走了，李接近我军后卫营，要队伍停止，营长周子昆回答：“团长（当时团长为周士第）命令我们出发，我服从团长命令。”这种层层命令是当时军队指挥习惯，其实周子昆这次行动，是他在接到党的起义指示后，利用这种习惯势力来抵制反动军官的指挥。周子昆以后长期在红军工作，对党忠诚，战功卓著，抗战时任新四军副参谋长，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了。

75团拉出了12个连，基本部队都出来了，师长、团长都不是共产党员和左派，但部队却能带出来。1营营长孙一中是共产党员，他事先通知党内有关人员及左派，又以营长职务调动部队，带出了三个营，显示了党的政治影响和组织的重要作用。

我们在南昌又住了几天，主要是作政治动员。起义时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发了不少文件，像《革命委员会联席会议宣言》、《农民解放条例》、《劳动保护暂行条例》等等，我们都看到了，便组织部队学习。南下广东这一战略目标，起义前就说过，这时提的更明确，政治动员也主要是解释南昌起义和南下广东的意义。

那时对张发奎还是采取争取的政策。起义的第二天，贺龙、叶挺分别电告张发奎，表示欢迎他到南昌来。公布的革命委员会名单中，张发奎是主席团7个成员之一。《叶挺致张发奎书》发到了部队，其内容就是劝张发奎过来的，我还记得这样的话：现在到湖南扩兵也不行了，张总指挥还是指挥我们一起南下云云。

当时对张发奎采取争取政策是必要的，因为张在二方面军中有信仰，争取他可以争取一部分军官，并保持二方面军完整的战斗力。另外，张发奎与蒋介石特别是广东的李济深、黄绍竑等有矛盾。利用矛盾，分化敌人是对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政策起了一定作用。1932年在江西时，我听张云逸（当时任张发奎部第四军参谋处长）说，张发奎到广州后，还派人到潮汕同起义军联系，走到惠州，得悉起义军已失败便作罢了。如果我们打胜了，他还有可能与我们联合，至少要迟一点分化。

从南昌出发，20军走前面，11军跟进。盛夏季节，赤日炎炎，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好在开始路还比较好走，路两边有很多老百姓摆摊，卖西瓜和其它水果，也有卖茶水的。北伐军在这一带多次来往，老百姓对北伐军的纪律非常赞赏。我们走过时，不断有老表们打招呼，作关切的问候，有的还主动递上瓜果和茶水。尽管行军十分辛苦，部队的士气还好。

但两三天后，由于天气太热，人已非常疲乏。部队中大部分是湖南、湖北人，且多为农民，让他们远离家乡，艰难跋涉到广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出发前虽然做了宣传和动员工作，但时间有限，工作做得粗，特别是部队中的各级党组织还来不及建立或健全，两湖籍士兵不少开了小差，我团甚至有3个连指导员也走了。他们都是我当连指导员时的同行，多次在一起开会。平常这些人讲得头头是道，显得很“左”，但遇到困难就擅自离队，我们才知道他们革命并不坚决，深为鄙视。

到抚州后，部队停下来休息。领导上把政治上不可靠的军官调整一下，以巩固革命的指挥权。

当时，起义军刚从国民革命军转变为新军队，成分和情况都很复杂。虽然从总体上说，这支部队是由我们党领导的，但士兵中的党员很少，干部党

员也不多。比如我们71团，只有参谋长刘明夏是党员，3个营长，除2营长廖快虎是共产党员外，那两个营长也仅是左派军官。但有一点很重要，部队中对叶挺的信仰高，军官都服从叶指挥。非党军官多数有战场经验，指挥打仗有一套，因此，不能也不应把他们全部掉换。即便换了一部分，也是在起义以后逐步调整的。这样就团结争取了不少人，也保持了部队的稳定。

但也有不足，比如对10师师长蔡廷锴，当时已发现他态度暧昧，但前委却继续让他带兵，并单独让他做前卫，又不采取防范措施，结果该师3日从南昌出发，4日走到进贤李家渡，蔡就率队脱离起义军，转向赣东入闽，投奔早已脱离革命的陈铭枢去了。

在抚州，我从8连调回4连当连长。没几天，就赶上全军开大会。记得会址在抚州一座石桥旁边的沙滩上。吃过晚饭，太阳快落了，天还不太黑，地面虽然散发着热气，但不那么灼人。我们的队伍排列在夕阳映红了的沙滩上，叶挺军长（南昌起义升任11军军长）站在队前，他依然军容严整，讲了几句后，就把一位头戴博士帽，年约50岁的老人，请到队前，说：“请彭泽民先生为我们讲话。”

队列中响起热烈的掌声。彭老是我心中久仰的人物。早在1926年我刚到广东投身革命时，就听说他是一位华侨革命家。北伐军打到武汉后，他任武汉国民政府的海外部长，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过华侨革命运动。南昌起义后，我在一张布告上看到有彭泽民和徐特立（徐是湖南教育家，我在师范读书，校长李崇本就介绍过他从事教育的业绩。）的名字，就生出一种奇特而又崇敬的心情。因为那时我们都是下级军官，又年轻，而彭老和徐老已年过半百，就觉得他们很“老”了。老年从军，令我们这些年轻人既惊奇又敬佩。

彭老在讲演时，情绪很激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痛斥蒋介石、汪精卫之徒叛变革命，气愤地说：“清党，清党，清他们的狐群狗党！”彭老还痛骂徐谦，说：“在武昌时徐还讲要东征北伐，不打胜仗不回来，余下一颗子弹也不回来。现在他干什么去了？去做蒋介石、汪精卫的狐群狗党了！”

以后在瑞金，我又听过彭泽民的讲演。当时我们刚在会昌打了胜仗，他神采飞扬地说：“听说你们打败了钱大钧和黄绍竑，我也不觉得老了！”

南昌起义失败后，听人说，彭老在香港当中医，一直坚持抗日反蒋，同我党也保持联系。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到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并兼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在50年代，我又见到他，并到他家去拜访。这时，他确实老了，但精神并不见老，依然乐观爽朗，谈笑风生。

我们在抚州住了几天，就向宜黄前进。

8月的江西，多晴少阴。从南昌出发十多天了，就没遇到一个阴雨天，火辣辣的太阳总是高悬中天，连一丝云彩的遮挡都没有。顶着骄阳行军，人昏沉沉的，由于出汗过量，腿脚也有些发软。站在路边的宣传队，用话筒喊口号、唱歌或说些顺口溜，给部队鼓劲。革命委员会的一些女同志，也在宣传行列里，顶烈日、冒酷暑作宣传鼓动工作。这使我们深受鼓舞。

靠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在南下的路上奋力前进。

快到宁都的时候，一天，在路边十分显眼的地方，贴着一张革命委员会保卫处的布告，上面写着：离×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叫××的大土豪，

让部队自动去挑谷。布告落款处签着革命委员会保卫处处长李立三的名字。

这张布告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看到党公开号召打土豪的布告。在这之前，我们都是花钱买粮吃。那时，粮食并不难买。我们向一般农民买，也向豪绅地主买，一手交钱，一手交粮。虽说买卖公平，但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共产党是要打倒封建地主阶级，解放农民的，可我们对贫苦农民和土豪劣绅，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些敲骨吸髓剥削农民的土豪没有受到多少触动。当我想起过去土豪劣绅趾高气扬，想起杀害我大哥、堂哥，镇压农民协会的刽子手萧仁秋那些土豪劣绅时，心里就充满愤感和疑惑。我不理解革命为什么不赶快打倒土豪劣绅，摧毁封建势力的根基。

后来，我在井冈山上看到党的八七会议文件，才知道大革命后期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统治，党中央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一直态度不坚决，但在南昌起义时就举起了土地革命的旗帜。而真正把土地革命政策从口号变为实际行动，是进军赣南在这张布告上看到的。

那天看到布告，我们精神极为振奋，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这下好了，可以不交钱就去土豪家挑谷子了。这些谷子本来就是搜刮穷人的，早就该挑。”我觉得革命一下子变得离我那样近。

过了宁都，我们经广昌向瑞金前进。

南昌起义后，蒋介石在搞清起义军的战略方向后，命令当时盘踞在两广的“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组织堵截，而汪精卫也命令张发奎火速追击。但张发奎没有追击叶贺军，却往广东去了。1976年我主编《南昌起义》一书，曾专访过叶剑英，他说，当时他任第4军参谋长，张发奎召集第4军军长黄滇翔和他以及其他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对策。张发奎很生气，说南昌起事、叶贺出走，于“公谊私情，均无可谅解”，就想下令追击。这时，叶剑英向张发奎建议：还是放叶贺的部队去广东。叶贺部队到广东，李济深必然招架不住，就会请我们援助，我们便可以“援师”为名，趁机回广州了。

这话正中张发奎下怀，他立即决定放弃追赶叶贺部队，率部改经吉安入粤。

我们从南昌出发20多天，一直是平安行军，到瑞金北之壬田以前没有遇到战斗。说起来，真该感谢叶剑英的妙计，他使我们免遭敌人的尾追，可以放手打前面的敌人。

在壬田，打了南下以来的第一仗。

壬田是通往瑞金的必经之路。钱大钧部新编第20师有两个团在壬田布防，企图阻止我军进入瑞金。当时，我们分两路向瑞金前进，20军在左，11军在后。20军第1师先到壬田，遇到敌人，一个冲锋上去。敌人挡不住我军的英勇攻击，战至近午，开始退却，一直退到会昌。

我们听到枪声，加快步伐前进，赶到时，战斗已结束，部队便开进瑞金。

在瑞金得知钱大钧和黄绍竑部重兵正向会昌集中，准备侧击南昌起义军。前委认为，不破会昌之敌，我军有后顾之忧，便决定打会昌。

那是个早晨，太阳升起一杆子多，会昌城在晨雾中显得沉静而莫测。我们于前一天晚上进入战斗出发位置。叶挺率11军的5个团在右边担任主攻；朱德率20军第6团

（团长就是我在补充团时的副团长傅维钰）和教导团在左边担任助攻；

贺龙率 20 军的主力为总预备队，位于瑞金附近，策应各方。

一声枪响，划破了晨空的宁静，我们向敌人发起进攻。当时，在会昌城及其周围，驻有钱大钧的 3 个多师。敌人占据着城东北、西北和西南的高地，又在环会昌城的贡水沿岸构筑工事。

我军左右两翼按计划进攻，24 师由洛口向会昌前进，接近会城西北，敌人顽强抵抗。由于 25 师（周士第、李硕勋率领）夜间急行军走岔了路，没有赶上总攻时间，右翼兵力不足，与敌人形成僵持局面。左翼朱德指挥的部队也打得很苦，伤亡严重。

中午时分，25 师赶到了，他们不顾饥饿和疲劳，立即投入战斗。25 师是叶挺独立团扩编起来的部队，战斗力强，他们一加入，整个战场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夕阳西下，我军全线都处在胜利的进攻中。24 师在两门山炮掩护下，夺取了主要阵地。朱德在左边，也不失时机地反守为攻。敌人很快动摇了，纷纷跳下贡水河，争相逃命，我军则在山鸣谷应的冲锋号激励下，穷追不舍。

接近黄昏，战斗胜利结束，我军占领了会昌城。第二天一清早，师部命令 71 团向南追击敌人。当时，我团 3 营正在洛口箱制黄绍竑的部队。团直属队（含特务连、机关枪连、侦探队）及 1、2 营往鹭门岭方向追击。鹭门岭距会昌有 90 里路，傍晚，我团主力在鹭门岭以北 8 里的村庄宿营，一部分部队直进到窝门岭。半夜，部队接到返回会昌的命令。第二天又是急行军，傍晚回到会昌。

我军攻打会昌时，黄绍竑部已由于都前出至白鹅镇一带，距会昌很近。由于我团 3 营在洛口布下疑兵阵，加上 25 师往返路过，把黄绍竑搞懵了，一直没敢到会昌援助钱大钧，我军攻下会昌的第三天，他却向会昌开来，这也出乎我们的意料。

就在我团返回会昌的第二天清晨，我们还在睡梦中，突然听到城西北山头打枪。大家一骨碌爬起来，各团在城西的一个小山上及附近集合，抢占阵地。

当时，20 军已撤回了瑞金了，留在会昌的只有 11 军的两个师。中午时，战斗全线打响。24 师的两个团在两门山炮的掩护下，攻了四五个小时才将主阵地攻下来。

我营担任预备队，归 25 师师长周士第指挥。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周师长要我统一指挥 2、4 连警戒右边的一座山头。我们随即登上这座山头，敌人也正来抢这个高地。我们一阵猛打，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又一鼓作气，追下山去，边追边打，一直到夜间八九点钟，占领了敌人的最后阵地。素以顽强著称的桂军黄绍竑部被我军打得丢盔弃甲，乘夜向珠兰埠方向退却。

两次会昌战斗，是我们南进途中的大胜利。我们以劣势兵力打败了蒋介石嫡系钱大钧和桂军黄绍竑部，打出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铁军的威风。

会昌战斗后，我们回瑞金，东行入闽，直奔汀州。

到汀州已是 9 月上旬了。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特别是经过会昌的两次恶战，部队很疲惫。除了有近千人的伤员外，还有相当多的病号。暑天行军这么长时间，又总是饥一顿饱一顿，很少休息，中暑、拉痢疾、打摆子的很多，加上负伤和逃跑的，整个部队减员相当严重。

到汀州后，部队停下来休整，主要是治伤治病。汀州有个福音医院，是英国教会开办的，我们就把伤员送到医院。这个医院的院长傅连障同情革命，

精心治疗伤病员，给南昌起义军以很大帮助。傅连璋后来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军医务工作主要领导人之一。

那时，在整个起义军中，我们71团2营4连是保持战斗力比较好的连队之一。我这个连开小差的少，生病的也少。从南昌出发时，全连共有110人，到汀州时有八九十人，到广东后还有70几人，保留了近三分之二。我这个连的班排长、司务长、通信员等骨干都是广东人，他们愿意回广东，情绪高，斗志旺，带动了部队。除此之外，我觉得在管理和教育方面，也有些经验可以总结。比如，注意政治宣传和思想工作。我虽为连长，但是从指导员转过来的，因此，对政治工作也重视。从南昌到抚州途中我连指导员李亭林跑了，我就兼做指导员的工作。从南昌出发时，我收集了不少革命委员会的文件、传单、布告等，经常带在身上，早晚点名、行军途中常拿出来讲一讲。

当时，我看到革命委员会的布告中，有宋庆龄和邓演达的名字，就向部队说：“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也参加了南昌暴动，跟我们一起南下。还有咱们的总政治部邓演达主任（邓是北伐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也来了。他们同我们一起打回广东，再次北伐，实现总理的遗愿。”

其实，宋庆龄和邓演达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南下，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当时，孙中山在部队中威信很高，我这么一宣传，对连队影响很大，士兵们的情绪高涨，开小差、逃跑的少了。

我连一排长郑逸，山西人，他会做思想工作。他原来是团的政治干事，因愿做军事工作，降了一级当中尉排长。他把眼下的行动同士兵们的现实思想结合起来讲，能打动人。起义失败后，他消极了。我觉得，有些被革命浪潮卷来的知识分子，有些人在革命顺利时很积极，也会讲道理，但革命处于低潮，就不能坚决彻底地实践革命的理想了，以后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

在部队管理方面，我花了很大精力抓伙食。我认为，部队暑天长途行军，又不能经常休息，只有把伙食搞好，保证部队吃饱、吃好、又卫生，才能保持体力，减少疾病。我连司务长是从班长提起来的，有战斗经验，他知道伙食的重要，我们常常一起商量，想各种办法搞好伙食。最重要的是不能缺粮，到驻地现购买，有时买不到，就会饿肚子。我们宁可累一些，行军都背着米，带着伙食担子，部队一停下来，就烧开水、做饭。一路上，很少挨饿。

在汀州停留期间，我还参加了一次11军共产党员大会。记得是晚上开的，有一两百人，挤在一间庭堂里，中间摆张桌子，当做主席台，桌上放盏马灯，光线不强，看不清人脸。只听到主持会议的人是四川口音。这口音还熟悉，我想起来，在宜黄听过他讲话，是军党委秘书长欧阳继修。

欧阳继修后来改名阳翰笙，长期在白区做党领导的文化工作。“文化大革命”后期审查他的问题，有人找我调查，问阳翰笙是不是参加了南昌起义？我就是根据宜黄的那次讲话和汀州的这次党员大会，给他作了证明。

上井冈山后，我和毛泽覃（南昌起义时，他在25师工作）闲谈，说到汀州的党员大会，他说，当时他也在场。我俩很兴奋，你一句我一句地回忆大会的内容。毛泽覃也记得，主持会的是欧阳继修。1932年我和毛泽覃在江西富田碰面时，又谈起了这件事。

那天会上，有两个人作报告，首先是李立三，以前我没有见过他，但对他的名字熟悉，他在上海、武汉搞工人运动，很有名声，又是南昌起义党的前敌委员会成员，南下时公开的职务是革命委员会保卫处长，还有那张打土

豪挑谷子的布告，使我对李立三更为敬佩。

李立三讲话很风趣。他问：“我们南下到广东，还要不要国民党啊？”

底下交头接耳了一会儿，有人说：“国民党反动了，不要！”

有人则说：“三大政策还要，国民党也得要。”

李立三很干脆地说：“我们到广东，只有共产党领导，至于国民党嘛，我们是联合它。三大政策是‘联共’。我们改个字叫‘联国’，联合国民党。当然是指左派。”

他的这番话，反映了党的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南昌起义我们没有完全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到这时，已比较明确地提出共产党领导了。

李立三还讲了革命军要遵守革命的军事、政治纪律。又说：“我们还有一条纪律就是要照顾好伤病兵，给他们医治，还要找人抬他们。没有人抬伤病兵行吗？如果那样，我就打起旗子到街上去拉夫！”

李立三讲话有鼓动性，又爱用比喻。开始我们没理解，听后才一愣。他转而笑着说：“当然，我不是真的要去拉夫。我的意思是要照顾好伤病兵，这样才能鼓舞士气。否则，没有人打仗了，不就得去拉夫吗？说拉夫，也是出钱请呢。”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台下也是一片笑声。

接着，欧阳继修又请叶挺讲话。叶挺主要讲战争形势，说：“在会昌的两仗都打好了，打败了两个强敌，说明我们还是铁军。”他也讲了纪律问题，说军队就得有纪律，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铁军，更要有纪律。他批评了一些党员在战斗中表现不大好，还不如非党员勇敢。讲到这里，他显得很激动，说：“共产党员是什么？就是带头兵，是榜样！就要比别的人勇敢，打仗冲在前，退却走在后，没有这点精神，还叫什么共产党员？”

我们从汀州出发，向潮汕进军。离潮州不远时，政治部在路边竖了块大标语牌，上面写着：“潮汕在望”4个大字。看到这个标语，大家都欢呼起来。当时我就想，这4个字很能鼓劲儿，看到它，疲劳、病痛一扫而光，走起路来，脚下生风。

在潮州住了两天，又开往揭阳。在揭阳，听说陈济棠的部队来了，就在距揭阳不远的丰顺一带。一天，全师排以上军官集合，24师师长古勋铭（师长本由叶挺兼任，古是到潮州新任）请叶挺军长讲话，叶说：“前面有陈济棠的部队9000人，我们要发扬会昌歼敌的精神，打好这一仗，消灭陈济棠。”

后来查明，我们对敌情的侦察和判断有误差。敌人不止是陈济棠部，还有薛岳、徐景堂等部，兵力也不止八九千。

钱大钧和黄绍坑在会昌吃了败仗，但部队没有被歼灭，余部又集中到梅县一带，准备与我军再战。此外，蒋介石、李济深又将陈济棠第11师、徐景堂第13师和薛岳的新编第2师，编成了一支由陈济棠任总指挥的东路军。两路敌人加在一起，远远超过了我们侦察和估计的数目。

第二天，我们向汤坑前进。11军25师在大军南下时已留在三河坝；20军3师留在潮汕。往汤坑的为11军24师和20军1、2两师，战斗部队共6000多人。

大约是9月28日的下午，我部走到浮山附近，前面传来炒豆般的枪声，还夹杂着沉闷的炮声。我们知道20军在前面打起来了，就加速前进。赶到时，已是傍晚。双方停止交火，我们就在阵地上露营休息。

第二天投入战斗，才发现敌人相当强，兵力数倍于我，又做了工事，易守难攻。敌人火力压得我们抬不起头，连叶挺的指挥部都转移了好几个地方。

这是一场罕见的恶仗。从天亮打到黄昏，你攻过来，我攻过去，拉锯似地相互冲锋，双方伤亡都很大，但谁也攻不动对方的主要阵地。我营与2营在一横山坡上与敌人对抗，我看到对面有个小丘，双方无人。就率两个排去占领，将到丘前，敌兵亦从北面来，我们从丘南抬头打几枪，低头隐蔽，敌方也如此。我连打了几个手榴弹，一声爆炸，乘机占领。不到半小时，敌又夺回小丘。我退却后，敌人也退了，此后双方都没有去占领。2营打退了敌人几次攻击，营长廖快虎被敌弹击中，传令兵要背他下阵地，他坚决不肯，面对敌人坐着，表示决不后退，最后牺牲在阵地上。

吃过晚饭，天还没有完全黑，敌人阵地上的枪声稀疏了。叶挺军长又调24师夜袭敌营，敌人早已在白天我军攻击的地方加修了工事，我们没有攻动，只好撤下来。那晚，又在阵地上露营。第二天一早全线撤退。

上路前，军部通知要吃一顿饭。这是两天来唯一的一顿正经饭，官兵们是流着眼泪吃的，因为照常做饭，吃饭的人却少了。我连在战前有兵70人，现已伤亡过半，一排长牺牲，二排长何凤鸣和传令兵班长负重伤。有的连队甚至不到一半人。

这样惨重的伤亡，在英雄的叶挺部队是空前的。

汤坑一仗，是南昌起义从胜利到失败的转折。

后来我到广东才知道，我们撤退后，敌人也撤了，两败俱伤。但我们吃亏，因为我们兵力本来就不充实，以劣势兵力同优势敌人拼消耗，我们拼不过。另外，敌人有广东的大地盘，我们没有站住脚。所以，在战略上就被动了。

9月30日早晨，我们从汤坑撤退，10月1日退到离潮州20余里处，因潮州已被敌人占领，就转向揭阳炮台。当晚，过一条小河，就在河西村落宿营。1992年11月，我到广东海丰县参加纪念海陆丰苏维埃建立65周年纪念大会后，又专程去揭阳炮台，看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揭阳炮台大变样了。记得我们从汤坑撤到揭阳炮台的那天，部队都挤在一起住。现在街道有一里多长，也宽了，繁华了许多。

在街上围观的人群中，我问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婆婆：“60多年前，叶挺部队从这里经过，你知道吗？”

老婆婆连声说：“知道，知道。那年我16岁，见到了。”

我说：“你怕不怕？”

她伸出大拇指，说：“那是好队伍，不扰老百姓，我不怕。”

我问她：“你还记得部队是从哪里过河去的？”

她向街道西头（街道东西向）指着不远处一条河，说：“就是那里。”

“我过去看了看。河面波光粼粼，河水湍湍流着。”

那老婆婆也跟了过来，指点渡口给我看。又说：“我从小就在街上住，已有几十年了。小时候的事我都清楚。当年，好多部队从这里过，我们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但都晓得这是好兵，不骚扰老百姓的兵。”听了这话，我感慨万千。当年从汤坑败退的叶挺部队，在老百姓的心中还留着那么好的印象。人心是秤，英雄岂能以成败而论？

在揭阳炮台渡河后，10月2日，到贵坎宿营。有个传令兵从我连经过，向我打听20军第1师的驻地。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传命令。”

说着便把一封没有封口的信给我看。我打开一看，是总指挥部的命令，要部队向海陆丰前进。汤坑战斗后，我们先向南，又向西，也不知要往哪里

去，看到这个命令才明白是去海陆丰。

海陆丰，我早知是彭湃做农民运动最有基础的地方，有“小莫斯科”之称，现在要向海陆丰去，方向对了。

3日，我们从贵欤出发，向海陆丰前进。走了三四十里，来到一个大平坝，停下休息，生火做饭。这时，部队还有六七千人的样子，人喧马嘶，挺热闹。

吃过饭，继续前进。走到白马流沙，突然遭到敌人袭击，20军和11军24师被拦腰截断。我营奉命阻击敌人，到天黑时我连还有三四十支枪，右边70团一个连也在抗击。我们坚持打了一夜，第二天退往贵欤。这时，贵欤挤满溃兵，乱成一团，已经无战斗力了。

轰轰烈烈，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军，经过两个月，行程数千里的南征，终于在强大的敌人围攻之下失败了。

革命遭受了挫折，我个人也经历了一段落难的日子。

第五章从潮汕到湘南

南昌起义军兵败流沙，我所在的第24师被分割，溃散了。第二天返回贵欵，我这个连还剩下约20个人。到处乱哄哄，群龙无首，兵荒马乱。

我知道汤坑战斗后上级原计划是去海陆丰，便决定带着这20人单独行动。我向部队说，“不要灰心，只要到了海陆丰彭湃那里，就有希望！”

我们向南走了一程，便拐向西，想绕过流沙到海陆丰。没有地图，又没有向导，只靠看天辨方向，方位不准，几乎是盲目行动。

一路上，不断遇到反动民团的拦阻，子弹消耗得差不多了，人也精疲力竭。有的人丢掉枪悄悄溜走；有的人干脆坐下不走了。不到半天，20人的队伍只剩下七八个人。

当地的老百姓喜欢枪，人们都挤在路边看我们。有些生病或疲惫的兵士掉队二三十步，就会有人突然从围观的群众中跳出来，抢了枪便跑。走在队尾的兵发现后，惊呼不迭，我们赶紧放枪威胁，抢枪的人一下钻进人群就找不到了。这样的事在行军中发生过几次。

一天下午，经过一个村子，刚到村口，就有人打枪，村的侧面也传来枪声。我们还击了几分钟，仅剩的子弹打光了。眼见村里和村边有人向我们冲过来。一个班长对我说：“看样子不是敌人，东江的百姓就是要枪。”说完，他把枪往路边一甩就跑了，别的人也边跑边扔枪。

村里的人追上来，我回头看看，果然是老百姓。我刚松口气，又有人围上来了，是国民党第13师的部队。

我们都被俘虏了。

当天黄昏，我们被押到潮阳，关进一个大祠堂。祠堂里已有一二百人，都是叶贺部队的官兵。我们进去，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

第二天，我们又被押往汕头，关进离13师司令部不远的一个大院子里。院里关押二三百人，人们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不打招呼。

敌13师的军官经常来查看，每次都要大声发问：

“你们中间有没有共产党？”

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答道：“没有。”

那时，军队中党员数量少，而且身分不公开，这样的回答也很自然。

我除了党员身分，还是连级军官。被俘前，我连的士兵对我说：“实在走不动了，如果被抓住我们就说你是司务长。”被俘后，我一直称自己是司务长。但我知道，俘虏中有不少人认识我，身分恐怕隐瞒不住。

有一天，一个军官来审问，他直接了当地说：“你是叶挺的连长，知道叶挺、贺龙是共产党吗？”

我见行政身分已暴露，便不再掩饰，说：“贺龙是20军的，我不认识。叶挺是我们的军长，但我平常见不到他。军人就是服从命令，我们下级哪里知道上级的事？”他又问：“部队里有没有共产党？”我说：“去年我们从广东北伐，今年从湖北二期北伐，回到湖北后，又从江西到广东，我们听到的就是孙总理、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这些，旗子、军装、帽子和你们现在一个样。”

他见问不出什么，就回去了。打这以后，我便从楼下搬到楼上。楼上原有两个军官，更便于监护。

有一天，我和同监的几个人在楼下散步，一个看管我们的敌军官也凑过

来与我们闲谈，说：“叶挺、贺龙在南昌造反，张发奎回到广东向李军长（济深）报告了，李军长就下命令打你们。但李军长还有一个命令，说叶挺部队是属他指挥的第4军，俘虏都不准搜身。你们不要怕。”

说起来，叶挺部队与李济深确实有些关系。叶部从广东出发北伐时，李济深为4军军长。当时4军有4个师，副军长陈可钰率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李济深率两个师留守广东。参加北伐的队伍在两湖战场打得好，称为铁军。到武汉后扩编了，又成立了一个4军和一个11军，与李济深虽没有建制关系，但原是李的旧部。我们兵败以后，李济深对旧部采取收容政策，也是笼络军心。

当时，我身上有十几块钱，从潮阳押往汕头时，国民党军的一个班长向我要钱。我拿出几块钱给他，对他说：“我就剩下这些钱了，你们拿去买点东西吃吧。”那班长看看我，没有要我的钱，也没有搜我的腰包。后来在我流落时，这十几块钱起了大作用。

被俘后不久我就病了，肚子痛得厉害，隔一会儿便要去趟厕所。我估计是得了痢疾，因当时拉痢疾的人很多。流沙失败后，我极度紧张、劳累，抵抗力差了，很容易染上这个病。

我搬到楼上住了几天，病越来越重。由于经常要去厕所，上下楼不方便，又把我换到楼下。我瘦弱不堪，没有力气，不愿说话，也懒得动，整天想睡觉。

这期间，我被讯问过几次，都是重复地问叶挺、贺龙和共产党的事，我还是照样回答说不知道。

有一次，他们问我：“以后你打算怎样？”

我想了想，说：“我有病，不服广东的水土，去年春天刚从师范毕业，和一些同学跑出来当兵，现在想回家去继续读书。”

过了一天，吃过早饭，看守说：“下午不开饭了！”我们正纳闷，有人把院门打开，还吼着：“快走！快走！”我们这才明白是被释放了，赶紧收拾自己的行李，离开了被暂作监狱的大院。

在汕头街上，有一两千被俘又释放了的起义军官兵流落街头。幸亏我身上还有些钱，就找个地方住下，买点药吃，赶紧治病。痢疾止住了，体力也慢慢恢复，但钱花得差不多了。

下一步怎么办？部队没有了，熟人也找不到。举目无亲，四野茫茫。我一个人在街头踱来踱去，苦无良策。

突然，一声汽笛，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抬眼望去，一条轮船正停靠在码头上，旅客蜂拥着往船上挤。

我连忙打听这船开往何处，有人说是去广州的。一听是去广州的船，我顾不得思索，三步并作两步，跑向码头，跨过栏杆。这时，船刚好起锚，在离岸有一米远时，我纵身一跃，跳上了轮船。

从汕头到广州，海路要一两天。我在甲板上站着，心里想，到了广州总会有办法的，那里曾经是革命的大本营，我又住过半年，总会找到熟人，找到党组织的。

大约是1927年11月初，我到了广州。

这时的广州已没有昔日的革命气氛了。街道上军警林立，岗哨森严，行人稀稀落落，一片白色恐怖。

我顺着熟悉的街道，去寻找往日的亲友，毫无着落，更说不上党的组织

关系了。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还是音讯杳然。这时，我已是囊空如洗，饥肠辘辘。但我并没有消极失望。我决心，一息尚存，就要找党。为了生存，为了找党，我不顾自己出身书香门地，也不顾曾是一名铁军的军官，放下架子去讨饭。

我到纸张铺买来中小学生的笔记本，用从武汉带来的钢笔，写了一个哀怨真切的自述，开头是：“诸君，我今天以至诚之心，向你们说几句衷肠话。”接着，介绍自己的出身、学历，在北伐军中做过什么，然后讲：“前不久我还是一名北伐军的军官，由于政局变化，不幸流于楚囚……”。末尾是“……如今，我肚子饿，身上冷，病未愈，想找工作，又无处可找，难道老天要绝我生路不成？请问，这是我的罪过，还是社会的罪过？”

我拿着这篇自述，就到书店去给人看。我想：逛书店的人一般都有文化，有文化的人看到我的陈情，会同情我的遭遇。果然，不少人看了我的自述，都唏嘘不已，有的掏出一毛二毛小银洋给我。慢慢地，我就有了几块钱，暂时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但我想，不能总这样下去，还得找个事来糊口。一天，我在街上转悠，路过一个卖字的摊子，见那卖字的老先生面容慈祥，说话和气，就走上前去问他：

“老先生，我来分一口饭吃行吗？”

老先生看看我，问：“你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

我答道：“我是一个打了败仗的小军官，流落此地，现在生活无着，请老先生发点慈悲。”随即又把我的陈情交给他看。

老先生沉吟半晌，用手指了一下摊在桌面上的纸和笔，说：“你先试试吧。”

我拿起笔，先写了一行颜体字，又写了一副隶书的条幅。我在私塾就练过这些书体，写的时候，老先生看我用笔；写完后又端详了好一会儿，终于点点着，对我说：“好吧，你就帮我的忙吧。”

从此，我过起了以卖字为生的日子。平常，先生写字作画，我铺纸磨墨，客人多时，我也写上几幅颜体或隶书，一天还能挣得几毛钱，勉强维持生计。

解决了糊口的问题，我找党的心情更加迫切。有事外出和帮人写字时，我都设法打听消息。

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到一个嘉禾师范的同学，兴奋极了，大声喊他，他看看我，打个招呼，不冷不热。见他这样，我一肚子的热呼顿时凉了。我问了他的情况，他只简单地告诉我，他在第4军教导团，驻广州。我有些失望，好不容易碰到一个熟人，却是这个态度。可我哪里知道，他所在的教导团，就是由叶剑英任团长的我党领导的武装；而这位同学是教导团的秘密党员（他的党员身分，是在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回家乡时我与他接触中知道的）。当时广州正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时期，我们这种身分的人，都比较谨慎，他随教导团从南昌到广州后，习惯于秘密环境，所以对于老同学，在身分未明之前，只能漠然处之。

我日夜思念，苦苦寻找党组织的一次机会，竟这样失之交臂了。

回到住所，我心里盘算：广州虽大，但白色恐怖太严重，在这里找党组织看来希望不大，还是回湘南吧。大革命时期湘南的工农运动搞得好，共产党力量大，那又是我的家乡，熟人多些，可能会打听到一些消息。于是，决

定回湘南。

天亮后，我整理好行装，赶到火车站，登上了开往韶关的火车。

坐在车厢里，我又开始盘算下一步的行动。在广州时听说方鼎英的 13 军去湖南打唐生智了。根据从广东出征北伐的经验，入湘的部队一般都要在韶关驻扎一段时间，我估计 13 军军部很可能在韶关。13 军军长方鼎英曾是黄埔军校（后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教育长，我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宪兵教练所学员的身分去找他，想必他会接受，便决定先到 13 军去。

火车到了韶关，我一打听，13 军军部果然在这里。两天后，该军开往碓石。我跟到碓石，找到 13 军司令部办公室。

一位姓萧的中校副官接待了我，他同我谈了一二十分钟，就出去了，几分钟后又回来，并拿了一枚写有“13A”（即 13 军）的铜牌证章给我，说：“副官长指示你先在这里候差，等以后有缺位再安排。”

我接过铜牌证章，心想，我的目的是找党，先安顿下来，才有条件找党组织，管它候差不候差。

在 13 军候差的人很多，副官处就有好几十人，有的年纪挺大了，有的不像军人，倒像是权贵的亲友。凡是候差的，都无职、无权、无薪，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平常大家就在一起天南地北闲扯。我为了隐蔽党的身分，很少与人交往，常常一个人躲在僻静处看书。

我们在碓石住了几天，军部就开往宜章，以后又到郴县、栖风渡、高司亭等地。所到之处，一片凄凉景象。“马日事变”后，国民党新军阀残酷镇压共产党和农民协会，湘南的党组织有的垮了，有的转入了地下。我在湘南转了近一个月，仍然没有找到一点线索。

这时，方鼎英与唐生智部在耒阳地区大战。不久，13 军军部退到郴县。我亲眼目睹，新军阀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愤恨难耐，只想快点找到党组织。于是，以天冷衣薄为由，写报告要了 10 元钱，买了一套半新不旧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请假离开 13 军。

湘南这么大，到哪里去找党呢？就在我漫无目标地寻访时，突然想到我高小同学萧亮，他家在临武县沙田圩杉木桥，我离家从军，就是经他家里走的。他父亲是大地主兼商人，往广州、香港和江西等地贩卖杉木，结交的人多，消息灵通。我听人讲，“马日事变”后，长沙、衡阳一片白色恐怖，在那里读书的学生，下半年都没有去，估计萧亮此时在家。于是我就去萧亮家。

快到萧家时，我把那套半新的衣服换上，又把 13 军的铜证章也戴好。萧父是大地主，如果衣着不整，会引起他的怀疑。

收拾妥当，我扣响了萧亮家的大门。

开门的正是萧亮。他见到我，又惊又喜，忙把我让到屋内。萧亮的父亲也在，我家与他家同宗，萧亮父亲的辈份高，我向他施礼问候，照旧尊称他为“老前辈”。萧父见我穿的灰军装，又佩戴着 13 军的证件，满心欢喜，留我在家住宿。

萧亮领我到了他的房间。开始，我们只是寒暄了一下，夜晚，彼此谈了别后的经历。我把南昌起义及失败的详细经过告诉他，他听后非常惋惜。接着，他同我讲了“马日事变”后他如何跑回家乡，并对我说，父亲很怀疑他，要我在他父亲面前不要透露这方面的只言片语。

我们越谈越深，最后，互吐真言。原来，萧亮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是大革命时期在长沙入党的。逆境中遇到同志，真是倍感亲切。

萧亮与临武县的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离沙田圩 20 几里的牛头汾，有临武县支部的联络点，他就是那个支部的成员。萧亮答应帮我去联系。

为了慎重，他先去了一趟，然后带我前往牛头汾。党支部负责人贺辉庭与我接了头。贺辉庭郑重地对我说：“临武支部研究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和组织生活。”听了这句话，我激动得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但只对贺书记说了一句：“我终于找到党了！”

是啊，漂泊数月，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我日夜思念的党组织，这心情怎能用言语来表达呢？

当天，我就留在牛头汾，与贺辉庭书记长谈。为了隐蔽，谈话有时在贺书记的家里，有时在野地。

一连几天，贺辉庭书记对南昌起义的政治和军事情况，问了又问，谈了又谈，表示极大的关注。当我讲到南昌起义军兵败流沙，人马溃散时，他的眼里闪烁着泪花，顿足疾首，连说：“可惜，可惜。”

贺辉庭出身于地主家庭，大革命时期在衡阳读书，加入了共产党，“马日事变”后逃回家乡，联络当地的一些党员，重建地方党支部，坚持斗争。

牛头汾是临武县的大乡镇，四通八达。原临武党和工会负责人袁痴等在“马日事变”中被敌人杀害，县一级党组织不存在了，以牛头汾为中心的党支部，实际就是临武县支部。在牛头汾期间，我参加了两次支部会议。第一次是在当时的党员傅昌表家（解放后，我听黄克诚说，傅参加了湘南起义，在耒阳小水铺战斗中牺牲了）；第二次会议在野外。我们研究了如何发展组织、扩大宣传和开展革命斗争。我至今还记得，贺辉庭反复讲，要在穷苦农民中发展党员，不能总找些“穿长衫的”。议论到怎样开展斗争，大家都说要搞武装，还你一句我一句出主意，筹款买枪。

到牛头汾大约半个月，有一天，贺辉庭告诉我，宜章县碣石彭家有个党支部，他们派了个代表同我们联络。当晚，贺辉庭带我到傅昌表家和他见面。来人叫彭睽，他热情地介绍了宜章碣石彭家一带的革命情况，还告诉我到碣石联系的办法：平时，可直接找承启学校校长吴汉杰。寒、暑假期间，就到村里找“周攸华”，那是支部的联络代号。

与彭睽见面后，我沉浸在兴奋之中，想起了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觉得，湘南的地下党组织就像这“原上草”，烧不尽，斩不绝，一遇春风，又生机盎然。

这时，已近年关了，我决定回家去看看。从广东到湘南后，我随 13 军在碣石、宜章、郴县一带转了一个多月，几次离家不远了，都没敢回去。现在有条件了，我想该回家去，一方面看看父母亲人，一方面也可以在家乡开展革命活动。

1928 年春节前，我回到离别近两年的家乡。

家里变了，父母亲明显地老了。父亲佝偻着背，神色显得呆滞；母亲擦着昏花的眼睛，正为惦记我而伤心落泪呢。我忽然回来，给他们带来一个意外的惊喜。母亲破涕为笑，父亲也一扫愁云，妹妹拉住我问长问短，诉说着自我走后家里发生的一桩桩痛心事。

三姐听说我回来了，从邻村赶来看我，并悄悄地对我说：“黄益善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也跑回村了，一直藏在家里的吊楼上。他只同夫人及二三知己有交往。”

我就随三姐去找黄益善。黄益善与我三姐婆家同村，三姐夫黄相憬就是

同他一起搞农运被杀害的。战友相见，分外情深，我们一直谈到过半夜。黄益善对我说：大革命失败后，嘉禾南区有不少党员从外地跑回来，我们要把大家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党支部，领导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斗争。我非常赞同他的意见。黄益善曾任湖南省农协特派员和嘉禾县农协委员长，反动派正到处缉拿，他不能露面，我有 13 军的证件，活动起来比较方便，串联党员的事就由我来干。

恰在此时，我二哥萧克允也回到家乡。

二哥告诉我，他 1925 年 10 月在广州入党，北伐出征后，任 2 军 6 师 17 团 3 连指导员。当时他们的军党代表李富春、师党代表萧劲光都是共产党员。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军队中搞“清党”，2 军的党员奉命陆续撤离，他也在此时离开军队，应老表彭传新（当时任湖北省农协特派员和中共崇阳县委书记）之邀，到鄂南洪湖、崇阳等县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可惜失败了。他在反动派的追捕下，逃回家乡。

我对二哥说：“回来得正好，咱们就在家干吧。”我把与黄益善商量的计划和这两天联络的情况，告诉了他。

二哥说：“咱们不能赤手空拳干，要搞武装。”

说到武装，我想起来，回家后，四伯母曾告诉我，农协失败时，四伯隐藏了两支枪，由她放在离我村一里的小村廖家窝的谷仓内墙。前两天一个晚上，四伯母带我去看了。我对二哥一说，他非常兴奋，说：“太好了，有枪就行，子弹可以找到，就用它来搞暴动。”

第二天，我和二哥分头行动，先后与流散在家乡的共产党员唐仁宅、毛中心、彭芳、彭启贤、彭瞻贤、何辅汉等取得联系。我们聚会野外，组建中共嘉禾南区特别党支部。支部书记推黄益善担任，因他不能露面，行动不便，日常工作就由我二哥萧克允负责。开会都由萧克允主持，讨论情况由我向黄益善汇报，黄的意见也由我向支部成员传达。

为了保密，我们见面都用暗号讲话，比如支部叫“我们学校”或“我们”；通知开会就说：“到某处走一下”，直到后来我们参加湘南起义，在起义区才公开称“南区支部”或“我们那个支部”。

支部成立后，开过一两次会，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萧克允在发言中非常明确地提出，要走广州暴动工农兵苏维埃的路，不要“青天白日”旗了。我们分析了当时军阀混战的形势，认为李（济深）唐（生智）战争虽然结束，但蒋介石占据东南地区，桂系控制从安徽、两湖到广西一线，势均力敌，蒋桂一定会打仗。军阀混战有利于工农革命。我们议论最多的还是搞武装、搞暴动，还研究过把队伍带上晋屏山打游击的问题。晋屏山是嘉禾、宁远两县间的大山，满清末年旧民主主义革命家李国柱曾在这里活动过；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本地绿林散兵也曾割据过。我们当时认为，搞武装暴动就要上山。

我通过萧亮，把嘉禾南区特别支部的情况通报了临武牛头汾支部，他们又转告了宜章碣石支部，这样，我们三个地方支部就串联起来了。

1928 年春节前夕，支部的成员毛中心到临武星子坪活动，获悉朱德部队在宜章起义。当他把这一消息带给我们时，大家都认为我们搞武装斗争的机会到了。支部立即开会，决定派我和毛中心、唐伯安去宜章联络，其余人留在家中进行暴动准备。

去宜章的第一天，我们三人走到临武沙田圩，找了一家伙铺住下。我一个人绕道数里，到杉木桥村萧亮家去了一趟，想从萧亮父亲那里再了解点情

况。萧亮家果然聚了八九个客人，是宜章麻田欧家的地主们，在宜章城和麻田暴动后逃到这里。他们说，朱德、杨子达（起义时宜章农协委员长）的部队在宜章暴动了。

我一听朱德的部队到了宜章，喜出望外。朱德是南昌起义第9军的副军长，起义军在潮汕分兵，他率25师留守三河坝，我们兵败流沙后，便与他们断了联系，没想到朱德现在到了湘南。

我内心激动，但表面显得很镇定，故意问那几个地主：“诸位先生是从宜章来的吗？”

萧亮的父亲连忙介绍说：“这是萧衡石先生的侄子，现在13军供职，是有识之辈，可以倾心。”

萧衡石是我三伯父的号，他在本地教书多年，是有声有望的文人。几个地主一听，连忙站起来，拱手让座。

这两年来，我也是几经风雨，深知应付这种场面要沉着，还要巧妙。我摆出书香子弟的架式，用孔孟的语言同他们讲话。

我问他们：“朱德部队到宜章可是当真？”

“千真万确！”“绝无戏言！”“有伤为证！”他们七嘴八舌地说。

我故作吃惊地说：“糟了，不久前我从13军回家，行李什物都放在宜章城，这如何是好？”

有个胖绅士说：“万万不能再去宜章城，去了就没命啦。”

探听到朱德部队到湘南的消息，我早就坐不住了，但还是沉着应付，在主人的安排下，同席就餐。

一个叫欧阳继山的绅士说：“他们搞什么苏维埃，让一些泥腿子、穷光蛋掌管大权，真是反了天。”

旁边一个绅士插话：“去年底，广东省里造反了，满街写的苏维埃，到处喊‘劳工神圣’，天呀，劳工也神圣起来了！”

我听他这样说，意识到是指共产党领导的广州暴动，就假装糊涂，不答话。

欧阳继山问我：“少先生，你对此如何看？”

我装作痛心的样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工是劳力者，是治于人的，怎么神圣起来了？”

他们听后，一片嗟叹。

我又问：“宜章现在情况如何？”

欧阳继山说：“朱德的兵退到巴黎堡、黄沙堡一带去了，宜章城光复了。”

听了这话，我心里有了底。

第二天一早，我到沙田圩街上，找到那两位同志，就出发去宜章。事先商量好，遇到民团盘查，我就扮作13军军官，唐伯安是我的同学，毛中心是农民出身，已40出头，装作我的挑夫。

我们翻山越岭，走了两天半，终于到了宜章碣石。

这时，碣石已在前4天挂起红旗，宣布暴动了。我按彭睽告诉的联络办法，去承启学校找吴汉杰校长，但学校已放假，我就直接去村子里找周攸华。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正好对面来了个30多岁的男子，问：“你们找谁？”我说：“找周攸华。”

他警疑地说：“我们村子里没有什么周攸华。”我说：“肯定有！”

他颇严厉地对我们说：“走！跟我走！”

他把我们带到了一间像是办公室的大房子，里面有不少人，都在忙忙碌碌。一个书生模样而形色从容的青年男子用审示的目光，把我们挨个看了一遍，就接连不断地提出一些问题。

当告诉我我从临武牛头汾来，叫萧克（我原叫萧武毅，这时为了隐蔽，改名萧克）时，他笑起来，对我说：“我早就知道你，欢迎你来碣石，参加我们的暴动吧！”说着，把我的手紧紧握住。

一会儿，彭睽从外面进来。我们前一个月见过，算老朋友了。他连忙指着那个男子对我们说：“他就是宜章黄沙区党支部书记彭晒同志。”彭晒在当地是有名望的小学教员，打入这地区的上层，当了民团团团长，掌握30多支枪。当朱德部队在宜章城关揭开湘南暴动的序幕后，彭晒根据宜章县委的指示，领导了以碣石村为中心的黄沙区暴动，并根据朱德的委任，将所掌握的武装编成工农红军第2团独立营，由他任营长。

彭晒机敏而幽默。其实他早从彭睽那里了解了我的政治态度，还饶有趣味地把我“审”了一遍。一切释然后，我们禁不住开怀大笑。那位盘查我们的同志叫周廷彦，也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上井冈山，后来在赣南牺牲了。他是“小红军”周礼的父亲（周礼到陕北后也牺牲了）。

就这样，我们和碣石支部接上了关系。第二天早上，又见到彭儒、吴统莲（后改为吴仲廉）等同志。晚上，支部开会，书记彭晒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组织委员吴统莲把我们的组织关系接收下来，从此，我们3人参加了宜章黄沙区碣石的年关暴动。

根据支部的决定，我担任了新成立的农民武装——独立营（后为2团3营）副营长，营长是彭晒。因为部队不多，只编一个连，我又兼连长，彭腰任党代表。他们知道我参加过南昌起义，所以主要叫我负责军事工作。彭睽为支部宣传委员，又是碣石村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支部书记彭晒为全面领导，他和组织委员吴统莲经常来部队讲政治课，教唱革命歌曲。当时，这个党支部真正发挥了暴动中的领导和骨干作用。

从嘉禾来时，黄益善、萧克允等让我们与宜章碣石村党支部联系上后，就去找朱德部队，请他们协助嘉禾南区暴动。此时，朱德部队正在碣石地区与许克祥的24师激战，联系不上。我就写了一封信，托一个在碣石帮助独立营造枪的嘉禾籍铁匠，带给黄益善和萧克允，告诉他们，我们留在碣石参加暴动了。大约过了半个月，黄益善也来到宜章。他与宜章县委的胡世俭、张际春、彭祐等，都是衡阳第三师范的同学，同搞革命运动，他们就调他到宜章县委工作。以后我们上井冈山，他陆续担任了红4军的连党代表、支队党委书记和军党委的秘书长，1929年冬，在红4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4军军委委员。

黄益善来后又过了半个月，我二哥萧克允和临武牛头汾支部书记贺辉庭也到宜章梅田。他们找到我，请求独立营去支援临武、嘉禾的武装暴动。我说：“这需宜章县委决定。”他们随即去请示县委。得到的答复是，请他们先回去准备，待适当时机即派军队策应。

他们返回后不久，湘南暴动就失败了，我率独立营撤往井冈山，从此和他们断绝了消息。1933年夏，我在湘赣苏区时，见到湘鄂赣军区政委黄志克和副司令员严图阁，据他们说，两年前，萧克允曾受上海中央特科之命到鄂东南去搞兵运工作，以后转入红军，在鄂东特委军事部办的红军学校任教员，后任鄂东南红3师参谋长、湘鄂赣北路指挥部参谋长。1932年底。湘鄂赣

红军与国民党薛岳部在湖北通城的大坂作战，萧克允在战斗中负重伤，抬回柳河苏区后牺牲了。至于贺辉庭，我还是解放以后回湘南才知道他后来的情况，他一直在临武坚持地下工作，不屈不挠，1929年秋被反动派杀害。

碓石暴动后，我担任独立营副营长兼连长，这个营实际只有一个连，步枪和梭镖各30多支，而步枪约有一半是本地铁匠仿造的，名为五响枪，但打三四发子弹就要擦油才能打，大家称其为“土快枪”。“土快枪”者，又土又快也。表尺与准星不精确；快是能连打五发子弹的后膛枪，不同于从前面装火药的土枪。人员都是本地农民，相互间讲土话，离三五十里的人都很难听懂。晚上，有些人还带枪回家过夜。班、排长也是本地人，军事不高，即使执行日常勤务也不够。

我在铁军工作过，体会到铁军的钢铁精神是从严格的管理训练和从艰苦战斗中培养锻炼起来的。我常想，孙武可以把吴宫姬妾训练得进退自如，戚继光可以把义乌农民兵训练得赴汤蹈火，我们是共产党，也一定能把这些农民训练成新的“铁军”。

我认真整顿训练部队，首先宣布了几条规定：建立连值星、班值日制，有事要报告；早晚点名，按时操课，爱护武器，行军不用枪挑东西，梭镖不倒插，不沾土，保持洁白而锐利；吃饭由值星班长吹哨子集合，一班一桌；办公不讲土话，还要讲礼节。

我反复向部队讲明道理，要求个个遵守。一次，有个战士严重违反纪律，查明唐，全连集合进行体罚。这样队伍就比较整齐了。体罚，如打屁股、打手板，现在看来是笑话，那是旧军队的恶习，1929年红4军第9次党的代表大会批评为军阀残余，完全对。但当时我们管理水平低，只知道这种办法。地方同志和农民看到我把部队带得守纪律，又学会各种射击姿势及散兵动作，虽然处分了他们的子弟，但认为我执行纪律时，还合人情。他们见到我，都亲热地叫我萧连长，就是50多年后，我回碓石，老人见到我，还亲切地叫我萧连长。

碓石暴动组建的独立营，虽只有100多人、30多条枪，梭镖多于步枪，但在当时也是一支重要的武装了。我对这支部队一面整顿、训练，一面带着四出游击。

附近大黄家有个恶霸地主，有武装，群众都恨他。我们乘夜包围了这个地主的宅院，打死了大恶霸，振奋了周围的群众，农民纷纷起来暴动。我们就协助各区、乡建立苏维埃政府，组织农民协会，宣布分田地，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还把地主的田契、帐本集中起来，当众烧毁，把打土豪所得的浮财分给穷苦的农民。不到半月，整个黄沙区以及靠近广东边界莽山附近的农民都发动起来了，暴动的烈火越烧越旺。

我们在宜章西南山区建立了革命政权，坚持了两个多月。此时，朱德、陈毅的部队正在郴州、耒阳一带。国民党湘、粤两省军阀白崇禧、许克祥、范石生等部南北夹击，工农革命军主力和宜章县委向东转移。我营因处于偏僻的宜章西南山区活动，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就靠近白沙区梅田镇，与那地区的欧阳祖光和王政领导的农民起义武装汇合。为统一指挥，两部合编为宜章独立营，男女老少约600人，枪六、七十支，梭镖300多杆，名义上仍为彭晒之独立营，后彭调宜章县委工作，独立营由龚楷任营长，我为副营长。我和龚楷都参加了南昌起义，龚在朱德部，我在叶挺部。南昌起义失败后，朱部到湘南又发动起义，朱德派龚楷到碓石地区与地方党组织联系，正值发

动起义，他就留在当地参加了起义。他虽是朱部来的，又是四川人，但与当地的同志联系较好，又有指挥能力，选他为营长是适宜的。不幸的是，1929年冬，他在东江工作时病故了。

敌军占领宜章城后，反动民团又占领了黄沙、梅田一带。我们退到骑田岭南面一个叫麻田的大村落，又从麻田翻越骑田岭主峰黄琴岭。黄琴岭林木茂密，瞩目中原。当我们翻山时，红旗招展，梭镖刺天，嘹亮的国际歌声响彻山岭。一时间，豪情洋溢，乘兴写下了一首诗：

农奴聚义起烽烟，
晃晃梭镖刺远天。
莫谓湘南陬五岭，
骑田岭上瞰中原。

这时候，湘南暴动失败了，我们600多农军是最后撤退的。骑田岭虽然是中国南部五岭山脉之一，但群众也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很难持久坚持，我们几个领导人商议，认为毛泽东指挥的部队在宁冈、碛县活动（当时不知其已南下），朱德、陈毅和宜章县委大概已东去，就决定自己也东去。于是，我们深夜越过郴县和宜章大道，登五盖山，继续向东，在资兴东南的龙溪洞和毛泽东的部队会合了。

我们这一群背梭镖的农民队伍和大红军会合，又见到有名的农民运动先驱毛泽东，多么高兴啊！他们见到我们也是同样心情，欢呼雀跃：“宜章独立营来了！宜章独立营来了！”

第六章井冈山斗争

我们在龙溪洞休息了一两天，就在毛泽东师长的率领下向井冈山前进。

当时，并不晓得什么井冈山，只知道在湘赣两省交界的地方有片大山，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就在那一带活动。

毛泽东是中央委员，部队中很多人习惯称他为毛委员。大革命时期，我曾经读过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其中揭示的真理深深折服。这次，与他接触了短短的几天，他那轩昂的气度，敏捷的谈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能因为我是湘南起义部队中第一个与他见面的，40年后——1968年的“五一”劳动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主席，他握住我的手，笑着谈起了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说：“我们是在龙溪洞见面的，那时候，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

我真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毛主席还记得我和他的那次见面，还记得我们那支小小的农民起义武装。我回答说：“男女老少加在一起，有五、六百人，六、七十条枪，300多杆梭镖。”毛主席听后不住地点着说：“揭竿而起，揭竿而起！”

记得在沔渡，我们会合了一支特殊的部队——水口山工人起义武装。水口山是衡阳西面的一个矿区，我在补充第5团时听说我们的团长、著名共产党人蒋先云去黄埔军校前，曾在水口山矿区做工人运动，并当工人俱乐部主任，因此对水口山这个名字颇感亲切。这支工人武装约有300人，百多条枪，是清一色的产业工人成份。他们从水口山走到湘南，与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会合后，命名为第一师特务连，又走到湘赣边。他们经过长途跋涉，依然精神抖擞，威武严整，令我们这些农民军啧啧赞叹。

从沔渡到十都，见到了宜章县委和宜章农民团团部，我们归队后，一起到耒市集中。

耒市是宁冈的一个大集镇，群山环抱，清澈的龙江穿市而过，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而雄壮的建筑——龙江书院。我们一到耒市，就听说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都集中在这一带。宜章独立营营长龚楷对我说：“你还没见过朱德师长呢，我带你去见他。”

我在南昌起义前，不知道朱德的名字。起义后从行军的布告中得知，他是9军副军长，常率所属3、4个连打先锋。后来知道他是反袁护国军高级将领，到西欧和苏联留过学，是共产党员。湘南起义，我们都知道他起了主要作用。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败了“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许克祥，真是大快人心。我心目中早已认定他“知兵”，自然很想见他。

龚楷带我到耒江书院，他走在前面，一推门，就听到一个四川口音说：“是龚楷吗？快进来，快进来！”

龚楷跨进门去，又听到那个声音说：“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和你在一起的萧克没有来？”

龚楷马上把我拉到前面，说：“他就是。”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年约40来岁，身体健壮，面庞黑红，神色慈祥的老军人。不用龚楷介绍我就知道他是朱德。

我激动地敬了一个军礼。

朱德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你们干得好。”

我向朱德汇报了碣石暴动和在黄沙、梅田活动的情况，感慨地说：“南

昌起义失败后，我苦苦地找党；湘南起义后，也到处找朱师长。”

朱德说：“现在革命力量在湘赣边大会合，今后，会有一个大发展。”

我们到耒市不久，就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红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我记得当时成立了3个师，下分9个团，其中28团是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的；31团是由秋收起义部队改编的；我们宜章农民军编为29团。井冈山农民袁文才与王佐等部队改编为32团。其余各团，都是湖南农民改编的。不久，龚楷调任28团任2连连长。我为29团2营7连连长。

红4军成立那天，在耒城南边的草坪上，举行了庆祝两军胜利会师和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很多，真是盛况空前。人们用许多禾桶排成方形，上面铺起门板、木板，作为大会讲台和舞台。毛泽东、朱德、王尔琢在大会上先后讲话。我现在还记得毛泽东那天讲的几句话，他说：我们是工人农民的队伍，要遵守纪律，工人农民的东西即便一个鸡蛋也拿不得。

这段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因为以前也常听讲纪律，但没有像毛泽东讲得这样形象、深刻，特别是他说“我们是工人农民的队伍”，我觉得恰如其实。北伐时期，我们唱过工农兵大联合歌，现在更现实了。

井冈山第4军成立后，部队尚未整编完，就接到出发的命令。上级通知带5天的粮食，但没有讲去哪里，我们只知道要翻过那座有大小五井的高山。仲春时节，山茶花红，油菜花黄，竹林翠绿，溪流碧青。我们沿山间小路盘旋而上，走了一会儿，朝下望去，白纱似的云彩竟飘拂在脚下，置身山中，如临仙境。

我们在大小五井住了一夜，又下到小行州住了一夜。在小行州，我第一次见到陈毅。南昌起义军南下时陈毅是25师73团指导员，但我并不认识他。还在湘南起义时，人们常提到起义领导人朱德、陈毅，我才知道他的名字。陈毅在湘南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的党代表，我在湘南第一师的布告上看到他的名字。井冈山时期，陈毅先后任过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务，主要做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他性格开朗、豪放、豁达，批评人很严厉，甚至骂人，但不记仇，大家又觉得他宽厚、诚恳，愿意与他交谈。

我们到小行州的第二天一大早，又沿着朱砂冲的小路前行，8点左右到了黄坳。一出山口，就听到枪声炒豆般地响起来，黄坳街后面的两座山上火舌闪闪。枪声就是命令。我们立即展开成战斗队形，向敌人的阵地冲去。

29团是湘南农军，有千把人，枪却不到300支，大部分人使用的武器是梭镖。这种梭镖长约2米，两刃雪白，刀柄是一寸直径的铁圆筒，插入木杆，刀刃下面围一圈红缨，衬着白晃晃的刀刃，好不威风。

农民军武器不好，但有冲劲儿，又仗着人多，分几路冲过去。只见漫山遍野的梭镖，像潮水一样，冲过黄坳河，又往山上冲，很快便把敌人冲垮了，缴了50多支枪。

战斗结束后，才知道交战对方是朱培德27师81团的一个营。我高兴极了，因为北伐时我就知道，朱培德部能打仗。我们这支农民军建立不过3个多月，到井冈山的头一仗就打垮了朱培德的部队，说明农民军也能打仗。当然，这一仗，说不上有什么好战术，就是靠革命农民的勇猛冲锋精神，加上人多，梭镖长，刀刃发亮，那个气势把敌人搞懵了，几下就垮掉了。

这个胜仗显示了农民军的威力，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它还引来了另一

个更大的胜利。

战斗结束的当天，我们住在黄坳。午饭后，军部和 28 团也来了。28 团奉命开往五斗江。这天下午，从黄坳溃败的敌人跑回拿山，向团部报告，说是在黄坳被农民军袭击，并说我们没什么武器，都是梭镖。敌团长立即带着全团向五斗江反击。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一进五斗山就遭我 28 团的反击。28 团是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的，本来就是铁军，武器也好，一下就把敌 81 团打垮了，缴了 370 多条枪。第二天，我军向永新前进，28 团为前卫，在进至永新城禾水之北，又击溃驻守该地之敌一个团和五斗江溃退之敌残部。战史上称之为“一打永新”。

占领永新后，29 团就到城东面的石灰桥、高桥头等地做群众工作，建立农民协会、苏维埃政府、游击队。因为工作对象是农民，我们自己也是农民，建立和参加过农民革命组织，所以我们这支农民队伍做地方工作也很得力。

29 团团长沙少海在社会活动方面有经验。他是湖南宜章人，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但他在外读书，接受了进步思想，曾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在湘粤边搞军事活动。大革命时期受共产党的影响，成为同情者。湘南起义时，朱德就是以他的名义，把部队带进宜章城，取得年关暴动胜利，并揭开了湘南大起义的序幕。暴动后，胡少海任农军团长，而他的弟弟胡老六是宜章各区民团首领之一。有一次，胡少海率宜章农军与民团在他的家乡大战一场。兄弟俩各为红白两方面的指挥官，鏖战结果，红军胜利了，在追击时，胡少海边追边骂：“老六，今天要打死你！”这件事，对我们影响很大，大家都赞扬说：“胡团长真是大义灭亲。”

1928 年 6 月中下旬，江西敌人杨池生部 3 个团向龙源口进犯，其中一个团攻新七溪岭，两个团攻老七溪岭。4 军 28 团在老七溪岭迎战敌人两个团，我们 29 团和 31 团的一个营及特务连守新七溪岭。

23 日早晨 6 点战斗打响，我连控制最前面的一个山头。可能是因为担任迟滞敌人前进任务，头天晚上，上级命令我们撤下去，撤下后不久又命令我们回到山上。等大部队到来，我们才一起向敌阵地攻击。

冲到山脚时，我突然觉得右脚被石头重重击了一下，低头一看，鲜血顺着脚腕流到了地上，扒开鞋袜，见一颗子弹贯穿了脚腕，伤口冒血。我被人背下火线，接着又被送到井冈山的小井医院。这是我从军以来第一次受伤。

小井是井冈山上的一个小村庄，有十几户人家和店铺。红 4 军成立后，在这里设立了一所医院。说是医院，实际就是在民房旁搭几间茅屋，屋内的地上铺着稻草，四围用木头围起来，算是病床。轻伤员都睡这种地铺，重伤员就用门板架个床。医院设备简陋，但治疗还是很正规的，分内外各科和药房。药很少，尤其是西药，主要靠打仗缴获些，有时到城市的西药房买一点。除了较重的外伤，一般都用中草药治疗，就这样也治好了不少人。

一到医院，医生就给我做了检查，由于伤口大，失血多，脚已经肿起来了，但万幸的是，没有伤到骨头。上完药，医生告诉我，安心休养一段就能好。

医院的环境很安静，生活也不错。当时伤病员都发负伤费和营养费，我住院期间部队在莲花县罚土豪的款，还专门派队伍送上山，给我们每人发了 2 元钱。山下的老百姓经常挑着东西来卖，有鸡蛋、黄瓜、油豆腐等，就摆在病房的窗外，伸手可以买到。在那种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有这么一块宁静

的后方，真是太好了。

我想起毛泽东曾向我们讲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任务，用“工农武装割据”这个词来阐述建立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波浪式向前发展，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思想。经过一段实践，特别是亲身体会到大小五井（即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重要作用，我对这一思想更为信服。

那时，我们都有一种信心，觉得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绿林”占山为王，割据一块地盘，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队伍好，人才也多，还怕搞不了？当然这还是一种朴素的农民战争思想，毛泽东“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理论则是大大提高了一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使我们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

然而，对于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来说，要彻底克服农民意识是不容易的。

1928年7月中旬，我还在医院休养，突然接到团部从酃县捎来的信，让后方的同志能走的都赶到酃县。据送信的同志说，湘南敌人吴尚第8军侵入宁冈，再进永新，畏我群众，仓卒经莲花退回茶陵，这时28团从安福，29团从莲花向宁冈进攻，没有打上敌人，便由宁冈向酃县、茶陵进攻。敌人控制了茶陵，我军则控制酃县。我们从井冈山去酃县的时候。听到部队正在议论回湘南问题。29团士兵大多为宜章农民，眷恋家乡，难舍故土，从到井冈山后，他们常常想打回家乡去，现在部队已进到湘赣边界，特别是听说湖南省委的代表也主张回湘南，29团就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回乡情绪。

那天晚上，29团士兵委员会给各营、连发了通知，让第二天早上3点钟起床吃饭，4点钟集合出发去湘南。我觉得奇怪，怎么营部没有命令啊？就跑去问营长，营长说：“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又派人问团部，回话说：军部没有命令。

第二天早晨，队伍果然集合了，团长、营长，连长和各级党代表也跟着集合，我们说：“军部没有命令，怎么走？”干部中也有许多人想回湘南，但组织观念还是有的，认为军部没有命令不能走。干部不动，士兵也不敢走。等了一会儿，朱德军长来讲话，他大声说：“罗霄山脉的形势很好，还需要我们在这里干！28团不去湘南，你们29团回去行吗？”但是讲不通。朱军长又说：“你们要革命，就要听军长的命令。”有些战士就嚷起来：“军长带我们回湘南去呐！回宜章去呐！”军长说：“28团不去，你们29团行吗？”29团是农民团，没有28团在旁边，信心不大。朱军长见下边有些犹豫，便说：“你们特务连很听命令，特务连先走，回沔渡去。”特务连确实很好，作为前卫出发了，后续部队有些人就骂开特务连了，但骂归骂，走还是走，各营按次序向东，回到沔渡。

到沔渡后，军委本来可以采取有力措施，说服干部战士，因为当时28团不要求回湘南，29团也不是全部要回去的，如把道理讲清楚，是能说服的，但由于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主张回湘南，使部队中的农民意识更加狂热，军委又采取了迁就态度，最后还是决定回湘南。

部队走到水口，还有两种意见，28团不同意回去，29团也有人不同意回去，就在水口开会。我连党支部派代表参加。他回来对我说：“王尔琢团长反对回湘南，杜修经就指着王团长质问：‘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

在水口停了一天，第二天又走。29团为前卫，28团为本队。29团就

是想回家乡，一天走七八十里，28团赶都赶不上。7月24日打下郴州，29团住郴州南门外通宜章的城关街上，28团住在郴州城北。将近黄昏，国民党范石生部从北面来反攻，同28团接触。枪声一响，29团各部就拥到街上，没有命令，没有指挥，建制混乱，也不集合就向南跑，老少和行李担、伙食担夹在部队中乱跑。走出两、三里路，队伍还不停。我看情况不对，28团在打仗，29团不去增援，反而向南跑？我当即命令我连坐在路边不要走动，也不许散兵乱插队。我站在南面最前头，把班长、排长叫来，对他们说：“28团在北边打，敌人还远嘛。上级没有命令就向南乱跑，一定是那些想回家的人发谣风。”

有的班、排长也说：“是发谣风。”

“军长在北面，28团也在北面，我们单独回宜章行吗？”

部队对朱德军长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又佩服28团能打胜仗。我这句话，提醒了他们。大家都说：“不行！”

征得他们同意，我命令回头走，走了三四里，天黑了，听到北面的枪声向东移，而且稀了，我就向东北的岔路走，恰巧遇到28团向东撤退。我问了情况，就跟着28团走。第二天，退到东江，29团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带着团部和通讯排、特务连共八九十人，四五十支枪，也来了。这时，29团基本散了，总共剩下不到200人，约百支枪，只有我连是保持完整建制归队的。

过了天把，全军又退到资兴的布田圩，军委决定进行整编，把军部特务营及29团撤销，所有人员编入28团，朱军长兼团长，原团长王尔琢为参谋长，陈毅仍为军委书记，我调28团第1营第2连当连长。

红4军从组建时的9个团，到现在只剩下28团、31团和留守井冈山的32团，号称八千子弟的湘南农军，经过两次南返，已没有好多人了。其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没有克服农民意识。

时值8月，此次行动被称作“8月失败”，它使红4军遇到了自成立以来最困难的局面。但大家并没有失望。陈毅在行军休息时讲了一段话，使我深受鼓舞，他说：“半年以前，我们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呢。打个败仗要什么紧！再干就是。打剩一个营，朱德当营长，我当营党代表；剩一个连，朱德当连长，我当连党代表；一个排，朱德当排长，我当排党代表；一个班，朱德当班长，我当班党代表。总而言之，革命到底。”

8月1日，正是南昌起义周年纪念日，我们在布田圩开纪念大会，朱德以他那在革命失败时的乐观主义态度，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指出只要努力奋斗，革命一定胜利。由于他的经历、地位和年龄，更易为人接受。

陈毅和朱德的话，说到了我的心里。大会后，我就去28团2连当连长，朱德对我说：“这次回湘南，29团只有你这个连保存下来了，现在让你当2连连长，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好。”

2连是南昌起义军73团一个营缩编的，前身是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一个营，战斗力强。我从农民团转到正规团，又带这样一个主力连，真好像自己又回到了“铁军”，当然也感到责任重大。

队伍改编完，我们就在资兴地区和汝城、桂东县一带分兵做群众工作。有人揭发2营营长袁崇全从郴州回来就想另走一条路，说这个人靠不住。后来有人当着他的面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那家伙暴跳如雷，说没有这回事。后来军委感觉这个人不可靠，决定调动，但还没有执行，队伍要分兵，就由

他带着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和 2 营全部，从住地出发往东南方向一天行程的地方游击。

袁崇全带着 6 个连向前走，走了一百七十八里还不停下，干部们就怀疑了。以机关枪连党代表何笃才和六连党代表赵尔陆为首，就找其他连党代表和连长商量，都说袁崇全这样走，一定有问题。有个排长李见林（湖北汉川人）说：“他要是反革命，我就敢打死他。”

他们十几人就带着盒子枪到营部质问：“往哪里去？军部有没有命令？”

2 营党代表也是反革命，假造一套说军部口头交代的。他们不相信，因为出发时团部讲得很清楚，是到布田圩东南五六十里地做群众工作，而现在走了一百七十八里还不停，再分析袁崇全平常的表现，特别是从郴州败退时那种动摇的表现，认为他是要叛变投敌。他们就互相商量，定下主意，约定夜深集合往回走。5 连连长是袁崇全的亲信，迫击炮连有 3 门炮，同营部在一起，不好办。就没有惊动这两个连，其他第 6、7、8 连和机关枪连半夜集合，调头往回走，急行军 100 多里，第二天中午回到军部驻地。

住了一个星期，毛泽东率 31 团 3 营从井冈山到桂东来接我们。当时，28 团 1 营住在桂东城西南的村子中，军部和 3 营在龙溪洞一带，离桂东城还有一段距离。1 营马上向军部报告上述情况。第二天早上 9 点钟，朱德和陈毅率军部赶来，靠近 1 营驻下。毛泽东到了军部，与朱德、陈毅会合，决议重回井冈山。就在那天下午两三点钟，敌第 8 军突然从北边打来，31 团 3 营被隔断在城东边，冲了几次过不来，就从原路回井冈山了。我们只有一个营在山上同敌人打。打了两三个小时，伤亡很重，我的颈部和左肩受了重伤，这是我从军以来的第二次受伤。在这次战斗中，营长林彪也挂了彩。

晚上，一营清点人数，共伤亡五六十人。次日晨，部队继续撤退。由于伤员多，担架不够用，一些伤员只能骑马或走路。那天，我伤得很重，走路都摇摇晃晃，卫生员找来一匹马给我骑。我们走在队伍的最后。走着走着，听到北边打起来，枪声很紧，而且离我们不远。队伍中有人大声喊：“赶快走！赶快走！”我想回头看一眼，但颈部肿得很粗，回不过头，我就扭转身子看，已经看到敌人打的白旗子了。我想上马快走，但身子虚得连马也上不去，就拼命跑。跑了里把路，回身一看，敌人离我只有百米左右。正在紧急时刻，28 团 4 连党代表彭葵从后面赶来，攥着我的腰带上山，这时副营长龚楷带队伍反冲锋，打退了敌人的先头部队，我和许多伤兵，才算脱离了危险。

彭葵是奇石彭家人，彭儒的堂哥，湘南起义时我们就在一起。这次若不是他，我很难脱险，而他却不幸在后来的大柏地战斗中牺牲了。

这一天，我们退到龙溪中洞，第二天继续南进。刚宿营，老百姓说前面 30 里处的思训圩有二三百人的队伍，还有 3 门迫击炮。我们一听便知是袁崇全叛部。王尔琢团长恨极了，黄昏后就和团党代表何长工带着 2 营的 3 个连去打叛徒。半夜过后把思训圩包围了。叛徒打枪，王团长带传令兵直往街上去，边走边喊：“我是团长，来接你们的！”战士听到是团长的声音，不打枪了。那几个叛徒铤而走险，对着王团长一阵驳壳枪，王团长中弹牺牲，但 3 个连都归队了。叛徒袁崇全想拖部队走，结果一个班也没有拖成，说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团结一致，坚不可摧。

王尔琢团长的牺牲，是红 4 军的重大损失。他是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学生，投笔从戎，入黄埔一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他临

阵沉着，指挥灵活，勇猛果断，是朱德军长的得力助手。他和下级，同甘共苦，能团结人。由于对反革命缺少警惕，竟牺牲在叛徒的枪下，实在痛心。

第二天，我们开了追悼会，朱德亲自主持安葬，毛泽东写了一副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待到胜利方始休！”毛泽东的挽联，代表了红4军全体同志对王尔琢的悼念与悠思之情。

从思训圩继续向南走了一二十天，终于回到井冈山。一路上，我们这些伤员受到很好的照顾，部队到一地就打土豪，杀猪杀鸡，马上给卫生队送来。说来也怪，我受重伤，喝几次鸡汤，竟慢慢好了。到底年轻，生命力强。

回到井冈山，我又在小井医院休息了一段时间，大约是9月下旬，我伤愈归队。这时，部队干部作了调整。林彪任28团团长；伍中豪任31团团长；我调28团1营当副营长，营长是胡少海。

这时，宁冈城已被敌人占领，我军驻茅坪、柏露等地区，根据地略有缩小。10月1日，敌周浑元旅的一个营来袭击，28团在离茅坪不远的拗头拢迎战来敌，打垮了敌人，并乘胜收复了新城，恢复宁冈全县政权。接着部队分兵，28团2、3营和31团全部到遂川游击；我们1营和袁文才、王佐部守井冈山。10多天，敌又占新城。主力回来，再打新城，歼敌一个营；次日追至永新南阳区之四教书院打垮敌一个营，进至烟江。住了一夜，第二天打永新。敌人在东瓜岭一带构筑工事，我们一直打到黄昏，我率两个连虽一度打进了永新城，但敌人主阵地东瓜岭始终没有攻下，黄昏撤退，我部退到禾水南归还建制。

经过一系列战斗，我们克服了8月失败给井冈山根据地造成的困难，重新打开了湘赣边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尤其令人鼓舞的是，这个时期，有两支国民党的部队起义参加了红军，一支是毕占云领导的，有100多人；另一支是张威领导的，有八九十人。这两支部队起义，对我们影响很大。大家觉得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还有国民党军队倒戈参加红军，说明我们不孤立，我们的事业有希望。

打永新回来后，我调28团2营当党代表和党委书记。营长是王展程，湖南石门人，黄埔四期学生。也是在这时，我们听到了敌人要来“会剿”的消息。为了长期守山，特委决定发动军民往山上运粮。井冈山上有些稻田，但产粮不多，部队在山上住久了，吃饭就成大问题，因此要守山就得大量储备粮食。宁冈是产粮区，古城新城一带粮食也多，军队和地方分了工，农民把粮食送到大垅、茅坪、柏露等村，部队转运上山。当时叫做挑谷子。全军上下除了病、伤残外，都去挑粮。我印象中，28团只有两个干部没有参加，一个是林彪，因为身体不好；一个是周子昆，脚上负伤。朱德军长同我们一样，每天步行几十里，用扁担挑粮上山。

朱德军长威信高，一方面因为他善于指挥打仗，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与士兵同甘共苦。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朱军长，虽然当过滇军的旅长，还留过洋，但始终保持着农民的忠厚、朴实和勤劳。闲暇时，他帮助老乡犁田和耙田。于得熟练，就这一点，也使他与老乡和许多农民出身的红军官兵亲近了许多。

朱德性格谦和，与他接触也比较容易。那时他的夫人是伍若兰，这是一位有文化的革命知识分子，她在湘南起义时是耒阳县委较得力的常委，湘南起义时朱德率部队到耒阳，与她一道工作，颇有好感，县委一些人开玩笑，说他俩很般配，一来二去，他们真的结为伴侣了。在井冈山时，我们常拿这

事讲笑话，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记得其中有两句是“朱伍才貌正相当，邂逅相逢于耒阳……”。我用小毛笔把诗写在石灰墙上，张际春看到了，说：“你真是，玩笑开开可以，怎么还写到墙上？”我一听，也觉得不好，伸伸舌头，赶紧擦掉。

大家努力挑谷子上山，是抱定了与井冈山共存亡的思想。我们相信井冈山可以守住，因为井冈山有五大哨口（黄洋界就是其中之一），每个哨口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口子上放一两个连，敌人千军万马也难进来。

12月上中旬，井冈山上粮食准备得差不多了，这时彭德怀和滕代远率红5军来井冈山。我们在新城开了一个联欢大会，4军、5军和新起义的两个部队及地方干部、老百姓都到了，好多人。主席台的柱子上贴了一副对子，据说是陈毅写的，上首是：“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下首记不得了。这个上联写得很有意思，用了四个新字，把整个形势和任务，都描绘出来了。

5军上山后，敌人“会剿”的风声更紧了，大家都在考虑如何守山的问题。当时有个说法，要留5军守山，4军打到外面去调动敌人。彭德怀军长每天都在搞调查，找老百姓谈，然后一条条路去看。开会讨论时他就说：“留下5军守山不行，兵力不够。”大家就说：“5军有6个连，加上本地武装，兵力怎么不够？”有的同志也说：“5个哨口做好工事，各放一个连就能守住。”彭德怀说：“上井冈山不止5条路，而是9条路。”他一条一条他讲出来。我们在井冈山住了近一年，他说的几条路有些连“山大王”王佐都不知道。28团党代表何挺颖对彭德怀非常佩服，对我们说：“彭德怀这个人不简单，是个好军长。”我和5军没有接触，只在宁冈城听过他一次讲话，何挺颖说他是好军长，我们都高兴。在那四周都是白色恐怖时期，多一个好军长，怎么不高兴！1月4日至7日，湘赣边界特委和红4军、5军军委在

柏露召开会议，正式决定留5军守山，4军打出外线。为了加强井冈山的守备力量，在下山前成立了一所红军学校，由彭德怀兼任校长，从每个连调4名学员，当时全军有20个连，这样就抽调80人，组成了一个连。红4军离开井冈山时，这所学校的学员全部编到5军。这年4月，我们在于都与红5军会合，当时我营有三四个原红军学校的学员跑来找我，要求回4军，我就到军部找毛泽东，请求批准他们回来。毛泽东说：“5军正缺人，哪能把他们调回来呢？我们不能只想自己的部队，要有全局观念。”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和朱德率红4军军部、28团、31团及特务营、独立营，共3600余人，从茨坪地区出发下井冈山，向赣南进军。

当我们离开这座战斗了近一年的大山时，都想着很快就会回来的，不料一别竟是几十年。

第七章 闽赣路上

下井冈山前两天，我营营长王展程调红军学校当教员，我由营党代表改任营长。下山时，调原 29 团 3 营营长陈俊来我营当党代表。陈俊是湖南宜章人，第三师范学校学生，比我大两三岁，是一位忠诚而谦和的同志。

我军从茨坪附近的土岭出发，从小行洲西南下山，走的是一条比较隐蔽的小路，绕过黄坳，经大汾、左安、营前、杰坝、崇义，一直向南。每天行军五六十里，同时还做群众工作。沿途经过许多村庄、集镇，老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当时，我们的经济也很困难，缺吃少穿，但大家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给穷苦的百姓增加负担。

走了大约两个星期，来到大余。大余旧称南安府，是个不小的城镇，有两三万人口，还有几个外国教堂。部队在大余住下来，打土豪筹款，改善生活。

我们下山后，赣敌李文彬 21 旅（辖 41 团、42 团另加一个归他指挥的 68 团）和刘士毅的独立 15 旅（由独立 7 师改编，辖 29 团、30 团）从遂川向我尾追。到大余后，我们估计敌人会来进攻，打还是不打？军委在天主堂开了个党的活动分子会，朱德、毛泽东、陈毅、林彪、何挺颖都参加了。会上有两种意见，多数人主张打，28 团团团长林彪、党代表何挺颖是主张打的，特别是何挺颖，态度十分坚决。少数人认为不能打，但在这种气氛下，也不好十分反对，军委就决定迎战李文彬。

这个决定是仓促作的。当时，既没有摸清敌人进攻的方向，也没有搞清敌人进攻的时间。第二天侦察员突然跑来报告，说敌人追来了。队伍立即拉出在来路迎敌，红 28 团担任主攻。由于林彪事先连地形都没看，队伍拉出离大余县城四五里地就和敌人接触了。李文彬是朱培德的部队，有战斗力，兵力和装备又强，我们冲来冲去，一直打到下午三四点钟，终不支而溃退。部队失去指挥，建制打乱了，很多人乱跑，军部、团部都不知在哪里。

我营退下后还保持着没乱，其他机关和失去建制单位的零散人员跑到我这里，要往队伍里插。我想：如果把建制插乱，部队就无法作战了，便下令：不是 2 营的人，临时编队，跟在后面走，任何人不许插到 2 营队伍中。这样时走时停，到天亮，林彪带着团部和其他部队陆续到了。上午，28 团集合起来，一看，团党代表何挺颖负了重伤，1 营党代表熊寿棋和在 31 团工作的黄益善都负了伤。

林彪让我营走在前面，1、3 营在后，向南往梅岭走。到了梅岭又向东去。第二天下午，走着走着，又听到左边 10 多里的地方打起来了，后来知道是 31 团与敌人接了火。第 3 天，军部、31 团与我们汇合，又沿着九连山北麓向东急行。那一带都是崇山峻岭，偶有村寨，也是些少数民族。时值数九寒冬，部队在冰冻寒天中行走，很多人衣着单薄，大部分人穿草鞋。群众没有受红军的影响，有的逃跑，即不跑，对我们也是怀疑的。地主武装还来骚扰。我们既要对付后面穷追不舍的敌人，又要克服自然界的重重困难。这一段行军很危险，也很艰苦。

有一天行军，我营担任全军的后卫，一股敌人追上来。我们把其先头部队打退，抓了两个俘虏，经审问，知道是广东军阀王应榆的部队。我看过一本书，上面说在遭遇战中常常敌情不明，一发现敌人，就要“争取先机之利”。

我根据这个原则，遇到这种情况，给他一个冲锋，因为他走前面的是尖兵排、连，人数不多，你自己虽然也不能多集中兵力，但以不大的兵力突然冲击敌人不大的兵力，只要打退敌人的先头，多半可以抓住几个敌人，至少收容敌方几个伤兵，敌情就明白了。等到敌大部队赶到，我或打或掩护撤退都行。这个原则给我很大启示，在指挥作战中，我常用这个方法。

有一天走了 20 多里，天快黑了，我们就在一个村子住下。离住地四五里的村庄，有个党支部。快半夜时，几个党员来报告，说敌人天黑后到了他们村里，情况十分紧急，我们立即起床，悄悄出发了。若不是地方党的同志来报告，第二天拂晓我们就有可能受敌袭击。毛泽东后来曾以此例来说明军队做群众工作、建立地方党组织的重要性。

在寻邬孔田圩，归李文彬指挥的 68 团准备侧击我军，幸被我前卫便衣侦察发现。我们马上转了个弯，避开这股敌人。但到吉潭，终于还是遭到敌人的袭击。

在吉潭宿营的第二天拂晓，敌人分 3 路袭击我军宿营地。我们还没起床，部队给打乱了。陈毅险些被俘虏，朱德军长带着 3 个卫兵杀出一条血路才冲出来。我营的党代表陈俊也给打散了。

从吉潭出来走了十几里路，遇到一条河，我带着两个连到河对面占领河岸阵地阻击敌人，坚持了两个小时，军部才从我左边里把路过了河。我们赶紧撤退，跟随大部队向东转移。这一次又避开一个大危险。

从吉潭退到了罗福嶂，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隐蔽的村庄。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一下，前委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28 团改为 1 纵队，原来的 3 个营分别改成 1、2、3 支队，特务营改为 4 支队，林彪任纵队长，陈毅任纵队党代表。我任 2 支队长，胡世俭为党代表。胡是湖南郴州人，曾任宜章县委书记，在 28 团、29 团党委工作过，很有宣传鼓动能力。

从罗福嶂出发，我们又转向北面前进，走寻邬、澄江、会昌、瑞金。敌人穷追不舍，在离瑞金东面不远的地方，我们同福建敌人郭凤鸣部打了一下。后来又发现追敌，是赣敌刘士毅独立 15 旅。军委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研究部队行动。我记得朱德在会上说：“南昌起义失败后，只剩八、九个连，还能打，我们现在还有 22 个连队，要打，要煞煞敌人的威风。刘士毅部队战斗力不强，我们在井冈山时同他交过手，曾在遂川县城打得他七零八落。”于是决定打刘士毅。

第二天，我们到了大柏地。我营奉令在大柏地来路 4 里处担任警戒，主力到大柏地宿营。大约下午两三点钟，敌人来了，我营占领阵地，打了两个多钟头。那时正值冬季，五点来钟天就黑了。我们撤回大柏地，当晚休息，军部部署第二天再打。我营党代表胡世俭负了重伤，就在这天晚上死了，当时才 20 多岁。

第二天，1 纵队为右翼，3 纵队为左翼。胡少海率 1 支队从大路右边山上爬过去迂回到敌人左侧后，截断敌人的退路。3 支队在正面，我支队为第二梯队。正午时分，纵队部令我支队从正面大道左侧攻击敌左翼，3 个连同时冲击，一下子捉了 200 多俘虏。这时 1 支队已包围敌人左后侧，俘虏了二百四、五十人。左翼 3 纵队也打得好，将敌人击溃。到下午 3 点，独立 15 旅完全被击溃了。这是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第一个大胜利。

这一仗打得好，消灭了刘士毅部主力五分之二，俘虏七、八百人，缴获了很多枪，拿都拿不了。我们也有伤亡，我这个营伤亡 40 多人，牺牲了一个

连长李见林（湖北汉川人）和一个副连长王宝元（北方人）。第二天出发，为了抬伤兵，缴获的武器无法拿，我就让司务长把一些不好的枪堆成一堆，一支支地对着石头猛砸，几下砸一支，很快就砸破了一大堆。

大柏地战斗胜利了，大家非常高兴。因为从井冈山下山以来一路打败仗，被敌人穷追、袭击。这一仗扭转了长途行军中的被动局面，振奋了士气，是大革命失败后我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一次有战略意义的胜利。

从大柏地到宁都，国民党第14军军长赖世璜的弟弟赖世琮率一个保安团驻守宁都，该敌受到大柏地战斗震慑，不战即弃城逃跑了，红军没发一枪一弹便占了宁都城。宁都是赣南一个很大县城，过去是州治。我们找到商会，筹了5000元款，每人发了1元零用钱。

在宁都住了一天，又出发去东固。3纵队为前卫，毛泽东随3纵队走，朱德、陈毅随1纵队在后。在井冈山时，我们就从报纸上得知，有一个叫李文林的共产党人在东固搞游击战争，但具体情况不清楚。我们在离东固25里的南隆住了一晚，这里有我党领导的秘密政权，也有群众组织和游击队，但不打红旗，和白区通邮通商，人们自由往来，不像井冈山地区有赤白对立的现象。当地的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东固红军2、4团的情况。这时我们才对东固地区的红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从南隆往西走就到了大山环绕的东固。这时，群众和游击队都到街上欢迎我们。他们没有打红旗，但那种热烈动人的场面真叫人感动。过去我们在井冈山眼光比较狭小，虽然知道井冈山以外还有游击战争，但不知别处有苏维埃政权。这次到东固，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观念就是这里是个没有公开打红旗的苏区。到东固的第二天，在河边召开了大会，红军2、4团的代表也来了。陈毅主持大会，2、4团代表讲了话，有一句话我还记得：“我们2、4团有战斗力，打团把敌人是没问题的。我们的战术叫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红2团是赣南地区农民暴动组织起来的，李文林任团党代表和团委书记。团不设营，只有6个连。红4团是由地方游杂部队组织起来的，团长段月泉，只有三、四个连。东固的群众非常好，我们住在东固的时候，他们送米、送菜、送柴，保证了我们3000多人的吃、住、用，使我们得到下山以来最好的一次休息。

我们在东固还做了两件事：一是改编部队。前委开会研究今后行动，准备部队分兵，朱、毛、陈分开行动。为此，将1纵队改编为两个纵队，即把3、4支队分出来，组成2纵队，纵队司令由朱德兼，对外称刘忠（朱德的化名）。这时，红4军辖3个纵队：1纵队，纵队长林彪，党代表陈毅，辖第1、第2两个支队。2纵队，纵队长刘忠（朱德）兼，没有党代表。辖第3、第4支队。3纵队，纵队长伍中豪，党代表旷朱权。辖第5、第6两个支队。二是传达了“六大”决议。“六大”文件是快下井冈山时收到的。五斗江战斗时，我们打败了国民党第9军27师81团，我听毛党代表说，书记官是我们党的秘密工作者，是这位同志通过关系送来了“六大”文件。在东固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由毛党代表亲自传达“六大”决议，共传达了3次。

在东固住了一星期，赣敌李文彬率3个团进逼，张与仁旅也进窥东固，此时我们得悉井冈山已经失守，彭德怀率红5军突围下山，正向赣南活动。本来我们下山是为解井冈山之围，井冈山失守，就得重新考虑战略方向。

前委开会研究，“乃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

这个决定有重要意义，原先我们都有一种在固定地区作长期斗争的思想，认为只有“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才是正确的，现在这个决定，实际突破了红军初创时期在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为以后在闽赣两省大范围的游击行动，以至最后创立中央苏区，打开了一条道路。

2月25日，我们撤离东固，临行前，把一些走不动的伤病员，包括周子昆、毛泽覃、陈东日等共二三百人留在东固。部队走水南、白沙、藤田、招携、苦竹、广昌，又向南，走白水、驿前、石城、壬田市。

一天，我支队为前卫，走到瑞金东面约30里的虎头嘴，发现敌人从东南来堵截我们。当时不了解东来之敌的虚实。恰好纵队政委陈毅来我支队直接掌握情况，在他的同意下，部队立即转向东南，进入闽西，插到了古城与汀州南面的四都坪。这不是军部的预定方向，但在游击战争时期，军部规定前卫纵队的领导人，可以根据情况临时决定全军性的行动方向。

这时汀州敌人一个团来进攻，军部决定迎战这股敌人。我支队奉命担任正面主攻。敌人占领了对面一座山，中间隔着一条小河，河上有座桥。那时是冬天枯水季节，河水很浅。战斗打响后，我支队有的从桥上过去，有的干脆涉水，很快冲过了河。敌人虽然在山上，但火力不强，连机关枪都没有。我们展开队伍，呈扇面往上冲，敌人也有一部向我冲，副支队长温朝盛率一排多人从右侧突击，敌退却，我部乘胜迅速前进，占领敌中间阵地。这时，1支队也从右边打了上来，敌人完全垮了。

这一仗我支队俘虏了20多个敌人，从缴获的武器看，有些枪是汉阳金陵兵工厂造的，有些就是本地造的土快枪，火力不行。从战斗力看，他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不会利用进行反击，而我们一接近，他又不敢拼刺刀，证明敌人战斗力不强，士气不高。这一仗最大的收获是摸到了闽西敌人的虚实——武器差，战斗力不强。当晚，前委开会，决定打汀州。

汀州是闽赣边南面——武夷山区一带较大的城镇，过去我们不敢打，一直向南走就是想避开这里的敌人。现在清楚，汀州敌人战斗力并不强，完全可以打。

第二天打汀州，3纵队为前卫，2纵队、1纵队跟进，由于南方山区小路只能走一行，行军队伍拉得很长。我们在后边才走了二三十里，就远远地听到前面打枪，还没赶到，敌人就垮了。2、3纵队追击，我1纵队只是跟着走，没有捞到仗打。

汀州比大余、宁都更大、更好。从1928年退出郴州以后，我还没有到过这么大的城市哩。部队在汀州得到了很大的补充，每人发一套新军装，还发了绑腿和八角帽。说到帽子，有个笑话：下井冈山时，很多人没有帽子，我们就把打土豪弄到的布做包头，缠在头上，有蓝的，有白的，有绿的，缠得宽宽的。听俘虏说，他们在四都坪同我们打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付打扮，十分害怕，边打边跑，吓得腿都发软了。

到汀州以后得到蒋桂战争爆发的消息。这里还有段插曲：我们从广昌向南走时，赣敌张与仁旅来追。在距壬田一二十里的黄柏圩，我们的后卫尖兵和敌人接上了火。双方保持接触。快到中午，敌人突然集合，回头向北去了。侦察员向军部报告，军部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到汀州后得知蒋桂战争爆发的消息，才明白张与仁旅为什么回头向北。

军阀混战是红军发展的大好时机。3月20日，前委在汀州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大力开展游击战争，

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并“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这时，我们得知彭德怀、滕代远率红5军到了赣南。4月1日，红4军回师赣南到达瑞金与红5军会合。接着，两军一起到于都县城，并在于都东门外河滩上召开了4军、5军第二次会师庆祝大会。滕代远主持会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都讲了话。尔后，彭德怀率红5军回湘赣边区，毛泽东率3纵队，朱德率1、2纵队与军部，在赣南分兵活动。

大概是4月中旬，军部率1、2纵队攻打宁都。上次进宁都，守敌赖世琼不战而退，这次也是这个民团头子却不走了，率领他的6个连坚守宁都城，我们围了6天6夜，没有攻下来。

宁都城墙有两丈高，还有外壕。我们2000多人，从四面把城围起来，我率2支队从西门进攻。我估算了一下，城墙有9里长，旧中国一里是570米，9里就是5310米，我想，这么长的城墙有3000多个垛口，五六百人是守不过来的，就采取了一个办法。靠近城西门外约百米处有一幢火砖砌的铺子，上下两层，后面还有些住房，也多为两层，我让士兵在下层挖了不少枪眼，从枪眼处可以看到敌人，也可以射击，我们的枪眼小，敌人不容易看到我们。上层有窗，更好观察射击。

开始几天从枪眼向城墙上打枪，吸引敌人的火力，并不强攻。等到第6天，我估计敌人也麻痹了，锐气已过，就令部队停止打枪，准备了一些长梯子放在铺子边，然后让一些赣南兵对着城墙喊话。敌人见我不打枪，又跟他们拉家常，也停止打枪，有的还站起来看。我见城墙垛口处站了很多人，下令“快放”！二三十支枪突然射击，敌人受到袭击昏了头。我又指挥早已准备好的进攻部队，拖起梯子，靠近城墙。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见我军已登上垛口，便纷纷向两边逃跑。

我们占领了城西门，向两边延伸。各部队也纷纷爬城而上，攻下了宁都城。这是红4军下山以来第一次攻下的有敌人据守的州城。

这个战法，我是从《三国志》上学来的，曾国藩说过：“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初气过锐，渐就衰竭”。此次我为进攻者，可反其意而行。在攻城前，先包围，弄清城壕深浅，城墙高低，准备好过壕和登城工具。我根据军部指示，开始几天从容作准备，万勿“初气过锐”。准备好了，不在早晨、黄昏、夜晚攻击，而在将近中午，敌人不注意的时候，一鼓而进，登上城墙。

打下宁都城，四周都有当地党组织领导的游击梅花点，军部决定在这里大力发动群众。

在宁都住了几天，我们又转向福建。这时，福建的游击战争已经开展起来了，与我们第一次去时情况大不一样。红4军转战闽西，三打龙岩，捷报频传。但这时前委内部发生了一些争论。自从大柏地战斗后，我们都打胜仗，形势很好，红4军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争论，当时我不明白。后来回想起来，起因是打下宁都后，前委决定恢复4军军委，由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恢复4军军委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本来是件好事，但是，新上任的军委书记刘安恭主持军委会议，作了条规定，让4军党的最高组织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这个决定一提出，许多人就议论纷纷，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6月初，在湖雷开会就争论起来。那时党内不忌讳争论，党的文件、党章都规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员对问题有看法，在未作出决定之前，可以自由讨论。

争论的焦点开始是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以后又引发出了许多问题，如对出击湘南的看法，对坚持井冈山斗争和赣南游击的看法，对4军各种制度、政策的看法，而争论最大的是“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要不要一切归支部”，以及有没有流寇主义和军阀残余等等。6月中旬，我们在新泉住了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那几个问题。这中间，林彪和刘安恭起了不好的作用。

“七大”前林彪给前委写了一封信，意思是有前委就不要军委，还说设立军委“这是个无耻的阴谋”。我们读了后都不高兴。要不要军委，是组织形式上的问题，哪里说得上是“无耻的阴谋”。

刘安恭采取的一些做法也很不合适，如他“把4军党分成派”，并且说成是拥护和反对中央的两派。在争论发生后，又提出用“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解决纠纷”。这些论调更助长了争论。一时间，由下而上，大家议论纷纷。如：

对“党管理一切、一切归支部”的提法有意见，认为支部不能管得太细。“党管一切”和“党管理一切”有没有区别？指导和领导有没有区别？行政上的事，管得那么细，有什么好处？等等。

1929年6月19日，第3次打下龙岩后，红4军在龙岩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由时任4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主持，各支队干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参加了会议。陈毅向大会作报告，毛泽东、朱德都发了言。大会在通过《红军第4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后，选举了新的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各纵队的士兵代表共13人为前委委员，陈毅为前委书记。

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大多数代表投了陈毅的票，我也在内。为什么大家选陈毅而没有选毛泽东或朱德呢？

毛泽东、朱德、陈毅在红军初创时期，都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寻找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方向。大的方面，如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地方武装，建立群众组织，建立革命政权等等是一致的。但当时朱毛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在我们看来，尽管这些意见多属认识和工作方法上的不同，可是给部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他们俩人的威信也有些影响。陈毅在大敌当前，出面调解朱毛的矛盾，基本稳定了局面是对的。于是就选举陈毅担任前委书记。

红4军“七大”对停止党内争论起了作用，但没有从政治上提出明确的指导方针。“七大”后，闽粤赣三省敌人开始对闽西根据地进行“会剿”。这次“会剿”，金汉鼎为总指挥，指挥福建张贞的第1师，江西金汉鼎的第9师，还有广东蒋光鼐的两个旅。

我们得到敌人“会剿”的消息后，军部决定向东首先打击进攻闽西的敌人。当时，陈毅到中央汇报去了，毛泽东因病离开了部队，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朱既要指挥部队进行反“会剿”作战，又要抓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有些应付不过来。我们也感到，由于毛泽东的离开，部队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受到了削弱。那时，大家一致认为，毛对政治工作有办法。2支队副党代表张恨秋就给毛泽东写信，请他回红4军。但毛回信说，他不能回来。朱德率领部队出击闽中。去闽中的结果，把张贞的那个师打垮了，在漳平还打垮了张汝光的一个旅（张贞占龙岩城的一个旅也撤退了）。不久，又打开了“铁上杭”，使东西两大块苏区联成一片，这是闽西苏区的全盛时期。

打开上杭后，红4军又召开了“八大”。我对“八大”没什么印象，好像开了一两天。

在此期间，林彪和熊寿祺也闹矛盾，林彪一连写了3封信，要求辞职。前委专门开了一次会，解决他俩的矛盾，朱德说：“不要再吵了！”

“八大”后，中央来信要红4军去东江。后来才知道，此番去东江时机不对。当时“两广战争”已经结束了，敌人可以集中力量对付红军，加上遇到的又是强敌——19路军，就更困难了。我们去东江时有五六千人，回来剩下4000多人了，在上杭编的1000多俘虏，也大部分跑回家了。总之，红4军不宜远去东江。

在去东江的路上，我调任1纵队参谋长，纵队司令林彪，党代表熊寿祺。此时1纵队有3个支队，1支队长王良，党代表李赐凡；2支队长龙普霖，党代表粟裕；3支队是由1、2支队各拨两个连并加以补充组建的，支队长龚楷，党代表刘万清。出击东江打梅县时，龚楷负伤，部队伤亡也较大，就将这个支队撤消了。

出击东江一共打了三仗：松源一仗打广东蒋光鼐师1个营，是1纵队打的，缴了40多条枪。虎头沙一仗，是2纵队打的，敌人也是蒋光鼐师。仗虽打胜了，但纵队长刘安恭牺牲了（刘“七大”后，由军政治部主任改为2纵队长）。梅县一仗主要是1、3纵队打的。开始打进去了，梅县是朱云卿的老家，他家在街上开了个铺子卖毛衣，我们打进去后，朱云卿从铺子里拿了千把件毛衣（那时一件毛衣一块半至两块钱），准备发给部队。刚拿到街上，我们还没来得及抱走，敌人打来了，结果，毛衣都扔到街上。打梅县时，我的左肘被敌弹穿伤。这是我第三次负伤。进梅县前，我们了解到，梅县西南面有个叫马头的地方，是个小苏区。我们在梅县站不住了，就退到马头，休息4天，就撤回闽西。

回到闽西，占领汀州。毛泽东由蛟洋来汀州，据说是陈毅把毛泽东请回来的。我们在由蕉岭向梅县走的那天路上，巧遇了从中央回来的陈毅，得知他带来中央给红4军的信，大家高兴极了。我们对中央有信仰，认为中央有全国其他方面的经验，一定会给红4军指示，解决前委内部的争论，使全军团结一致地战斗。由于当时忙于打梅县，没有马上向部队传达中央来信。

回到闽西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毛泽东于11月26日回红4军主持工作。28日在长汀召开了红4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为开好这次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齐心协力，作了很多准备工作。12月3日，部队由汀州开到新泉，毛泽东亲自召开地方干部座谈会，听取群众对红军的意见；然后又召开各支队、纵队党代表联席会议，还找一部分干部、战士谈话，仔细调查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反映，共同研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如何克服的办法。

经过充分准备，12月28日，红4军“九大”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

“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会议由陈毅主持，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朱德作了军事报告。印象最深的是陈毅传达中央来信。中央的这封信对“九大”起了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信中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特征、中国革命道路和红军基本任务的阐述，特别是指出红军中存在的不正确倾向的表现、根源和纠正办法等，使我们都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中央的来信中，许多观点与毛一致，说明他在政治问题上的确是高瞻

远瞩。

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经验教训，改选了前委，一致通过了红4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是毛泽东根据中央来信内容并结合红4军的实际主持起草的，它总结了从南昌起义开始两年多来的建军经验，划清了我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总结的经验有高度原则性，有理论的系统性，也很具体、实在。对红军存在的错误倾向，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有的放矢地提出了纠正的方法，针对性强，有废有兴，有破有立，文辞质朴，没有空谈阔论。直到今天，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许多具体规定上对我军建设、尤其是政治工作，仍有现实意义。古田会议后，据说中央把红4军的这些经验介绍给鄂豫皖、广西左右江、湘鄂西等根据地，供各地红军学习、参考，促进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九大”后，红4军翻越武夷山，进至江西，这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情景，确实是“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我们在富田住了一个星期。蒋介石派独立15旅唐云山部来进攻，敌人有一个营占水南。红4军决定消灭该敌。第一天上午，1纵队为前卫，向水南进攻，后续部队还没全部到就打垮了敌人。继续前进，走了还不到20里，又打垮敌人一个多营。第二天，全军集中兵力（共4个纵队）打敌人主力所在的值夏，下午三、四点钟，又打垮他一个多团，这样，我们将敌人一个旅全部打垮了。这一仗是红4军打开上杭后又一个大胜利，仅重机枪就缴获了12挺。

3月间，4军1纵队成立教导队，我以纵队参谋长兼教导队队长，赵尔陆为党代表，学员一半是我们自己的老战士，一半是俘虏过来的班长和老兵。学期3个月，主要是在行军中训练，教官就是我们自己。军事教材用的是打龙岩时缴获国民党的操典，武器就是步枪。有时也请毛泽东、朱德来讲课。毛泽东来讲红4军九大的精神，朱德来讲过射击和利用地形地物等战场行动，他们既有威信，又有水平，很受欢迎。

林彪规定我在打仗时回纵队司令部，执行参谋长职务；不打仗时就住在教导队，全力抓教导队工作。这也是我第一次兼任军队干部的教育工作。

水南、值夏战斗后，我们南进到赣州，围了5天，没打下来，便南下打大余、南雄、信丰。

此后部队情况很好，战斗也顺利，在南雄打垮广东军阀余汉谋师的两个营，在信丰消灭守城的地主护卫团五六百人，大大促进了当地游击战争的发展，也扩大了红军队伍。

1930年4月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大动干戈，一场空前规模的军阀混战爆发了，这是红军和游击战争大发展的极好时机。然而，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这时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并逐渐在红军中推行一整套冒险主义的计划。

第八章 战斗在中央苏区

1930年5月间，我们由赣南再度入闽。6月上旬在上杭官庄击溃金汉鼎部周志群新编第14旅，即进入长汀县南 阳。这时我们得到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精神。本来，5月初，军部派1纵队党代表熊寿祺去上海，把我们打南雄、大余时筹的一些金子给中央送去，正好赶上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他就作为红四军的代表参加了。但会议结束后，熊寿祺一直没有回来。1950年春，我在汉口碰见他，才听他说，从上海中央返回闽西时，在厦门被敌人扣住了，他家把他保释出来，送到上海复旦大学读了两年书，后又到日本读书，以后在四川作社会活动。

我们是通过秘密交通线得到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的，中央要求各地红军分别集中组建正规的军团。根据这一精神，红4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南阳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红军改编的问题。因当时没有接到中央的正式指示，只是议了议，没作决定。

6月中旬，我们从南阳移到长汀。两天后，中央代表涂振农来了。他传达了中央（立三路线）关于整编红军的指示和对形势的分析，以及要“扩大红军一百万”、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当时中央看到蒋冯阎军阀混战爆发，对革命形势看得过于乐观，说什么“统治阶级十分动摇”，“国民党很脆弱”，“不攻自破”，“一攻就破”等等。因此命令各地红军进攻中心城市，配合全国武装总暴动，夺取全国政权。

根据中央指示，前委决定将赣南、闽西地区的红军编为第1路军（不久改为1军团），红4军一分为二，以原4军的1、2纵队和由福建地方武装编成的3纵队，组建一个军，仍称4军；以原4军3纵队和福建地方红军12军合编为一个军，称12军；黄公略的红6军改为红3军。胡少海领导的福建地方武装编为21军，另外，决定由陈毅将赣南第26、27、28等纵队和赣南独立师编为红22军，这个军是1930年在信丰成立的，第二次打长沙后编入1军团。

公布干部名单时，我为4军3纵队司令。当时心情很复杂：一来红军编成大兵团，要打大城市，适合了我们盼望革命快成功的愿望，感到非常兴奋；二来我知道3纵队是由闽西农民军组成的，武器少且落后，人员也缺乏军事素养，我当过农军连长，知道带农民军的艰辛，现在又要去当农军司令，心里多少有些不大痛快。

新任4军军长林彪和军委书记谭震林找我谈话，说：“3纵队是新队伍，你要快去，我们不久就要出发打南昌啊！”

我一想，这是前委决定的，就答应了。因很快要出发打仗，我对自己的队伍心里没有底。以前带过农民军，但只有一个连，不到100人，管理训练都可以亲手办；现在1000多人，不能自己喊口令、讲课、下操，必须通过干部。常言说：“打枪靠兵，指挥靠官”，只有解决了干部问题，才能保证部队能打仗。我就找林彪和谭震林，要求把我兼任队长的第1纵队教导队全部调给3纵队。这个教导队有50多名快毕业的学员，已经过了3个多月的随营训练，军政素质都比较好，林彪和谭震林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真高兴，就去3纵队任职。

3纵队政委张赤男，福建长汀人，是一位好的同志。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参加了广州起义，以后回家乡，以中学教师作掩护，开展党的秘密

工作，很多青年学生在他的影响下投入了革命，后来他又组织游击队，并逐渐扩大，到汀州改编时，已发展到了两个支队。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还配了政治干部。当闽西特委决定他们加入主力红军时，他很快带着成建制的农民军到汀州参加整编。我为有这么一位忠于党而又有能力的政治委员感到欣慰。

在汀州，我抓紧整编和训练部队，张赤男主要抓部队的巩固工作，还派人继续动员农民参加主力红军。

两星期后，全军在汀州开誓师大会，随即向江西出动，去打南昌。部队经瑞金、兴国、富田、水南、吉水、永丰、清江，一直到樟树镇附近。湘军鲁涤平部一个团驻守樟树，红四军把他打垮了。占领樟树镇后。了解到南昌驻有国民党正规军 6 个团。1 军团总指挥部决定不打南昌，全军西渡赣江，到上高、高安一带做群众工作。

记得那时上级发了一个命令，上面说“窥袭南昌”，这个话很灵活，可以理解为有利时就乘机进攻南昌，也可以理解为远远攻击一下，起威慑作用。实际我们采用了后一种办法。8 月 1 日那天，我们以一部兵力攻击在赣江西岸的南昌牛行车站，并隔江向南昌城打枪，向敌人示威，也是纪念“八一”南昌起义。

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这一着是对的，不盲目执行中央的命令。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中心城市，我军虽号称军团，但大多是由地方武装和游击队集中编成的，武器又差，打南昌不切实际。总前委就把部队转向赣西做群众工作。我们在赣西工作 20 天，扩大了部队，也筹到了军费。

前几年有人问我：当时红 1 方面军执行立三路线了吗？我说，执行了，不然怎么会从汀州向南昌进军？但又有保留，我看主要有两点保留：一是从汀州出发时，留下了很多地方武装，在原地坚持斗争，而立三路线是要将武装全部集中，连一支枪都要集中到红军中的；二是立三路线决定打南昌，一方面军采取“窥袭”战略，当发现南昌驻有重兵，打不了时，立即向西做群众工作。

我们在赣西做了一段发动群众、扩大部队的工作以后，继续西进，进到万载与湖南浏阳之间的桐木。在此前半月，敌为阻止红军向长沙推进，派戴斗垣旅 3 个团扼守文家市。我们摸了一下敌情，认为有打胜的把握，就决定进攻。这是 3 纵成立以来参加的第一个大仗。为了打好这一仗，我同张赤男一起，召开了大队以上干部会，传达攻打文家市的战斗部署，规定战场纪律，并且要求党员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党代表要同大队长一起在前面指挥。

第二天，我军进攻敌阵，红 3 军从正面进攻，最先和敌人接触，吸引敌主力。红 4 军打敌侧面，红 12 军迂回到敌后，断敌退路。军部给我纵队的任务，是在 1 纵队的左面展开，我纵队的两个支队平行攻击，上下一心，进攻有序，很快就占领了敌左侧后阵地。经过三个小时的冲杀，正面敌溃退，12 军在后面拦击，敌全旅被我消灭。我纵队缴获步枪 300 多支，重机枪 4 挺，子弹三四万发，还抓获了大批俘虏。这是我们这支农民军自闽西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大仗，也是第一次大胜利。这个胜利使全纵队上上下下的信心大为提高。

记得刚从闽西出发时，我们这支农民军不要说打大仗，就是长途行军都很难掌握。进入江西后，部队过乌江，那一带是赤白交界地区，离吉安、吉水敌据点不远，敌机经常出来侦察轰炸。许多战士没见过飞机，敌机来了也

不知道隐蔽，还在那里指指点点地看热闹。为了安全，部队改为夜间行军。一天晚上，地主武装来袭击，我们纵队在最后，敌人离我们老远，枪声稀稀拉拉，可以判断人数不多。而新兵没经验，听到枪响就紧张起来。天快亮，将近乌江边，后续支队的副官跑来报告，说他们的支队听到枪响就向后面跑了。我急忙问：“跑了多少？”副官回答：“跑了一大半。”我又问：“连长，排长跑了没有？”副官说：“他们没有走。”我生气了：“那为什么不掌握部队？”副官竟回答：“白天好掌握，夜晚看不到，一惊就跑散了。”

我和张赤男愣了一下，一想，也不奇怪，农民军，新兵多，难免发“谣风”。我就命令副官：“立即回去，让各连连长、排长、党代表到山上去把走散的人员喊回来，我们在这里等。”

我让纵队直属队就地休息，又令跟直属队走的一个支队继续前进，到乌江边，控制渡口，等我们和部队到了再前进。

天亮后两小时，后面报告，跑散的人都我回来了。于是，一起到乌江边，在林中休息，同时报告军部。

这次发“谣风”让我们紧张了一下。说实话，那时我最怕发“谣风”，29团在湘南因发“谣风”溃散的悲剧，我记忆犹新。发“谣风”是因为战争环境下心理紧张造成的，新兵和一些没有经验的军官，对于突然出现的情况，缺乏判断能力，盲目性很大，听到一点动静，就乱作一团，个别人甚至因梦幻而惊醒，也会引得许多人丢盔弃甲地乱跑。

发“谣风”是使部队跑散的主要原因，我认为要掌握部队就必须制止发“谣风”。除了加强日常训练和纪律教育外，还采取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晚上在室内宿营，连长、排长都睡在门口，一发“谣风”就把门关上，谁也不准跑出去。如果在路上发“谣风”，就命令大家坐在地上，都不准动。一静下来，就能冷静地观察和鉴别情况。这样做果然有效，在樟树镇住的两个晚上，有几个部队发“谣风”，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制止住的。

为了尽快使部队能够打大仗和硬仗，我还想在军队中采用“连坐法”。“连坐法”是戚继光创造的，北伐军用这个办法在北伐进军中，确实起了作用。红4军从汀州出发后，我曾在纵队委员会上提出实行连坐法。张赤男是黄埔生，他知道北伐军有这个制度，我的建议得到他的同意。我同林彪也讲了，林彪也表示同意，这样就定下来。后来红4军军委检查我的工作，认为这个办法不妥当。我为此而受了党纪处分。“连坐法”是旧式的治军方法，1929年曾有人提出在红4军中实行，朱德不同意，说这种方法不适用于游击战争，毛泽东也不同意。现在看来，红军是无产阶级的新型军队，主要靠提高政治觉悟，加强纪律教育来激发战斗热情，不应用这种方法。

文家市一仗缴获很多枪，步枪大家会用，但重机关枪就不会用了。我发现，俘虏的国民党军官中有一些人懂机关枪，我就亲自给他们做教育工作，讲共产党的主张，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军阀混战不顾工人农民士兵死活，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当时，蒋冯阎中原大战正酣，俘虏兵们目睹军阀混战给国家带来的灾难，饱尝战乱给个人身心造成的痛苦，对我的讲话很容易接受。我讲，他们也插话，列举军阀混战的事例，说到痛楚之处，有的禁不住唏嘘出声。

这样宣传，使他们思想发生了转变。我任命一位解放过来的中尉排长当机关枪连连长，他很感动，尽管知道我们不发饱，生活很困苦，也愿当红军，接受任命。

那时，每打一仗，都抓不少俘虏，俘虏兵成了红军补充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俘虏兵的教育改造，成了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感到，对俘虏兵的教育改造，攻心为上，晓以大义，让他们明白为谁打仗，同时也要给予更多的信任和关心，让他们感受到红军队伍的温暖，体会到人民军队中亲密无间的官兵关系。通过两种军队的对比，他们多数人的觉悟有很大提高，昨天为白军利益打仗，今天掉转枪口就会成为英勇杀敌的红军战士。

在文家市就听说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打开了长沙，但占领10天又退出了。毛泽东和朱德派杨岳彬去同3军团联络，准备两个军团一起行动。当时3军团在永和市，离我们只有60里，杨岳彬很快就联系上了。两天后，我们从文家市向浏阳前进，在永和市与3军团会师。两军团合编为红1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滕代远为副总政委，还成立了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

会师的第二天，我们就按照总前委的命令向长沙进军，一下进到离长沙20里的地方。这时长沙守敌收缩了阵地，我们就把长沙包围起来。长沙有城墙，敌人在城外设防，还有电网，我们没有攻城的重武器，便硬着头皮打，各种手段都使出来，甚至连战国时期田单的“火牛阵”都用上了。说起来也好笑，原以为牛尾巴上挂了响炮，就会驱使牛向前走，冲敌人的电网和防御工事，谁知我们花了一千多块大洋，买了二三十头牛，晚上攻打敌人时，点燃牛尾巴上的响炮后，但受惊的牛根本不受我们操纵，向两边跑，甚至掉回头冲我们自己的阵地，造成混乱。

围攻了10天没有打下，总前委决定收兵，撤离长沙，退向醴陵、萍乡、安源方向。这个撤兵是对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实际上打长沙在战略上不对。同南昌一样，长沙也是敌重兵防守的中心城市，我们远远没有达到攻占这些大城市的力量，希望“一战而得天下”，是不现实的，当时，立三路线看不到这一点。部队退到醴陵、萍乡一带时，湖南省委还要我们回头去打长沙，说打不开也要打。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抵制了这种错误思想，决定从长沙撤兵。

长沙虽然没有攻下，但10天的围攻战却锻炼了我们的农民军。文家市战斗后，军领导对我们3纵队信任了，打长沙时，便让我们和另两个老纵队共同担负作战任务。那天，敌陈光中部3个团由湘江西岸东渡，企图迂回于我攻长沙城主力军侧后，总部令红4军抗击该敌。我们在猴子石与敌人激战，反复冲杀，直至日沉。在战斗中，我纵队刚成立不到20天的机关枪连发挥了大作用。这个连的军官干部和机枪手，多属解放过来的敌方兵员，他们射击技术高，打得准，又听指挥，一声令下，4挺重机枪齐发。打惯了游击战的农民军，听到自己的机关枪响了，精神振奋，冲向敌群。那天我纵队打得很出色，连1纵队都对我们刮目相看了。战役后期，又参加了夜间进攻长沙敌之外围防御阵地的战斗。

长沙大战，使我们这支农民军见了世面，经受了锻炼，已能和正规部队一样打大仗了，我的精神得到大的解放。同我一起从1纵队调来的教导队学员（大部分任连排长），心情也和我一样，他们有时还十分感慨地议论：“司令官以前很少有笑容，最近笑得多了。”

部队成长进步，是全纵队上上下下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我的好合作者张赤男，对我的支持最有力，帮助最大，每念及此，我都对他怀有深深的

敬重和感激之情。1932年春天，张赤男在战斗中牺牲了，这时我已调独立第5师，消息传来，我为党失去一个优秀干部，为自己失去一个最好的战友而痛惜不已。1981年春天，我到汀州，闽西人民立墓碑纪念赤男，我为他题写了碑文，以寄托哀思，祭奠英魂。

9月中旬，我们从长沙撤围，进入湘东、赣西，分兵发动群众。10月4日打吉安。吉安是赣江中游的一个中等城市，四周都是我们的根据地。一年多来，赣西人民曾经8次打吉安，虽然没有打下，但削弱了守敌兵力。那天，军部派我们3纵队当前卫，这也是对我们的信任。作战序列是按战斗能力排的，以前我们总是走在后面，现在上级认为我们成熟了，所以要我们当前卫。

吉安东北面的骡子山是敌人的重要防御阵地，军部命令我纵队主攻骡子山，我们很快攻下了，就沿赣江逼近吉安城东北门。敌人凭城抵抗，我命令部队占领城外房屋、土坎，构成阵地。敌人不断从城内发射迫击炮，我军按战术要求分散隐蔽并积极准备攻城。

天黑了，我们一面监视敌人，一面继续做攻城准备。半夜，突然发现赣江上有大批船只向下游移动。我判断是城内的敌人从水路退了，立即组织部队追击。那时，雨季刚过，水面很宽，敌人靠东岸走，我们在西岸追。追了一二十里，在一条小叉沟找到几条小船，一条船约能坐一个班，队伍中有会划船的，立即带领上船从河中继续追。敌船走得快，我们赶不到前面。我命重机枪向敌船上扫射，但夜幕笼罩，效果不大，敌船反而走得更快了。直到天亮，敌人大部分上东岸走了。即便如此，我们还俘虏了百把人，缴获110支枪，还有两万多发子弹。

这个胜利，我们把梭镖统统换下，人人背起步枪，好不威风。就在这天上午，红军占领了吉安。第三天，我率3纵队赶回吉安城。在这里，我看到了土地革命战争以来最热烈、最壮观的群众场面。赣西各县的赤卫军、青少队，从十几里、几十里的地方赶来吉安观光，走了一批，又来一批，他们身背红缨枪，颈系红带，有的还打着大红旗，大家都显得无比兴奋，像过盛大的节日一样。

地方党动员了许多农民参军，部队扩大了，我们3纵队增加七、八百人。总司令部决定各纵队、支队、大队改编为师、团、连。我纵队改为红4军12师，干部不变。改名那天，召开了排以上军官会，当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愉快之感。看到同自己一起从汀州出发的农民战友，虽然在非公务场合还是讲闽西土话，但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再没有“土共”的感觉，而是名副其实的“大红军”了。

在吉安住了10天，我们出发向北行动，经峡江、新喻、罗坊，过赣江，向崇仁进军。这时已得到蒋介石要对红军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的消息，总前委制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11月底，我们在宁都的黄陂、小布一带集结，进行反“围剿”的各项准备。

首先是政治思想方面。全军上下对国民党军阀早已十分痛恨。敌人向苏区进攻，越来越残暴，兵力也越来越多。大家知道，一定要消灭敌人才能保护苏区和广大工农利益。当时方面军总政治部提出早晚点名的口号是：勇敢冲锋！拼命杀敌！多缴枪炮！活捉蒋介石……这些口号，全军都喊，确是提高士气。

我们虽然没有反“围剿”经验，但敌人也没有经验。湖南军阀鲁涤平派18师张辉瓒部来东渡赣江，进至根据地基本区东固镇。又派两旅四团由张率

领进至龙冈。红军看出这个敌人孤军深入的弱点，以优势兵力将敌包围，我第3军打正面，4军打侧面，12军在左后迂回。我师正打到敌人侧面的薄弱部分，敌军全面溃败。我师缴获多，梭镖、土造快枪全部换成汉阳造的步枪。全师兴高采烈，我同样振奋，认为农民师已发展成为正规红军了，我这个农民梭镖师长也光彩了。

龙岗告捷，大军东进，追击50师谭道源师，我师始终作为主力参战，从早晨打到下午，给谭师以毁灭性的打击，敌残兵败退，我军进到广昌县，第一次反“围剿”不过一周完全结束。

第一次反“围剿”结束，红军去苏区东南部做了一时期发动群众扩大苏区的工作，就准备第二次反“围剿”了。工作程序和准备一次反“围剿”差不多，但内容更丰富，也更老练了。

第二次反“围剿”于1931年4月下旬开始，敌人来得更多，我师同全军一起，参加反“围剿”战斗直到5月底就胜利结束了。主力东进到福建建宁、泰宁一带，这时，总前委决定红一方面军增建第4、第5两个独立师，这是地区性的红军，介于县游击队与主力红军之间的武装。

6月中旬的一天，林彪把我找去，说：“你的工作有变动，让你到独立5师当师长。”

我虽然没有思想准备，但也没有大多顾虑。因我知道这又是一支农民部队，我已经有些带农民军的经验了。

当天，我就赶往驻在福建建宁康都墟的总司令部，见到毛泽东、朱德。他们同我谈了谈，让我去龙岗，向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报到并受领任务。

苏区中央局派来参加总前委会议的王稼祥也回中央局，正好同行。我们从建宁出发，步行9天，到了龙岗。

项英向我详细交代了任务：独立5师在永丰、吉安、吉水、万安、泰和、乐安几个县活动，主要是巩固和发展这片红色区域，并努力配合主力红军在当地作战。独立5师由上述几个县的游击队合编组成，共约2000人，我任师长兼师党委书记，党内归永（丰）吉（安）泰（和）特委领导（我参加特委）。

在龙岗住了一夜，第二天去永吉泰特委驻地富田，见到特委书记毛泽覃和组织部长陈正人，我把上级的介绍信给了他们。毛泽覃高兴地说：“太好了，正需要你来。”陈正人也说：“老伙计，咱们又一起干了。”

陈正人是井冈山时期的遂川县委书记，我早就认识。毛泽覃也是参加井冈山斗争的，也熟悉。我说：“得快些找个政委，再派个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毛泽覃风趣地说：“蒋介石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你也一个人兼了吧。”

我笑了，说：“那不成了‘独裁’吗？”

陈正人说：“你就辛苦些，党政军工作一起抓。”

我们都是满腔热情的年轻人，干工作还讲什么条件？我不再说了。

毛泽覃又向我介绍了一下游击队的情况，要我尽快建立师的指挥机关。

告别毛泽覃和陈正人，我赶往离富田40里的水南镇，找到吉安县委，就以吉安独立营为基础组建师部。在县委帮助下，从各方面找了20多个干部和勤务人员，包括参谋、副官、供给员、会计，还有医生、护士、传令兵、炊事员等等，打出了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的牌子。又将吉安独立营及永丰、万（安）泰（和）独立团分别改称第13、14、15团，每团辖3

至5个连，独立5师算是建立起来了。这期间，我既管军事、政治、后勤、党务，还要管部队，累得够呛。但觉得干革命，累也痛快！

独立5师组建不久，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就开始了。7月上旬，驻吉安国民党的第19路军东渡赣江，直抵富田。我们没有料到敌人进军如此之快，这时，主力红军还在武夷山南部，鞭长莫及。我和毛泽覃商定，独立5师虽然刚从游击队集中起来，但也要敢于打大仗，尽量控制住我们的阵地，不让敌人过早深入苏区中心，以待主力回师。

我们沿九层岭、观音岩山地，构成一条向西防御的阵地，固守了26天，多次打退敌人整团整营的进攻。

这时东、北、西各路敌人陆续深入苏区，我们不需要也不能再守阵地了，就分散游击。敌李抱冰师占领了东固。李抱冰是湖南宁远人，我在学生时代就听过不少关于他能打仗的故事，心想，同这样的敌人打仗，得以智谋取胜。敌人远道而来，背不了多少粮食，要守东固，就得另找粮食。于是，我把东固附近地区的干部召集起来，统一部署，坚决贯彻前委的“坚壁清野”政策。牛牵到山里，粮食能搬走的搬走，搬不走的就埋在地下。

那时正是8月，稻子快熟了。我担心敌人割稻谷，就下令把脱谷壳用的碓子（一种木质结构的磨）藏起来。我们在江西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稻谷要用碓子磨，再用风车把谷壳扬掉，才能把大米分离出来，没有碓子就是有稻谷也吃不上米。

碓子很大，要4个人才能抬动，我们发动老百姓搬，有些来不及搬走的就把推臂破坏。敌人驻守的东固镇，我们也派人进去，把能用的碓子都破坏了。

敌人割了稻谷，没有办法脱谷壳，只好煮谷子吃，边吃边吐谷壳，难以下咽。时间一长，人饿得发慌，但蒋介石有命令，又不能不守在那里，真是进退两难。有一天，我们截到一封信，上面写着这样的话：“牛耕田，马吃谷。马可以吃谷。人还能吃谷吗？但我们现在不能不当马了”。

我们在这一带游击了两个月，真是军民一家，官兵同心。蒋介石有30万人，在苏区厉行坚壁清野的政策下，“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我主力红军消灭敌人两万，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剿匪已告一段落”，纷纷撤退。

反“围剿”胜利后，我适当集中部队整顿了一下，各团都武装起来了，莫说梭镖，就是土造五响枪也不要了。15团（原万泰独立团）最阔气，他们在拦截蒋鼎文部独立旅时，缴获了3挺重机枪和200余支步枪，4个连都武装得和主力红军一样。我像在红4军3纵队一样，对“带枪的农民”进行整训，想使部队迅速来个“铁军化”。

这次整训重点抓政治教育，办了一个党支部委员训练班，我亲自当教员，讲红4军“九大”决议以及苏区中央局和总政治部编印的时事教材等。十月革命到了，我们开纪念大会，我亲自讲话。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回来后，我又请他们传达大会精神。总之，那时有个责任感，觉得自己是师长又是师党委书记，没有参谋长，司令部的工作不能放松；没有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更不能马虎。

经过一段教育，干部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我也逐渐了解了他们。缺的干部慢慢配齐，部队也严整了，能做到“令行禁止”，可以集中，可以分散。

1932年1月底，红1方面军围攻赣州，我师奉令西渡赣江，在万安、泰和、遂川地区游击，配合主力攻赣州。两个月后，赣州撤围，我们又回河东，

在永丰、乐安活动。

当时，乐安县城被敌人占领，但乡下大部分是我们的，只有一个叫万崇圩的大镇，我们没有控制住。本来，这一带是老根据地。1929年冬季，我曾到这里做群众工作，结识了一位叫邱汉杰的地下革命者。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在当地坚持斗争，我们走后，他干得很出色，把这一带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建立了游击队，他当队长，还打出苏维埃的旗帜。1931年5月以前，这块苏区已发展到两万多人，但邱汉杰与县委的一些同志搞不拢，肃反时，有人就怀疑他是“AB团”。邱汉杰知道后闹独立，当“山大王”。但他不投敌，不改变苏区时期的主要政策。乐安县委要求5师帮助恢复这一地区，我就带了一支小部队来到这里。当地老百姓中的壮年男人都走了，只剩下些老人、妇女和小孩。有的老人认识我，我就问：“邱汉杰哪里去了？”

妇女们说：“我们是妇道人家，哪里知这些事啊？”

老人们说：“我耳朵聋，听不清啊！”

我知道邱汉杰在当地搞了几年，在群众中有威信，我就想争取他。

我写了一封信，交给一位老人，说：“请你送给邱汉杰。”

信送到了，邱还回了信，但他不敢与我见面。我与他通了两三次信，再三劝说，他就是不肯出来。

县委有的同志说：“不要对这种人存有幻想啦！”后来我离开那里，县委调动周围的游击队打他，他就投敌了。

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教训。由于我们不能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采取扩大化和简单化的方法处理，结果把一些人从革命的队伍逼走，甚至逼到敌人一边去。1928年的郴州事件，闽西的傅柏翠事件，就是这样做的结果。虽然这些人本身有大缺点，缺乏坚定的革命性，但从党的领导思想来说，这种做法，只能削弱自己而增强敌人的力量，对革命没有一点好处。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1932年6月，驻乐安的敌人一个团出动，我率独5师去迎战。战斗中，一颗子弹从我左胯穿到右腿根，这是我从军以来的第四次受伤，而且比前三次都重。天黑部队撤离战场，我被抬往设在兴国茶地的红军医院。

在医院一住就是3个月。这期间，在中央军委工作的张云逸到医院巡视。我们以前不认识，但一谈起来，都参加了北伐战争，又都是当时“铁军”即第4军的，就很投机。张在粤军中有声望、地位，与张发奎也很接近，他给我讲了不少关于粤军的历史和4军上层的事，又讲了卢德铭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长的经过等，他说：“警卫团建立时，叶挺想让共产党员卢德铭去当团长。但他想到自己色彩重（指共产党员色彩），就让我去说，因我年纪大，资格老，张发奎对我更信任。同张发奎一说，他果然同意，这样才有一个共产党员当团长。”我听了他的话，很佩服他善于在国共合作中工作。住院期间，得知独立5师编入红22军，成为主力红军的一个师，还听说，中央局准备调我去当红22军军长。9月，我的伤基本好了，就从医院搬到驻兴国县城的江西军区司令部，那时，陈毅任江西军区司令员，李富春任政委，郭天民任参谋长，蔡会文任政治部主任。

记得刚从医院出来不久，一天蔡会文同我谈，说中央决定调他任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也调我去湘赣军区任红8军军长，政委由他兼任。

这个消息对我有点突然。我原准备去22军，陈毅司令员已同我谈了话，据说命令都下了，因我在医院治伤，未到职，现在又决定调我到湘赣任红8

军军长，虽说都是当军长，但这中间却有很大不同。红 22 军属红一方面军序列，在中央苏区活动，上有方面军和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红 8 军则不一样，它是一个独立战略区域的红军主力，担任这个军的军长，就意味着要担负起一个战略区域的主要军事领导责任，要独立自主地支撑起一个局面。

我感到担子很重。蔡会文对我说：“我们都是从井冈山下来的，也算是湘赣的‘老人’了，对这个地区情况熟悉，你又有带农民军的经验，军事上有一套，我们好好配合，一定可以干好。”

这番话使我很受鼓舞。蔡会文是参加秋收起义的老同志，井冈山时期同在红四军。1930 年 6 月汀州改编时，我任红 4 军 3 纵队司令员，他任红 12 军 3 纵队司令员，后来我到独立第 5 师当师长，他到黄公略的红 3 军，第三次反“围剿”后，调到江西军区任政治部主任。他政治坚定，有政治工作经验，也曾带过农民军，正像他说的，我俩对湘赣地区民情、地理都比较熟悉，我们密切合作，上有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靠苏区广大群众和红军指战员的支持，还怕搞不好？

大约在 10 月中旬，我同蔡会文一起去河西了。记得那天陈毅司令员为我们送行，送了很远。信任之情，期望之殷，尽在这相送之中。

第九章重返罗霄山

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以赣江为界，河东是中央苏区，河西就是湘赣苏区。我和蔡会文从兴国出发，西渡赣江后，于1932年10月25日，到达了湘赣省委、省军区所在地永新县城。

湘赣苏区这时包括永新、莲花、宁冈三县全部，茶陵、攸县、遂川、吉安、萍乡、上犹、崇义县各一部，总面积近一万平方公里。这块大苏区是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井冈山在红4军主力下山后由红5军守。不久，敌人大举进攻，彭德怀滕代远率部与绝对优势之敌激战了四昼夜，冲出重围，开往赣南与红4军会合，井冈山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了。

然而，湘赣边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在红4军和红5军主力相继离开井冈山后，湘赣边界党的组织和各县地方武装，为恢复根据地展开了英勇斗争。埋伏在井冈山的32团2营以及遂川、宁冈、莲花、碛县、茶陵等县委及赤卫队，以宁冈中心县委为主（书记何长工）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地主武装清乡队、挨户团，并趁蒋桂战争爆发之机，收复了井冈山和九陇山军事根据地。这些武装合并组成边界红军独立第1团，在何长工、王佐率领下，先后夺回了宁冈、莲花两县城。当年5月初，红5军主力返回湘赣边，边界的革命斗争更发展了。

第一次反“围剿”期间，地处赣江西岸的湘东和赣西南西路两个根据地的军民，在军事上密切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粉碎敌人“围剿”。

这年的3、4月，李明瑞、张云逸率红7军经长途转战，由广西进至湘东根据地。这时，敌人又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红7军与湘赣红军，配合红一方面军反“围剿”作战，同时也扩大了赣江以西的根据地，为湘赣苏区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7月，苏区中央局决定将湘东南、湘南两特委以及赣西南的西路、北路、南路三个行政管辖的区域合并成立湘赣省。10月，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标志着湘赣联合省苏维埃政权的诞生。

我们来时，湘赣苏区已建立一周年。看到当年井冈山根据地，已发展成今天这样一块广大的、巩固的红色区域，我们深深地为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言所折服，为湘赣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所感奋。

到达永新后，最先见到张启龙。当时，他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省军区总指挥，启龙同志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湘赣苏区政治、军事情况。接着，省委书记王首道、省军区政委甘泗淇、军区参谋长冯达飞等也见到了。我们对湘赣苏区的建设和发展，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从战略位置看，湘赣苏区是中央苏区的战略侧翼——河西战线。东与中央苏区隔赣江相邻，北与湘鄂赣苏区隔袁水、修水相望，我们向北发展就通向湘鄂赣苏区，造成威胁武汉、南昌、长沙的大局面。湘赣苏区在中央战略全局中所处地位十分重要，我们感到肩负的责任是光荣而又艰巨的。

在永新住了两天，我们就赶往红8军驻地。红8军的前身，是湘赣独立第1师和第3师。

第8军是1932年2月中央军委命令成立的，但当时没有成立军部，也没有正式任命领导干部。我去之前，由独1师师长李天柱代军长。李天柱是井冈山的老连长，1931年3月底，由江西苏区调到湘赣，接替刘沛云任湘东南

独立师师长。

说起刘沛云，我有印象，刘在井冈山时，曾任 32 团参谋长。有一次说：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就是因为陈独秀没有搞好。如果让我当总书记，不会搞成这个样子。当时我很佩服他的胆量和气魄，对他产生敬重之意。下井冈山后一直未见到他。我到红 8 军时，刘沛云早已调回中央苏区。一天，我与军部管理科长闲谈，他说他是刘沛云的弟弟，这使我很惊喜，忙向他打听刘沛云的现状。他弟弟却哽咽着告诉我：他调回中央苏区后，在红军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在肃反中，被打成 AB 团，我心一沉，这样一位洋溢着革命豪情的同志，怎么会是 AB 团呢？

接替刘沛云任师长的李天柱，也没有摆脱肃反扩大化的阴影。中央苏区最初打 AB 团，他被人咬了。我来接替他当红 8 军军长时，领导上不信任他，准备调他回中央苏区。我和蔡会文做了一些调查，没有掌握什么材料能证明他是“黑色分子”，就建议他到湘赣省军区当副总指挥，但后来还是被调回中央苏区了。

我和蔡会文到达红 8 军驻地，正式建立了红 8 军指挥机关。我任军长，蔡会文兼政委；参谋长先是李朴，后是李达；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军的领导机关建立后，对部队番号作了些改变，原独立 1 师改为 22 师，师长谭家述，政委王震；原独 3 师改为 24 师，师长戈勇，政委胡楚父。另由茶陵、莲花、攸县、萍乡等县地方武装组成的新独立师改编为 23 师，师长杨茂，政委谢国瑜。

红 8 军的部队是从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扩大起来的，在政治上继承了井冈山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比如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都认真实行。在政治组织制度上也是以井冈山红军为样板，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师、团成立党的委员会和政治机关，连设党支部。

红 8 军号称三个师，总人数约 2700 人，下属部队的编制并不整齐，有的师三个小团，有的师二个小团，有的不设团部，由师指挥各连。各团不设营，直接指挥各连。没有经过严格的正规训练，战术、技术不够。虽说已是一个战略区域的主力红军，但还和游击队差不多，打起仗来也不讲究什么战斗队形，部队中的游击习气很严重，我来了几个月，几乎每个月都因枪走火自己打死打伤十几个人。

我感到，这种状况正是游击战争中游击队成为正规军的特点。但是，游击队既已编成正规军，就要脱离游击习气，这种状况是不能让它长期存在，必须加强正规训练，大力提高军事技术。不仅枪要打得准，更要懂得战术、技术，班、排、连会疏散开；还要熟悉前进、停止、射击、冲锋、集合、撤退等等。

当时处于紧张战争环境，不可能集中太多的时间训练，我就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抓紧对部队进行“铁军化”训练。

为了解决枪走火伤人的问题，我想了个办法。一次，全军集合，所有的人都不准缺席。我当众规定：不准平举枪扣火，验枪只准朝天上或地下验；如果哪个平举扣了火，不管枪里有无子弹，都要关禁闭。作了这个规定后，打死打伤人的现象大为减少，部队严整多了。

参谋长李达是参加宁都起义的，他配合我抓正规训练。比如做工事，游击队是不大注意的，部队连工具都没有。李达规定每个班要装备几把小圆锹，

亲自示范，部队很快掌握了做工事的技术和阵地防御的基本战术。

经过一段时间的管理和训练，部队的军事技术素养提高了，战斗力也相应的加强了。

我们到达湘赣苏区，正是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初期，蒋介石除集中主力对中央苏区外，进攻湘赣苏区的敌人，也达10个师8万余人。当时我们的战略任务很明确，就是配合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怎样配合呢？我认为首先要巩固湘赣苏区，把敌人更多的兵力牵制在我们这里。

我和蔡会文都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而湘赣苏区与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井冈山全是山区，平地很少；湘赣苏区则多为平原和丘陵，地域比那时大多了，人口也多，仅永新一县就有20多万人口。湘赣苏区处于赣江西岸，与中央苏区虽隔江相望，但赣江为敌人严密控制，就自然而然形成独立作战区。这个地区的军事活动，除注意与主要战略区及其他地区相联系相配合外，就要以本地区的情况作基础来考虑和行动。中国在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区发展的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大致都是如此。我到湘赣苏区，就感到原来的思想跟不上。跟不上就要改变。这是任务和环境逼迫我们改变的。

虽然在中央苏区参加过一、二、三次反“围剿”，也打过不少大仗、恶仗，但那时上面有中央军委和总司令部指挥，作为中层指挥员，我只从战术、技术上考虑，战略上是不大注意的。到湘赣苏区的初期，我对战术技术注意得多，仍不大习惯从战略上考虑问题。面对敌人大兵压境，我一时还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对付。那时中央除了总的反四次“围剿”的方针外，对湘赣红军并没有单独的指导。我感到压力很大。

11月下旬，国民党军李明第52师之155旅向我进攻，不断从北翼蚕食湘赣苏区。11月29日，我率领红8军迎击从古安官田出来向我进攻之敌，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进展顺利。担任正面攻击的23师和左翼的22师都打得很出色，将敌人全部击溃，给进攻苏区的敌人当头一棒，但还不是战略上的胜利。

我对自己的战术指挥是有把握、有信心的，对于敌众我寡的形势，也并不怕。因早年读“淝水之战”的文章和曾国藩的家书，讲了以少胜多的事例；大革命时期我亲历的北伐战争，也是如此。我想，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更有条件打这种仗。但我当时还不善于从全局上观察和处理战争大势，也就难于驾驭整个地区的战争形势。

1933年2月下旬，敌人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和对湘赣苏区的进攻。中央军委命令红8军北上袁水，配合中央红军作战。3月，我与蔡会文率红8军开到新余以西地区。本拟渡过袁水与湘鄂赣红16军会合，但敌人在袁水流域驻有强大兵力，有坚固工事，我军两次强渡袁水都没有成功。遂转战于赣江流域中部地区，直接配合中央苏区军民的反“围剿”。

由于这时期的行动完全是独立的，大小事情都要靠自己决策，这就迫使我开始注意战略问题，思考战略问题，学习战略问题。我认识到，一个指挥官，特别是独立行动的部队的指挥官，必须学会从战略大局思考问题，否则就无法指挥部队，不能完成所担负的战略任务。

一方面是形势任务所迫，一方面也是思想上有了自觉的要求，我注意研究战争的态势，研究敌我双方的特点，尤其是敌人的情况，诸如兵力布署、战斗作风、行动规律等等，从中发现敌之弱点。

我们在袁水流域活动的时候，湘敌王东原第 15 师乘虚占据宁冈城。3 月 5 日，该敌 3 个团又越过七溪岭、龙源口，向我苏区中心——永新进犯。红军学校学员在龙湾桥将敌人堵住，我即率红 8 军主力返回苏区中心。这时，盘据遂川的敌第 28 师，又企图进攻桥头、衙前。我将几路敌人的情况分析了一下，认为遂川这路敌人战斗力较弱，先打该敌，回头来再打敌 15 师。

这路敌人的番号是蒋军 28 师，原来是冯玉祥的军队，1930 年中原大战后，被蒋介石从北方调到江西。二次反“围剿”时，该敌进至富田以东的九层岭地区，被我红四军及 12 军消灭后重新建立的，利于我再消灭它。决心定了，我们于 4 月 6 日到达路田，根据敌人分布情况，采取佯攻打援之策。7 日，我们一部向据守于田墟的敌 28 师 83 旅旅部及 166 团发起佯攻，引诱遂川城内的敌人出援，以便在运动中将其消灭。遂川城之敌果然被诱而出，我乘机在运动中从侧面伏击，仅半小时就将来援之敌 1 个营及迫击炮连、机关枪连大部歼灭。共缴获迫击炮 4 门、重机枪 3 挺、步枪 220 支，毙敌 200 余人，俘虏 100 多人，其中有敌营长、连长。

这个胜利不算大，但对于鼓舞士气，打击敌人进攻的气焰，起了很好的作用。战后我总结了一下，从为这一仗所以取得胜利，一为进攻方向选择得好，避强打弱；二为战役目标明确，诱敌出来歼灭之；三为战术动作好，部队位于敌前进路翼侧二、三里处隐蔽，我见敌出来，就突然从侧面出击，迅速解决战斗。

这一仗后，我对平原、丘陵农村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在思想上逐步搞清楚了，这是属于内线作战，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要作战方式，以消灭敌人为主要目标。

这个思想确立后，我们在行动上就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防御。云田墟战斗后，5 月份内又连打了 3 个胜仗。

4 月间，各路敌军向我苏区腹地进犯，其中以第 15 师和第 63 师进得最快。当时，63 师孤军深入，占领了莲花。我和蔡会文都认为这是有利的作战时机。当时，敌人以主力一个师占领莲花县城，但我地方武装四周包围，交通运输被我截断了，从整个形势看，湖南敌人虽然处于优势，但莲花地区之敌的态势不能算优势。茶陵是敌进攻莲花及宁冈之敌的后方基地，他一定会来打通莲花至茶陵的交通，而这一段路，处于我苏区范围，又为山谷地带，敌人一出动，就便于我在运动中歼灭。

敌人何时出动，我们不知道。但我和蔡会文都意识到，敌人肯定要出来。5 月 8 日，我主力从永新南面经小冈区进至莲花城南三、四十里处之棠市时，我事先把战斗想定用命令写出来，发给部队。命令规定出现某种情况用第一案；情况发生某种变化就用第二案，等等。

就在这一天下午，得到茶陵独立团和县军事部报告，敌人约一个团从茶陵向东出动，向莲花攻击前进。我们立即命令茶陵独立团（约 200 多人）根据预定方案，边打边退，诱敌进入九渡冲狭窄地带，主力部队则在棠市附近待命。那天吃过晚饭，前面打响了。部队按预定命令就集合，按预定序列行动。主力 3 个师分两路向九渡冲前进，形成有力的侧面攻击，一下子就吃掉敌人两个营，缴获 4 挺重机枪和许多步枪，还有大量弹药。

晚 8 点多钟，我们回到棠市宿营。我估计敌人第二天一定会来报复，因莲花城内敌人还有 3 个团和 1 个特务营，他们不打通这条交通运输线不利于进攻湘赣苏区。还有，63 师及师长陈光中是杂牌军，如果不打通这条交通线，

他的上司（蒋介石、何健）就会把他的整编掉，叫他和亲朋故旧失去位置。基于前二者，我和蔡会文认为莲花敌人会出来。就研究了新的战斗布署。第二天一起床就作好战斗准备，部队开到九渡冲占领阵地。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早饭后，敌人就出动了。敌人两个团、一个营，加上先一天没有消灭的一个营，敌我双方兵力相等。我们头一天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又得到大量武器、弹药的补充，战斗力更强。我军即与敌人展开了激战，从早上八、九点钟一直打到中午，担任正面进攻的24师和右翼22师同时抢占了有利地形，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左翼23师从敌侧面攻击，敌人就溃败了。我军进行战场追击，缴获重机枪22挺、步枪上千支，击毙敌旅长1名，俘敌六、七百，其中敌团长、营长就有好几个，中央军委发来贺电嘉奖。

九渡冲胜利过了20天，在棠市又打了一仗。5月29日，我们开到茶陵与永新边界的路江、梅花一带待机。茶陵县委对敌情掌握得清楚，敌人一举一动，都及时通报给我们。一天，茶陵的同志来报告，说敌人向这边开来了，有5个团，还有很多行李担子。我当时就决定要打。蔡会文认为敌人兵力比我们多，打不得。我说，敌人虽然多于我军，但他是走路，又有几百担行李，上下坡、过小桥等大小障碍都不灵便，行军纵队会拉得很长；而我是在敌人侧面隐蔽，主动从敌行军纵队侧面出击，地形有利，战机有力，又只打敌人的一节，虽弱犹强。

蔡会文知道我是从“铁军”出来的，仗打得多，有战争经验所以军事上尊重我的意见。我们马上命令部队进到出击地区。赶到时，敌人主力刚过去，恰好打上敌人中间和后尾的一个团及大批辎重行李。我军猛烈从侧面攻击，迅速解决战斗。这一仗缴获步枪500余支、机枪5挺、迫击炮2门、无线电台一架，俘敌600多人，其中敌团长1人，还得到了军装和军衬衣各1万套，而我们只伤亡四十五人，是最便宜的一仗。

九渡冲和棠市战斗，在指挥上有几个特点。一是对敌人行动判断得准确。知彼知己，按预定计划行动，都能取得预想的战果。二是能临机应变。我从参加北伐战争起，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战场经验，即使遇到新情况处理也快。像头一天打九渡冲和后来打棠市，都是突然发现情况，马上作出决定，及时捕捉战机而胜利的。三是能辩证地分析敌我态势，不是简单地以敌我兵力多寡而作决策。打九渡冲和打棠市，我们的兵力都不占优势，但把战场形势综合起来分析，敌强之中有弱点，我之弱处有优势。敢下决心，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九渡冲和棠市的胜利，打破了敌人对湘赣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这时，我的心情颇为激动！刚到湘赣时，这么一大块根据地，又面临着那样严重的敌情，能不能保得住？心里没有数。过去我是在上级指挥下行动的，现在独立指挥一支执行战略任务的部队，仗该怎样打？经过半年多的摸索、实践和总结，心里有底了。特别是在战略方面，我总是希望自己能成为革命战争中有所作为的军事指挥员，而现在感到，敢于担当独立行动的部队的指挥重任了。

1933年5月，中央为了加强湘赣苏区的领导，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来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6月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在永新将红8军改编为红6军团第17师，下辖49、50、51等3个团；我为师长，蔡会文任政治委员，李达为参谋长，李朴为政治部主任（后改为王震）。这时，红6军团只有个内部名义，既没有成立领导机关，也没有向下宣布。

任弼时来后，省委连续开会。6月间，我们住在永新龙山，有时也参加会议。我印象最深的，是批斗省苏维埃主席张启龙。永新有个列宁场，就在那个广场上斗他。我们知道省委负责肃反的是刘士杰，这个人“左”得厉害，骄横跋扈。他到中央苏区接受了“左”的东西，回来后变本加厉，弼时同志从中央来，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左”的政策的影响，但他比较稳重，当刘士杰提出要枪毙张启龙时，弼时制止了。长征时，经弼时同志同意，把张启龙放了出来。走到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我和王震建议派张到六军团当供给部长，任弼时同意了。

刘士杰后来因企图叛变投敌，被枪毙了。表现得极“左”的人往往会走上另一个极端——极右，这似乎是一个规律。

那段时间，在红军中也处理了一些人。红17师政治部主任李朴因有“托派”的嫌疑，被撤了职。这个说法也是从中央苏区传过来的。我们接到省委决定时，都感到有些奇怪。李朴是红军中的老干部，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南昌起义，以后到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在湘赣苏区工作。在红8军时，先是当了一段参谋长，后又任政治部主任。我到湘赣以后，常同他一起交谈，感到他是一个革命热情高，政治上比较老练的同志，怎么会是“托派”？据说李朴在莫斯科炮校学习时，苏联开展反“托派”的运动，他曾被学校关了三天禁闭。

李朴被撤职后，曾对人说：“告诉省委，我有错误，可以撤职，但不要开除党籍。我要努力工作，为党尽力。”他的这番话，代表了受冤屈同志的心声。那时打仗牺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自己人不信任。对于把党的事业看得重于生命的人来说，不能被党组织理解、信任和承认，那是最为痛苦的事情。这种精神状态，我过去认识不深，自1958年反教条主义和后来“文革”给我戴上了几项不实际的大帽子后，认识就深刻了。

李朴是1935年7月红六军团在湘西招头寨与湘军战斗中牺牲的，就牺牲在离我不远的战地上。那天我正指挥战斗，一颗子弹呼啸而来，打中了在我附近的李朴，他立刻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身下的青草。他用自己的热血证明了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经过半年多的反“围剿”斗争，我们取得了在根据地内线作战的经验，但当时中央整个战略指导上是“左”的，不可避免地也给我们带来消极的影响。九渡冲、棠市两战之后，本来应该休整一段时间，这时，军委指示，主要意思是叫我们坚决执行“积极进攻”路线。所谓“积极进攻”，具体地说，就是连续寻找强敌作战；1933年7月，我们曾两次向宁冈出击及向萍乡出击都劳而无功。

当时敌人在坳背、下水湾一带，碉堡摆得密密麻麻。我军进到宁冈，敌人就集中兵力由古城、蓉市向我迫近。我们占领阵地，准备敌人进攻时从阵地前用反突击反冲锋战术打垮敌人。可是敌人见我们摆开阵势，他也摆开阵势，只构筑工事，与我军形成对峙局面。他们有6个团，占领宁冈中心地区，以宁冈与古城为基地组成防御体系。我们当时只有4个团，失陷后的苏区宁冈县，群众工作一时不能恢复，不利于大战，便在敌军构筑工事时，乘夜撤退，另求机动。

这次军事行动，我们只是做而不公开讲。因为当时“撤退，机动”这些词，很容易给“左”的好事者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其实，军事上尤其是在游击战争中，经常采取这种办法，十六字诀中的“敌进我退”，还

有一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话，都说的是这个道理。敌人强大且处于有利时机，我们打不赢，当然要走了。中国古代兵法也强调“不能则避之”、“避实击虚”、“避强击弱”。避实可击虚，避强可击弱，打不赢就走，还可以打得赢。当时我军的处境，就是我这个老兵，也只能做，不能明说，足见当时“左”倾思想影响之深，控制之严。

8月间，我们又在茶陵宁冈之间活动。事前得到情报，敌人为了缩小苏区，可能分兵到梅花一带窜犯，我们采取每天派一个团利用地形待机，捕捉敌人，有一天中午敌人一个营从墨庄与城皇庙之间插过来。被我们捉住消灭了。为扩大战果，派49团向雪花坳敌据点佯攻，想把坳背的敌人吸引出来再吃掉它，不料碰上了敌主力之一部，结果打了一场硬仗，毫无所得。

9月，我军又出萍乡活动，敌人情报灵通，调动快，加上飞机轰炸，我军被迫打了不利的战斗，造成二、三百人的消耗，只得撤回苏区。

两役不利，是军事领导上的大问题。11月，任弼时召开省委会议，指出湘赣红军在6月以前的反“围剿”战争中，是打得较好的，基本上坚持了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又认为蔡会文在执行军委的指示中犯有错误（当时还没有认识军委指示本身也有错误），于是蔡会文辞去了17师师政委的职务。

当时，“左”倾路线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个任务没完成好，就批成右倾机会主义。在永新召开的一次省委会议上，有人提出不打“死老虎”（指王首道），要打“活老虎”（指蔡会文）。王首道当“死老虎”，历史已经证明错了；把蔡会文当成“活老虎”打，更是错上加错。但当时我们还没有这个觉悟。1933年11月底，省委批准蔡会文辞去17师政治委员，并派陈洪时来继任。不被信任的蔡会文后来牺牲在战场，而陈洪时在我主力长征后当了叛徒。

1933年10月，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调动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当时，湘敌刘建绪积极向我湘赣苏区进攻，他把彭位仁第16师和王东原第15师之45旅摆在主攻方向；以第15师主力和陈光中第63师在南北两翼配合，企图首先攻占湘赣苏区西部要冲梅花山地区，进而进攻湘赣苏区中心——永新城。

梅花山位于湖南茶陵与江西莲花、永新之间，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东侧。控制这里可以威胁敌人主要补给交通线，又利于我出湖南活动。所以，我们决心利用这里的地形和群众条件，保卫这个地区。

敌16师每天派出一两个营到梅花山北侧向我作试探性进攻，但主力不轻易出来。我还是让茶陵独立团在梅花山阵地加强工事，在山顶北侧修筑一个碉堡，并在周围做散兵工事，吸引敌人主力出动。我军主力则摆在梅花山、江鼓寨之线待机。正在赣江活动的红18师也调来参加战斗。

11月8日，敌第16师5个团和第15师之45旅共约7个团兵力，向梅花山发起攻击。茶陵独立团凭借工事居高临下，顽强抵抗两个钟头，敌人越来越多，形势紧急。这时，红17师先头一个连跑步投入战斗，红18师一个团也赶来参战。这时敌人的炮火猛打碉堡，其实我们根本不在碉堡内，而在碉堡外的野战工事和灌木丛或山坡隐蔽。炮火一过，敌人的步兵攻上来，我坚守正面阵地的部队给强攻之敌以重大杀伤；随即一鼓作气，乘胜反击，将敌主力3个团全部击溃。

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同敌人打的第一仗，打好了。我军只伤亡 100 多人，敌人伤亡惨重。第二天打扫战场，清数敌人尸体就有 200 多具，估计敌人伤亡人数在 800 至 1000 之间。但这一仗缴获不多，因为没有把敌人的退路卡住，敌人主力退走了。但是，梅花山之战是胜利的战斗，对湘赣根据地中心区的巩固有很大意义。

1933 年 12 月，为护送湘鄂赣和湘赣两省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也为迎接由中央苏区派到湘鄂赣当省委书记的陈寿昌和军区司令徐彦刚，由我和陈洪时率 17 师全部及 18 师一个团经永新、牛田到遂川、万安、泰和地区之高桥头，向赣江边前进。

12 月 5 日，我们到遂川县之路田附近时，敌 77 师一个团从于田圩进至路田古田岭阵地（那里原有敌人做好的工事）。我看敌人刚到，还没准备好，就立即决定把这股敌人打掉。我们 3 个团一起攻击，只两个小时，就将敌人大部消灭了，俘敌团长李春光，缴获步枪 300 余支，重机枪 3 挺。这次胜利，是从 6 月份以来战斗缴获最多的一次，士气提高了，弹药补充了，也有利于开展与恢复遂万泰地区的工作，并完成了迎送代表团和干部的任务。

在湘赣苏区形势日渐好转，中央军委命令 17 师北上南浔路，配合中央红军向北发展，也是间接配合国民党第 19 路军在福州发动的抗日反蒋行动。红 17 师北上后，湘赣苏区兵力单薄，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城不久便被敌占领了。

第十章北上与回师

1933年11月，驻福建的国民党第19路军，在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诸位爱国将领的领导下，提出抗日反蒋，与我们联合行动，并订立了秘密的联合作战协定。他们公开建立了“福建人民政府”，与国民党南京政府相对抗。蒋介石为消灭19路军，从进攻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了10个师去福建，于1934年1月开始进攻延平、古田等处的19路军。

中央红军根据联合作战协定，从江西向北发展，以牵制蒋军，配合19路军的行动，同时也是为了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当时，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分东、西、南、北四路，东路军即19路军，西路军是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南路军是广东军阀，北路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1934年1月14日，我们接到中央军委以朱德、周恩来的名义发来的电报，令“第17师应速向宜春、分宜地段渡过袁水，北出配合第16师向南浔路永修一带行动”。当时，军委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北上的战略意图是配合第19路军，只是在通报“福建事变”的情况下，要我们去配合中央红军向北发展。对“福建事变”，只认为他们反蒋是好的，却没有把他们作为同盟军。

红17师是规模较小的游击兵团，全师才4000多人。军委指示我们北上的主要任务，是破坏南浔铁路。南浔铁路是南昌到九江的交通要道，是敌北路军进攻中央苏区的主要后方联络线、补给线。如果能破坏南浔铁路，对中央红军北上是有力的支持。

当时，我们驻在安福的枫田、固江一带，接到上级指示后，立即做出发准备，补充兵员，打草鞋、做风帽等。1月26日早晨出发，进到分宜以东的萧公渡。萧公渡对面有条河，河对面有地方武装防守。那时是冬季枯水期，河水不深，我们在天亮前涉水冲了过去，把地主武装打跑了，还抓了些俘虏，查明情况。这一天全军乘胜渡过袁水，驻在鹤巢、双林一带。

27日，国民党的飞机来驻地轰炸。为了引开敌人，我派小分队去打鹤巢附近的碉堡。平常打碉堡是先把周围的电话线割断，那天我们特意不割电话线。我们一打，碉堡里的敌人就打电话告急，说红军的大部队来了。这样就把敌人的飞机引到碉堡附近。我们又在碉堡附近搞了些假目标，飞机把炸弹抛完也就回去了，我驻鹤巢的主力部队得到了休整。这个方法很合乎孙子说的“兵者，诡道也”的原则。

过了袁水，我们继续向北。蒋介石得到情报紧张了，急令敌第18师朱耀华部和第62师钟光仁旅驰往铜鼓，从西面堵截我们。我们却由华阳渡过锦水，向高安前进。一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筑的碉堡。我们多半晚饭后战备行军，前面打开一、二个碉堡，放火一烧，火舌从堡顶冒出，冲向天空，附近碉堡中的敌人都被吓跑了。我军继续前进，沿途烧碉堡，熊熊的火光把马路照得通明，好像一条大火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做群众工作，打土豪，捣毁国民党的区、乡政府和食盐公卖处，把没收的盐、粮食和其它物资发给当地群众。群众高兴得很，青年纷纷参军，从鹤巢到华阳，不过一天行程，参军的就有二百多人。

部队进到村前村，住了一二个晚上，又转向西，经花桥到了宜丰的黄沙。到黄沙时，天已黑了，地形没有看，就在村子里住下来。黄沙是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苏维埃联合县的中心区，距上述各县各五六十华里，近一万人口，是一块小苏区。我们去了以后，地方同志向我们介绍

了情况。

第二天刚吃了早饭，我们正准备去看地形，突然西面的潭山、天宝方向打起来。这时，敌人又攻占我驻地西面的连哨位置。警戒阵地有我们的一个营，把敌人顶住了。不久，该营撤到山上抵抗，这时主力也陆续上山。因为没有看地形，上山时找不到路，是从柴篷中钻上去的，既困难，又耽误时间。

上午八、九点钟，敌人的飞机来了，在我们阵地上丢炸弹，丢了又回去，回去又来，轮番轰炸。主力还没有大打，就伤亡了七八十人。后来我们发起冲锋，夺回了前面阵地，但敌人主力还占领着对面的一个山头。

中午，敌人的飞机来得更多了。我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阵地，发现敌人在阵地上用白布摆了符号标记，好让飞机辨别目标。我看准了这一招，也用白布在自己的阵地摆上同样的符号标记。敌机被迷惑了，不知该往哪里丢炸弹。双方对峙，一直延续到下午三点。我们抓紧挖工事，把部队调整好，然后向敌人的主阵地发起了猛攻。

正面山梁上，我们只用少量兵力控制，主力从山脊梁侧翼的柴篷里冲上去，几个手榴弹一响，敌人垮了，乱做一团，从山上滚下去。我们紧跟着追，那时田里没有水，就从田里追过去。这时敌人飞机又来了，朝前面丢了一二十颗炸弹，挨炸的都是敌人自己。原来我们的追击部队与敌人尾部相接，飞机上分不出你我，认为红军追得快，把他们后面的部队，也当做红军炸了。当飞机分清后，炸弹丢光了，只好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我们知道它没炸弹了，也不管它，一直追到潭山附近，天黑，飞机不来了，我们才回黄沙。

这一仗是以劣势兵力打垮敌优势兵力的一场恶战。我们49团、51团，每团3个营（1个营3个连），50团才两个营；而敌人是一个整师。这个师是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消灭的张辉瓒第18师的残部。当时，该师大部分在龙岗被歼，另一旅朱耀华部住东固，没有参加战斗。后来国民党把该旅提升一级，扩大为师，就是现在被我们打垮的这个师。打垮18师，人人高兴，对我更有一层深意。我是参加第一次反“围剿”“龙岗擒瓒”战役的，这个漏网的敌人，又被我们打垮了！该师有师直属队、2个旅、4个团，战时有飞机助战，却被我们打垮了。俘敌200多人，打死打伤四、五百人，敌62师的旅长钟光仁也被我们打伤了，还缴获很多枪支、子弹，缴的背包特别多。因为敌人向我们进攻时，解下自己的背包、毯子放在山脚下，以便前进。到溃退时，只顾逃命，谁也顾不得背包了。

这一仗，我军伤亡了400多人，参谋长李达和一个团长负伤。对我们这支小部队来说，这样的伤亡也是不小的。这一仗从总体来看，打得好，对湘鄂赣的群众和我们自己，都是很大的鼓舞。

在黄沙战斗打得正紧张的时候，我写了封信给红16师。当时，他们在九仙汤附近的山间里隐蔽休息。接到信后，师长高泳生、政委温景惠带着队伍马上来增援。他们晚上10点钟才到黄沙，仗已经打完了。我们两个师会合在一起。当时是战争环境，又在夜间，大家都很疲劳，就在那些小村里挤在一起宿营。分不清是那个师的，只知道都是红军，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打了黄沙以后，我们两个师一起行动，因军委早有指示，16师由17师首长指挥。我们沿河边走了两天，路过澧溪，再从莆田桥渡过修河，沿着马路向武宁走。这时，国民党军郭汝栋一个旅来堵我们，打了个遭遇战。我们夜间攻击，到离武宁城北7里的地方，转向北面，2月12日到横路铺。

横路铺离武宁大约30里，这一带原来是苏区，被敌人摧残得很厉害。我

们在这里打了敌人的区公所，抓了国民党的一个区长，缴了几支枪，便继续向东行动，到了瑞昌的小坳村。这时，军委来电，叫我们轻装急进迅速破坏南浔路。我们决定红 16 师留在小坳，警戒武宁方向，红 17 师向马回岭车站前进。

当时，敌人沿南浔路驻有 3 个旅，瑞昌是独立第 3 旅，德安是第 36 旅，还有独立第 7 旅，每旅 3 个团，共 9 个团。我们一向铁路靠近，敌人就从四面压过来。一天晚上，进到离铁路约有 2 里的地方，下起大雨，我们没有破坏的工具，也没有破坏铁路的技术和经验，敌人又逼近了，我感到，不能再向前了。那个地方交通便利，敌人坐上汽车很快就到，大势不利。

情况十分紧急，我等不得请示军委，当即决定部队马上撤下来，向西走，走到九渡源山区。

我们在九渡源休息了两三天。一天下午，敌人的飞机来了，我们隐蔽在山上的树林子里，把马牵到老百姓家的牛栏，什么也没有暴露。敌人飞机没有发现目标，也就没有丢炸弹。但敌人又分 3 路向九渡源进攻，第一路是敌第 16 师的 6 个团，第 18 师的 4 个团，62 师李国钧的一个旅，共 12 个团。还有第 62 师另两个团，从西面向九渡源进攻；第二路是独立第 3 旅，由瑞昌的南面向九渡源进攻；第三路是独立第 36 旅，从德安向岷山一带进攻。我们在岷山方向有个连哨，见到敌人来了，就在路的两侧隐蔽。敌人的前卫连与他的主力相距约有里把路，我警戒连一个冲锋，就把敌人的前卫连打垮了，除了打死打伤的外，还俘虏了十几个人，这个小仗战果不小，最重要的是从俘虏中弄清了这一路敌人的情况。

三面都发现敌人，我们只有从九渡源向南往秦山去的一条路。那天晚上，我们上了一个两里路高的小山，又下了六七里路的岭。天下着雨，路很难走。有个地方队伍老是走不动。我插上去一看，那个地方很窄，下面是悬崖陡壁，只有十几步路，就是走不动。我估计这里离敌人较远，即使敌人在远处发现，夜间也弄不清楚；就是被敌发现，也比困在山上更利于尔后的战略机动。我就冒点险，叫人点了两盏马灯，以利于部队很快通过。向秦山撤退。我又让负责警戒的那个连堵住敌人，后来增援到一个营，才把整个部队掩护到了秦山脚下。这就利于今后的军事行动了。

虽然到了秦山脚下，但我们还没有脱离敌人的战役大包围。那天晚上，我们研究了各方面的情况，决定向南，从柘林南渡修河。整整一个晚上部队没有合眼，第二天天快亮时又出发了。侦察队走到前面，他们把缴来的国民党军服穿上，急行到柘林。柘林的国民党区长和几十个民团以为是国民党军队来了，忙出来欢迎。侦察队一冲而上，把他们都缴了械。船工很快架起浮桥，早上 8 点钟我们过了修河，完全跳出了敌人的战役包围圈。

过修河后，又经仰山、桃源、固坊、庙前街，进入上富山区。敌人的大部队被我们抛在了后面，但他们调动得很快。国民党第 16 师从德安乘火车到南昌（在南昌，蒋介石还接见了 16 师师长彭位仁，发给他德国造的 20 响驳壳枪，给其撑腰打气），又从南昌到高安，从前面堵截我们；另一路第 62 师的两个旅，经柘林、庙前，从北面追来；岳森的第 50 师从西面来堵；第 19 师的两个团从西南面奔来，企图将我们消灭在上富山区。

我们休息了两天之后，就向西运动，到了观前、郭城一带。这里原是苏区，后被国民党占领了，一个个村子烧得光光的，老百姓都逃到山上，搭棚子安身。我们一到那里，老百姓下山来了，带些干薯送给我们。他们自己本

来够困难的，却把仅有的一点杂粮分给我们，虽然数量不多，但对连日来吃不饱饭的我们，真是“雪中送炭”！

我们一直向西，又打破了敌人在上富地区包围我们的计划。当时部队疲劳得很，白天有飞机轰炸，只好晚上行军。有天晚上走了五十多里，于拂晓前三四点钟到了修水县的漫江。我们住在靠漫江山边村子里，前面3里多路有个小村子，住一个营。因为太疲劳，大家都睡着了。敌人来袭击，连哨兵都睡过去了，结果我们那个营被敌人包围。我和师部的其他同志在睡梦中听到机枪响，马上起来，集合部队上山。敌人过了田段向山上冲来，我们一个冲锋号反击，把敌人打下去。敌人从田段里乱退，我被围的那个营反守为攻，堵截溃退的敌人，打得敌人到处乱窜。

战斗结束了，俘虏80多敌人，缴了90多支枪，击毙敌连长两名，俘虏连长一名。这一仗虽然消灭敌人不算多，但在我军当时吃不好，睡不好又极端疲劳的情况下，堪称奇迹。

这次与我们交手的是敌第50师的部队。50师同18师一样，也是我们的老对手。第一次反“围剿”消灭张辉瓒后，红军在东韶把50师也打了个落花流水。这两个师都是湖南老政客谭延闿统治湖南时期建立的，参加了北伐战争，以后叛变革命，成为新军阀“围剿”红军的主力。我军的干部都有种革命意识，对叛变革命的军队特别痛恨，谭延闿又是我们根据地茶陵县人，他的父亲谭钟麟在满清政府当过大官，许多战士都知道这些情况。战斗前，我们从谍报中得悉是50师的部队，都摩拳擦掌，想同他较量一番。没想到在我们疲惫不堪的情况下与他遭遇，靠着战士们的英勇顽强，终于把他打垮了。

这一带也不能停留，我们就决定到幽居去。在幽居，又同红16师会合了。原来我们向东转移后，红16师还在小坳地区。敌26师向他们进攻，打了整整一天，由于我们的电台失灵，同他们联系不上，他们就自己行动，向西突围，冲破敌人的包围圈，到了幽居。

幽居是当时湘鄂赣省级机关所在地，四周都是大山，粮食非常困难。省委、省苏维埃机关想了很多办法，饭是一成米，二成薯丝，菜是吃笋干，又没有油，连医院里的伤员也是吃薯丝。我们本来准备在幽居休息一下，但休息不

成。

这时，敌人又布置了新的进攻，兵力很多，东面是敌第18师的一个旅和第62师的两个旅，东南面是敌第16师，西面是敌第19师，北面是第26师加上第50师的一个

团，还有独立第4师，都向幽居包围过来。我们同以陈寿

昌为首的湘鄂赣省委共同研究部队的行动方向，他们介绍说鄂南有红3师，那里是湘鄂赣最大的一块苏区，人口多，富足些。恰好军委来了一个电报指示，也是让我们到湖北去，于是就决定北上鄂南。

部队进到渣津，敌第26师郭汝栋部赶来堵截。我们趁敌人刚到，立足未稳，发起勇猛冲击，打垮了敌人一个团，乘胜到古市岭，跳出了敌人在幽居附近对我形成的包围圈。第二天下午，敌罗启强的独立第4旅追来，我们又继续向北，走到江西湖北交界的修（水）武（宁）崇（阳）通

（城）苏区。

这块根据地有4千多人口，也是山区，地方不大，粮食困难。一到这里，我就向湖北共产党的县委机关了解鄂南苏区的情况，才知道苏区已被敌人分

割成十几块了，回旋余地不大，而粮食又特别困难，我们两个师共有5千多人（其中红16师有1600多人），到鄂南苏区，吃什么？“军无粮食则亡”，我早就知道这个原则；自己多年的军事实践对这条原则体会更深，我感到再也不能向北走了，应立即南返。

当我提出南返时，师政委陈洪时不同意，说没有接到军委指示。的确，向北是军委指示的，但眼下情况紧急，军委又不在眼前，机械地执行或等待军委指示都会贻误战机，陷于被动。我就向陈洪时分析战略大势。我说，再往北是长江，京汉铁路，还有敌重兵所在的武昌，西面是岳阳，何健也可随时调重兵，东面有九江和南浔铁路，处在这个三角地带，活动范围小，十分危险。陈洪时也承认当前的现状是事实，但他还是要等军委电报。陈在大革命失败后去苏联留学，回国后长期做县委书记，可谓满腹经纶，但缺乏军事素养和战斗经验，遇到复杂情况就拘谨得很。

我们在冷水坪住了一天，就为解决问题。那晚，我和陈洪时都在思索。平时我们关系比较好，他对我的意见也尊重，就慢慢地说服他。师参谋长李达和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同意我的意见，他们都看出敌重兵很快会过来，拖延不得，大家一起做陈洪时的工作。我说，军委电报的末尾也有“你们可根据实际情况机断处理”的话，我们一边向南，一边向军委报告。陈洪时终于同意了，但他担心向南会与追来的敌人碰上。我说，不要紧。我们把前面的侦察连和前卫营派远一些，如果发现敌人大部队，就改向西行。

第二天清晨，全军从冷水坪回头向南。中午，敌人果然来了，前面抓住几个俘虏一问，知道是敌人第23师和第77师。我们立即向西，把前卫改为掩护部队，在后面边打边走。敌人发现我们向西，已经被我们抛在后面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又突然向南，这样，敌人和我们就换了方向，由原来的从南向北堵截变成由北向南追击了。方向一变，我

们就摆脱了战略上被动局面。那几天我们一直向南走，经过塘口、金港、获田铺、水源，到了朱溪厂，行动顺利。老百姓看到红军又回来了，高兴得不得了。

3月15日，我们从水源向朱溪厂前进时，却得到了一个错误的情报，说敌第19师调到后面去了。其实19师并不在我们后面，而在我们前面的长寿街一带。由于情报错误，我们大意了，认为前面没有敌主力，就想靠近幽居，同湘鄂赣省委商量整个行动。走到龙门厂附近的沙湾，发

现敌人，认为只是保安团之类，就发起攻击，结果敌人越打越多，打了几个钟头不得不撤下来，临时向西转移。这一仗打败了，牺牲50团团团长李崇、还有49团团政委，伤亡三四百人。我们队伍只有那么大，损失是严重的，部队被迫向西转移。

到了虹桥，这里也是失败后的老苏区，但老百姓很好，把粮食、菜拿出来给我们，还收留了我们的伤员。敌人离

得那么近，群众还敢收留我们的伤员，我非常感动，老百姓真是好啊！第二天早上，继续向西走。走了二十多里，发现敌人又来追我们，便改道向西南，到了平浏长苏区的周坊。这是大山中的小村庄，侦察队说红17师来了，山上的群众就送粮食下来。部队一到，粮食也到了，我们就在路边架起行军锅做饭。周坊只有三四百基本群众，临时供应我们四千多人的粮食，不容易啊！

黄昏后，我们继续向南。那天晚上，我同侦察员一起走在前卫部队前面，那时，我常常跟着侦察员走，这样发现情况可以及时做出决定，即兵法常言的“兵贵神速”。走到汨罗河边上，我们知道冬季水浅，但不知究竟有多深多浅，有没有桥。走进村子打听，有个老百姓说在嘉义、献钟之间有桥。我请他带路，队伍就在乾田坝里集合，等齐了后面队伍又走，在拂晓前渡过了汨罗河。

过河四、五里，有个大村子，敌人筑了碉堡。但我们走得很疲劳，就在那个村子住下。敌人知道我们是红军，也不敢出来。天亮，敌人吹起床号，我们也吹号。天大亮了，敌人从碉堡里向我们打枪，我们也不搭理。吃了早饭，就向浏阳坳前进。

浏阳坳是连云山的主峰之一，海拔 1600 米，上去一趟就是 30 多里。刚到半山，敌 19 师追来了。我们望见他们沿河边走，他们也看到我们上山，但双方谁也无可奈何。19 师本来在我们前面，我们向西一摆，夜间又向南，就把他们甩到后面去了，这样减轻了我们一个很大压力。到下午二、三点钟，我们登上了浏阳坳。没有饭吃，就杀了五、六匹马，那时，马本来不多，但又非这样不可。红 16 师也杀马。那天晚上，就在山上露营。

浏阳坳的东面是黄金洞苏区，从山上翻过去就是。晚上，两师首长商量军事行动。16 师师长高泳生提出，他们的队伍现在不足千人，如果继续向南不好收容。他说的这个情况我是很理解的。农民军容易跑散，情况艰苦了有的就回家，过些天又回来。16 师与我们会合时有 1600 多人，打来打去就剩 900 人了。我认为，16 师是湘鄂赣的主力，离开本地，很难保卫苏区。何况去年秋已将湘鄂赣的 18 师调到湘赣苏区，再把 16 师也调走，这个地区就没有红军主力了。虽然 16 师只有 900 人，但留在当地，便是个旗帜，后方的千把人就能回来；如果师领导机关一走，后方的人就会散掉。所以，从大局考虑，16 师以留在原地为好。

在讨论时，我提出了这个意见。16 师的同志非常赞同，但陈洪时不同意，还是说，两师集中起来是军委决定的，应报军委批准才行。我说，我们回湘赣，多八九百人起不了大作用；但八九百人留在湘鄂赣，作用就不同了，应从大局出发决定两师的行动，不应拘泥于军委的某个具体指示。我又从 17 师本身和当前军事形势说明必须立即南下，不能等军委批准后再走。我认为，中国历来仗打得好的指挥员，并不是唯“君命”是从，而是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机断专行。我提出，先这样决定，同时向军委报告。从冷水坪回师南下，就是这样做的，我们行动两天后，军委回电批准了我们的决定。

由于我和高泳生的坚持，陈洪时终于同意了，没有使用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对此我是满意的，说明他能够接受我的意见，信任我的指挥能力。冷水坪和浏阳坳的两次决策，都是在紧急情况下，从战略大局出发独立自主做出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次决策都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冷水坪的回师南下，就不能保留红 17 师这支主力；而没有浏阳坳决定留下红 16 师，湘鄂赣这块根据地（以后成为游击区）也很难保住。

建国后，付秋涛（曾任湘鄂赣省委委员及 16 师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为总参民兵部部长）还对我说：你那时决定把我们留下是对的，好多兵都归队了。16 师一直在湘鄂赣坚持斗争到“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时期，这一地区也成为我党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

那天作出决定，离天亮只有两、三个钟头了，天一亮，我们两个师便分

开行动，16师向东返回湘鄂赣基本苏区，17师向南，返回湘赣苏区。两个多月的战斗、奔波，部队减员很大，我们下了浏阳坳，把50团解散，分编到49团、51团去，三个团变为两个团，然后从官渡过浏阳河继续南进，到孙家煨住下来。

那天正下毛毛雨，下午发现敌人来追我们，后卫营等敌人接近，一个猛冲抓到几个俘虏，才知道是保安团，但那个保安团的武器不次于正规军，不能轻视它。半夜，保安团突然从山上打枪，天下阴雨，我军在营地坚守，他也不敢接近我们。第二天，我们继续走，离路不远也有敌人的碉堡，老百姓带着我们拐了过去，到桐木南面八里路的地方住了一晚。第二天继续往南走。走出一二十里，湖南敌人的3个补充团又追来，我们一面走一面打，先是改道向西，然后又折转向南，摆脱了敌人。黄昏后到了离栗市不远的地方做饭吃，当晚就迅速从芦溪、宣风之间过了袁水。就是那天傍晚，我们的前卫营（周仁杰部）在公路上堵截了敌人从萍乡开来的一辆军用汽车，消灭了敌人一个班，俘虏14人，缴枪十多支。特别珍贵的是缴获了敌人西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刘膺古的一个文件，刘奉何键命令从萍乡来堵截我们，还有其他军事部署。

得到这个情报，我们立即靠近南山，这是湘赣苏区的边缘地域。我们估计北面的敌人一定会来追击，西面萍乡的敌人也可能出来，便令已经渡过河的前卫49团在南山埋伏。不久，萍乡的敌人果然来了，49团勇猛出击，一下就把敌人打垮了，然后上山。1934年3月22日，我们渡过袁水，又打了个胜仗，回到湘赣苏区的边缘，大家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北上湘鄂赣的队伍并不大，才4000人。两个月中，纵横驰骋，在白区走了2500里，赤区500里，3000里路云和月，算是“小长征”吧！敌人调动了46个团围、追、堵、截，蒋介石亲自在南昌督战。但我们打垮了敌人6个团，烧毁了敌人无数的碉堡，冲破了敌人5次大兵团的战役包围。由于我们积极行动，钳制了敌人大量的兵力，起到了配合中央红军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作用。

之所以能够起这个作用，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调动那么多敌人，首先，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团结、勇敢的军队。我们的指战员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团结一致，一往无前。任何艰难困苦，大家都能忍受，也克服得了。

第二、我军在战略、战役上采用游击战、运动战，打得赢得就打，打不赢就走，不管遭到敌人怎样的大包围，大堵截，我们都能打破敌人的进攻，保存自己的力量，并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抓住机会消灭敌人，从而摆脱被动地位，达到自己的战略意图。

第三、我们这支部队有良好的军政素质。从我带这支部队起，就注意抓养成的教育，在战术上，从单兵到分队和小部队，对现有武器技术及散开、前进、冲锋、集合等动作，要求精通熟练。以前我读历史，看到项羽退至乌江只余28人，还保持一正一奇的战斗态势，未自杀前，汉兵不敢轻易接近。17师也能达到这个要求，班跟排，排跟连，走散了相互找，总要在一起。战斗时，攻得猛，守得住。即使打败仗也能保持建制，上不失指挥，下也听指挥。遇到敌人，只要在运动中，甚至刚刚进入防御，都会给他一个猛冲。反之，任何时候，敌人刚到我阵地前，各部不待命令就反冲锋，必有缴获和俘虏。这已形成了部队的作风。战争时期，指挥员最重要的指挥艺术，是指挥

部队打胜仗。打败敌人，缴枪、抓俘虏，最能提高士气，也能提高指挥员的威信。红 17 师处于那么多敌人的围攻追堵，仍士气旺盛，回到湘赣苏区，还没有得到休息补充，又继续打大战，就是因为大大小小的胜利，上下都树立了信心。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苏区的群众太好了！我们每到一个地方，群众、地方政府、游击队就把周围的情况告诉我们，极有利于我们了解情况。我们行动的地区，多为失败的苏区，敌人摧残得特别厉害，群众粮食本来就很难，他们还省出来给我们吃。像幽居、寒婆村、周坊等地，群众生活很苦，他们还是省出薯丝、米、笋干来供给我们。我们在湘鄂赣苏区，有时一天只吃一餐，但大多数日子是吃两餐，就是在浏阳坳杀马吃那天，我们早上也吃了饭。群众带路就更不用说了。还有寄养伤员，龙门厂一仗我们伤了二百多人，到虹桥，抬又抬不动，就把重伤员分散在群众家里，老百姓也接受。没有这样好的群众，要保留那么多的力量是不行的！所以我讲，湘鄂赣苏区的人民群众对革命有很大的功劳。从红 17 师短短两个月的行动中，可以看出群众对红军的胜利起了多大的作用。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红 17 师的北上行动，是失策的。军委要我们北上，是因为那时福建 19 路军发生事变，中央红军要向北发展，才要我们由河西向九江马回岭、南浔路牵制蒋介石。我们的配合行动是积极的，可中央当时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认为第三势力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危险，虽然双方定了作战协定，但没有积极配合他们，却去进攻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地带。从军事来说，我们一个小游击兵团加上不足 2000 人的 16 师，北出南浔路，很难达到破坏南浔路的目的，也就不能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对支援 19 路军的行动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其次，从湘赣苏区来说，17 师北上与 18 师分开行动，致使湘赣苏区的中心根据地受到损失。待 17 师回到湘赣，与 18 师会合时，永新县城已经失去。这时红 18 师实际只有 52、53 两个团共五个营，红 17 师也削弱了。应该说，这是受中央“左”倾错误影响造成的后果。

我们回湘赣苏区后，敌人乘我长途行军疲劳和严重减员之机，大举进攻。当时，49 团有个文书在莲花叛变投敌，把我们北上时遇到困难和损失的情况告诉了敌人，敌人瞧不起我们了。我们一到永新地区，敌人就来找我们决战。4 月 5 日，敌第 15 师加上 16 师一个旅，共 8 个团，由永新向里田、沙市前进。那时永新城虽被敌人占领，但群众是我们的，城里还有我们的秘密组织，敌人什么时候出发，有多少队伍，我们前一两天就得到了情报。

4 月 5 日清晨，我们以 3 个团进入里田到沙市大道北侧四五里地隐蔽。战术部署是：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先头旅，即在敌先头部队进入里田与沙市之间尚未集结构成战斗队形前，三个团同时突击敌人的先头部队。我把突击重点选在沙市至汤溪陇一段五华里的山坡上，49 团、51 团为右翼，53 团在左翼；红军学校摆在禾水南岸，侧击敌后续部队增援和先头部队回窜。这样的布置，从战略和战役上说是劣势，但从战术上说，我在 5 华里的行军道上，集中了 3 个团，却是优势。

上午 9 时许，敌第 15 师 43 旅进至沙市东面的小高地，我 51 团首先向敌发起攻击，将敌人的先头部队冲乱了。49 团和警卫连同时冲上山头，52 团和其他地方武装也向敌人猛攻。只 40 分钟，便把敌 45 旅两个团击溃，残敌仓皇向东逃窜，我军一直追到里田，全部消灭了敌人的先头部队。这时，

敌人的后续部队赶到了里田。敌人有 8 个团和 15 师直属的特务营、工兵营，消灭了它两个团，还有六个团两个营，仍占优势。我们处在运动中，建制较乱，我下令停止进攻，撤到台岭、南坟，准备迎击敌人的再度进攻。

下午 2 时，敌人来进攻了。我命令部队，一枪不打，让敌人进到工事前三、四十米时，手榴弹一投，立即反击。敌人抵挡不住，我军奋勇追击，到黄昏，歼敌一部，残敌向里田退去。

沙市战斗是一场成功的伏击战歼灭战。消灭了敌人一个旅，活捉旅长侯鹏飞、团长徐本楨及参谋长赵楚卿，并给敌另两个旅以重创，这是河西战场五次反“围剿”以来一个最大的胜利。

我们回到湘赣苏区的前几天，前往中央苏区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王震也回来了。他带回来两个本子，一本是军委关于战术的指示，讲堡垒对峙下的战术动作；一本是“支撑点构筑法”，讲支撑点的构筑法及与敌堡垒对峙的战术。我们回来看到这个材料，感到这种战法主力很难集中，与过去运动战、游击战不同，但当时也没有意识到是错误的军事指导思想。既然是军委的指示，当然要照此执行了。沙市战斗后，我们在松山、钱市打了两次阻击战，搞阵地对峙，虽有缴获，但付出很大代价。尤其是金华山争夺战，虽从敌人手中夺回了阵地，但我们自己却伤亡 400 多人。

这时，敌人又从中央苏区调来了李抱冰第 53 师和鲍刚独立第 46 旅，在永新与莲花之间构筑碉堡封锁线。军委强调所谓阵地防御战略，我们也到处修碉堡。主力被派去修工事，地方武装也去修工事。如永新埠前区少年模范队有 3 个连，200 多人，都有枪，有战斗力，但全部去修工事。碉堡修好后，同永新城的敌人对峙起来。

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敌人对苏区层层包围，严密封锁，占据苏区中心永新、钱市、石灰桥和里田等地，我主力与几方面的敌人对峙，他攻我顶，我攻他顶，堡垒对堡垒。敌人子弹多，有重武器，我们没有，伤亡大而战果小，整个战局越来越被动。省委及后方机关，被迫转移到石灰桥南牛田去了，我军主力集中于石灰桥东南山区，很难机动。我因子弹少，不愿和敌人对抗，有时对进攻之敌顶一下，也带着战术上的取巧心理，并非大计。6 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永新、钱市几方面的敌人向我进攻，我看打不出好仗，没有时间请示军委、省委，就离开永新地区，翻过南山到牛田一带和省级机关一起行动了。

当时，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红军总应该打胜仗，可这两个月为什么仗总打不好？离开了基本根据地，今后如何办？但我又想，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办法的。省委和省军区开会，对局势进行研究，决定向遂万泰和井冈山地区发展。

7 月 18 日至 19 日，我们围攻五斗江，7 月 23 日围攻衙前。这一带都是山区，包括拿山、关背在内，地域广，回旋余地大。如果工作做好了，我们是可以不走的（指后来的西征）。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实行过“左”的社会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损害富裕中农利益，对“反水”农民不注意争取，对知识分子也以其成份作去留使用标准等等。这样，就使群众情绪对立，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特别是 1929 年 1 月红 4 军下井冈山后，对井冈山原来的“绿林”武装领导人后来成了共产党员的袁文才和王佐，作了错误处置，使湘赣苏区长期背了一个大包袱。当时，我们想恢复井冈山，可是上山后，老百姓都躲起来了，不和我们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

作，没有实现，我们的活动范围没有扩大。

7月下旬，中央命令我们西征。这时，我们确实十分困难，必须突围转移了。

第十一章先遣西征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边境。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不大了。湘赣苏区在六月以后，也没有这种希望了。在这种情况下，苏区如何坚持？红军如何行动？大家都在思索着。

1934年7月23日，中央军委给湘赣省委来电指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电报还明确地讲了撤出湘赣的理由：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敌人正在加紧对湘赣苏区封锁与包围，特别是加强其西边的封锁，企图阻止我们的力量向西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六军团继续在现在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这就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

来电还阐述了军委这一决定的目的，指出：红六军团去湖南中部积极行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中央苏区的计划，以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这一行动，还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六军团有生力量，并在创建新的苏区的斗争中，“确立与二军团（作者注：1931年3月，原红二军团已改为红三军。电报中的二军团是习惯称法）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电报并对红六军团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地域和行动作了具体规定：“六军团由黄坳、上下七地域的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部或其以南，转移到桂东地域。在转移中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则向新化、溆浦向北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电报还就这次行动的组织领导作了规定：“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3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在这个长电中。中央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没说明。一天，弼时同志对我说，中央红军可能要向西，到湖南方面去，这几句话，对我既有震动又有启示。我早就听说过弼时的一段经历，他在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期间，曾以团中央名义起草了《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并在一次中央紧急会议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以及他们隐瞒共产国际指示的错误。后来，他到中央苏区，我们就认识了，尤其是在1933年6月11日，我们接他到湘赣苏区工作后，对他的印象更加深了。我觉得他不仅对政治问题有深入的见解，而且善于观察战略大势。后来我们在行动中体会到，中央红军也很可能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周恩来后来曾说过，当时组织红军第六第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博古更直接说明，“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当然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们立即进行了转移的准备工作。任弼时主持召开了全军政工会议。他亲自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报告，分析了目前形势，传达了任务，指出了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对这次转移部署作了慎密的研究，认为如按军委规定的方向突围，沿途山大路险，不便运动，容易遭到驻宁冈的湘敌第15师堵截和驻永新的第16师、62师的追击，而且会过早地暴露行动意图。因此，确定主力先向南再向西南急进，冲破敌人的战役包围。我们觉得，南面是湘敌和粤敌的接合部，都是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兵力较弱，间隙较大，便于行动，同时也不至于

过早暴露战略意图。我们在决定了突围的方向后，积极打草鞋，做干粮，并实施了行军、侦察、警戒的教育。地方行政机关也进行精兵简政，充实部队。对留下的地方武装作了坚持根据地的安排。

经过充分准备，8月7日下午3时，全军约9000人，在独立4团的引导下，由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经日夜兼程行军，通过藻林、左安、高坪等地。连续突破敌人四道防线，于11日中午到达了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12日，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兼17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17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18师师长，甘泗淇为18师政委，谭家述为18师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

这次向西行动，中央军委指示我们一切都要带走。由于我们主要领导人不大了解西征意图，也没有接受红17师北上的经验，就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上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你走10里路它就掉队一二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机动能力大大削弱，行军不灵便，打仗顾虑多，客观上影响了指挥员寻找机会打仗的决心。特别是到了贵州，山高路窄，崎岖曲折。我们从湘桂黔边进入贵州，带的东西扔得差不多了。就把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但那时是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他们不仅不吸取教训，当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时搬的比我们还厉害，打仗是被动掩护战，因而吃亏也就更大。这种搬家式的转移，是五次反“围剿”后军事保守主义的继续。完全违反了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原则。

我参加军队以来，有三次亲切的感受，一次是南昌起义后南下广东，开始带了被服、装备，一路走，一路丢，到东江后，留下不多了。第二次是朱毛红军下井冈山，也带了些辎重行李，虽然不多，但走到闽赣边，也丢得差不多了。第三次是红17师北上，北渡修水后，军委还特令我们焚毁行李，我们执行这个指示。行动更便利了。我认为军委的命令总的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六军团西征，军委却叫我们搬很多东西，我认为是不行的。我最担心的是战斗部队行李辎重所累而不利于灵活机动行动，打不好仗，不仅辎重行李会丢掉，连战斗部队也会损失。但又感到这是军委指示的，不执行也不好，我深深为此发愁，就同张子意个别谈，他虽然理解我的心情，但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认识不深，也就不了了之。

当时大家对中央军委的指令，十分尊重。本来就舍不得丢掉自己的家当，包括公家的、私人的，都想搬走，而军委又恰好指示要“搬家”（后来语），大家就积极执行。我虽有自己的想法，但没有坚持的勇气，不敢提，听之任之。

六军团西征一个月，我们经常向上级报告地形，敌情及行李辎重损失的情况。可是，中央不接受我们的教训，“搬家”搬得更厉害，国民党报纸说我们是：前头的“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上来。此语虽近乎笑话，但对我们自己来说，如果前头的“乌龟”走错了路，后头的“乌龟”应就警惕了，即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如果后头来的不知所“鉴”，就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失。

红六军团突围的消息，震撼了湘桂两省军阀。湖南军阀何键一面急令刘建绪派两个师追击我们，一面令一个旅和4个保安团防堵拦截。广西军阀也

令第7军两个师向北部边境调动。由于敌情变化，我们改变了在湘南地区停留的计划。8月12日晚，从寨前圩出发，越过了郴宜公路，绕过桂阳，于20日占领了新田县城，休息一天。继续前进，到达湘江右岸的蔡家埠一带，准备抢渡湘江，向新化、淑浦地区前进。

敌刘建绪发现我军将抢渡湘江，急忙调重兵防堵湘江，严令尾追我军。与此同时，桂军第17军廖磊部分两路向道县、零陵运动，堵我西进。这时，湘江西岸有利地形已被敌人占领，严密布防，渡江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放弃由零陵地区强渡湘江的计划，东行到阳明山区，打算暂时立足，酌情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我们就进入白果市，从4倍于我的敌军包围中摆脱出来。绕过敌15师的侧翼部队。立即转而南下，日夜兼程，到达了嘉禾县城以西地区。

敌军继续追来，我迅速进至江华、道县之间，渡过了湘江上游支流滞水，攻下湘桂交界之永安关，破坏了湘桂军3个师的截堵我军计划，进入了广西的全县、灌阳东北地区的文市。敌人又妄图阻止我军在此西渡湘江。我军一举击溃敌8个多团，于9月4日上午在全县以南的界首，渡过湘江，向越城岭前进，进占西延县城。

越城岭在五岭山脉西头，处于湘桂两省之间。西延是越城岭地区唯一的县城。山高路险，形势雄壮，是湘桂两省要冲。我们进至西延城，有居高临下之势。但广西敌人近来经常派飞机来侦察轰炸，影响我军行动，部队对敌机愤恨极了，虽然没有防空武器，有个连的干部战士，同心一致，用步枪射击，打下一架飞机。落在行军道旁。飞机上的人员，全部被我俘虏。武器装具和用品全部被我缴获。从此敌飞机来少了，来也不敢低空扫射了。大家说：“不要怕敌人的飞机，来了就打，看它再来不来！”

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出发以来，时而西，时而东，时而北，时而南。像神龙腾空，不可捉摸。9月8日，我们在西延车田接到中央军委的一个训令，要我们在城步、绥宁、武岗山地区打击敌人，最少保持到9月20日，然后沿桂边境行动，与红三军联系，在凤凰、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训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牵制敌人，直接与即将长征的红一方面军配合行动。

我们立即行动。这时，湘、桂、黔3省敌军也先后集结在靖县绥宁以北地区，防我北进。我们夺路南下，占领通道县城，渡渠水，西入贵州。我军这样迂回转移，忽东忽西，行动灵活，使敌人难于琢磨。何键曾无可奈何地说，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我15、16师跟踪追逐数千里”，“军队疲于奔命”，他还破口大骂其部下无能。

进入贵州后，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地形不熟悉。贵州是个多山多雨的省份，常听人讲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到这里一看，果然如此。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我们从江西、湖南带的马，不习惯那种道路，好多都掉到沟里了。老百姓也没有受过我党和大革命多少影响，对红军不大了解，而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宣传什么“共匪、共匪”，还发生过这样的笑话：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他们看我们纪律好，就不怕我们，但称呼照旧。我们问他们：“我们怎么样？”他们盛情地说：“你们好！你们共匪好！”尤其困难的是，没有军用地图。全靠找向导问路。对于一支独立行动的部队来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又没有群众基础，甚至连地图也没有的地区活动，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这时，我们的辎重行李已丢得差不多了，敌人跟踪尾追。我们走到锦屏、黎平、进入了苗、侗两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西征以来，我们对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十分重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我们在党内党外，军内军外，宣传两个口号：民族团结，民族平等。这两个口号使我们逐渐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准备渡清水江北进时，苗、侗两族人民，积极为我们寻找渡口，收集船只，绑结木筏，架设浮桥。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顺利地渡过了清水河，又突破湘、桂、黔3省敌军共18个团的包围，强渡大沙河，攻入地主武装盘据的老黄平县城——旧州。

旧州处于贵阳市东偏北约100公里处。虽已废除州治，而文化交通和人物等，较之新设县治，声名更大，也是我们更注意的地方。

在旧州地区，我们扣留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当时，正处于紧张的战斗行军时期，对这些不明身份的外国人，自然不能放过，虽然我们很快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并释放了他们的家人，但还是留下薄复礼和海曼。坦率地讲，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西征以来，转战50多天，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在旧州教堂，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找到一张晕瀚式的贵州地图，有一平方米大，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我们，这张地图是非常珍贵的。我马上把它取下来，但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外国文字。稍懂外文的张子意和袁任远说不是英文，看不懂。我听说那个叫薄复礼的传教士会汉语，虽然讲得不太好，但能听得懂，就请他来。薄复礼看了地图，说是法文。我让他帮助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中文。于是，两人就在一张四方桌子，展开地图，用一盏煤油军用马灯照明，他讲我记，整整干了大半夜，把我想要知道的与二军团会合的那个方向的地名都注上中文。

在交谈中，我不仅知道了军事上有用的情况，还了解了他的身世。过去，我对传教士的印象是不好的，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的，把他们当帝国主义分子看待，财产要没收，拘留要赎金。这时，我们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有提高，执行政策不像过去那样“左”了。传教士帮助我翻译的这张地图，对我们在贵州行军作战，决定部队的行动起了好作用。我总感到，他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了红军，尽管不是主动的，但总是做了对我们有益的事情，所以，我对他有些好感。

这位传教士一直随我们行动了18个月，这期间，我们一起谈过信仰问题，一起搞过娱乐活动，一起利用长征中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相互有了进一步了解。在1936年4月12日，我军进至昆明附近把他释放了，临别时，我还特意请他吃了一顿饭，还给了他足够的路费。据说，他被释放后，不但没有诋毁我们，反而说了不少赞誉红军的话。

就在扣留传教士的第二天，我们撤离老黄平，西进至松洞（梭洞）。这时，军委指示：“桂敌现向南开动。据谍报称：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照军委1日13时半电令，迅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我们根据军委电令，由松洞北进至瓮安县的猴场（现草塘），先头部队进抵乌江南岸，设法与红二军团联系。但军委于当日两电严令红六军团：“军委绝未令你们渡乌江向西行动……绝对不可再向西北转移。”我军立即进入石阡县境，经河坝场，直至走马坪、廖家腾地域。就在这时，敌军频繁调动，

以近 24 个团的兵力对我军实施大包围。

我军没有察觉湘、桂、黔敌的联合“围剿”部署，7 日拂晓，准备到石阡县的甘溪大休息，然后利用夜暗越过石阡、镇远大道，向江口地区开进。上午 10 时许，参谋长李达率 17 师 51 团和 49 团先后到达石阡西南 30 里之甘溪。前卫 51 团侦察队在甘溪街上俘敌侦察员两名，得知桂敌第 19 师一部正向甘溪开进。在这紧急关头，李达即率 49、51 两个团部和机枪连，共六、七百人向石阡的大地方及江口方向转移，与主力失去了联络。

我 51、49 团，在甘溪东西街与敌奋战 4 个小时，打退敌人多次冲击，顶住了正面进攻之敌，是日下午，王震亲率 53 团，在大土村以南一座上下 40 里的大山中，为全军开路，向东南面的大地方转移。我令 50 团接替红军学校，掩护 49、51 团和红校转移。

甘溪战斗不利，我们被迫向西在石阡、镇远、余庆、施秉、黄平一带盘旋行动，地形、敌情、社会情况和供应等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在桂、黔敌 24 个团的重围之中，我军先后被截为四段，减员很严重，部队常在悬崖峭壁小路上攀行，有些部队一天一顿稀饭，赤脚行军。中央代表任弼时害疟疾，手拄木棍，领导着全军行动。52 团是湘鄂赣久经战斗的部队，在行军中为后卫，遭敌包围，全团苦战数日，惨遭损失，18 师师长龙云惨遭杀害。

我当时已意识到战略形势很不利。如果不脱离这个地区及强敌的包围，就会陷入极为危险的地步。我除了与任弼时、王震等一起注意全军行动方向和行军组织及后勤外，更注意的是想法脱出危险的战略处境。弼时看出了我的紧张情绪，问我：“怎么样？”我说：“坚决向东去，脱离这个地区，争取主动。”

一天下午，我们进至石阡至镇远敌之封锁线上，击溃了敌之巡逻警戒部队后，占领了东去江口的路口，并向南面之镇远及北面之石阡派出了强有力的警戒。我当时最大的顾虑是敌人控制这个路口，堵我东去之路。这样就回到原来不利的战略地区。幸好，这个路口我们及时控制了。并在当地老猎户引导下，深夜进到一条人迹罕见的谷涧水沟（贵州称为夹沟）从沟底鱼贯而东。这时，南面的湖南补充第 2 纵队陈铁侠部，北面的桂系军队早已发现了我军主力。将近黄昏，敌人从南面进攻，黄昏后北面也打响了，这时，我军除警戒部队外，陆续东去下到夹沟。我亲自站在路口指挥部队行动，午夜，绝大部分过去了，我又令两侧掩护部队，撤到路口改为后卫，随大部队跟进。天亮，我与后卫一起出了夹沟，看到了正在东升的太阳，才松了一口气。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全军团大局的军事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我曾写了一首《红日东升》的诗，记录当时的心情：

封锁重重往复返，
满腔热血九回旋。
通宵苦战见红日，
百战老兵为一叹。

从此，六军团脱离了贵州和广西、湖南军队的围追堵截，同贺龙、关向应、夏曦同志领导的红三军相距日近了。

这次行动历时 80 多天，跨越敌境 5000 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绝对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我们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

这时期，我体会最深的是红军战略方向要对头，战术上也要搞好。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指挥员，在考虑与决定战略方针时，就得考虑为完成战略目的的战术问题，如行军、作战、宿营、警戒等。中国古代兵书多讲过此类问题，历史上的淝水之战，东晋之谢安如果没有刘牢之部渡淝水后的奋勇攻击，打开突破口，晋军就不可能全面展开，也就无法击溃苻坚的大军。大革命时期，广东革命军北伐采取长驱深入的方针是正确的战略，如没有前线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胜利，就不可能进至武汉。我们在西征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况，不仅没有战略优势，战术上也很少优势，要取得主动，关键在于寻找优势，化劣势为优势。敌人在分进合击，分路围攻，我们就可以找到局部的优势，以自己的英勇果敢的动作，战胜敌人。进攻中是这样，退却打败仗时也要这样，这就要求指挥员必须善于审势与审机。如在贵州东部，敌人是大优势，但当时在石阡至镇远大道 60 余公里的地段，并非优势，何况我们又是突然来到的呢！

我们总是希望打胜仗，大胜最好，小胜也是好的。我们没有兵工厂，缴一支枪，一袋子弹，就能激励士气。我总是提倡这样一种精神“勇敢冲锋”。这句口号是第一次反“围剿”早晚点名的第一句口号，很能振奋军心。我对部队的要求是，只能赢不能输。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前卫与敌遭遇，立即冲锋。打死打伤几个敌人，就可以弄清敌情。即便战略不利，战术上只要不输，就可以鼓舞和保持士气。永安关之战，击溃敌两团，歼其半团，对制止湘敌的战略追击有很大作用。甘溪之败，被敌压到西面，使我在贵阳以东，乌江以南，清水江之北地区，陷于严重的危机，经过十余天的回旋作战，既会打，又会走，达到战略目的。

回忆西征以来的战斗，心情很不平静，那时我年壮气盛，耳聪目明，手脚敏捷，图囊、望远镜，从不离身，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打仗无论胜败，都有直接责任。

1934 年 10 月 24 日，红六军团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在此之前，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甘溪之战被截的 17 师 49、51 团之一部，在黔东根据地之沿河地区，与红二军团的一部先会合了。

在木黄，我和任弼时、王震等与二军团首长贺龙、关向应、夏曦等同志欢聚一堂，并立即对当时整个形势和自己的任务，以及行动方针，进行了审慎的研究，认为：刚刚退出江西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正与优势敌军在湘粤佳边苦战，夺路向西转移，二、六军团就应积极行动，密切配合。我们两个军团会合的时候，二军团有 4000 多人，六军团有 3000 多人。当时人家说我们有万把人，其实只有 8000 子弟。但士气旺盛，武器齐全。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红二军团在与六军团会师之前，在贺龙、周逸群、邓中夏、段德昌、夏曦的领导下，在湘鄂西苏区建立工农兵政权和游击队、赤卫队，由于强大敌人的残酷而长期地进攻，加上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和肃反扩大化，革命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不得不退出根据地。后来，在湘鄂西分局的领导下，在湘、鄂、川、黔边主要在黔东等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没收和分配了土地，同时在黔东各县建立了地方武装。二军团有了这块不大的根据地，战略上，精神上有了依托，利于争取某种程度的主动。同时，由于红军工作的恢复和加强，就保存了有生力量，在四川、湖南、贵州广大地区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政治影响。

尽管是这样，但黔东根据地纵横才 200 里，人口只 10 万以上，人少粮缺，从两军团会师后的发展前程来说，是不理想的。很需要找到更好的发展方向，我们把四周的地形、民情、经济条件及敌情统一研究一下，认为湘西澧水流域上游，最适宜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于是，我们决定向湘西进军。

湘西经济虽然落后，但我党的影响比较大，那里有些县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的基础，土地革命时期是二军团活动的地区，有比较好的群众关系。贺龙在这些地区政治影响很大，人熟地熟，有利于我们发展。湘西的敌人只有陈渠珍部 3 个保安团，和民警团防约万余人，加上杂牌军杨其昌、车鸣骥、雷明九、廖怀中等部约 4000 人，总兵力不过两万，战斗力也不强，有利于我们向这个地区开展战略攻势。只有向湘西进军，才能达到牵制、调动湘鄂两省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才能在游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扩大部队。

10 月 25 日，任弼时、贺龙等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并具体说明“两军团的行动由二军团统一”指挥；第二、在加强黔东根据地的党和地方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原有根据地的同时，“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但是，中央军委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在 26 日的复电中指出“二、六军团会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单独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属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六军团应速以军委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在（再）延误”等等。

对于中央复电，两军团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军委对我们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为此，10 月 28 日，我们又以夏、贺、关、任、萧、王的名义再次电告军委，“建议二、六军团暂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以一个军团的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我们的建议还没有得到批复，但当时的军事形势逼着我们还是集中行动了。因此，当时既没有统一的番号，各自称原番号，也没有统一领导机构，只是在行动中形成了以贺、任、关为核心的统一领导。组织机构和人员作了一些调整，红三军番号改为二军团，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为军团政委，关向应应为副政委，李达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六军团仍由我和王震任军团长和军团政委，另决定谭家述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为进一步加

强二军团的政治机关，将原六军团政治部、保卫部改为二军团政治部、保卫部，六军团新成立政治部，还先后从六军团抽调 100 多名政工干部到二军团任师和团的政委及其它工作。两军团会师，指战员欢欣鼓舞。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八千健儿，挥戈东向”，发动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湘西攻势。

然而，军委 29 日复电夏、贺、关、任、萧、王，重申既定方针：二、六军团绝对不应合并，仍保持两个军团组织，两军团均接受军委指挥；六军团可暂住苏区休息，改编后向松桃、凤凰、乾城地区发展，创立新根据地；二军

团则应背靠乌江，箝制印、秀之敌，向敌积极行动。要两、军团利用湘敌大部阻击中央红军之机，向湖南大发展。

直到11月13日，军委指示二、六军团应乘机深入湖南西北去扩大行动地域，两军团在同一地区行动。16日，中央书记处给二、六军团来电，对建立根据地、肃反工作，特别是党政军统一领导问题作了指示。决定成立以任弼时同志为书记，夏、贺、关、萧、王为委员的湘川黔边省委

（即湘鄂川黔省委）。军事上，两军团均改为现行编制的一个师，仍保留二、六军团名义，贺任、萧王分别为二、六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两军团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贺任统一指挥”，贺龙、任弼时分别兼湘川黔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11月下旬，军委电报：“我西方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中。你们应深入到湖南的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首先你们应前出到湘敌交通经济命脉之沅水流域，主力应求占领沅陵，向常德、桃源方向派出得力的游击队活动……两军团为取得协同动作，暂归贺、任统一指挥。”军委同意我们的战略发展方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从军委决策人（主要是博古、李德）主观方面讲，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转移的基本方针是进入湘西，会合先遣队红六军团和在湘鄂边活动的红三军（即二军团）建立根据地。博古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李德后来回忆说，他们听说二军团巩固了湘鄂川交界处的根据地，觉得这块三角地区位于长江附近，是中国内地几个最发达省份交界点，战略位置重要，可以为广泛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提供很好的立足点。李德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博古也认为只有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放下行李才能打仗。正是出于这个战略意图，他们要求红六军团尽快进入湘西，为中央红军的到达和创建新根据地做好准备。

但是，红六军团深入敌后，引起敌人警觉，湘江战役后，敌人判明中央红军将转移到湘西的战略意图，便调兵遣将，部署了5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张网以待。这时，军委对于第六军团的实力又估计过高，过多的给予红六军团箝制敌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任务。也有不少不适合于游击战，运动战的硬性指令与批评，如要求红六军团这支转战千里的3000疲惫之师，继续去完成打击强大的湘敌和深入没有群众基础地区的先遣任务，显然是不适宜的。

军委对红二军团的情况也不甚了了。当时红二军团已停止肃反，但已受到严重的伤害，元气大伤，正处于逐渐恢复党团组织和创建新苏区中，军委却要他们以黔东为依托，箝击黔敌，也是不切实际的。军委对湘西地区及敌方情况掌握很少，而又作过多的具体指导，很不利于下级的灵活机动。

两军会师后，任弼时、贺龙领导下的两军团首长对军委不切实际的指示提出了建议，并在向军委申述意见的同时，从实际出发，见机而动。不久，取得了十万坪的胜利，攻占大庸。之后，继续执行军委南下的指示，逼近沅陵，从而调动正在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人，同时也为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

下级党组织有理有据地向上级提出意见，这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灵活性的统一。我们的建议与行动，实际上是对“左”的领导一次有力抵制。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巩固和发

展了两个军团的有生力量，为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使这两支部队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

也就是在这时，我对于“左”倾领导的中央产生了怀疑。

第十二章湘鄂川黔岁月

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四川西阳的南腰界出发，向湘西龙山、永顺、保靖、桑植地区开进。这一行动惊动了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他急调龚仁杰、周燮卿和杨其昌三个旅万余人，进至永顺和保靖方向，企图阻止我军进入湘西。我军经湖北省来凤县的百户司，向招头寨和龙山前进。将敌人向北牵动。当敌人进到招头寨南面的贾家寨时，我军即由招头寨突然东进，乘虚袭占了湘西的永顺县城。

在永顺，我们分析了敌我态势。当时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正在湖南追击我中央红军；湖北军阀徐源泉的部队，大部分散在鄂西和洞庭湖滨的津市、澧州；当面之敌只有陈渠珍这一股。该敌虽然数量多于我，但其内部派系林立，指挥不一，官无规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我二、六军团8000子弟，都是经过革命战争锻炼出来的战士，加之两军指挥统一，团结一致，群众支援，我们能够消灭这股敌人。也只有消灭了这个敌人，才能够在湘西打开局面，站住脚。我们定下了歼灭陈渠珍部的决心。

这时，陈渠珍的追击部队逼近永顺。为迷惑敌人，我们故意示弱，主动放弃永顺县城，向北撤退。果然，敌误认为我军怯战，就经永顺城向北追。我们一边走，一边看地形，选择有利于伏击、侧击敌人的地域和时机。第一次在永顺城北附近设伏，因敌主力没离开城市，其先头部队易退回固守，便继续北撤。第二次拟设伏于吊井岩，后又考虑在颗砂和塔卧等地设伏，都因地形不利于大量杀伤敌人而作罢。最后，我们看准了龙家寨及其东北地区的地形。以龙家寨为中心的十万坪谷地，南北长约15里，东西最宽处为4里，谷底平坦，村庄较多，两侧林丰树茂，山势较缓，既利于隐蔽，又利于出击。于是，就决定在这里伏击敌人。

贺、任、关率二军团军团部和4师部署在毛坝附近，我和王震率六军团分别埋伏在杉木村的东山、北山。11月6日下午4时左右，敌先头部队龚仁杰、周曼卿两个旅进入我伏击圈。我乘敌立足未稳，六军团从侧翼向敌本队发起猛烈攻击，二军团从正面猛打敌前卫龚仁杰旅。敌在运动中突然遭我猛烈冲击，兵多摆不开，枪多不能发扬火力，无法构成有力的防御体系。只两个钟头，龚仁杰、周燮卿两部就被我们打垮了。

我们乘夜追击。追了10多里，发现敌杨其昌旅在距龙家寨北5里左右的把总河构筑工事，企图顽抗。这时，六军团的51团赶到了。一会儿，二军团的18团也来了。18团团长高力国一来就找到我，要求分配战斗任务。我一看手上有两个完整的团，就决定消灭杨其昌的部队。杨其昌是贵州军阀，二期北伐时，他曾任26师师长，我所在的那个团归26师指挥（实际上，他并没有去河南，是由副师长吴仲禧指挥的）。大革命失败后，杨其昌走上了反共的道路。今天在这里相遇，冤家路窄，我们下决心消灭他。

我把两个团集合，进行战前鼓动，晚九、十点钟开始行动。那一带的地形前一天我都看过了，河流岔道等心中有数，18团更熟悉这一带的地形，我就令18团从右侧的干河沟去，攻击敌人的侧面。51团从正面进攻。18团动作很快，51团立即从正面发起冲锋。不到两小时，就把敌人大部消灭了。两支不同建制的部队，战场上临时组合在一起，动作协调一致，配合很好，我想，这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才做得到。18团团长高力国是位好的同志，顾全大局，听指挥，可惜在长征途中牺牲了。

第二天，我们一直追击到永顺县城，敌狼狈南窜。这一仗缴枪 2000 支，打垮了长期盘据湘西的军阀陈渠珍。从战略上说，作战方向选得好，敌人主力都追中央红军去了，湘西敌人较少而战斗力不强，我向湘西进军，正是“避强击弱”。从战术上说，采取了诱敌上钩的办法。我连日步步撤退，示之以弱；敌步步前进，将骄兵怠，越来越麻痹。战场选得好，攻击时机也抓得好。敌刚进入伏击圈，立即出其不意地攻击。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对我军在湘西的战略展开和在广大区域发动群众十分有力，这一仗是六军团西征以及与二军团会师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转折点，是开辟新苏区有决定意义的一战。

龙家寨战斗后，省委决定，展开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两军团主力随后进攻大庸，歼灭了湘西另一支土著军阀朱华生旅一部，并占领大庸城。部队在大庸稍加休整，即向南打沉陵，因敌凭坚固守，我转向东，在梧溪河、慈利地区给罗启疆的独立第 34 旅以歼灭性的打击，继而占领桃源，包围常德。一周之后，转向北面，攻下慈利城。

在一两个月时间内，红二、六军团纵横驰骋于湘鄂川黔边区，打垮湘西地头蛇陈渠珍和蒋介石派来的独立第 34 旅，包围湖南第二大城市常德，震动了统治阶级，打乱了蒋介石在湘黔地区追堵截击中央红军的行动。湖南军阀何键怕我们打长沙，湖北军阀徐源泉怕我们向北发展威胁长江交通。

蒋介石和两湖军阀，在中央红军向西急进和二、六军团积极在湘西北活动的情况下，除已令在江西的 26 师增援常德和正在湘西南堵截红军的 19 师兼程北进外，又令正在追击中央红军的 16 师和 26 师从通道之新厂北调，这就减轻正在西追的中央红军的压力。我们的行动，是对中央红军的行动的有力策应。

二、六军团，从 11 月中旬打永顺到 12 月打开慈利县城，是发展最快的时期，军队扩大了一倍。我们经常能听到兄弟同参军，姐妹齐入伍；举家共从戎的感人事迹。我的夫人蹇先佛就是在我们打到慈利时参加红军的。她的哥哥和姐姐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姐姐先任是湘西第一个女红军；哥哥先为 1928 年秋参加红军，历任警卫营营长、游击梯队参谋长、特委巡视员等职，1931 年不幸牺牲。红军到慈利时，先佛不满 20 岁，小弟先超仅 16 岁，他们已

知道哥哥牺牲的消息，但还是毅然地加入了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小弟先超也牺牲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无数这

样的革命家庭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二、六军团会师以后，能够很快地建立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有三个原因：

第一、两个军团会合后，领导机关和全体指战员要求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愿望十分强烈。二军团离开洪湖和湘鄂西苏区后，两年的游击活动，深感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长途行军，虽然几次试图建立根据地，如在湘南之阳明山、湘西南之城步、绥宁地区，但都未能实现，整整 3 个月，既不能休整，也不能练兵，同样感受到无根据地之苦。两军会师后，具有共同的理想。加以贺、任两位主要领导人的德高望重，所以会合之后就能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为完成当时重大的政治任务——配

合中央红军和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而战斗。8000子弟兵一条心，形成一股巨大力量，就能一战而胜。

第二、正确选择了战略突击方向和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我们根据红军传统的作战方法，对统治势力比较

强的方向采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弱的方向采取攻势，两军会合以后，战略上首先指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而我党又有较大政治影响的湘西。在湘西攻势中，我们改变了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前所采取的以主力对主力、堡垒对堡垒的机械打法，与敌人打游击战、运动战。

在战术上采取诱敌入彀、急而歼之的方法，这本是过去在根据地条件下运用的战法，我们刚到湘西，还来不及做根据地的工作，敌人就进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真分析，认为虽没有根据地那样好的条件，但战役态势与江西苏区反“围剿”时近似，就大胆地采用了这个战法，结果一举获胜。龙家寨战斗胜利后，我军立即转为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进攻，打下永顺和大庸，南逼沅陵，转而东进，战胜罗启疆，攻桃源，围常德，又占慈利。这个战例，使我认识到，在白区同样可以运用诱敌深入的法。当然，与根据地的诱敌深入又不完全相同，例如在白区就不能像在根据地那样坚壁清野，而坚壁清野正是诱敌深入的重要内容。在江西苏区反“围剿”时，曾把坚壁清野和诱敌深入，两句成语并列提出来的。

第三、批判夏曦的错误，明确了政治上的是非。夏曦执行了四中全会的“左”倾错误，使湘鄂西苏区和红军都受到了重大损失。二军团以前曾发展到两万人，但到与六军团会合前，只剩下4000多人了，特别是执行“左”的肃反路线，错杀了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领导干部，使革命力量严重受挫，红军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夏曦是中央派到洪湖苏区的，执行“左”倾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两军会合后，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这是正确的。但当时我们思想认识水平不高，同时处在紧张的战争环境，没有从理论上指出错误的实质，所以，也不能从“左”倾路线中解脱出来（从当时全党的认识水平来说，也不可能解决“左”倾路线问题。解决此问题，是遵义会议后）。比如批评夏曦犯了路线错误，但又说他不执行四中全会决议。本来他就是执行了四中全会路线而犯错误的，我们反而批评他没有执行，这就没有说服力。他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呀！”又如我们只从他主持起草的一些文件中，抓住某些不科学的提法，用推理的方法给他带上取消主义的帽子，也使他接受不了。他说：“我没有像陈独秀那样不要苏维埃，不要红军，算什么取消主义呀！”在组织处理上，把他的领导职务全都撤掉，就更不恰当了。中央于1935年3月31日来电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作的组织结论是不适合的；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在教育犯错误的同志，而不应该处罚这一同志；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根据中央指示，省委安排他担任省委委员、军委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革命者犯错误，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危害的，但对一个人的功过，应根据历史事实，作出实事求是、公正的评价。对夏曦应当从他一生的革命活动来评价。我认为他的一生是两头好，中间错。1920年10月，毛泽东在湖南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时，夏曦和郭亮等是第一批入团的，他同毛

泽东、蔡和森、邓中夏、郭亮、李维汉等一起搞过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及统一战线工作。后来毛泽东去广东，邓中夏到长率店，夏曦留在湖南活动。他是湖南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郭亮同享盛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夏曦还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李维汉在十多年前，曾同我谈，在党的初创时期以及大革命时期，夏曦是有影响的革命家。杨尚昆在党的“七大”上也讲过，夏曦在苏联学习时，开始还和王明作过斗争。他在湘鄂西苏区所犯的错误的，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下的产物。因此，在批判他的错误的时候，不能过分强调个人责任。

我和王震主动请夏曦到六军团当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我们长征经过贵州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夏曦积极做当地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当他去野马川、七星关地区做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队长席大明的工作时，得知红军主力要撤出毕节，匆忙回返，过河时不幸溺水身亡。他的牺牲，是党和红军的损失。

1935年初，蒋介石调集6个纵队，向我建立不到3个月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进攻，这是敌人对我们的第一次“围剿”。敌人为保障其追击我中央红军的侧后安全，企图趁我军在湘西立足未稳，迅速将我军孤立、限制和消灭于湖南湖北的西部边境地区。敌人的战略方针基本上还是堡垒主义。在军事上，采取分进合击、严密防堵、攻堵结合的手段；在政治上，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反革命的欺骗宣传，同时收买土匪，加强地主武装，在根据地内部实施破坏；在经济上，进行封锁，断绝我根据地与外界的贸易，禁盐、禁布匹入苏区。

面对敌人的“进攻”，我们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制定了作战方案。军委在得知湘鄂敌人联合作战的计划后，于2月1日来电，要求我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之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力量是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活动。”

军委的提法和过去不大一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就电报问中央，中央就把遵义会议决议摘录电告我们，这时我们才知道有个遵义会议。从塔卧撤退前，贺龙、关向应要我在部队中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通过传达学习，把运动战、游击战提到战略高度上来认识，抛弃了“左”的军事原则。两军会师之初，我们的战略方向和战斗行动，都是根据敌我实际情况确定，实际上也就是游击战、运动战的方针。遵义会议决议收到后，战略思想更明确了，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军事上犯了单纯防御和短促突击的错误，今后战略上要采取积极防御的原则，选择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过去那种“搬家”式的行动，避战和不放下包袱不打仗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样，我们就自觉地为二、六军团争取反“围剿”的胜利定下了总方针，并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利用湖南何键和湖北何成睿、徐源泉两个派系步调不一致，指挥不统一的矛盾，先集中主力打击从湖南方面来的敌人。

3月，我们发现湖南敌人一部由王村向永顺城前进。六军团去迎击，消灭了敌人1个团，取得了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4月中旬，敌人深入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永顺一带。当时我们的思想很明确，机动灵活，有机会就打，时机不成熟就转移，在内线没有歼敌可

能，就转到外线去寻找战机。

队伍从中心区向北走了1天多路，到达桑植县陈家河，发现东面离我们15里地新到敌人两三个团。这股敌人是来袭击我们，但动作不灵敏，我们认为这个敌人不强，可以打。第二天早上占领阵地，我看了一下，那个阵地对我们很有利。正在这时，敌人向我发起攻击，我们稳住阵地，打退了敌人的第一线兵力。在敌人刚溃下的时候，抓住时机，突然反击，一直打到敌人阵地的纵深，两三个钟头就把敌人1个旅打掉了。

打掉这股敌人，就把情况摸清楚了。驻桑植的敌人是陈耀汉的58师，我们打掉了他一个旅，还有一个旅和一个师部在驻桑植。我估计，桑植的敌人会撤退，因为一个师打掉了一半，剩下的势孤力弱，不会继续控制桑植了。我就同任弼时和贺龙商量；认为桑植城的敌人会向南退往塔卧，以便与那里的敌人靠近或集中，任弼时和贺龙都赞同我的意见，就由我带两个团去截击。

那时，刚打完仗，队伍都散开了，一下子调不拢，我只调齐了49团和51团，马上出发，走山路，一口气跑了80多里。走到离桃子溪8里路的地方，发现小河里的水有些浑，就问老百姓，他们说，上游刚有大队人马过去。我判断是桑植的敌人撤退下来了，立即决定打，虽然不知道他有多少，但估计最多是一个旅加一个师直属部。他们刚到，而我们是从距桃子溪80多里的陈家河赶来的，马上打，正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离桃子溪8里的岔路上，把两个团展开，一下子冲到敌人的师直属队和前卫团。敌人措手不及，很快就溃败了，残部退到后山。我军乘胜继续攻击，一直打到晚上八九点钟，把陈耀汉的师部和另1个旅也歼灭了。这一仗，战术上是以稍劣势的兵力击破优势敌人。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缴获过炮，这次缴获了两门山炮（日本造的），立即建立了炮兵营。

由于敌58师的覆灭，震撼了敌人，各路“围剿”之敌纷纷后撤。这样我们就粉碎了敌人的第1次“围剿”，并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5月，敌人又增加兵力，集中80个团对我们进行第2次“围剿”。这时，湖北徐源泉的43师、48师和谢彬的85师都来了。湖南敌人虽不积极，但数量多，3个正规师（1师6个团）加七八个保安团。我们决定采取东守西攻的方针，在东南对湖南取守势；在西北对湖北、贵州取攻势。从5月起至8月初，3个月内，我们转到湖北靠贵州边界地区和敌人作战。在忠堡战斗中消灭了敌41师师部、师直属队及第121旅和特务营，俘敌中将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8月初又在板栗园消灭了敌85师，击毙敌师长谢彬。这样就粉碎了敌人的第2次“围剿”。

这里，有必要说说被俘的敌师长张振汉。张振汉是高级军官，我同他接触与交谈中，知道他早年从军，又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有军事知识又有作战经验，根据党的政策，对他宽待。不久，我们扩大了红军学校，选调有战争经验的干部及优秀战士入学，全校有学员800名，还有个高级班，都是营以上的干部，全班有七八十人。我以兼校长身份请张振汉到红军学校当战术教员，并亲自与高级班学员听他讲课。我这样做，一为使张安心，二为使学员虚心接受正规的军事知识。同时，我们还请了其他有军事技术的几位军官当教员。有人问，打败仗的人怎么教打胜仗的？我认为军事技术没有阶级性，一般战术原则，如行军，组织战斗、协同动作以及利用地形地物等都是军事科学，不管红军白军都要用。至于运用的如何，则取决于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政治目的，以及不同的战略指导思想。打败仗的人还可以从反面来进行教

育，张振汉就举了他自己同红军打仗，以及军阀混战的战例来说明一些原则。我这样做，是从自己见到及自己经历的事学到的。一九二八年二月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打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许克祥三个团，战争之前，双方都使用北伐军的典范令。但宜章之战，我军以一个团打败绝对优势的敌人，歼其大部。使湘南起义的影响，震支中外，既然都是一样的典范令，为

什么一胜一败？那是军队的阶级关系与指挥员素质的不同

（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思想的关系）。一九三一年八月文家市之仗，我纵队（全是新建的农民武装），缴了敌人四挺重机枪，我立即成立重机枪连；但当时农民武装很少有会用机关枪的，我就使用解放过来的敌方下级军官和士兵，

（连长就是敌方的中尉排长）。只十多天，由他们教会了不少工农士兵，打长沙的猴子石之战，该连在战场上就起了作用，不久打吉安也如此。我当时敢于这样干，是一种感性认识。后来从书本上看到十月革命后，列宁不仅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各种专家来搞工业建设，而且还利用旧军官到高级指挥和技术学校当教员，也听到过去苏联的留学生讲过。对我是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1952年林彪曾在怀仁堂军委会议上攻击我军使用旧军官任教。1967年，大野心家江青也叫嚷：“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笑话，常败将军教常胜将军，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还让这些人来当教员”。江青这个不学无术之徒，又极端狂妄，她和林彪的这些谰言，完全是形而上学，根本不懂得革命事业必须善于吸收历史上的优秀文化和一切科学技术成果。我们不杀张振汉，还请他当教员，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长征时，我们带着他走，到了延安，中央决定放他回去。后来参加了抗战。我军解放长沙时，他还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建国后任长沙市政协委员和副市长。有次他来北京，谭家述（原六军团参谋长）请他吃饭，我以老朋友的身份作陪客。我们早已是“一笑涡恩仇”，这时成为净友了。

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后，省委决定，主力向东，转为战略进攻，打到石门、澧州、津市和临澧一带，扩大根据地。那时我们有个很明确的概念，打了胜仗，马上转入进攻，向新区发展，因为新区更便于打土豪，扩兵和筹军饷。同时，新区的群众受国民党残酷压迫，愿意当红军，也好扩兵。省委将领导机关分为前后两摊，前面一摊领导打仗，后面一摊领导地方工作，其中包括红军学校和留守根据地的18师。主力向东发展，后方抓紧建党、建军、建政以及青年、妇女等群众工作，加强根据地内部对敌斗争。这样，前方取得新的胜利，后方也得到巩固和发展。红六军团产生于湘赣苏区，是朱、毛红军在井冈山地区时的地方党和游击队发展起来的，三大任务的光荣传统始终保持。遵义会议后，这个传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建设中，更加发扬了。

红二、六军团连续粉碎敌人两次“围剿”，根据地和红军都扩大了。二、六军团会师时8000人，刚过一年，即到1935年10月，就发展了两倍半，有21000多人。在敌人新的大规模进攻将开始的时候，我们于11月19日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战略转移。

反“围剿”既然胜利了，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呢？

第一、敌人来得多。从10月开始敌人又组织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的规模比前两次更大。第一次“围剿”敌人有6个纵队，四五十个团，第二次“围剿”是80个团，这一次是130个团。敌人认为前两次“围剿”的

失败，是使用杂牌军多及指挥不统一。这次“围剿”，以蒋介石的嫡系、半嫡系为主。如汤恩伯部的 88 师、78 师都调来了；与红军打仗有经验的 26 路军孙连仲 3 个师和樊嵩甫纵队也调来了。蒋介石还派陈诚到宜昌设立行营，统一指挥。在根据地四周不断增加兵力，构筑大量的工事碉堡，形成了更大的包围圈，同时实行更为严密的经济封锁。

第二、地形的限制。湘鄂川黔苏区周围，东有洞庭湖，北有长江，南有沅、澧二水，西北是崇山峻岭，粮食困难。敌人利用山水要隘，建筑有战略作用的碉堡线（纵碉线、横碉线），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守备，形成重重包围、严密封锁、内外隔绝的战略格局，对我大兵团的机动极为不利。

第三、根据地经济、文化落后。本地封建势力独霸一方，割据一地，在大割据中又有若干小割据。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名为统治 13 县，其中若干县又有人割据，甚至有割据三两个区、乡的。有些大地主也有枪，在山顶上占据自然溶洞，他打你容易，你打他困难。他们钻进洞子里，洞口建碉堡，洞里又加上些工事，你打他就更困难。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攻洞口之敌，把辣椒点燃熏烟，用风车吹进洞内，一边熏，一边喊话：“你们出来，我们不杀你们。”这样打开了许多洞子，搞了 1000 多条枪。即便如此，民团地主的小区割据还是不少。

湘西遍地都种鸦片，地主军阀嫌一般收税收不多，就要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亩地要缴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他们从卖鸦片中发大财。由于遍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到湘西，抽鸦片的不只是流氓，很多农民也抽，如果不要，就无兵源。好吧，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抽鸦片。但军队还是要戒烟。开始还定量发鸦片。同时讲清道理，然后逐渐减少烟量，吃点戒烟药，最后以蒸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月就戒了。这项工作是我军卫生部长戴镜华研究出来承办的，解放后他任过军委卫生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1967 年不幸病故。

第四、“左”的社会政策，根据地不巩固。湘西的社会情况有两个特点：一是土地特别集中，地主、富农占人口不到 10%，而占有土地却在 70% 至 80% 以上；二是游民特别多，游民武装也很厉害。湘西自民国以来，出现过许多草莽英雄，如汤子谟、周朝武等。为什么有那么多游民？主要是从清朝末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自然经济崩溃，土地更加集中，人民没饭吃，活不下去，就大批沦为游民、半游民。省委对土地革命是积极的，抓得很紧。根据地中心地区大部分都分配了土地。但那时的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三次“左”倾路线那一套。划阶级成分，地主和富农超过 10%，实际上是把有些富裕中农也给划成富农了（地富比例，各乡村虽不一样，但平均应不到 10%）。分配土地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对富农过重地征收粮食

（40%），这是错误的。还有，对商业征税太多；对游、杂武装、绿林会道门武装没有注意改造他们，至少使他们中立。袁任远对此很有意见。他是湘西慈利人，我军初到湘西，任大庸分区政治委员，奉省委指示费了很大力气去争取游杂武装，来接头的有 1300 多人，还集中了 400 多，带来了好多枪。但是，我们却把他们解除武装，杀掉头头，这就引起游杂武装的敌视，又散为匪。由于过“左”政策没有纠正，就孤立了自己，把许多可以争取或中立的队伍，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在根据地的大半年中，一方面消灭

了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另一方面却产生了许多新的游杂武装，同地主武装结合，一起反对我们，严重影响了地方工作的开展和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及政令的实行。

军队由于流民大量加入，政治工作没有相应地跟上去，土地革命也尚未在更广大的地域深入，影响了部队的巩固，带枪逃跑，甚至有成班逃跑的。如果当时的政策不那么“左”，就不会树敌过多，不会成为在强敌包围下非走不可的因素之一。遵义会议以后，当时全党思想刚刚开始转变，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左”的社会政策的危害，就加重了

自己的困难。这个问题，在长征出发前不久接到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我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才开始有感触，直到延安整风才完全解决。

从前述四个因素来看，根据地不巩固是关键问题，敌人不断增兵，形势当然严重。但如果根据地巩固，加上正确的战略战术，可以打破敌人的进攻。但当时我们还不够这些条件，于是决定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退出苏区之前，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并没有想到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长征到陕北。

第十三章 长 征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从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记得出发前，省委及军委分会在桑植讨论过多次，研究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当时决定到湘黔边，也就是江口、凤凰、石阡、镇远、黄平那一带。我们分析，那里的敌人薄弱，可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为了隐蔽向西突围的战略意图，我们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故意向东南走。这次撤退，我们吸取了红六军团自己行动的教训，只带一、二天的干粮，行李简化，轻装前进，行动灵活自如。

从桑植地区向西，有澧水和沉江两道河流障碍。出发前我们考虑过如何突破敌人这两道封锁线的问题。估计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虽然防守严密，但我突然行动，易于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就不同了，我军一过澧水，敌人便会发现我向南，定要加强沉江的戒备。我们只有快速行动，赶在敌人部署尚未调整完之前，连续突破澧水和沉江。

第一天出发时，我率六军团17师一部以急行军赶到澧水，抢占渡口。我们一天行军120里，当晚就到了澧水边。那天，六军团的主力也走了七、八十里，我们特意选大山中的小路，虽然难走，但好处是避开了敌机的侦察轰炸。晚上在张家界外面的村子住下，做饭吃。1990年我到湘西，看到张家界已成了风景旅游区，当年我们从这里过时，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带还有这样好的风景。

第二天下午四、五点，六军团主力赶到大庸县城东三十里兴隆街地区，黄昏开始抢渡澧水。直到这时，敌机还未发现我们。前卫团先过去了，后续部队乘夜过河。对岸至大庸有敌19师一个团筑碉防守，我们过了河就一直向西打，半夜打到离城不远处，找到了从大庸城南通沉江北岸洞庭溪的大路。第二天清早，我们顺这条路向南走70里宿营，仍没有遇到敌机，真是顺利。二军团主力21日上午开始南渡澧水，这时敌机来了，炸得很厉害，部队有些损失，但很快也都过去了。

22日，我们急行军125里，赶到沉江北岸的洞庭溪，找到几条小民船，过去两个营。这时，敌人的一个营从沅陵来加强洞庭溪的守备。我们正在渡河，看到敌人乘船来了，就在沉江两岸埋伏起来。等他一到，用重机枪朝船上打。敌人做梦也没想到我们这样快就到了沉江，一个营全部缴械。我们在中央苏区时有个口号，叫作“争取廉价的胜利”。这一仗真是“廉价的胜利”，没打几颗子弹，就消灭了敌人一个整营，而且顺利地渡过了沉江。

这次突围行动方向选得好，行军路线也选得好，保密好，称得上是得意之笔，当我站在沉水岸边，看到部队渡江，不禁长叹一声，如释重负。突破澧水和沉江，这意味着战略计划初步实现了。

过沉江后，继续向东南猛进，直到湘中。我们早就知道湘中是富庶的地区，到这里一看，新化、溆浦、锡矿山、辰溪这些县，不仅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文化教育也发达。我们原想从这里过一下，看到这样好的条件就打算停下来，搞块根据地。那时我们都有一种观念，站得稳就站，站不稳就走，随时可站，随时可走。

我们经过的国民党区域，都是新地区，红军以前没有在这里打过土豪，统治阶级没有多少对付我们的经验。筹款捐钱较容易；老百姓因受国民党的压迫，生活痛苦，很多人愿意当兵，我们就在新化、溆浦一带筹款、扩兵。

撤出湘鄂川黔之前，我们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又接到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国际和中央的这些精神，我们认为适合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南渡澧水后，夏曦起草了“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用六军团政治部的名义发出。前面几句是：“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寇……”，末尾两句是“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到新化后，我们大喊“抗日反蒋”的口号。大革命时期夏曦在湖南有影响，利用他的影响，我们天天开大会，作宣传。当时国民党报纸上讲：“夏曦、萧克搭台演说……”夏曦很会做宣传，号召凡是要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群众踊跃参军，只7天就扩大了1000人。王震带了一支队伍去新化东60里的锡矿山，三、四天就扩兵两、三百人。那里是规模不小的矿区，扩的兵多为工人。对于红军来说，能吸收现代产业工人参加，十分重要。我们把这些工人分到各单位，以增加部队的无产阶级成分。

在湘中停了个把星期。国民党樊嵩甫和李觉纵队从北面压来。我们以一部兵力钳制李敌，集中主力打樊敌，但后来情况发生变化，樊敌没打倒，李敌乘虚占了淑浦城，敌人的几个纵队靠到一起，向我围过来。淑浦、新化间地区已不能停留，我们就放弃在湘中立脚的想法，按原定目标向西走。

经淑浦向西，由绥宁、洪江向北渡沅水，继续向北，便进入了湘黔边广大地区。国民党几个师追踪而来，为了在湘黔边站稳，六军团就在晃县和芷江间的便水反击追敌，但战斗打成了消耗战，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在湘黔边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只好放弃。

便水战斗虽打得不理想，但制止了敌人的急追，取得在江口和石阡地区的短时休整，并迎回了在湘鄂川黔苏区担任箝制任务的6军团18师53团及部分地方武装。他们在强敌围攻下，掩护主力胜利转移，就由师长张振坤（抗日战争时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率领，从苏区西面突围，采取迂回曲折、避实击虚的战术，突破敌人重重包围，到江口与红军主力会合，根据地虽然丧失，但保存了部队。

我们在石阡、江口及以南地区稍事休整，即经余庆、瓮安、平越、边战斗边向西走，进至贵阳北60里札佐镇，歼敌两个营。敌人见我逼贵阳，有北渡乌江之势，急调堵我之黔敌和追我之湘敌驰援贵阳，郭汝栋和樊嵩甫纵队则转向遵义地区，郝梦龄部则沿乌江北岸堵截。我即经修文西渡鸭池河，进入贵州西部的黔西、大定（今为大方）、毕节等地区。

离开湘黔边时，我们就打算在贵州省的西部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时军委也来电报，指示我们“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群众地形均可暂作根据地”。到黔、大、毕后，我率红6军团17师去遵义西之打鼓新场（现为金沙县）游击，钳制贵阳方向敌人向西。这时，敌万耀煌部13师追来，占了大定。我即率部回师大定，刚到将军山，正遇大定敌人先头部队7个连向毕节挺进，敌处在我之侧面及正前，我军立即将敌包围，仅1个半小时就将敌全部消灭，制止了敌渡鸭池河后向我急追的不利形势。

战斗结束后，我登上将军山，看到这座山脉横跨大定与毕节间10余里，如果控制住将军山，就可形成建立以毕节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的东面屏障。我立即决定控制将军山。在山上做工事，我和大家一道在茅篷中露营，严守阵地。几天后，敌人两路向我仰攻。我令部队隐藏在工事内，不发出任何声响，等敌人逼近后，手榴弹一甩，一个反冲锋，敌人溃退，我立即追击到敌主力展开地带，一下子就缴到了百十支步枪，万余发子弹，得到补充，敌人

短时间不敢再来。

利用山地这个屏障，两军团主力与强大追敌周旋，并对驻威宁之滇军，严加警戒。同时积极开展地方工作，使后方机关及伤病员得到休整。近 20 天，补充新兵 5000 人。

在毕节，当地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周素园先生与红军交了朋友。周素园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在贵阳办报，后来又在北洋政府供职，在袁祖铭的云贵川总司令部当过秘书长。红军快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他走，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红军到后，在他家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翻开一看，圈圈点点。政工人员立即把这种情况报告王震和夏曦。他们马上找他，问过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他说：“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10 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王震、夏曦告诉他说：“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好，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他说：“赞成，完全赞成。”我们就请他出来，当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时间很短便发展到 1000 余人枪。

为了在黔大毕站住脚，我们请周素园给驻威宁的云南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因为他和龙云、孙渡等上层人物都认识。他把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告知孙渡，并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道灭虢’，史有明鉴”。

由于龙云当时的处境及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 20 天，休整补充。后来我们从乌蒙山向宣威进军时，也以军队的名义给龙云、孙渡写信，晓以利害，并提出缔结抗日停战协定。虽然估计不会有什么效果，但至少可以使龙云增加对蒋军人滇的戒心，加深其矛盾。后来事实证明是如此。

敌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郭汝栋 4 个纵队，共 7 个师 1 个旅，很快向毕节地区进犯，其中有 4 个师进攻将军山。地方工作一时也不能广泛和深入开展，我认为将军山不能控制了，遂于 1936 年 2 月中旬撤退，旋即退出毕节城，进入乌蒙山区。敌又以 10 个师继续围攻，长江北岸，有大批川军防堵。我军就从昭通、威宁之间，透过滇军孙渡纵队防线，向南直趋滇东，占领宣威及贵州之盘县，进至南北盘江之间。这时，我军兵员充实（不减于从湘鄂川黔出发时的人数），士气旺盛。南北盘江及牛栏江东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条件都比较有利。军委分会决定在这一带展开创立游击根据地的活动。这是我们长征中第三次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尝试。

从乌蒙山地区向南，红二军团到达盘县，红六军团进入宣威。我们在宣威城北和追敌打了一仗，但只打个平手，然后进到宣威到盘县间的亦资孔休整。这时，接到总司令部的来电，要我们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贺、任、关通知我和王震、张子意立即到盘县开会，研究行动方向。

我们到盘县后，任粥时主持开会。记得总司令部来了两次电报，第一次是 3 月 23 日，电报中说：“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 3 月水

涨前设法渡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电报中还说：“如你军并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

本来我们是想在滇黔边站住脚的，接到总部北渡金沙江的指示后（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闹分裂的情况，电报署名是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曾在3月29日向总部询问，要我们北进，是从战略上考虑必须渡江会师北进，还是怕一四方面军北进后，二、六军团在长江南岸陷于孤立，或是军委估计我们现在处境困难而要我们北上。3月30日，总部第二次来电，还是说最好北渡金沙江与他们会合一同北进，如条件困难也可以在滇黔广大地区活动。电报的最后说：“究应如何请按实情决定，不可受拘束。”

我们认真研究了总司令部的指示，并对当时战争态势和全国形势进行分析。虽然查明来包围滇黔边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少了，但还在50团以上，时间久了，敌情也可能变化，能否在这地区站住，是未知数。从全国形势看，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向华北进逼，全国人民特别是华北青年学生，群情激奋，要求抗日。现在总部要我们北进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可见全国革命大势转向了北方，应执行总部的指示。盘县这次会议，对二、四方面会师甘孜起了决定作用。对尔后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也有重大意义。

我们在南北盘江建立根据地的架势，敌人也看出来了，就布置新的围攻。但敌人长途与我作战，有的被歼，还有死、伤、病、逃，兵员不足，加上北方和江淮一带出来的兵，新到这层峦叠嶂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水土不服，士气不高，行动缓慢，对我们威胁不大。我们就决定经滇中到金沙江。这个突然向西的战略转移，把敌人新的围攻部署又打乱了。

当我们进到昆明北面百余里的普渡河时，滇军6个团赶来堵截。6军团与敌展开激战，双方互相攻击，都攻不动。将近黄昏，我认为当前的敌人不能很快消灭，就令部队撤下来，南行到2军团指挥部，见到贺、任、关，我们立即商量行动方向。我说，敌人主力在普渡河堵我们，昆明只剩4个团，兵力不足，我们进到昆明附近，再向西，就把滇军主力甩到后面了。他们赞同我的意见。

我们立即从普渡河向南，转向昆明附近，摆出一付“攻其所必救”的架势，然后转向昆明以西。在昆明北30里处的羊街，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们到那里时，天已黑了，在一间房子里发现有很多伤兵，开始以为是自己人，就挤在一起住。但后来发现，那些伤兵不是红军，而是在普渡河与我们作战时负伤的国民党兵。我们的医务人员以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为他们治伤，并热情地宣传红军的宗旨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经过我们的宣传，都表示友好。有些人还说，身体好了，还愿当红军。半天前，我们还是战场上的对手，这时已尽释前嫌了。这件事也说明了红军的政治工作深入人心。

我们从昆明附近转向西面，就把堵截的滇军主力甩到后面了。从此，虽然有追兵，但行动就主动了。

由于云南敌人对我们有个错误的判断，说红军没有炮，打不了碉堡、城市。在我军接近滇西北的时候，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修理城垣，把各县重要物资运存于碉堡和城市，由民团守备。我们分两路前进，先头部队猛冲猛打，攻占禄丰、楚雄、盐兴、姚安、祥云、宾川、鹤庆、丽江等城市和无数碉堡，吃的穿的，无所不有。真是“因粮于敌”，士气旺盛。从盘县向西北前进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沙江畔的丽江市和石鼓圩等地，并很快地

北渡金沙江。

红二、六军团在滇东和昆明地区的大回旋战，是敌我双方的战略较量，我军的战略方针是西去，然后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敌人的战略方针则是千方百计堵截我军。较量的结果，是我军的战略方针的胜利。这一大的军事行动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由盘县向西，横越云南中部，直至昆明北之普渡河，行程近500华里。入滇后，摆脱了蒋介石追堵我军之主力，但到普渡河与滇军堵截部队鏖战不利，我即采取避强击弱、避实击虚的灵活战术，不同敌人主力恋战，自行退却，从战场后面10余里处转向南面，转到昆明城北30里之羊街。

第二阶段是从羊街向西。我主力进到昆明附近，利用云南统治阶级要控制云南省会昆明的心理，在夜间以小部队佯攻昆明，示之以“攻其所必救”之形，令其感到昆明危急。昆明濒危，对云南统治阶级政治上、军事上都会有大的影响，并影响他们的个人利益（昆明附近有些富翁把家属和家私送到昆明保险），滇敌定会以一部主力固守城防。守城的部队就不能机动；野战部队也只能尾随我军，这就有利于我军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

第三阶段是攻占禄丰、牟定、大姚、姚安、楚雄、祥云、宾川、鹤庆广大地区，进到金沙江畔之丽江、石鼓圩一带。这阶段行动比较顺利。前面除国民党各县民团防守外，没有大敌堵截，我军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愈战愈勇。后面虽有强敌追击，但被我后卫部队和路障迟滞，我们避免了在白色区域与追敌决战，我顺利到达预定的战略位置。这种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利于我制敌而不为敌所制。

红二、六军团分别从丽江和石鼓、巨甸渡过金沙江，蒋介石带着龙云，乘飞机在金沙江南的鹤庆、宾川、丽江一带上空盘旋，无可奈何。云南军队追到江边，也只好望江兴叹。记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李伯钊等率剧团来部队演了一出戏，叫《破草鞋》（一、四方面军会合时黄镇编剧），说敌人追到金沙江边只拣了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就收兵了。这是一出有政治意义的生动的讽刺剧，说敌人一无所得，红军胜利北上了。

过金沙江后，开始翻大雪山。总司令部早就来电报，要

我们带衣服、辣椒和酒。那时已是4月底了，天气很热。我

们也不懂，有的部队把棉衣、毛衣都丢掉了。上午上山时，在原始森林中走。那些树又高，又粗，又密，我从未见过那么高、那么多的树。走着走着。地上都是雪了，气温也骤然下降。我们定了条原则，决不能在山上过夜。那天走

了十几个小时，上下150华里。

翻过雪山，于4月30日到达藏民区中甸。接着，分两纵队向甘孜前进。6军团在瓮水、那坡又翻了两座大雪山后，进至稻城。向理化前进。6月3日，在理化以南之甲洼与总司令部派来接我们的红32军会合。该军由军长罗炳辉，政委李干辉率领，总政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还派刘型同志和文工团来迎接。

我们虽然同四方面军初次见面，但亲如兄弟，一种阶级的情感，体现在双方容颜举止和交往之中。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虽去前方，对两军的团结非常关心，他在会师之前恳切地对其他领导人说：“去年我们会师没有搞好，现在二方面军来了，一定要搞好啊”。四方面军的同志很体会徐帅的指示，当我们到蒲玉隆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四方面军立即派马数十匹接他们

回来。又给我们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

在理化南之甲洼，6军团与远道而来迎接我们的32军会合，我和军团政委王震、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等一起同何长工、罗炳辉、刘型等同志见了面。他们原来都是中央苏区的，有的还一起打过仗。老战友见面，话题很多，他们说得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大家心情沉重，从井冈山斗争到转战赣南、闽西，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经过了多少艰难苦战，才开创出中央苏区的大好局面，现在不但根据地丢了，中央红军也只剩下万把人。大家对造成损失的领导者有怨愤情绪。我联想到在湘赣苏区时，17师奉命北上，苦战数月，结果劳而无功；第五次反“围剿”，那些领导者要我们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把湘赣苏区拼完了，我们不得不作战略转移；6军团西征，又指示我们“搬家”；沿途我们不断向中央报告多带行李辎重的不利及损失情况，但中央红军出来，搬家更为厉害，损失也更大。大家都认为这些领导人博古、李德等太主观，对革命不负责任。

在闲谈中，他们又说起中央红军北上没有告诉总司令、总政委就走了，关系没搞好都有责任；还说到张国焘另立中央，但不久前又自己撤销的情况。我对这些问题过去没有听说过，没有插话。几天后，在蒲玉隆见到了许多年不见的朱德总司令，我们谈起了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谈到中央撤换左倾错误领导博古、李德，确定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的事情，都很高兴；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感到愤慨。朱总司令还说，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是大错误，这个人有野心，但是，今后还要对他注意争取、团结，促使他一起北上抗日云云。

7月2日，我们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大会师。5日，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将32军编入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我为副总指挥。从此，我们就用红二方面军的番号了。

在我们到达甘孜前，徐向前、李先念等已率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出发北上了。11日，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也由甘孜的东谷出发，向哈达铺地区前进。从甘孜向北，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地。草地人烟稀少，即使有些村落，也没有多少粮食。当地群众以畜牧业为生，反动土司常常把牛羊牵走。四方面军走在前面，对后面虽有照顾，但他们自己也很困难。我们虽然努力准备粮食，常常不能完成计划。部队因缺粮疲劳，体力下降。我们的口号是：“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大家用野菜代粮，许多人牺牲在草地。

人们通常的印象，以为草地行军，没有敌情顾虑了。其实不然，同反动骑兵作斗争，也不是小问题。四方面军有经验，组织了骑兵师，各军、师也有小的骑兵部队。我们初到甘孜是没有认识的。有一天到总司令部开会，总部的领导人向我们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指定刘伯承教我们打骑兵的战术。伯承同志来二方面军，向干部讲述了打骑兵及草地行军注意事项，我这是第一次直接听他传授丰富的军事学识和作战经验，直到现在仍有深刻印象。由于有对抗骑兵的精神和战术教育，在遭到骑兵几次袭扰中，虽然不能消灭他们，但也没有吃亏。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36年9月1日走出草地，到达了岷县的哈达铺。

这时，红军三大主力都进至陕甘地区。蒋介石一面准备把胡宗南部由湖

南迅速调到陕甘；一面命令位于定西、陕西和武山地区的第37军毛炳文部和位于天水、秦安和武都地区的第3军王均部，阻止红军会合；同时，强迫东北军和西北军执行他的“剿共”计划，进攻红军。

中央军委于9月拟定了一个战略计划，要求：一方面军西出并南下，占领西兰大道以北海原、固原地区；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州、武山等地

区，继续向东向北，会同一方面军向定西、陕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毛炳文部；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两省西南部，配合一、四方面军消灭毛炳文部，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并准备打击和消灭胡宗南部，进而逼蒋妥协，促进全国的抗日战争。

但由于张国焘按兵不动，错过战机，毛炳文部没能消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也已调到了西北。中央军委于9月18

日提出了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的作战方案，要求二方面军在甘南和陕西积极活动，箝制和侧击胡宗南部队，先敌北进，占领静宁、会宁、隆德、定西，以配合控制西兰大道的四方面军和南下的一方面军，夹击胡宗南。

9月间，二方面军的部队进到甘南岷州一带。这时，我

因肠胃炎，在后方休息。记得有一天，接朱德总司令电话，

叫我到红军总司令部去一趟（总司令部设在岷州乡村中）。赶到后，总司令对我说：“西北局决定要打胡宗南，以便同一方面军会合。现在31军军长王树声病了，你到31军去当军长，打胡宗南。”

我是革命军人，习惯了服从命令，更何况是朱总司令亲自交代的，所去的部队是红军部队又是为了打胡宗南，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我从岷州前往漳县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报到，同行的还有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及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到漳县后，见到徐向前，他欢迎我来工作。这时张国焘也从总部来到前方，他一来就以家长方式命令部队自通渭、渭源、漳县地区西去，准备渡黄河，经青海、西宁大道翻祁连山，进入甘肃西部。朱德总司令从后方赶到漳县之三十里铺，建议召开西北局会议，坚持北上，但没能使张国焘转变。部队继续西进洮州。干部战士听说还要过草地，极为不满。如9军军长孙玉清就愤愤地说：“天天向太阳落去的地方走！”不少人甚至离队，消极抵抗。

到洮州又开西北局会议，朱德说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向北进的理由。徐向前也说：“鄂豫皖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陈昌浩、傅钟、李卓然和我，都同意朱总的意见，一致要求北进。这样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回头。但部队拉来拉去耽搁了时间，以致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靠拢了。我这个军长，也因部队行动的辗转变化，直到10月20日，才在通渭赶到31军军部任职。

在此之前，一、四方面军于10月8日在会宁会师。红二方面军从甘南艰苦奋斗，夺路前进，渡过渭河，通过西

兰大道，于10月22日也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有名的全国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宁的大会合。至此，我们完成了长征的伟大任务。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有着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高度地保存了有生力量。长征途中，我们虽然消耗很大，但补充也多。从湘西出发时是18000人；

过金沙江时，保持了出发的人数；出草地后还有 10000 人以上。之所以能这样，我认为我们的战略思想明确。我当红军以来，经过了三次长途行军，对这种行军如何保持有生力量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就是中途要找适当的地方休整，发动群众，扩大红军，训练部队，治疗伤病员，筹集粮款等等。从湘赣苏区出发时，弼时同志就提出要建立游击点和游击根据地，我赞成这个观点。这样，部队就不会连续行军，可以得到休息和补充。长征途中，只要到了有粮食或其他条件较好的地区，我们就停下来，布置大战。敌人看到我们停下来要打，也会停住观察一下，调集军队，调整部署，总得三天五天，十天八天，我们就趁机休息，做群众工作，争取主动，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利用这个办法，我们一路虽打了许多恶战，减员不少，但都能及时得到休整与补充，有效地保持了有生力量。

第二，坚持正确的军事方针。早在二、六军团会合时，我们就从自己的军事行动的体验中，得到了退出苏区和搬家式转移的痛苦教训，对过去那套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已无兴趣了。那种打法，是近乎冷兵器时代兵对兵，将对将，“下战书”和先报姓名的愚蠢打法。孙子在 2500 年前就提出“毋要正正之旗，毋击堂堂之阵”的观点，“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是不懂中国优良的军事传统的。当时，我们虽然还不能从理论上批评它，但知道那种打法是不行的。在战略转移中，我们坚持了游击战、运动战的军事方针。我们由湘鄂川黔去贵州，不是径直向西，而是声东击西，先向东南东渡过澧水、沉水后，进至湘中，然后向西。敌兵虽多，处于优势，也抓不住我们。在贵州突然进至札佐，威胁贵阳。在普渡河，突然冲到昆明城外 30 里地，这些地区都是敌人的战略要地。可以影响敌方的战略行动。常常采取曲线行军，穿插于诸路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弄得敌人扑朔迷离，疲于奔命；有时以急速的行动，猛烈的动作，震撼敌人战略要害，造成其临时应付、仓皇调动的无计划行动，我则易于抓其弱点，摆脱强大敌人。记得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后我到延安，朱德总司令对我们说：“二、六军团集游击战、运动战之大战”。我认为这是对二方面军中肯的评价和鼓励。

第三，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了湘、黔、滇、川、康、甘、陕等省，前后攻占了 30 多座县城，一路上，我们广泛宣传党及红军的政治主张，团结、教育、争取了包括开明绅士周素园、被俘国民党中将张振汉等在内的各种力量，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尤其是经过苗、瑶、回、彝、纳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大力宣传民族团结、民族平等，严格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红军是最不怕艰难困苦、最富于牺牲精神，为人民谋利益的武装，共产党是忠实于自己的主义及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政党。人民支援红军，这就使得我们在广大地区（包括大部分白色区域）的活动，都能像鱼在大海中一样自如地游动。

第四，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二、六军团在会师之前的组建时期，领导人和主要干部还有许多人就具有为实现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坚强意志。为了这种理想，就不怕任何艰难困苦，敢于牺牲奋斗。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很快形成了以任弼时为首的坚强领导集体，强调党的领导和建设，重视政治工作，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同时，不间断地进行党的方针、路线、形势、任务教育和党的统一战线以及官兵一致、亲密团结的教育。战斗和行军中进行了改造俘虏与教育新兵、实施不间断的

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等工作。战斗愈激烈，环境愈艰苦，政治工作就愈深入、活跃，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愈坚强有力。即便只有一两天休整时间，甚至在行军大休息中，也不忽视宣传和组织群众工作，及时分配没收的财物，有群众在一起，军队就不孤立，士气就旺盛。真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因而，长征途中，强大的敌人没能搞垮我们，人间罕见的自然灾害和艰难困苦没能压倒我们，主要原因就是主要领导人和许多革命干部具有革命的理想，为了这种理想的实现，坚持了党的正确领导，发挥了政治工作的群众性、及时性的强大威力。一句话，我们是党领导的军队，党指挥的军队，为党的事业而战斗的军队。

第十四章出发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两个多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我自红31军驻地甘肃镇原县前往出席。会议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而斗争。

会议首先由洛甫（张闻天）致开幕词。接着，与会代表选举了毛泽东、洛甫、朱德、博古、张国焘、刘少奇、林伯渠、凯丰、杨尚昆、聂荣臻等19人为大会主席团，领导大会工作。我也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在第一阶段由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然后各代表团分组讨论，讨论后由毛泽东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会议的第二阶段，由博古作《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然后各代表团分组讨论。最后，由林伯渠致闭幕词，会议结束。

这次会议批准了1935年以来党的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新任务。通过这次会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增强了团结，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会议一结束，我就赶回部队。先从延安乘卡车到云阳镇，这里当时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与组成不久的援西军指挥机关所在地（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然后再骑马回到部队。我向军政委郭述申介绍了苏区代表会议的精神，并立即决定对部队进行传达，积极准备抗战。当时部队中要求抗日的气氛十分强烈。我们把指战员的抗战热情，引导到战前的主要准备工作——练兵。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全国同胞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7月9日，由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左权、徐海东及我率全体红军将士通电南京政府，请缨杀敌。彭总要求红军加紧练武，把刺杀、投弹、射击列为主要的项目，准备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发挥我们的特长——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来打击敌人。

这时，中央派陈质到我部来，他是北伐军和红军老指挥员，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准备在部队改编后由他任旅长。为了加强对部队训练的领导和激发练兵热情，我们两个老兵一起拟定训练计划，并用一天时间，专门集中营以上干部进行了一次射击训练，从瞄准、击发到跪姿、卧姿、立姿射击的基本要领，一一练习。最后进行实弹射击，由我和陈质带头，记得陈赓三发子弹打了28环，我打了27环。

两个老兵的射击成绩，虽不是十全十美（陈比我好），但起了带头作用。我们后来定的军政课目，大体都能完成。从此，只要有点时间，各级干部都利用来练兵。部队掀起学习热潮，都想学好本领，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当时称日本鬼子）。我也认真学习，想搞好一点。

随着国共合作的形成，我们在行军中经过国民党统治区，同国民党地方官员和军队的联系与接触也多了。先是为了在西兰大道上迎接西路军溃散的归队人员，刘伯承让我与当时任国民党平凉专员的胡公冕取得联系。平凉位于西兰大道中间，与陕西、宁夏毗邻，由于胡公冕的协助，使西路军归队人员得到了些方便。

我与胡公冕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相识。当时，他随北伐军打到江苏。1927年春蒋介石叛变革命，他脱离蒋介石跑到武汉来，参加反蒋运动。

这次在平凉我与他通过几次电话，除了叙旧、讲国共合作相互友好的话外，主要请他协助解决部队吃粮问题。他说我们搞粮食搞得太厉害了。我说：“我们没有人发饷，只能向地方要，希望给予帮助。”由于他的合作，我们筹粮筹款能较顺利进行。

胡公冕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都与我们有过合作，解放后不久，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

我们在开展练兵的过程中，国民党还派了一个视察组来。组长萧致平，井冈山时期我们就曾交过手。红四军下井冈山后，他率独立15旅来追击。我们在大柏地反击，将他们大部分歼灭，这次他来，身份不同，我们友好接待。我向他们介绍了我军练兵的情况。视察组也说了些要团结抗战的话。

8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各部到陕西三原地区集结待命。8月7日，31军和整个援西军一起，在刘伯承司令员的率领下，从甘肃镇原出发，途经甘肃的西峰镇、宁县，陕西省的旬邑、淳化等地，于8月下旬到达三原城西的石桥镇地区。

在行军中，有一天，到淳化城宿营。陈赓要我给他一张名片。我问干什么，他说你别管了。他拿到我的名片就送给县政府，还笑着对我说：“今晚请你的客。”我认为他开玩笑，一笑置之。不一会儿，县太爷来了，对我们倍加慰问。陈赓说：“我们上前线抗战，对地方有点麻烦。”于是，他提了些正当要求，县长都答应办，还热情地请我们吃晚饭。我没有想到西安事变后印的名片，还能用来办事。而且有人请我们吃饭。

在三原待命整编期间，我们一方面抓紧各级干部的配备，另一方面加强对干部的教育训练。记得当时我们曾召集全军的参谋长、参谋和连长上课。由我讲授行军和防空知识，陈展讲授铁路运输及渡河知识。在此期间，刘怕承和张浩还向我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向全国民众提出的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出了《关于目前形势及党的任务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应是：独立自主地山地游击战；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创造根据地。毛泽东还指出，在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这次会议正确地指导了我党我军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8月底，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与国民党谈判的结果，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指挥部（9月11日改为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总部或集总），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和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辖115师、120师、129师。改编后的这三个师，主力就是长征时的一、二、四方面军。

1937年9月初，军委命令，我改任120师副师长。红31军改编为129师386旅，陈赓任旅长。这时，日军向华北战场大举增兵，华北战局危急。八路军不待改编就绪，就开始相继誓师出征。我在八路军总部住了两天，同彭德怀一起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彭总去西安，是准备和周恩来来到山西与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商八路军参战事宜；我是准备经西安到太原等待120师的到来，周恩来副主席让我一起去太原，也做点统一战线工作。

在西安住了两天，9月3日晚，我就跟周、彭及林彪、聂荣臻、徐向前以及南汉宸、程子华等一行10多人，乘坐西安行营派出的专列前往太原。火车经风陵渡进入山西，5日到太原。这时，刘少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真（北方局组织部长）及做秘密工作的杨尚昆、朱瑞，还有薄一波、李昌（秘密党员）等均在太原，不久，朱德也来了。

一到太原，周恩来就去前方同阎锡山会面，又同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及各方面的要人谈话，并出席许多会议，宣传抗日救国。知名爱国人士续范亭、杜仲远等不断来找他，工作十分繁忙。我们根据周恩来的安排，或分头进行活动，或与他一起参加一些活动。当时，平津失陷，中共华北党组织动员了大批党员和爱国学生到山西参加抗战，山西的救亡运动更加高涨，一时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心。八路军过了黄河，要从太原上前线，老百姓对我们期望很大。

在太原期间，有两次活动我一直印象很深。

一次是参加太原的一个万人群众大会，周恩来让我出席，并代表八路军讲话。在大会上，当主席介绍八路军代表时，群众热烈欢迎。我在讲话中说，我们八路军正向前线开动，我们上前线是不会退回来的！会场掌声齐鸣，欢声雷动。因为这时国民党军队先后从平、津、南口败退下来，我讲八路军是不会退回来的，群众怎么不激动呢！我有什么把握这样讲呢？第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全体官兵都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救国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第二，我们有长期革命战争经验，后来总结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我们敢于也能够在敌后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革命根据地。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在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河南、安徽、四川等地，就是这么干起来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来打我们，我们也有在敌占区发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决心和本事。我们不但后退，还要前进，打到鸭绿江边呢。这是我们八路军当时的气魄；第三，有统一战线这个早已证明的法宝。我们党有与资产阶级和其他阶层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和各个阶层。因此，我在讲话中充满了坚定和自信。

另一次是去成城中学。这个学校的校长侯如墉，是个秘密共产党员，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全校师生抗战热情很高。我去学校看望他们，并同10多名师生进行了交谈。青年们抗日救亡的热情，令我感动不已。后来，侯如墉校长把全校师生组织起来，同我们联系。太原失守，这个学校的师生又自动武装起来，组成革命游击队，转移到晋西北，同八路军到敌后打游击。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堪称在民族危亡中投笔从戎的榜样。我曾为此写下了《成城中学赞》的诗句：

班超投笔古今名，
集体从戎更典型。
虎视晋绥寒敌胆，
成城诚不负成城。

在太原的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与南汉宸等根据中央的指示，经过与阎锡山谈判，商定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第二战区行营直接指挥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下设各级战动会，以发动民众，组织游击战争为主要任务，其工作纲领由中

共拟出。这是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时期产生的统一战线组织。日本侵略者要灭亡中国，中国人民不愿当亡国奴，加上山西当时处于抗日前线，虽然阎锡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日本进攻中国，尤其是进攻山西，他是反对的。山西是阎锡山长期割据的地方，也是他的家乡，他对蒋介石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自己决策。而中国共产党在日本进攻的时候，认为山西在华北游击战争中具有决定作用，并以山西为中心，部署绥、冀、察游击战争。这时利用“战地”这个有动员性的口号及第二战区这个合法名义，成立一个共同的组织，双方都能接受。战总动会还将此前阎锡山的“守土抗战”口号略加改造，提出“保卫山西”。日本打来了，我们提出保卫山西，是最好的动员群众的口号，也是山西统治阶级能接受的口号。

战总动会以著名的爱国将军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南汉宸任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我过去不认识续范亭，1935年从白色区域的报纸上看到，他由于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堕落和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激愤得曾在南京中山陵前自杀，幸而遇救，继续为抗日救国奔波。他敢于以鲜血来抗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令人

十分钦佩和崇敬，感到在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里也有这种热血爱国人士，对我们是个鼓舞。在太原我初次见到他，他40多岁，身材颀长，面容瘦削，垂直的鼻梁和宽厚的嘴唇，给人的印象是坚毅、深沉。后来在晋西北，我们经常见面，虽然他当时还不是党员，但我们始终以一个革命家来尊敬这位爱国将军。

南汉宸的年龄与周恩来相近，也是这次来太原的火车上第一次见面的。我知道他是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是个经验丰富的职业革命家。因统战工作关系，周对这位秘密党员用中国的传统称呼“南先生”，我们也跟着这样称呼。

程子华，我们早就认识，这次又见面了，自然感到很亲切。他是早期的黄埔生，老红军，与徐海东一起率红25军最先长征到陕北，他担任战总会的武装部长期间，我和120师的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等，常同他一起商量问题。在太原住了约10天左右，贺龙、关向应等率120师经太原开往晋西北前线，我即随部队行动了。

自从长征出草地不久，我奉朱德总司令面谕调任31军军长，就离开了贺龙、关向应等。这次，我被任命为120师副师长，贺龙为师长、关向应为政委，我们再度共事。别后重逢，感到亲切。120师的其他领导人，如周士第、甘泗淇、陈希云、赵熔等，也都是老同事，部队大部分高上级干部我也熟悉。120师是由红二、六军团和陕北红27军、28军，独立第1师、第2师、赤水警卫营及总部特务团一部改编的。下辖358旅和359旅及教导团、特务营、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全师共14000多人。除一个团及师直属的5个营在陕北担任河防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外，主力共8000多人，全部东渡黄河，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

中央决定八路军各师都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加强党的领导。120师军政委员会由贺龙、关向应、我及甘泗淇、王震5人组成，贺龙为书记。根据洛川会议精神，我们到华北抗战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

配合友军作战和保存与扩大自己；争取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部队经太原开往宁武、神池。这时，日军3个师沿平绥路东段分三路向南进攻，并已先后占领大同、广灵、蔚县。平绥路东线国民党军纷纷向南撤退，战线已南移到察南和晋北。中央军委判断，进攻华北的日军。企图夺取华北5省。据此，军委认为过去决定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建游击根据地的计划，须适当变更部署，要求120师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9月下旬，师军政委员会决定，部队分散到晋西北各县发动群众，建立晋西北根据地，并向大同、绥远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在敌后创立大块游击根据地。但部队刚分散到神池、五寨、岢岚、五台不久，敌人对太原的进攻就开始了。10月10日，日军逼近忻口，准备夺取太原。

位于太原与忻县之间的忻口，是晋北通向太原的重要通道，也是保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国民党军为保卫太原，在这里集结重兵，组织忻口会战。参加会战的有国民党中央军和阎锡山的部队，八路军配合这次作战。我师主力配合其右集团，由国民党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指挥。我们曾派358旅716团团长沙时轮率一个营，赶赴日寇向南进攻的重兵集结和机动位置大同附近，在雁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袭扰并迟滞敌人。我师主力则位于南进之敌侧面，发动游击战的战略进攻和多次战术进攻，伏击、侧击敌人，阻止日军前进。全师各部队先后收复了宁武、阳方口、平鲁、井坪等城镇，并三度占领雁门关，常常切断南下进攻忻口之日军的后方主要运输线，给日军的进攻造成很大困难。同时，在忻口正面防御的国民党军广大官兵，也进行了坚决抵抗，使忻口会战坚持了20多天。但是，由于日军沿正太路西进时，娘子关地区的国民党军抵抗不力，

日军遂进占寿阳、榆次，防守忻口一线的国民党军侧后受到威胁，遂向晋西南撤退，1月8日太原失陷。

敌人占领太原后，八路军是真的“不会退回来”。120师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继续进行敌后游击战争，创建和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这里，西凭黄河，背靠陕甘宁老根据地；东与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相接；北可威胁直至控制平绥路和长城要塞，群山起伏，山河交错，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及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在太原失陷后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用以捍卫全国，钳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这时期，刘少奇也在报刊上撰文，说华北已进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并说中国几十万正规军不能抵御日本军队的侵入，但抗日游击战争如果发动起来，就可以战胜日本侵略军。是年秋冬之间，120师在晋西北分兵进行全面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在“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及“战总动会”的配合下，广泛发动群众，使地方政权与人民武装迅速建立起来。这时，除宋（时轮）支队继续在雁北地区外，由关向应率师政治部大部和教导团700余人，

组成工作团，分赴晋西北各县；同时，358旅在忻县至太原以西、汾离公路以北地区展开；359旅在雁门关、崞县、忻县以西地区展开，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恢复和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游击队和抗战团体。不久，根据地内建立了以赵林为书记、罗贵波为副书记的晋西北区党委，统一领导晋西北及绥远地区党及地方工作。

太原失陷后，第二战区“战总动会”也来到晋西北。那时，谁都知道，八路军120师原来是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些事不便于出面，就由“战总动会”这个统一战线组织来出面。我师把师教导团的近千名干部，分散到各级“战动会”或国民党地方政权中去做工作，各旅、各团也派出干部，帮助地方工作。由于“战动会”中的共产党员南汉宸、程子华等善于运用统一战线形式发动群众，团结各阶级、阶层，就有利于地方党及地方工作的建立。晋西北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了。

我在晋西北工作初期，看到晋西北地区广大而党组织不强，除与当地党的领导同志及总会内的党员多联系外，还与当地国民党长官交朋友。如与晋西北专员公署专员张隽轩既有工作交往，还常谈国共关系和抗战大局。他也邀我去给干部讲游击战争。我知道他是山西当权派杨爱源的外甥，也曾经和我们的秘密工作有联系，就去讲了几次。我在讲演时，各界都有人来参加听讲。当时讲的题目是“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问题”。我用红军“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十六字诀”等游击战争的经验，说明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可以把敌人打败、困死。我说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我率5个连，与根据地的群众武装密切配合，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在国民党中央军一个3旅6团编制的师（李抱冰师）进占东固时，我们将敌团团围住，内外隔绝。逼迫其不得不自己撤退，说明只要截断日本侵略军的后勤供应，他们就没有办法。日本军队到中国来，对后勤的依赖更强，人吃罐头，马带草饼，只要我们持久地坚持游击战争，敌人就难以坚持下去。

当时阎锡山的骑兵军驻在静乐一带，我们注意团结他们，有时还主动帮助他们补充兵员。一次我去骑兵军，军长赵承绶集合军官让我给他们讲话，这就给我在他们军官中进行宣传的一次合法机会。我讲了要团结御侮，共同抗战，赵承绶自己也在听讲。还有一次，贺龙、南汉宸和我一起到骑兵军军部，商请赵承绶出兵参战，并让他担任作战指挥，赵承绶谦辞说，还是由你们指挥，我们配合作战，赵承绶只能如此，因为北伐战争和红军战争有名的英雄贺龙就在他面前。

又如傅作义的部队，从前线退下来后，减员不少，我们在临县动员了3500新兵都补充他们。他们过去招兵买马、招降纳叛那套办法，在军阀混战中是可以的，但要发动广大群众打日本，就要战动总会、牺盟会和我们的民运部帮助了，对他们做不利于抗战的事，我们也从多种渠道进行制约。比如赵承绶骑兵军的政治部主任宋震环（后改名宋日昌，解放后在上海工作），是中共党员，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山西同乡关系，从各方面影响赵。我们有时也公开同他谈判，减少其消极方面的影响。

通过我们的积极努力，到1937年底，晋西北根据地县以下的共产党组织都建立起来了，还普遍成立了工、农、青、妇、儿童等群众组织。部队也有很大的发展，120师由上前线时的3个团发展到6个团，由8000余人发展到20000多人；游击队和脱产民兵发展到10000多人。全师半年多的艰苦奋

斗，为在晋西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8年2月下旬，日军的黑田旅团，配属炮兵和骑兵、工兵，加上伪兵共10000多人，向晋西北大举进攻。敌人分为三路：一路为千田联队，由朔县出动，进占宁武、神池后，一股向西，进占保德城；一股南进，向五寨、岢岚攻击；另一路为竹内联队，由井坪镇出动，先后占领偏关、河曲；第三路为伪蒙军李守信部约3000余人，由绥远南犯，占领清水河后，进至偏关与日军会合。同时，在太（原）汾（阳）公路之敌，亦向西犯，占离石后，进至黄河东岸的军渡、碛口，并隔河炮击我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阵地。当时在晋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一见敌人，就节节退避。这时，我120师主力正在同蒲路北段进行破击战，配合国民党第二战区反攻太原、石家庄的行动。在敌人向根据地进攻的情况下，立即回师迎敌。

敌人来势很猛，连续占领我晋西北根据地的河曲、保德、偏关、神池、五寨、岢岚和宁武七座县城，压迫我军西渡黄河。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敌分散深入以后，集中兵力进行反击。于四月初将河曲、保德、偏关、神池、五寨、岢岚和宁武等7座县城，全部光复。

收复7城的胜利，是对建立不久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一次大的考验。这次胜利，也是由于我们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在整个战役中，我们既注意集中兵力打敌一路，又采取了以一部兵力围困敌据点，而以大部兵力及地方游击队，在敌人交通线上开展游击战，破坏交通，打击敌人外出部队，逼迫敌人撤退，为主力创造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机会。

战役过程中，我有时在师部，有时在前线指挥作战。在与日军的作战中，我还摸索出以打夜战来对付敌人强大火力的办法。如717团进攻三井之战，当时敌是一个大队加炮兵中队及工兵，我团2500人，在三井附近待机。敌人是午后到的，如果在国内战争时期，就会立即迎击，但此次作战，我稳住不动，待午夜稍后才攻击，拂晓，将敌全部击溃，歼敌俘敌约300人，我方也伤亡250人。如果不是夜战，伤亡会更大。

战后，我曾写了一篇题为《我们在晋西北与敌人作战的经验》的文章，发表在1938年9月的《解放》周刊上。我在文章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缺点及敌人的战略、战术特点，总结了我们在晋西北抗战中正规战和游击战的部分经验。我在文章最后说：“不要将敌我双方战略、战术看作一成不变的模型，机械的狭隘的运用我们的经验和原则，如果不随时察明敌人战略战术运用的变迁，都会在现代战争的进程中落伍的。要知道在这大规模的复杂的民族自卫战争中，无论敌我双方，都会在不断的残酷战争中，吸收世界各国进步的军事学术，都会在许多新的经验中展开着、补充着现成的原则，成就着新的原则。我们要随时随地观察敌人战略、战术的运用及其变迁，而定下对策，要从自己许多新的经验中充实我们的武库，并按照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今天来看，这是总结军事经验的泛论，反映我当时一些军事观点。

收复七城之后，晋西北根据地局势又稳定了。不久，我因事赴延安。先到了兴县，120师教导团在那里。教导团团长彭绍辉让我给学员讲讲课，我就讲了在晋西北的作战经验，并与教职员一起，将抗战以来我们进行的游击战、正规战的基本经验作了一些总结。随后我西渡黄河到陕北，约于7月上旬到达延安。

到延安后，我去看望正在养伤的林彪。他是3月初在行军途经山西隰县

时被阎锡山部队的哨兵误伤的，当时他还兼着抗日军政大学校长职务。林彪对我说，你刚从前方来，给学员们讲讲前方的情况。我答应了，在抗大讲了一次《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这篇讲稿后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刊登了。

不久，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我列席了会议，从9月29日开始，至11月6日结束，共开了一个多月。这次会议，对党在抗战中的基本政策，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会议内外充满了民主气氛和同志间的亲密情谊，对于我这个见识不广又是初次参加中央全会的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同时，也为我即将独立担任领导工作，提高了信心和勇气。

会议快结束时，得悉冀东起义失败，八路军主力退到北平西面的百花山永定河地区，冀东只留下少量地方武装坚持。军委认为，冀热辽地区是敌人的远后方，我军的最前线，必须坚持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11月25日，由毛泽东、王稼祥、杨尚昆联名签发了一个指示，指出，宋（时轮）、邓（华）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的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的团结地方及军队，没有很镇静的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冀热察区的军事政治环境，有许多有利条件，是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的。也有许多困难，要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才能达到。因此，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我前往工作，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及地方党、政权工作。军政委员会须有地方党及地方军队的领导者参加，名单待我、彭真到冀察晋后由北方分局提出，交中央批准。并告知，我不日将由延安启程，经晋西北到晋察冀。指挥机关由延安拨出一部干部，并由贺、关和我负责成立之。要求宋、邓两纵队目前在平绥路南各择地整训，补充。

12月初，我与贺龙、关向应、彭真、程子华等一同从延安回到晋西北，又研究了组建冀热察挺进军的问题。我们从延安出发前，中央调来的一批干部和从中央党校、抗大毕业的青年约百人，去挺进军工作。

与贺龙同志分手颇有些依依惜别之情。我在南昌起义及二、六军团会师前军内通报及中外报刊上看到他的革命活动情况，深为敬佩。会师之后，两军团在研究军事、政治和群众工作，等等，交往甚多，为了便于工作，统一指挥，他与任弼时、关向应常要我住到二军团。抗战初期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一年多，关系是好的。虽然我们在个人性格、作风、爱好有不同，有时还发生不悦，但在大的方针政策和军事行动是合作得好的。现在还要分开，而且要离开120师，对贺及120师的战友，深有惜别之意。贺龙同志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我党我军的优秀领导人，这是我和好些同志都知道的。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林彪、“四人帮”诬陷受折磨，含冤去世。一想到他，至今仍甚为愤慨和惋惜。

第十五章率挺进军包围北平

1939年1月初，正值北国隆冬。我和程世才率领组建冀热察挺进军的近百名干部，从晋西北随120师师部东越同蒲路，前往晋察冀军区——河北省平山县蛟潭庄。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还专为我们举行了联欢会，亲切之情，溢于言表。随后，聂荣臻司令员根据中央决定召开会议，彭真、贺龙、关向应、马辉之和我，还有其他几位同志参加了，讨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成立冀热察挺进军的决定。我们认为，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冀东有700多万人民，热河有500多万人民，察哈尔有200多万人民。这一广大地区早在“七七事变”前就被日伪所统治，属于“敌后之敌后”，在这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向东、向北发展。东面与东北的抗日联军相呼应，北面靠近外蒙，西面与大青山游击战相配合。地区广阔，人口多，群众受敌伪的残酷统治，反抗情绪高，很有利于革命战争的发展，对将来收复关内外

失地关系很大。

会后，我和程世才便出发去平西。走了几天，到达历史上有名的紫荆关，这里离百花山不远了，也就是离倭寇占领我们的历史名城——北京城不远了。祖国的土地呵！一想到在冀热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前景，心情激动，记得当时还写了一首诗：

北渡拒马河，百花山在望。
建立挺进军，深入敌心脏。
放眼冀热察，前途不可量。
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
抗战虽持久，笑我力正壮。

这是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不论条件多么艰苦，我们对于冀热察地区的抗日斗争前途，充满了信心。

1月下旬，我们到达平西的三坡（现称野三坡），立即与宋时轮、邓华、马辉之、姚依林等商量着手组建挺进军的工作。1939年2月7日，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正式成立，同时还成立了以马辉之为书记的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和以我、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后为程世才）、邓华等5人组成的军政委员会。挺进军由我任司令兼军政委员会书记，程世才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接着，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随营学校、兵工厂、医院等也陆续建立起来了。这年秋天，在区党委的领导下，还创办了《挺进报》。为了壮大声势，我们一到平西，我就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写了一首共有150句的六字韵文布告，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朱彭总副司令，下了一个命令。
成立一路精兵，军名叫做挺进。
旗号青天白日，宗旨救国救民。
可恨日本鬼子，对我久有野心。
逞强打我中华，烧杀掠抢奸淫。
还有汉奸卖国，枉为黄帝子孙。
穿戴中国衣服，屈膝侍奉日本。
忘了中国龙脉，卖国卖祖卖宗。

满腹狗肺狼心，不义不孝不忠。

本军出师华北，转战冀热察晋。

忠愤耿耿在心，杀敌决不后人。

这首韵文布告，用挺进军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名义发表，张贴在村镇、街头、在冀热察边及平津地区。1988年，一位同志从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了一份原件，并转送给我。看着这份近50年的发黄的纸张，吟诵这熟悉的韵文，冀热察挺进军的战斗历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冀热察挺进军，编制序列直属八路军总部，由晋察冀军区代管。主力是宋时轮支队和邓华支队，另外还有来平西整训的冀东抗日联军，蓟县、遵化游击队等武装。冀东抗日联军是冀东暴动时国共合作建立的抗日武装，干部成分比较复杂。其司令高志远是靠办民团起家的有武装的地主，冀东暴动失败后，高部与八路军宋、邓部队撤到平西整训，高志远对平西八路军的领导人心怀不满，想脱离挺进军，撤出平西。为达到目的，他正与日本人秘密谈判，又与北伐时期被国民革命军消灭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联络（此时吴氏正准备出山组织伪军），阴谋叛变投敌。

我一到平西，就接到在高部的我地下党员陈飞的报告，我们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当时的军事形势很紧张，挺进军刚组建，如果高志远投靠吴佩孚的阴谋得逞，对挺进军和京西抗战根据地都是严重的威胁。所以，在掌握了证据之后，就把他逮捕，并召开公审大会，由公诉人杨春甫提出公诉，地下党员陈飞等人提供证据，高志远供认不讳。审理完毕，根据当时国民党的法律以汉奸罪论处，执行枪决。

高志远被处决之后，我们将抗日联军的1000多名官兵与白乙化指挥的抗日先锋队合编。抗日先锋队是新从雁北过来的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干部多是东北的流亡学生，“七七事变”前在绥远屯垦，事变后，转为武装斗争，在山西敌后与八路军王震旅协同作战，是一支军政素质很好的抗日游击支队。我到平西后，接王震信，介绍他们到平西，准备打回东北。这两个部队的合编，也是为了加强党对抗日联军的改造。

我从延安出发时，军委确定挺进军的任务是发展冀东，这时我们仍按照军委的预定方案，准备主力再度东进，利用“青纱帐”时期去发动冀东第二次武装起义。当时上上下下都对回冀东怀着热烈、兴奋的情绪，特别是从冀东来的同志，心情更加迫切。

不久，总司令部来电，鉴于华北形势发生变化，日本侵略军在侵占广州、武汉之后，已把力量逐步转移到敌后，进攻我八路军，因此，不主张用太大的兵力去冀东。稍后，军委又来电，也说了这个意见。但我们的思想却不大通，认为不趁“青纱帐”时期去冀东大发展，会失去时机。我们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总部、军委是从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决策，而当时我们的眼光只局限在一个地区。对于这个战略思想的大转变，显得迟钝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这年5月，晋察冀中央分局召集我们到禾家庄开会，彭真、聂荣臻和我们一起研究了形势以后，决定在冀热察采取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主力不去冀东，只派刘诚光等20多名干部去冀东加强工作。

就在我去军区开会期间，日伪军9000多人从察南、北平各据点集结出发，分10路向我平西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这时我不在平西，由参谋长程世才指挥反“扫荡”。程是老红军，是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地区产

生的人物，与我从延安同来平西。此次反“扫荡”，他指挥平西部队和地方武装，只十多天就把敌人打出去了。我回到部队，他向我作了详细汇报，使我深感有这样一位责任心强，又有指挥能力的好战友。我们在冀热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更有信心了！

这年秋后，根据地更巩固了，部队的扩大，也饱和了。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我们将平西地区的武装进行了较大的整编。当时，这一地区除了八路军和东北流亡学生组织的抗日先锋队、正在改造的冀东抗日联军外，还有其他五、六支人数不多的抗日武装，他们各不相属，各有防区，自筹粮饷，行动不大协调。我认为，我们处于敌后根据地，要应付敌人频繁而残酷的进攻，政治上、军事上必须统一领导和指挥。谁来统一？在敌后非共产党莫属。因此，我们就与区党委协同，逐渐将这些武装进行统一整编。撤销八路军4纵队番号，将第11支队的31、32、33大队和房(山)、涞(水)、涿(县)游击队改编为第6、第7两个团，把第12支队第34、36大队及平西游击队一部分编为第9团，抗日先锋队和冀东抗日联军编为第10团，仍在冀东的包森支队编为第13团。

部队整编后，一边战斗，一边进行了几个月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普遍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建立了各种制度，加强了党的建设，从而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增强了战斗力。在部队整训的同时，平西党组织动员人民群众掀起了参加子弟兵的热潮，进一步充实了部队。这时期，平西全部兵力已达到1.2万多人。正规部队和游击队，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有些以老部队作基础的单位，党员比例在30%以上。

从当时冀热察地区来说，我们的力量不算小，但主力不东进，平西地区的发展受到限制，而冀东地区工作的恢复证明那里是能够长期坚持发展的，如何使这两块交错相连的地区协同作战？怎样利用地理条件威胁日伪军指挥中枢和进入伪满洲国境？怎样配合华北各地以及正面战场创造反攻前进阵地等问题，就提到冀热察挺进军领导的议程上。

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一段时间里是处于迷蒙状态的，找不出一条适合在这一地区大发展的路子。那段时间，我日夜思考，认真地读了六届六中全会文件、毛泽东《论持久战》以及《孙子兵法》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著作，慢慢地形成了在冀热辽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概念，即“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发展平北”的方针。

我从古兵书中看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个词，联想到去年的冀东大暴动，感到那次暴动是“一鼓作气”起来的，但有共产党的领导，失利后“气”并未衰，还有继续坚持游击战争的后劲。我们不以主力东进，但如果平西能够巩固，冀东继续坚持，又把平北发展起来，就形成“常存有余不尽之气”了。

11月间，我在区党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正式提出：“以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开展平北新的游击根据地”这“三位一体”思想为我们的战略方针，经过酝酿讨论，大家都同意，并报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批准。之后，我给干部作了报告，对“三位一体”的内容、相互关系、实现这一任务的条件和困难，以及应克服的各种错误倾向等，作了详细的论述。这个报告在《挺进报》发表并一再进行宣传，基本上家喻户晓，上下认同。

我认为，“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发展平北”，是一个互相关联，互相

依存，互相配合，不可分割的整体。平西是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是晋察冀根据地北面的有力屏障，是向冀东、平北发展的前进基地，也是冀热察地区的指挥中心，因此，挺进军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平西”。但是，平西的巩固，如果没有平北、冀东斗争的密切配合，是难以实现的。

平北是平西和冀东的交通枢纽与结合部，是我军在热察的前沿阵地，地域广大。开辟平北，有利于冀东和平西间的联系，成为坚持冀东的战略回旋地。然而，开辟平北，也需要平西的巩固和冀东的坚持。因为只有平西巩固了，才能直接派干部和武装去平北。当时平北没有地方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只有一支统一战线的骑兵队，约百余人。因此，必须由其它地区派部队和党政干部进去，形成统一的单位（地方工作以地委为中心，军事以分区为中心），但开始去发展，则由平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

冀东是华北敌人的心腹区域，也是连接关内外的咽喉，那里有大规模的产业区域（唐山）和丰富的矿藏。在冀东坚持游击战争，对于吸引和分散敌人，将起着极大的作用，对于平西与边区的巩固有着重要的帮助。坚持冀东，还可以同东北义勇军互相呼应，振奋敌人深远后方和热辽等省久陷于敌人铁蹄下的人心。同样，坚持冀东也离不开平西的巩固和平北的开辟。平西是冀东游击战争的后方和直接支援者，平西的巩固，可使冀东得到军事上、政治上和干部队伍的直接援助及精神上的鼓励。平西部队可去冀东，支援冀东的游击战争。冀东地方干部和部队在必要时也可来平西工作和整训。至于平北与冀东，也有密切联系。平西到冀东，冀东来平西，都要经过平北，平北是冀东与平西两个根据地往返的转运站、联络站。

“三位一体”方针的提出，从政治思想上军事战略上统一了三个地区广大军民的思想，明确了创建冀热察大块革命根据地，坚持“敌后之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向。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冀热察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

首先是巩固平西。当时在这个口号下，将平西境内的各种武装团结起来，并进行整编。

整编，我当时估计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诸多各不相属的武装，多属抗战中自发地组织起来的，现在要统一整编，对个人及其部属，颇有不便之处。但必须做，否则一个根据地内，形成若干半独立状态，就不利于对敌斗争，就不能巩固。因此，我认为必须加强他们的工作，从思想上说服他们，我决心自己去做。首先是扛着“巩固平西”的大旗，单枪匹马，分别到他们部队，同他们生活一、二天，大道理，小道理耐心他讲，我又是高级司令，就有“畏威怀德”之感，都表示同意。我回司令部，就下了一道命令，要各整编单位一一执行。各单位接到命令，都认真执行，经一月整训，我看能“令行禁止”了，就于1940年1月，主力出击宛平、房山地区的王平口、佛子庄、长沟峪、周口店一线，袭占了南窖等日伪军重要据点，破坏了从这里至北平的高线铁道。不久，又在永定河畔、门头沟地区、北平近郊多次出击，连获胜利。百团大战期间，我们还攻袭了上下河、矾山堡、坨里车站、阳坊镇、连克蔚县以北以东6个据点，并派小部队活动于西山、妙峰山，给北平的

日伪政权和张家口等地的敌人以极大震动。

经过一系列战斗，加强了地方党、政、军、群工作，平西根据地扩大了，人口多了，更加巩固了，各区、县普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秋，由于部队外调，敌乘隙向我大举进攻，根据地军民团结苦战，很快恢复了大部分

中心地区，保持了抗日政权。被敌侵占的村镇，也保持着两面政权和秘密工作。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41年秋。在斗争形势和党的工作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平西地区建立了党的领导机构——平西地委。到1941年底，平西5个县党员已达3900多人。同时，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了平西专员公署及各种群众团体，以及地区性的群众武装。在反“扫荡”中，党、政、军、民一起对敌，体现了“军民团结如一人”的全民抗战。

抗日民主政府还创办各级中、小学校和夜校，普遍开展扫盲识字运动，广泛进行抗日政策的宣传教育，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和文化水平。我们还以军队名义发布一些政策性的布告。这些布告不仅在根据地、游击区广泛张贴，有时还散发到北平，对团结敌占城市上层进步人士，打击日伪反动势力起了很好的作用。

巩固平西根据地最困难的是粮食问题。平西地区除东南面有一块产粮较丰的平原外，大部为山区，粮食产量很低，老百姓生活本来就贫困，加上日伪军不断地“扫荡”，群众生活更加艰难。而根据地群众要负担抗战勤务，又要为部队供应军粮，负担很重。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一方面减轻人民负担，一方面也要保证部队有粮吃。当时军区决定将10分区（北平南郊至大清河北岸的平原地区）划给挺进军指挥，我就把山区一部分部队调到那里（山区部队缺粮严重，又无平原作战经验，很不利），一来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二来也可以学会在平原活动和作战。但缺粮问题，还不能完全解决，但又必须解决。

1939年河北大雨成灾，拒马河经平西段的两岸，大部分农田被洪水冲毁，粮食严重减产，有的甚至颗粒无收。这年秋后，军队缺粮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我就向地方的同

志诉苦，他们也很着急，赶紧想办法，《孙子兵法》中“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的话，此时我才有真正的体会。联想到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失利，固然由于

司马懿采取坚壁不战，待其自困的战略，更由于成都大军

深入秦岭之北，即使发明了木牛流马也供应不起前线的军需粮草。诸葛亮先生虽有为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但以三军之尊而解决不了战略上的困难，年仅54岁便病逝于五丈原。这个历史的教训给我很大的启示，要想

在敌后扎下根，必须解决粮食问题。

这年冬天，地方号召群众冬耕保墒，我也号召军队积极参加。次年春天，冬季作物长势好，春耕顺利，这一年气候又好，风调雨顺，收成不错，但缺粮问题还是没有从

根本上解决。之所以如此，是脱离生产的人太多。要从根本上解决，除精兵简政外，还要从严重缺粮的山区调出一部分部队，聂荣臻同志对此问题很敏感，当时就把第6团调到北岳去了。6团是老团，有红军基础，战斗力也强，就

因为缺粮，在“减轻平西人民负担”的意图下调走的。

后来我们总结出了这样的经验：一面负担（指只负担八路军）的山区，脱离生产的人员不能超过根据地总人口的10%；两面负担（指既要负担八路军，又要负担日伪军）的平原区，不能超过根据地总人口的30%。经过多年

实践，我认为这是科学的。以后我到晋察冀军区工作，虽不直接管经济，但喜欢过问这方面的情况，军区领导和地方政府也高兴我过问，并让我担任边区审计委员会主任，为边区增产节约做些工作。

平西军民经过 3 年多的艰苦奋斗，平西终于成为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以平西为依托，又逐步建立了张家口以南，包括蔚县、涿鹿、宣化、万全、怀安、阳原等县的察南根据地，西部与北岳区及雁北连成一片，为日后解放察哈尔全省创造了有利条件。

坚持冀东，在“三位一体”任务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冀东不仅战略地位重要，更由于党的工作基础和群众基础很好。早在我党初创时期，李大钊就在这里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玉田县一带曾举行过武装暴动；1934 年迁安也发生过抗日武装起义；特别是 1938 年的冀东大暴动，是我党多年来领导的武装斗争中，工、农、兵结合得很好的一次，起义军遍及整个冀东，有时截断京奉铁路，声势浩大，震惊中外。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党的基础还在，一部分暴动武装还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由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总部决定不以挺进军主力东进冀东，但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却是上下的共识。

我对坚持冀东还有一层情感上的原因。我在青年时代就知道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与陈独秀齐名，时称“南陈北李”，对他十分崇敬和钦佩。二期北伐进军河南时，我们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打仗。我从一张宣传画报上，看到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死的消息，真是义愤填膺，当时就怀着为革命领袖报仇的心情积极参加打奉系军阀的战斗。时隔多年，党派我开辟冀热察地区的革命斗争，而李大钊是冀东人，我想，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对于我既是解军阀残害革命领袖的旧恨，更有继承先烈遗志，完成其未竟的事业之意。

我们把来平西整训的大批干部和部队，先后派回冀东，大力加强这一地区的领导和斗争力量。1939 年的七、八、九月，我们以一年前暴动失败后隐蔽起来的武装力量为基础，利用“青纱帐”的时机发展游击战争，各县的小武装建立起来，原八路军留下的三个小支队很快发展到 1000 人，县、区、村政权和党群组织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为了充分依靠冀东党组织和人民坚持发展冀东根据地，我们将冀东抗日联军和八路军留在冀东的部队，统编为冀热察挺进军第 13 支队，李运昌任司令，李楚离任政治委员，包森任副司令。

说起李运昌任司令，还有一段故事。那年五、六月间，平西区党委召开会议，李运昌经敌占区的唐山、北平到平西来参加会，我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他的。当时他穿了件布长袍，戴顶礼帽，像个商人。正是这副打扮，使他安然出入于日伪统治的北平城。我很佩服他的机智勇敢和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特别是秘密工作经验。后来决定由他任冀东武装部队的司令。有位长征过来的同志对我说：“他没有当过兵，怎么能任司令？”我已经知道李运昌的经历，他是黄埔四期毕业生，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是冀东大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有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及其它革命工作的经验。我就向那位同志解释，但他不相信。我又说：“他这次从游击区来开会，是经北平来的。你敢不敢穿起布袍子，到北平城里去办点事情？”

他听后，愕然了，连说：“不行，不行！北平现在是日本鬼子占的地方，特务、暗探不少，我去不了。”我又根据游击区的特点，说明李运昌的斗争

经验是十分可贵的，那位同志终于心悦诚服，没有意见了。

到9月初，冀东部队发展到4000多人，在冀东北部逐步建立了很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随后，平西主力一部开赴平北、热河西部，在长城内外开展游击战争，与冀东密切配合，遥相呼应。1940年3月，中共北方局对冀东提出了“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明确规定：冀东当前的任务是巩固已有的游击根据地，创建新的更多的小块根据地，注意向现有的区域间隙发展，力求连成大片区域。没有开辟的山区应力求开辟，使山区和平原联系配合。

6月下旬，冀东部队分三路转到热河、滦东和路南发展。此时，从平西东返冀东的12团和党政干部数十人，在鸦鸿桥、三女河、任各庄打了几个好仗，使冀东的东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起来了。

1940年7月25日，根据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的指示，决定撤销挺进军第13支队的番号，成立冀东军分区。军分区和先已成立的冀东区党分委都由李运昌、李楚离负责，统一全地区党政军的领导。

经过两年多的斗争，冀东各小块根据地已发展到2700个村庄，人口120万。1941年五、六月间，在粉碎敌1个师团零两个旅团的大“扫荡”后，利用“青纱帐”期间，冀东抗日游击队又有了较大发展。在长城内根据地比较巩固的情况下，为贯彻向东北方向发展的预定方针，于9月组织3000余人打出长城，进入热河，创建了雾灵山与军都山之间的大块游击区。由于长城外是山区、人烟稀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过去没有党的组织，工作比长城内困难得多。但经艰苦工作，终于在长城外站住了脚，并成立了晋察冀的“东北工作委员会”，负责收集东北地区的情报，在伪满建立点线关系，争取伪方人员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寇从冀东抽调兵力，执行其南进计划，同时，调大批伪满军和伪治安军进驻冀东，宣称要把冀东变为日本管辖的“模范区”，让“中国人执政”、“中国军队统治”。根据这一情况和形势的需要，我决定将主力从热南回师，自11月中旬起进行了一个80天的“打治安军战役”，歼敌5个团，击溃两个团和1个集团军司令部，缴获了大批武器，冀东人民武装得到了大的补充，敌酋冈村宁次曾惊呼：“对冀东八路军要重新认识！”

1942年六、七月间，冀东分区又发起“复仇战役”，歼敌3000人，此时，越过长城的部队，一部向热南深入，进至平泉、叶柏寿、宁城之间；一部深入到伪满统治的兴城、绥中（辽西），这是中国在抗战时期最早打回东北去的部队。

发展平北，是“三位一体”任务中最为艰苦的。平北与冀东、平西不同，这里原来没有党的组织，主要是依靠外地派干部去工作。平北的名称，是我到平西后叫起来的，当时我们把冀热察地区分为三大块，冀东和平西二块，命名仍旧。二块之间的一块，因处于北平市区之北，跨长城内外广大地区，便称之为平北，言简意明。

这个地区是敌人经营已久的占领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在平绥路东段和平古（古北口）路沿线，加强军事力量，在张家口，建了伪蒙疆自治政府和伪蒙疆派遣司令部。挺进军在平北开辟游击战争，即可以同平西、冀东的游击战争互相配合，又可同大青山的游击战争相呼应。这里是坚持长期抗战和将来反攻的重要阵地。

平北游击战争早在1938年6月就开始了。八路军第4纵队挺进冀东时，

曾留下政治部主任伍晋南率领的一支武装，在昌平、密云、滦平一带游击，对平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情、地理等情况作了调查和了解，并一度建立了昌（平）滦（平）怀（柔）联合县政府和各种抗日组织。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不久我军即被迫撤出。1939年“青纱帐”时节，挺进军第34大队又向平北发展，首先进入十三陵地区开辟根据地。但没有站住脚。

这两次行动使我们认识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人增强了后方的统治，要开辟平北，必须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以及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我们认为，平北地处伪满和伪蒙境内，紧靠伪华北统治中心北平及日军的重要战略基地张家口、承德，这是开辟平北工作的不利条件。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里是伪满、伪蒙疆、伪华北这3个伪政府统治区的结合部，我有隙可乘；敌人残酷的奴役，激发了各族人民的仇恨，抗日情绪高涨；此外，又有平西和冀东人民的斗争相呼应，这是开辟平北的有利条件。我们吸收江西在土地革命游击战争初期的经验，采取波浪式发展的方式，先发展若干个小点，由点到面，党政军民一齐上。

1940年1月，派钟辉琨率20多名党政干部和一个连，进到昌平、延庆之间后五村一带，同原有的一支小游击队会合，很快建立了包括5个区的昌（平）延（庆）县政府。此后，继续向怀柔、延庆、赤城、龙关之间的广大地区发展。经过4个月的努力，基本站住脚。四、五月间又派第10团去丰（宁）滦（平）、密（云）之间，他们和区党委派去的地方干部密切配合，开展地方工作和游击战争，也很快站稳了脚。这样，平北的南部十三陵和西部大海陀及潮白河东部地区就都站稳了。不久，建立了以苏梅为书记的中共平北工委和以张致祥为专员的平北专署，以及由段苏权任政治部主任的平北军分区，形成了这个地区党政军民的一元化领导。这样由点到面互相连接，就扩大为一块小战略区。

这年六、七月间，又派7团进入平北，想把东西两大片联起来。但7团没有分散作战，不大适应那里的游击环境，这个团是正规团，目标大，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加上根据地新建，物资供应上也发生困难。他们没站住，不得不撤回平西。这主要是我在思想上只看到平北前段发展较顺利，有急于求成的情绪。在战术上，一次派出兵力大多，敌人在华北我游击战争的发展时期已有教训，所以很快警惕，不让我站稳，这是我们在发展中的一个挫折，也是我军事指导上的一个失策。

7团退回来并没有影响平北发展的大局。到1941年，平北主力部队已发展到2000多人；在240个村庄中，发展了2250名党员，并建立了民兵及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从初创的几个小块游击区发展为大块的平北游击根据地。虽然自1941年10月至次年七八月，敌人反复进行残酷的大“扫荡”，但游击战活动没有中断，根据地还是坚持并基本上巩固了。

在平北地区开辟根据地，是十分困难的。我们采取了独具特色的斗争方式：第一，党政军民组织的一元化。先派工作团去开展新区工作，工作团有党、政、军、民和各个方面的人才，统一领导，统一行动，既能打游击，又能开展地方工作。

第二，先隐蔽发展，再公开。过去军事上一般是先造声势，先声夺人。但我们力量弱小，刚进入敌占区，如果声势大，则惊动敌人，促其警惕，以强力对我，这样就不容易发展了。孙子在2500年前就说过：“毋要正正之旗，毋击堂堂之阵”；何况我们小的游击武装呢？初进敌占区，采取隐蔽发展之

策，包括熟悉地形、民情、敌情等，站住脚跟，力量慢慢扩大，能对付敌人进攻再公开。即便公开，领导者个人也不公开；有专员公署，却无公署衙门。专员既是该地区的行政中心，又是游击队员。

第三，采取逐渐增兵的方法。旧军事典籍上是忌讳这种做法的，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同，特别是进入敌人统治严密的区域，先派出工作团和小部队，站住脚后，再增加兵力，就像滚雪球一样，力量一点点滚大，敌人就无可奈何了。

第四，组织形式适应斗争环境。虽有军分区、县大队等称谓，但不用统一编制，内部组织及人数都要按敌情、地形来规定。小名义可以有内容；大名义干的内容也不一定都大。干部常穿便衣，不仅作领导和指挥员，有时还当侦察员和执行通信任务。

以上这些，都是从斗争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其中有不少与过去的军事学说不相符，如不造声势，逐渐增兵等，我们都大胆采用了。因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善于审势和审机。

冀热察地区经过几年的发展，到1941年，平西、平北、冀东这三个地区真正是“三位一体”了，在敌后比较深远的地方形成了三大块互相邻近、人口达320万的根据地。1940年冀中十分区划给挺进军指挥后，北平各郊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联系更紧密了。展开地图一看，就显出一个大的近似椭圆的形势。北平这个千年古都，完全在我八路军包围之中。东为冀东，西为平西，南为大清河解放区，北为平北抗日根据地。北平的老百姓也能看出大局，我城工部的干部说：“老百姓说北平被八路军包围了，这里的老百姓于日寇长期的统治下，对中华民族的希望更殷切了。”根据地的干部知道这个情况，斗争信心更坚定了。

挺进军为什么有这个成就？我看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统一战线和根据地各项方针政策。没有统一战线的政策就不能号召和团结众多的群众站在我们党周围，更不能团结那些地方的抗日武装、争取“绿林”队伍和开展敌伪工作。我们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要抗日，就团结他们。由于政策执行得比较好，反正、起义或掩护我活动的伪军、伪组织，也为数不少。

冀热察根据地很注意地下党及敌占区的工作。当时，北平、天津的进步青年学生，在地下交通员的引领下，一批批地来到根据地；我们的干部也可以到平津去办事或治病。我们用的药品、纸张、电讯器材、服装染料以至某些武器弹药、小型车床，不仅可以从敌占城镇买到，还能从敌占区运送到根据地来。我们的宣传品，经常出现在火车里、城门上；连《挺进报》，也被带进北平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际友人班威廉、林迈可、史平烈等，就是从北平进入平西根据地到延安、重庆的。美国飞行员奥利混·欣斯德尔，在山海关附近被我救起时，异常惊讶地说：真想不到这里还有中国军队！

再一条是发展了游击战争为主体的人民战争。在开展游击战中，既注意平原，也注意山区，平北地区是典型的山地游击战，那里的党政军民都参加了武装斗争。那时，我文职人员如专员、区长、县长都会搞武装斗争，他们同八

路军干部一样，只不过分工不同而已。以马辉之为书记的

区党委，在积极领导地方武装斗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各级政权建设，与敌占区地下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动抗日群众组织等方面有很大成就。

那时期，我军在敌后各根据地的斗争都很艰苦，但由

于冀热察地区处于关内与东北的衔接地带，是华北抗战的最前线，敌我斗争就更加尖锐和残酷。敌人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大“扫荡”，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冀东根据地，仅1940年日军就推行了3次“治安强化运动”，有的村子竟被烧10余次。年初，敌人在烧光鲁家峪后，又血洗潘家峪，屠杀1300余人。在平北，划定无人区，烧毁房舍，残杀军民。1940年秋，日伪军1万余人进行了为时两个月的“扫荡”，仅怀柔境内，烧毁房屋2400多间，死伤人数近千，方圆250公里沦为无人区。平西中心区在1941年前，158个村庄被烧毁142个，被杀害的群众达1670人，被抢走的牲畜7.2万头。这里还成了敌人设在北京南苑空军学校的靶场，每年多次“实习”，几乎所有的村庄都被炸成断壁残垣。

尽管环境如此残酷，战斗在这里的军民对胜利充满了信心。平北地区部队和地方干部，长期搭窝铺，住山洞及长城楼子，与敌人周旋，和万里长城一样，雄峙云燕。那时候，老百姓背一个兜，随时配合部队转移，打击敌人。许多人在开辟冀热察根据地的斗争中英勇牺牲了，如白乙化、包森、王仲华、陈群、刘诚光、刘开绪、张振元、丁振军、王平路、苏林燕、曹致福、节振国、徐亮、李荣旭、徐智甫、胡瑛、沈爽、边振东等，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每当想起这些同志，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是的，正是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和无数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1941年，党中央作出了精兵简政的决定，鉴于冀热察3个地区的党政军组织，都能独立领导各自地区的战争，区党委决定向中央和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建议，撤销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机构，以减少层次，缩小目标，减轻人民的负担，充实基层单位和战斗部队，以利于持久战，经中共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决定，于1942年春天撤销了区党委和挺进军领导机关，冀热察各地区按照预定部署，在晋察冀军区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各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造成我们不久对敌伪反攻的优良条件。

第十六章撰写《罗霄军》

抗战初期，我利用战争的间隙写了一部小说，最初定名为《罗霄军》。

一个久历戎马的人，从事文学创作，似不可思议，但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看得那么神秘。我读文学著作，很注意作品的序与后记以及对作品的介绍，从中受到启发。看到有些作品的题材有自己的生活基础，如托尔斯泰是个退职大尉，他写《战争与和平》，基本上是一部军事历史小说。我感到自己长期的戎马生涯，本身就是小说题材的生活基础，我对文学作品的爱好和兴趣，总想也能用文学的形式把这些表现出来。在学校时，我就爱读文学作品。投笔从戎后，仍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战争时期，读书不容易，但我还是利用作战间隙，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如郭沫若的《塔》、《女神》，冰心的诗集《繁星》、胡适的《尝试集》，鲁迅的《阿Q正传》、《呐喊》，以及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集及他的《战争与和平》等等。有时也自己动手写点。在湘赣根据地，写过白话诗、散文、小故事等，有些在《湘赣红旗》、《红色湘赣》等报刊上发表；在长征路上，我有时作一段即兴演讲或吟首诗。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写作打了点基础。

萌发创作小说的念头，是在西安事变之后。当时我率部队由甘肃镇原进军陕西三原地区，弄到一本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小说《铁流》。我一气读完，书中所描写的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一支俄国工农武装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逐步锻炼成为一支有纪律的革命队伍的故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相似。特别是书中塑造的红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曾使我激动不已。此后不久，作家马加同我谈起《铁流》，我深有感触地告诉他：“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史诗。”

马加不无惋惜地说：“现在中国缺少一部《铁流》。”

是呀，中国有革命战争，但是没有描写革命战争的好作品。我对马加的看法颇有同感。我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模比俄国大，时间比俄国长，影响也比他们深远，不仅应该写出中国的《铁流》，而且要写得更真实，我觉得《铁流》的结构、人物群体的描写等很值得借鉴。《铁流》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那样深刻，从而使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们经历过的战争，比《铁流》里描绘的要丰富、生动，也应该写出一本近似的作品来。

1937年5月，我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上，中央提出准备抗战。会后，我们一行数人在返回部队途中，纵论天下时局，追思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颇有些心潮起伏意难平的感慨。当时估计对日抗战有个准备时期，因此，我浮想联翩，觉得中国革命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规模宏大情况复杂、尖锐、激烈，在战争史上并不多见。一曲曲壮歌，一幕幕悲剧，可歌可泣！自己的经历也是丰富多彩，如果能将这些写出来，用以激励人们的斗志，不也是一种很好的抗战准备吗？于是，我就开始了小说《罗霄军》的构思。

搞文学创作是艰难的，战争年代写小说，困难更多，我动笔前对此有些估计不足。那时候也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罢，思想上没有什么束缚，想干就干起来了。真到动笔了，“拦路虎”还确实不少。

我多年拿枪，虽然读过一些长篇小说，却没有写过。基本的创作意向有了，但选择什么作为创作的主题？生活的积淀不少：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打长沙、下吉安、反“围剿”、万里长征……，但创作仍不是

简单记流水帐。我反复思考着、构思着，脑子里想得最多的是，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总是紧紧地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我决定就以此为主题，去展现中国革命力量的兴起。

红军战争时间长，区域宽广，情节复杂，怎样去表现？我想，只能选择一个地区、一个时期、一个部队的战争场面作中心。选来选去，认为以红军一个小游击兵团的一次战役行动来创作为好。这个兵团产生于罗霄山脉中段，我就把书命名为《罗霄军》。题材的时代背景是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和福建事变时期。全书以罗霄军一次军事行动为基本线索。书中的人物，以我熟悉的有代表性的红军指战员为主，也包括敌方的，都典型化。于是，我就不断地在腹中编排故事情节，形成小说结构，于“七七事变”前不久开始动笔。

资料缺乏，我就凭着自己的记忆；没有草稿纸，就用办公纸、书信纸，颜色不一，大小不等；时间有限，我就利用夜间和可以利用的间隙，因为进行革命战争是我的神圣任务，而写小说仅仅是我的业余爱好。我平常较少参加其他娱乐活动，常常把看书、写作当作一种消遣和休息。到卢沟桥枪声响起，我已试写了几章。不久，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便搁笔了。此后在战争中时写时停，仍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相对集中地进行创作，是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当时我率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抗日。战争环境里，工作紧张繁忙，除军队建设、反“扫荡”、打仗外，还要参加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所以，我写作的时间一般都在夜晚，白天躲飞机也是写作的最佳时间。那时，日寇设在北平的航空学校，以平西作演习目标，常常来侦察轰炸，有一个时期防空袭成了根据地军民的一件大事。一到防空袭时，我就搬上小凳子，朝村外的山坡边上一坐，就开始写作了。这时无论飞机怎样飞来飞去，都影响不了我的思路。

写多了，熟练些了，有时一写就到了午夜，那时年青，少休息一点也没有什么。有一天晚上我正写得兴起，爱人蹇先佛来了，我竟全然不知，真还让她有点误会。那时我们住地相距十几里山路，交通不便，十天半月见一次面还得翻山越岭。她跑了十几里山路，赶到我的住地，一进门便急切地说：“孩子生病了！”当时，干部的子女一般都寄养在老乡家，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寄养在湖南老家，被日寇的细菌武器杀害了。这第二个孩子刚满周岁，就放在离平西几百里远的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先佛听说孩子生病，心急火燎地跑来告诉我，但我当时正在写作，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她又大声喊了一句，我仍旁若无人。她没想到我会这样，生气地扭头便走。

夜黑沉沉，山路阴森森，风吹得呼呼作响。在那战争年代，一个女同志摸黑走山路，怪可怕的。因她满肚子火气，更由于在长征中有战争和行军经验，不知害怕，径直往前走。一个人摸黑走向自己的住处。她发誓，以后再也不理我了。几天后，我来到先佛的住地，她不理我，谈到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我才知道这件事。看我脸上惊讶的样子，真使她哭笑不得。

到1939年10月，这部4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终于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宛平县的马栏村完成了，前后花了两年多的业余时间。

我写小说，容易传开。知道的人多了，就来问我，因此，对我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这又鞭策我下决心进一步把书稿修改好。在随后的四五年中，我先后作了三次大修改，还有多次小的修改。越改越觉得好些，人们再问我，也不紧张了。

在晋察冀边区，有位民主人士问我是不是写了一部小说，我不否认，只是笑着对他说：

“我是中学生学作文呵！”

他说：“中学生是20岁以下的青年，哪有司令员当学生的？”

我重复着答道：“学习，学习作文。”

当时晋察冀边区的著名新闻工作者邓拓，知道我写小说的事后，也来问我。因我们常打交道，较熟悉，我就稍详细地同他讲了。他问我能不能给他看看，我同意了，并请他提意见。这部小说，邓拓算是第一位读者。几天后，他将原稿退还给我，真给我提了好意见。后来我根据他的意见又作了补充修改。1988年小说出版时，邓拓已在10年浩劫中离世了。我特地邀请他的夫人丁一岚出席首发式，以报邓拓的知遇之情。

1944年夏，我到延安，有一天陈伯达当着我向一位长者说：“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看他的态度略有轻脱，长者听了似在沉思，无多表情地说：“写文学作品呵。”我有点尴尬地答道：“东施效颦。”然后就相对无言地过去了。

总之，对我写小说，有的同志因对我的创作意图不理解，颇有微辞，更多的人则是寄以善意的期望。

完成的小说草稿，40余万字，加上几次修改，已是厚厚的一摞。在当时紧张而剧烈的战争环境里，要把它保管好很是不易。先佛为此极为关注。

后来还有过一段手稿失而复得的小插曲。那是在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我同聂荣臻司令员从延安

乘飞机到张家口，先佛在出席党的“七大”后仍留在延安。解放战争爆发后，她和一批干部从延安去华北，带着几岁的孩子，也带着这包手稿，赶往承德。那时，没有火车、汽车，天天紧张行军，无论怎样辛苦劳累，她都亲自把手稿带在身边。一天，到达河北滦平县，走了一天，又饿又累，便在附近的一个部队驻地休息。她们吃完饭，几个人就铺床睡下了。真是忙中添乱，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发现装手稿的皮包不见了，心里十分焦急。她深知这是我多年的心血，要是丢了，我会非常难过的。一定得找回来！她决定找到再走。

当地驻军上下都发动起来帮助找这个皮包，整整找了一天，没有找到踪影。大家分析，皮包可能丢不了，因为有人以为皮包里装着什么贵重物品，等看到皮包里全是草稿纸后，大家又那么紧张地寻找，也许会甩出来的。果然不出所料，就在那天晚上，她们都躺下休息了，突然听到外面不远处有人敲汽油桶的声音，她便警觉地走过去，仔细地看了看，发现这个皮包放在汽油桶上，但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后来，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及“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中，有人批判这部小说，有意借此打击我，先佛便感叹他说：“要是当初不找它就好了，省去了许多麻烦。”我说：

“不一定，在大搞政治运动时，如果我拿不出草稿供批判，他们更会对我穷追不舍，如果那次没找到，那麻烦更多。”

戎马倥偬中利用业余时间急就的作品，自己虽作过几次修改，但总感到还太粗糙。一直希望再花点时间把它改好。自己都不满意的作品，是不应该拿出来示人的。

然而，后来革命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我的本职使我不能为此事再花费

时间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接着就是全国解放战争，我从华北转到华中、华南。全国刚解放，军委又令我主持军队和军事院校的训练和管理工作，不仅有繁重的事业，而且自己也要提高，参加现代化的军事学习和研究。加之抗美援朝，形势紧张，以及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实在没有时间去修改了。

一放就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在 1958 年军队批判“教条主义”的运动中，在我受到错误的批判和组织处理时，小说草稿也被拿出来批判，一部历经 21 年劳作的书稿竟也招来横祸。

一天，我接到一位同志的电话：“听说你写了一本小说，大家要你拿出来看看。”我手握听筒，半晌无言以对。多年来，许多人让我把书稿给出版社，我都没答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曾亲自上门找我，表示要配备最强的责任编辑把书改好，我也没有应允。因为我是想自己改好后再拿出来。现在却成了这个局面。我轻声说道：“那只是一个初稿，还没有加工。”

对方的声音低下来，一会儿话筒里又传来对方的声音：“他们说，要的就是初稿，初稿可以反映你的灵魂。”看来不想拿也得拿。我从书柜中取出尘封已久的书稿，信手翻看着那布满勾勾画画文字，心潮起伏难平。索要手稿，用意是明白的，就是要找点批判的新材料。但我心胸坦白，我觉得我就是写得不好，也是写打帝国主义，打国民党反动派呢，就把书稿送去了。

不几天，小说稿被打印出来，但附上了“供批判用”的字样。我理所当然地要去接受批判。会议期间，我的身体真有点支持不住了。医生建议我住院，可是没被批准，我只好坚持着。我同先佛商量，生活搞得高点，我要坚持下去，也要看看斗争的结果。

任何事物常常有两面性，对我的小说的批判，却带来一件顺心的事。我将草稿交去后，他们为广泛批判，让打字员从头到尾，打得一清二楚，装订成三册。我这个被批者也“享受”了一套。当时心里挺高兴，如果以前能有这么个本子多好呀！直到现在多少年来，我只要看到或想到这部书稿，就感谢打字员，这位打字员是我在军训部工作时期的同事，以前帮我打过不少文稿，对我的字迹和勾划习惯很熟悉，“供批判用”的手稿，因多次修改，勾划更加繁乱，经她打出，很少遗漏或错误，更便于阅览，我得到这个“善本”，就把原来大包手稿送到火炉去了。“文革”时期，造反派算我的老帐，又油印数百份。这个“供批判用”的小说正式出版之前就“出版”了两次，读者不少。

批判的调门一次比一次高，“帽子”越戴越大。我自己在受批判期间，也认真读了，看到要增加或删除的地方，也留下了腹稿。

有人说我宣传“战争恐怖论”。我想，估计那是指书中写了敌人飞机炸弹落下后，有几具肢体不全的血淋淋的尸体。经过战争的人都知道，炸弹不是玫瑰花，爆炸过后的情景实际比我描写的更惨不忍睹。

有人说我“污蔑劳动人民”。我始终想不出这所指何处。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我都把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关怀和帮助看作是胜利的源泉，自信毋庸置疑。

还有人说我以小说中的反面人物自况，借书中人物之口来喊“打倒共产党”和“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真让人啼笑皆非。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又对早已打入冷宫的小说稿《罗霄军》进行批判，有人说：“老虎早就死了，再打还能打活？”造反派说：“死老虎也要打”，要以路线斗争的新观点来批判我和这本小说，一时间，大字报铺天

盖地。那个年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历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事物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向反面转化。“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随着“左”的思想逐渐肃清，对我及小说的不公正批判和不实之辞也随之被推倒。

1971年林彪叛逃后，我重新为党工作。当时，一心想的是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对小说的修改还无暇顾及。1985年底，军事学院撤销，国防大学成立，我从第一线退下来

后，在先佛、《诗刊》总编辑张志民（抗战时期在平西根据地的战友）、十多年来与我朝夕共事的秘书张国琦等的鼓励和催促下，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才下决心再来修改这部书稿。

我取出原来的两种版本的批判稿，在他们帮助下修改了。

动笔前，我曾作了这样一副对联用以自勉：

雕虫半世纪，今再操刀，告老不惜老。

戎马六十年，乐得解甲，赋闲再难闲。

我把对联写好后，挂在工作室，开始执笔修改这部小说初稿。

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原稿。多少年不看了，许多情节都淡忘了，再改起来的确有些吃力。我就一章一章地记下内容提要，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写出小传，一点一点地记下自己的修改意见。最后，逐章地进行修改、增删。

战争年代利用业余时间写的东西，我感到明显的不足，就是人物之间的联系不大贯通。我又重新设计一些新的情节，加强人物之间的联系，适当加强心理描写。我还对书中关于战斗阵势、战斗进程及战斗场面的描写作了仔细推敲，力求真实。为了体验当年的真情实感，我还和前述几位同志专门到南方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走了一趟。

对于书中引证的历史资料，我都注意力求准确。哪怕是一句古语，我也尽力查找到出处，予以校订。就是当年对小说批判时，有些善意、合理的批评意见，我也没有忘记，在修改中都适当地吸收了。

经过一年多的认真修改，文稿终于付印了，定稿时书名改为《浴血罗霄》。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小说如期出版。一本小说从开笔到出版，历经51年，我则从一个29岁的青年成为80岁的老人。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91年3月11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通知我《浴血罗霄》荣获84—88年度茅盾文学奖荣誉奖。我想，这是对作品本身的肯定，也是对这部小说成书的奇特经历的褒扬吧。

这是一方面，在小说出版后，也有令人难忘的故事。那年的春节，原在国务院农垦部工作的同事王伯强、邱静君夫妇和他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是我下放到江西云山“五七”干校时期的小朋友）来了。坐下不久，邱说：“今天来看您有两件事，一为拜年，二为要书。”他们说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小说出版了。

我说：“拜年是中国的风俗，我们互相拜吧！第二件事可以办到。”

我随即去书房取来两部，签名后送给他们。

他们说：“我们不是白要。”

随即打开挂包，我以为他们要给钱，不禁愕然。但他从挂包中取出三册褪色的书给我，书面上除《罗霄军》三个大字外，还有“供批判用”四字。落款是某部革命造反总部。我看了以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稍停一会儿，我向他们说：“这样的东西保留干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得

到这部被批判的书，觉得很宝贵，一直珍藏着，舍不得丢掉！”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们对此书的心情了。我也觉得，

我用了很大精力写这本书，写出的草稿又经多少风波，遇到“十年浩劫”那种“野火”，也“春风吹又生”了。

第十七章到晋察冀军区

1942年2月间，冀热察挺进军和冀热察区党委机构撤销后，我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原挺进军所辖平西地区和平北、冀东三个军分区分编为晋察冀军区的第11、12、13军分区，由军区直接指挥；原冀热察区党委所辖的平西、平北、冀东三个地委，改称第11、12、13地委，归中共晋察冀分局直接领导。

晋察冀根据地是平型关大战后，由聂荣臻率领八路军115师一部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的。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已成为拥有北岳（又称冀西）、冀中、冀东、平西、平北等广大地区的大块抗日根据地，巍然屹立于敌后，誉满中外。

5月初，我由平西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平山县寨北村，这是位于太行山区的一个大村庄，有一两百户人家。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设在这里及附近小村，人来人往，显得热闹而又秩序井然。我到后，聂荣臻司令员还向各兵团和总部发了电报，通报我已到达军区正式履职。

对于这次军队序列的调整，我认为是恰当的。挺进军经过三年苦战，已实现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发展平北的战略任务，形成为冀热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高级军事领导机构，这就为晋察冀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创造了重要条件。撤并机构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是发展的结果，平西、平北和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大发展，更促成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的大好局面，敌后根据地更加统一巩固，显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我为此感到兴奋和鼓舞。

同时，我也为能协助聂荣臻司令员工作而感到高兴。记得长征刚到陕北时，我第一次见到聂帅，对他说：

“你是我的老长官。”

他很奇怪，说：“我们刚认识啊。”

我说：“我同你虽然没见过面，但久闻你的大名。南昌起义时，我在上级的通报上看到你是我们师又兼军的党代表。”

他一听，高兴地问：“你在哪个部队？”

我说：“是叶挺部11军24师71团的。”

后来，我到120师，关向应又告诉我，聂荣臻是有知识的人，先后在法国、比利时、苏联留学，在苏联还曾与叶挺是同学，这使我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我从晋西北调到冀热察挺进军后，在聂帅领导下工作，虽不经常见面，有时到军区开会，与他也有接触，觉得他是一位忠厚长者。有人曾说过，聂荣臻不仅能治军，还能治国。晋察冀根据地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不仅部队在前方打得好，后方建设也搞得好，很有秩序。兵工厂、被服厂、白求恩卫生学校以及边区银行等等，一应俱全。当时，晋察冀已制造出TNT炸药，这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中是最早的，因聂荣臻早年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学过化学，能在技术上和经营上给军工部门以指导。其他如财政、粮食、民兵等工作都搞得很出色，特别是边区发行的纸币，在战争时期根据地通行，很有威信，等等。当时，延安的报纸，赞誉晋察冀为“模范抗日根据地”。我感到，能在聂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到军区时，正是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期间，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协助聂荣臻指导冀中区的反“扫荡”斗争。

那时，晋察冀的通信很灵敏，各分区都有电台，我们同冀中军区与各分区的联系主要是无线电通信。

敌人这次对冀中的“扫荡”是空前残酷的。从5月1日开始，由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日军3个师团主力 and 5个混成旅团的大部及一部分伪军，共5万余人，采取所谓“十面出击”、“铁壁合围”等战术，企图彻底摧毁这个处于华北日伪心脏部位的平原抗日堡垒。敌人先在边缘地区反复“扫荡”，稳扎稳打，逐步增建据点，形成包围圈，然后步步向根据地中心压缩。企图把我军和领导机关，诱迫、压缩到中心区歼灭。

从5月中旬起，敌人陆空协同，向我根据地腹心地区多路进攻，进行合围。平原交通方便，只要一路与我军接触，其余多路便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同时，还建立新的点线，形成所谓的“铁环阵”，使我内外线部队隔绝，不能互相支援，不便于回旋。但这种阵势，又使我有隙可乘。冀中区部队领导以小部兵力诱诸路之敌于一处，造成合围的大空隙，主力部队及机关则在群众的掩护下，从敌人空隙中，先后突出重围。

冀中的斗争形势越来越严重。八路军总部于5月下旬指示，为了长期坚持冀中，某些地区要改变斗争方式，一部分主力部队，相机转移山地，同时命令各战略区积极配合。我们及时将总部的指示电告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并指示所属各军分区向平汉、北宁、正太、平绥沿线积极出击，牵制深入冀中中心区的敌人。6月初，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决定，除留下一部分武装坚持斗争外，机关和部队分别向外转移。一部分部队到北岳区；领导机关率主力到冀鲁豫区，然后再转到北岳区。

在冀中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向外转移后，冀中进入了艰苦的反“清剿”斗争。这期间，我们曾指示，指导军民转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强调平原游击战争以武装斗争为主，从冀中报来的情况中，我们了解到，当地群众在家里挖地洞、垒夹墙，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掩护我军伤病员、零散人员和地方干部。有的地方武装还利用地道与敌人展开斗争。我和聂荣臻司令员、唐延杰参谋长一起，对冀中地道斗争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认为在敌据点增多、敌伪奸好特务不断袭击的情况下，为能与敌坚持斗争和减少自己的损失，自动创造与开展地道斗争，是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创造，并向其他地区介绍了地道斗争的作用及斗争中应注意的问题。

我们还提出关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中武装组织问题。指出武装斗争须与人民群众的斗争密切联系，武装斗争应是分散的、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并对民兵、游击队、地区队等武装的组织形式、斗争方式和领导问题作了具体规定。由于广大军民的顽强勇敢，也由于斗争方式和指导方法改变，敌重兵无能为力，疲于应付。冀中根据地的形势得以逐渐好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扬言华北是它的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对晋察冀根据地采取了多种形式的进攻，除了“扫荡”以外，更加重视对边区进行“封锁”和“蚕食”，到处建造封锁沟，制造“无人区”，把根据地分割成好些块。到1942年，以堡垒推进为核心的“蚕食”活动，已对边区造成严重威胁，有些地方，敌人的据点、堡垒和封锁线，一直伸到我们鼻子底下。我们派部队去打击敌人，拆毁堡垒，填封锁沟。但敌人与敌伪政权强迫人民劳役，我们夜里破坏了，白天它又修起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了粉碎日军的“蚕食”和封锁，扭转根据地不断缩小的被动局面，1942

年9月，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在驻地召开了党政军干部会议。会议由聂荣臻主持，主要研究贯彻

中央关于“敌进我进”的指示。我们在会议上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与会同志认为，必须把反“蚕食”、反“扫荡”斗争联系起来，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集中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力量，组成多条战线的全面对敌斗争。应针对敌人在兵力配备上“前紧后松、前强后弱”的弱点，把游击战争发展到“敌后之敌后”去。地方部队与主力部队都应如此。

我在会上作了军事报告，主要讲反“蚕食”斗争、将“蚕食”与“扫荡”的关系和反“扫荡”三个方面对根据地的军事斗争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我认为，敌人“蚕食”政策的基本特点是“以缓和的、隐蔽的、波浪式的形式逐渐

向我推进”；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总结几年来速战速胜及进攻根据地屡遭失败的教训而实行的战略转变。敌人“蚕食”政策在军事上的表现，是系统的堡垒主义。敌人广泛地构筑沟墙堡垒，并依托这些工事逐步向我地区推进，由点线的占领逐渐扩大为面的占领。

我在报告中指出，在反“蚕食”斗争中要防止一些错误倾向，如对敌人“蚕食”政策的严重性认识不够。以为

日寇兵力不足，不可能在广大地区系统地实行其堡垒政策；还有人认为敌人在我大块根据地上建立几个小小的堡垒，不过九牛一毛；有些地区在敌“蚕食”尚未严重时，军事上、政策上缺乏具体的研究与认识，不能采取有效的对策，等等。我提出，华北现时党和军队最艰巨的任务是反“蚕食”斗争。主要方针是到“敌后之敌后”去，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把敌后活动与正面斗争相配合，平原与山地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相配合，地方军与正规军相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打破敌人的“蚕食”。

对于敌“蚕食”与“扫荡”的关系，我认为敌人的目的，都是变我根据地为我敌占区。但二者的方法则不同。“蚕食”是以政治斗争为核心，配合军事的、文化的、经济的各种斗争，采取比较和缓的、隐蔽的方法，以逐渐削弱我们的力量。但这并不是说敌人不重视军事斗争。大“扫荡”则是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向我进攻，以军事斗争为主，配合其他形式，采取重兵压境，以多路的分进合击，企图一举毁灭我根据地。这两种方法虽不同，但并不矛盾。“蚕食”政策是敌人战略指导的总方针，不断的经济的“蚕食”，正是为了便于在一定时期的大“扫荡”。因此，我们不能只注意积蓄力量准备反“扫荡”，也应注意反“蚕食”，应把反“扫荡”与反“蚕食”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在报告中，我分析了敌人过去对根据地大“扫荡”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反“扫荡”特别是山岳区的反“扫荡”的方针和战术。在战役初期，因敌兵力处于绝对优势，应避免同敌主力决战，只以主力军的三分之一和地方军、民兵，展开广泛的游击战、地雷战；其余主力军一方面与敌周旋，一方面寻歼孤立的小股敌人。

我强调了要对部队进行控制制高点战术的教育，并对控制制高点战术作了阐述。我当时认为晋察冀军区位于大行山北段之五台山、恒山、军都山、燕山。这些地区山高势险，有些地段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扼制敌一连一排的行动。在战役中要适当控制制高点，阻止和威胁敌人运动，打击搜山的敌人，

保护山上的群众。在五台山和恒山山脉的东面，燕山南面，有广大平原，民殷物阜，在这些地区开展地道战，我们把山岳和平原斗争结合起来，形成对敌斗争的完整而有效的体系。加上“军民团结如一人”，就会如孙子所说：“故善用兵者，动于九天之上”，“藏于九地之下”。

除了军事斗争外，我还强调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方面也要密切配合。反“扫荡”的时候，要做好坚壁清野，使敌人得不到粮食，得不到休息，见不到群众，从各个方面消耗疲惫敌人，使敌人处处感受困难，减低斗志和武器装备的优势。要加强对敌伪军的宣传。敌军与伪军，以及敌伪政权之间，上下有矛盾。我可利用敌之矛盾，以及太平洋战局不利于敌的形势，进行宣传，分化瓦解，动摇敌之军心，以坚持持久战，保卫群众利益并促成我军的胜利。

寨北会议后，全军区执行向“敌后之敌后”的方针，北岳区主力部队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向“敌后之敌后”挺进。他们派出的几十支武装工作队，有的秘密越过敌人封锁线，有的分散到封锁线两侧，积极进行游击活动，开展军事和政治攻势，瓦解日伪军和伪组织，团结人民群众，孤立打击敌人，相机收复和开辟了1600个村庄，其中许多小块是我们原来的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开始扭转了从1941年敌人进行“蚕食”破坏以来的被动局面。

冀中区在寨北会议指引下，恢复工作有很大进展。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部队，组织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人统治的村庄，开展政治攻势，并利用平原上的青纱帐作天然屏障，特别是广泛地开展地道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摧毁敌伪政权。到1943年5、6月间，冀中区在反“清剿”中消灭敌伪军近4000人，使小部队和党政干部能在五分之四的区域里活动。不仅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而且为迎接主力部队重返冀中平原创造了条件。

冀东部队在1941年被迫转移到长城外的热河南部的山区，更深入到“敌后之敌后”。他们一面继续向东北发展，一面派出多支小部队，采取多种方式重返冀东腹地，在丰润、遵化、迁安、滦县等地开展反“清剿”、反“集家并村”斗争，开辟新区，恢复基本区。经过反复较量，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到后来发展成为冀热辽根据地。

平北、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和武装，挺进到“敌后之敌后”，不仅恢复了很多被敌人临时占领的地区，还扩大了解放区，形势也日趋好转。

寨北会议确定的方针，对晋察冀根据地打破敌人“封锁”、“蚕食”，变被动为主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针，曾受到党中央的赞许。

挺进到“敌后之敌后”的方针及其成功，是晋察冀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边区从建立起，以聂荣臻为首的领导机关就重视游击战争，加以五台山、恒山、燕山地形有利，群众好，正规军也一起行动，游击战争发展得很快很好。“模范根据地”之名，同样体现在游击战争方面。我曾以当时边区战争形势为背景写了一首诗，讴歌晋察冀的游击战争：

同仇敌忾驱倭寇，
敌后军民摆战场。
太行高耸燕山险，
善攻动于九天上。
燕赵慷慨悲歌地，
军民带甲同耕稼。
地道如网村连村，

善守藏于九地下。

这虽然是一首诗作，但从当时军事角度来说，也没有夸大。孙子所说“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抗战时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广大人民武装可以当之。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困难的阶段。日本侵略军加紧对中国人力、物力、财力的掠夺，以支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华北是其掠夺的重点，而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更是重点的重点。敌人对晋察冀根据地，连续发动了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活动”，不仅对冀中，对北岳、冀东、平西、平北等许多地方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复“扫荡”，加上1942年又遇到罕见的大旱灾。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都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困难。为了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党中央发出指示，指出目前一年内，我们的中心任务是积蓄力量，恢复元气。要坚决实行精兵简政，节省人力，休整兵力，训练干部和发展经济。

为执行中央的方针，1943年初，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了审计委员会。记得这个组织是根据边区政府副主席张苏的建议，借鉴旧社会的形式，成立这个组织的。其主要职能是控制编制，审计经费开支，检查粮食和物资供应情况。并推选我兼任了审计委员会的主任。我们为巩固精简成果，克服困难、渡过难关，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在控制编制方面，任何单位要增加或调整编制，都要经过审计委员会的批准，严格控制脱产人员。在财政方面，缩减公杂费用，严格经费开支手续，杜绝浪费，厉行节约。在供给方面，主要是尽最大努力节约，并作出具体规定。边区各级各系统成立实计委员会，并做广泛宣传，使边区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同志，认识在长期战争中增产节约和建立制度的重要性。我们还对边区人民负担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总结出脱产人员的比例数，即一面负担的地区（指较巩固的根据地）按根据地总人日计算，要30人才能养活1个脱产人员；两面负担（不巩固的根据地、游击区对敌我两面都负担）的地区要100人才能养活1个脱产人员。这个结论比较合理。对后来保证边区人民合理负担起了重要作用。

晋察冀边区的审计工作当时在华北各根据地是个创举。这项工作的开展，保证了边区财政收支的大体平衡，稳定了边币，统一了编制，减轻了人民负担，对经济的发展和持久作战起了好作用。

1943年夏，程世才去延安学习，我又接替他兼任边区人民武装部部长。在此期间，有两件事我记忆较深：

第一件事是这年夏季保卫麦收的斗争。北岳区的东西两面是起伏地，再往北，沿平汉线是一大片平原，这个地区种麦很多，是边区的主要产粮地。过去一到麦收，日、伪军就纷纷出来抢粮。我考虑，如果把这里变成一面负担，就能解决北岳区粮食供应的大部分。于是决定，分散一部分正规军，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保卫麦收。当时从1、3、4分区各抽两个团，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产麦区。

这时期，敌我双方在麦区展开了紧张的争夺战。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规模比过去大，人马也多，有正规军、游击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运粮车马等。虽然目标大，但都分散躲藏在麦地、田坎以及利于隐蔽的地形地物，敌人不易发现。加上我们地形熟，情报明，民兵和地方干部都是义务情报员，敌人来抢麦，我们就打枪，给敌以杀伤，并造成敌人混乱。敌大队来，我又转移了。埋伏在附近的其他小队如果看到有机会，也同样打。这样，敌伪既不能

割麦，运麦，兵力又受损失。反复搞几次，也就很少再来了。这种战争，江西苏区时期叫“麻雀战”。但那时的“麻雀战”，都由游击队担任；而现在正规军也参加。当然，无论在战术、技术和指导方法等方面都有发展、提高。这是一种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及经济斗争于一体的好的斗争形式。

这次保卫麦收的斗争达到预期目的，成熟的粮食一粒也没有落到敌人的手里。

第二件事是这年秋季反“扫荡”，我们把主力部队分兵敌后，与地方武装密切配合，以我之长，制敌之短，取得了大胜利。因为我们熟悉地形、民情，正规军敢于分散，不怕没饭吃；民兵又善于单兵、小组射击，利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斗争形式，机动灵活；而敌人是地形、民情不明，缺粮，不敢分散，尤其是日军不敢分散行动。当时，日军2万多人，伪军1万多人，对北岳区进行“扫荡”，我们留下小部队和民兵以游击战和地雷战箝制敌人，主力转到敌占区和游击区，实行内线与外线结合、主力与民兵结合，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结合，武装斗争与其他多种斗争相结合，使敌人到处被动挨打。这次反“扫荡”，我们的损失不大，但敌人的损失却不小。据统计，共歼敌9000余人，其中被民兵歼灭的占一半，说明我们的民兵有力量，也说明正规军与地方武装配合得好，可以用小于敌人的兵力战胜强大的敌人。

1943年夏，抗日战争进入第7个年头。日军由于在太平洋战争中连续受挫，不得不继续抽调部队增援南洋，当时从华北抽走了3个师团，其中有2个师团是原驻晋察冀地区的。边区形势开始好转，根据地也在逐渐恢复和发展。但日军为了掩盖其战略企图，在抽走部队之前又调集兵力，准备对根据地发动新的大“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准备以40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7月中旬，军区接到中央命令，派吕正操率6个团开赴晋西北担负保卫中央的任务。8月1日，中央通知聂荣臻准备去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并决定由程子华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由我代理军区司令员，刘澜涛为军区副政委。分局根据中央精神，决定将北岳、冀中两区党委取消，工作集中于晋察冀分局；原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合并于晋察冀军区，各军分区由军区直接指挥。

为了迎击敌人的大“扫荡”，我们一面布置战前准备工作，一面研究制定反“扫荡”的作战方案，决定仍采取内线同外线结合、主力同民兵结合、武装斗争同其他各种斗争相结合的对敌斗争方针。为此，划分了内外线部队的活动地区及物资掩蔽地区、补给地区和内线部队应控制的制高点（区）。加强了情报工作，把重要的电话线路更多地改成了隐蔽线路（晋察冀军区早就有隐蔽线路的布置）。并设立了宣传站，印制宣传品。正规军连队还组织了飞行射击组和飞行爆破组，民兵进行侦察编组和爆破训练。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和秋收、秋耕、秋种的各种准备。到8月底，北岳区全体军民，包括4万多部队和18万民兵，对敌人每年都要进行的“秋季扫荡”，都已严阵以待。

就在准备反“扫荡”期间，我突然身患重病，整天高烧不退。聂荣臻去延安时，还以为我的病会很快好起来，但到反“扫荡”开始时，我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了，由程子华和唐延杰负责反“扫荡”的组织和指挥。

敌人这次大“扫荡”，先从平北开始。8月8日，敌6000多兵力突然向平北根据地发起进攻，由于敌人的进攻来得突然，平北党的领导机关和部队仓促应战，一度呈现混乱，但很快调整了部署，由被动转为主动。至9月中旬，“扫荡”平北的敌人在我打击围困下，大部退出了平北中心区。

紧接着，敌人又对北岳区开始了所谓“毁灭扫荡”。9月15日，日伪军近2万人分别由保定、石家庄、阳泉、五台、张家口、宣化等地出动，以奔袭动作，很快占领了我根据地的松山、蛟潭庄、唐梅、会口、下关等地。这时，我的病仍不见好转，整日高烧，便随边区政府、华北联大，白求恩卫生学校等单位转移到神仙山，先佛也带着孩子到神仙山来既参加反“扫荡”又照看病人。

神仙山地处沙河、唐河、滹沱河之间，位于阜平城北约60里。主峰奶奶尖海拔1800米，兀立在群山之间，地势险要，日寇历次“扫荡”都不敢轻易进入。神仙山在军区划分防区时，属三分区防地。我在养病时的警卫都由他们负责。但这里北邻一分区，反“扫荡”一开始，一分区第1团政委亲率一个连来担任警卫，军区卫生部政委姜齐贤也来了，还有陈其源大夫来负责我的治病。姜是长征老兵，精通医术又有战争经验，不仅随时指导医生工作，还同一团熊政委和先佛研究情况，决定行动。我们一行100多人，组成了一个小单位，在反“扫荡”中独立行动。

9月下旬，敌人深入北岳区地区后，除四处“搜剿”外，还以飞机在空中侦察，发现哪里有我军的踪迹，就进行轰炸，地面部队立即前往合围。沙河、唐河、滹沱河之间地区，是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军工厂也设在这里。敌人进入根据地后，主力就朝着这三条河流之间的地区突击。敌主力一部便闯入了神仙山地区。

三分区政委王平等很关心我的安全，经常向我们通报敌情。一天晚上10点多钟，王平、黄永胜打电话给我，说敌人将分4路围攻神仙山，让我当晚就要离开那里。他们隔一会儿来一个电话，到12点多敌情完全清楚了。最后的电话中说，敌人将在拂晓前形成对神仙山的战役包围圈，情况十分紧急，要我们在拂晓前必须突出去。我当时还发着39度的高烧，医生、护士提出让我坐担架走。我说，坐担架走山路很难，行动迟缓，拂晓前出不去；骑骡子天亮能突出去，还是骑骡子。有关同志考虑我的病情，仍在犹豫。先佛坚决主张骑骡子，并立即行动。夜暗中，我们从敌诸路分进的间隙中悄悄地插出外线。侧面一、二里处敌人的哨兵在烤火都能看到。拂晓前，终于顺利地转移到了安全地带。此次神仙山反扫荡，好在先佛同我在一起，在军事上处于难下决心的时候，她能也敢负责下决心。好久之后，我曾问她：“敌人包围神仙山那天晚上，你为什么要我骑骡子走？”她从容地说：“正是因为情况紧张，才叫你骑骡子。否则不仅你出不去，大家也会被你拖住。我看你那天虽然发高烧，你还挺得住。即便万一从骡子上跌下来，也比被敌人包围好。我们人多，有办法。过去红军打仗行军，不是也有很多伤病员在马上救护的？”

我们突围后，保卫神仙山的部队，依山据险，居高临下，以事先布设的地雷和机枪射击，节节抗击敌人，经过一番苦战，终于将敌人击退。不久，我们又返回神仙山。

敌人的“扫荡”仍在继续。我的病情不见好转，持续高烧，却始终未能查出病因。姜齐贤写信给七八里地也正是在反扫荡中的卫生部长殷希鹏，把我的病情告诉他。殷回信说，根据我的精神状况，看来不要紧，并说我长时间体温较高，说明我的身体还有抵抗力。姜齐贤接到殷希鹏的信，精神上的负担大减轻。又立即告诉我。殷过去在中国大学毕业后，又到日本庆应大学研究病理，学术上很有成就，回国后当医科教授，又任河北医科大学校长，

抗战初在河北参军。姜对殷素有学术上的信任，就按殷的指导思想为我治疗。我既听医生的话，又以乐观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病，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10月底，2000多日伪军再犯神仙山。我们与当时隐蔽在这里的机关、学校和群众一起再次转移。途中，为了能随时行动，警卫战士们天天晚上和衣就寝；马匹每到一处，只卸下马鞍稍休息一下又重新放上。先佛带着四岁的孩子也在此。她既要照顾孩子和病人，又随时都在注意敌情和我们这个小单位的行动方向，还要注意和我有关的单位联系。总之，凡与我们这个单位有关的事宜，她都在注意。有一天，我们刚刚突出包围圈，敌人便在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下，蜂拥扑向神仙山。我守山的部队在外围部队配合下，激战两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到11月，敌人的“扫荡”已成强弩之末，从11月中旬起，日伪军的主力陆续转移到沟线外抢粮，只留下一部分在根据地内，以临时据点为依托，奔袭、合击我机关、部队，并大肆烧杀破坏，交替掩护撤退。军区指挥部队乘胜追击，迫敌撤退。到12月中旬，北岳区反“扫荡”战役胜利结束。就在此前不久，我几个月来的高烧突然退下去，精神状态更好了，仍留在3分区驻地栾头休息。这时，一团政委和步兵连归建了。在几个月的行动中，他们和三分区部队处处关心我的安全，照顾我的行动，我终生难忘。

北岳区的这次反“扫荡”，取得很大胜利。三个月中，军民共作战5600多次，毙伤日伪军1.1万多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反“扫荡”后，北岳区向察南、雁北伸展：冀中军民在反扫荡时隐蔽起来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又重新恢复了，还新建大批抗日村政权；冀东部队在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重返关内，不仅解放了长城沿线的“无人区”，而且将冀东游击根据地发展成为更广大的冀热边区。

在3分区休息了两、三个月后，我的身体渐渐康复。回到军区机关不久，接中央电报，让我去延安养病、学习，并准备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4年4月间，我从阜平动身去延安。路上要通过3个游击区，2分区司令郭天民同志专门派部队护送。在过同蒲路时，因后面的部队炸铁路，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行动，立即来追击。我们一面抵抗，一面向附近的山上转移，敌人不知虚实，追到半山坡便退了。我们下山后继续赶路，不久就到了晋西北吕正操的司令部，住了10天，又去兴县住了几天，就过了黄河。西北的4月，天气转暖，冰雪开始融化，黄河上浮动许多冰凌，我们好不容易乘船渡过黄河，在绥德休息了两天。红军时期的战友袁任远在那里当专员，派了一辆汽车将我们送到延安。

到延安后，我住在枣园，一边养病，一边自己学习整风文件。蹇先佛也是七大代表，与我一起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这时，延安整风的学习高潮已经过去；所谓的“抢救运动”也过去了，整风运动正进入到最后总结提高阶段。

1945年2月，在延安举行了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即华北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及华北各根据地的负责人，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议题，本来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工作，但后来却发展成为对彭德怀的批判。一些同志在发言中说彭总领导的百团大战，是大错误，一是暴露了自己的力量，二是帮助了国民党顽固派。还说了其他一些错误。我在会上发言，也批评了彭的错误，但没有上纲，并说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打得不错，扫除了敌伪许多军事设施，恢复了根据地不少面积，云

云。

散会后，一出会场，有三位同志（内有两位是江西时期的同事）不太高兴地对我说：今天算是知道你的思想情况了！意思是我的思想跟不上形势，落后了。说心里话，我是不愿跟这种形势的。我认为，人对事应该实事求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能说违心的话，因为我认为百团大战虽有缺点，但没有政治性的或严重的军事错误。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6月11日闭幕，共开了50天。我出席了这次大会。“七大”是一次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她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当时在延安的晋察冀主要领导人有聂荣臻、刘澜涛和我，虽然此时不在晋察冀根据地，但我始终与在那里主持工作的领导同志保持着联系。1944年夏，我到延安不久，一次和聂荣臻交谈，当时冀中形势好转，冀东部队深入热南、辽西，发展很快，整个晋察冀军区已有18个分区，鉴于地区扩大和斗争形势发展，军区直属单位太多，指挥不便，我们应向中央建议在晋察冀建立二级军区。他同意了，就向中央建议，中央也很快同意了。

晋察冀军区下面成立了冀中、冀晋、冀察、冀热辽4个二级军区，并相应成立四个区党委。冀晋军区以第2、3、4、5军分区组成，赵尔陆任军区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兼冀晋区党委书记；冀察军区以第1、11、12、13军分区组成，郭天民任军区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兼冀察区党委书记；冀中军区以第6、7、8、9、10军分区组成，杨成武任军区司令员，林铁任政治委员兼冀中区党委书记；冀热辽军区以第14、15、16、17、18军分区组成，李运昌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兼冀热辽区党委书记。

二级军区和4个区党委成立后，连续向日伪军展开攻势，使整个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出现了迅猛扩大的新局面。过去一般的认为，在抗战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很难发展，但晋察冀军区在相持阶段却得到了发展。这说明事物不是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只有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掌握这种局势，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1945年8月，国际国内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继1945年5月希特勒投降之后，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当时我各大战略区的主要领导人都还在延安，八路军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由察哈尔、热河向北行动；冀热辽的部队立刻向辽东、吉林挺进。我们军区在延安的几位领导人得知苏蒙联军一路将由蒙古直插张北，认为这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互相配合的好机会。8月10日，聂荣臻、刘澜涛和我将这一情况电告在晋察冀主持工作的程子华、耿飏，要他们立即派出部队向张家口。张北方向进攻。他们迅速行动，于8月底先后夺取和接收了张家口、张北和承德等城市。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那些天，延安一片欢腾。宝塔山下，延河两岸，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记得8月15日那天，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许多人兴奋得敲打脸盆欢呼，入夜，各窑洞门口都燃起篝火庆祝，八年抗战，艰苦奋斗，胜利的喜悦难于言表。

日本政府虽然宣布投降了，但日军庞大的武装尚未解除，仍然盘踞着我国许多城镇和交通要道。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的支持下，企图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他一面邀请

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一面调兵遣将，抢占大中城市，并极力阻挠破坏我抗日军民向日伪军反攻和受降，无理地要我军“原地驻防待命”。然而，这时国民党军队远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因此全面反攻的任务，自然也只能由我军来担任。日本投降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和指示，晋察冀军民向北平、天津、张家口、承德和山海关、锦州等地发起反攻，并以一部向东北挺进。

为了加强对全面大反攻的领导，8月18日，中央决定组织晋察冀中央局，以聂荣臻、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黄敬、赵振声和我为常委，以成仿吾、李运昌、胡锡奎、刘仁、杜理卿、朱良才、詹才芳、赵尔陆为委员，聂荣臻为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为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我为军区副司令员。不久，我和聂荣臻等一起重返晋察冀军区，执行中央赋予我们的新的历史任务。

第十八章保卫承德

1945年9月9日，在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等去重庆谈判后不久，我与聂荣臻、刘澜涛、罗瑞卿等搭乘美军到晋察冀接飞行员的飞机，离开延安，返回晋察冀。同机的有日本共产党中央主席冈野进，他是准备取道晋察冀回日本的。

离开延安前，中央召开过一个会，由刘少奇主持。王稼祥、彭德怀，还有我们晋察冀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参加了，会上除了决定成立晋察冀中央分局外，还对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我们的主要任务进行了研究。当时中央决定日本投降后，我军要尽量多占一些地方和主要交通线，特别是东北。晋察冀的部队已就进占领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和热河省会承德，中央对此十分重视，要求我们一定控制住两城，以便使热察两省全部成为我们的根据地，并以此来联结华北和东北两大战略区。

飞机场位于涿源，是我军从日军占领地收回来一个日本军用机场。当降落时，军区派来接我们的汽车已在那里等候。住了一天，我们换乘汽车到了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张家口。

张家口是抗日战争将结束的时候，我军从日军所控制的地区夺回的第一座大城市。当时我们还在延安，苏蒙联军一路将由蒙古直插张北。正在晋察冀主持工作的程子华等，马上派平北分区司令员詹大南、政委段苏权率部向张家口发起进攻，夺取了这座城市。我们在延安听到张家口电台的广播，说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好高兴啊！这也是我们抗战以来夺取的第一个省会。

张家口位于平绥线东段，连接察绥、大同、晋东北地区，北负长城，南傍洋河、桑干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军区机关从乡下移驻该城后，这里便成为晋察冀的指挥中心。我们到时，市委、市政府都成立了，还成立了察哈尔省政府，省主席由晋察冀边区政府副主席也是察哈尔籍并多年担任中学教师的张苏兼任。军区司令部设在离火车站不远处的大院落，这里原为日军驻蒙疆派遣军的司令部。我和聂荣臻都住在这里。

根据中央的部署，晋察冀军区的任务，首先是集中主力部队，尽力争取向日伪军受降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等地。本来，包括张家口、承德等城市在内的华北地区，理应由我们来接收。因为当时平西、平北、大青山、燕山南北广大地区，都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八路军早就把北平四面八方包围起来了。但蒋介石为了独占抗战胜利果实，下了一道命令，阻止我们向日军受降。并令日军不得投降八路军。

当时，冀中区党委曾派人到北平城内，找到日本驻军最高司令官，要他向我们投降。日本人显出很委屈的样子说，他接到命令，不能向八路军投降，要等国民党军队来受降。

蒋介石为了抢占地盘，一面玩弄“和谈”阴谋，邀请毛泽东主席去重庆谈判；一面发出“剿共”密令，并在美国的帮助下，迅速地向华北、东北、华东、中原地区运送军队，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准备内战。在我们占领和接收张家口、承德后，国民党反动派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该由我党我军来接收敌占区城市的斗争。

这时期，国民党军队正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在西面，傅作义以马占山为先锋，由绥远直趋张家口西南的柴沟堡（今怀安县），妄图从我手中收复张家口。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率部在柴沟堡，将马部击退。

但国民党的进攻仍在继续。阎锡山部在抢占了太原之后，又以一部沿同蒲路北上，进占大同及其周围地区；傅作义部在日伪军的配合下，抢占了归绥（今呼和浩特）、集宁等城市及绥东、绥南、察西、察北广大地区后，又沿平绥铁路东犯。随后，国民党军又准备从北平向平绥路东面进攻，从北平、唐山方向向热河进攻，企图抢占承德。他们的战略意图是，以张家口为主要目标，从东西两面向我晋察冀解放区进行夹击，占领察哈尔、热河两省，从而打开由陆路进入东北的通道，并切断我华北、西北、东北三大战略区的联系。

为了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反击敌人的进犯，当傅作义、马占山逼近张家口时，晋察冀和晋绥军区联合行动，组织绥远战役，以消灭傅作义部，收复归绥，解放绥远，切实保障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根据地。

10月22日，我军展开收复平地泉（今集宁）的战斗，我和罗瑞卿由张家口去前方巡视战况。本来战场形势对我们很有利，前一天，我们在集宁西面打得好，城里的敌人已经动摇，只要集中兵力继续打下去就能解决战斗。而这时傅作义的101师来了，前线指挥员就叫停止攻打快要解决的敌人，去打敌之主力101师，结果没有打好，让敌人跑了，城里的敌人不仅没有消灭，傅军主力也来了，绥远战役我们打了几仗，大都打成了击溃战，虽给敌人的进攻以打击，但没有达到解放绥远的目的。

就在绥远战役开始后不几天，军委获悉敌人将有3个军8个师集中北平，判断敌除一部保护北平及平津线外，主力将向承德进攻，并威胁张家口。抗战胜利后，中央军委始终重视控制热、察两省，曾向全党指出：“当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还说“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根据中央的指示，8月下旬，我冀热辽部队从兴隆一带越过长城，进入承德。派胡锡奎、段苏权、王国权等前往承德，并成立了中共冀热辽区党委热河分委和热河军区，开始接收工作。10月下旬，苏军从承德撤出后，我正式组成热河省人民政府，李运昌被选为省主席。当国民党军开始大举向平津运兵，准备进攻热河时，中央又迅速作出了保卫承德的部署。鉴于我们当时正注意于绥远作战，对热河、冀东照顾不及，中央决定将冀热辽区交东北局指导，令程子华去承德主持一切，并令由山东调到冀东的刘其人师，星夜兼程开往古北口、承德之线，担负阻击可能由北平进攻承德之蒋军。

为保卫热河及平北，中央决定组织晋察冀（当时称冀察晋）第二野战军，并任命我兼任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兼政治委员。当时我和罗瑞卿正在西线，接到命令后，立即赶回张家口，着手野战军的组建工作。11月4日晋察冀第二野战军编组完成，辖冀察刘道生、冀中黄寿发。冀晋赵尔陆诸纵队，共7个旅14个团。部队编成后陆续开往承德，我和罗瑞卿也从张家口去承德。

到承德后，看到形势很严重。一为敌人装备好，多为美械化，运动快，又有美国直接帮助，如出动飞机、军舰帮助国民党运兵，其中第13军，已从营口登陆，到了锦西、阜新、朝阳一带，准备向承德进攻。同时，蒋介石还收编大批伪军为其效力；二为我方多为新组建部队，仍是游击战争时期的旅团，没有经过整训补充。

但我们也有优势，冀东是我们的根据地，承德地区有很好的党的工作基础和有利的群众条件。部队上下情绪很高，决心保卫承德。我到承德后，作了一个动员报告，号召党政军民一起干，坚决击退国民党的猖狂进攻。

11月9日，中央又决定，冀热辽中央分局仍归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以程子华为分局书记；并成立了冀热辽军区，我为司令员、李运昌为副司令员，程子华、罗瑞卿分别为第一、第二政治委员；同时将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改称为晋察冀辽热第二野战军，令刘其人师划归野战军建制。不久，又将原拟调东北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杨（得志）苏（振华）纵队留承德地区。这样，第二野战军加上冀热辽军区原有的热辽黄永胜纵队、冀东詹才芳纵队，共有6个纵队和1个师的兵力。我们可以控制承德这一联结华北与东北的枢纽。

11月26日，由美军帮助海运至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占领了锦州。蒋介石命令他们停止向东北前进，准备与北平、唐山方向的国民党军相配合，进攻热河。对于国民党军的这一企图，中央和军委连续致电我们及到达东北的林彪，指出顽军有从古北口及锦州以至喜峰口、绥中方向进攻热河之可能，望林彪与我们联系，作必要部署。12月17日，中央又电告林彪：顽军进攻热河，除古北口、喜峰口两路外，锦州方向和绥中方向必有蒋军同时动作，并规定由他们负责，打击与消灭自锦州、绥中向热河进攻之蒋军。

12月28日，国民党军第13军、52军共3万多人从锦州出动，侵占义县，呈进攻热河态势。29日，中央军委电告我们：蒋军进攻承德似急于张垣（即张家口），但亦不会放弃对张垣之进攻与平绥路之打通。因此，除准备保卫张垣外，必须确切布置保卫承德。如该两城失守，不仅难以收复，华北、东北两大战略区将被分割，对我不利。

这时，由于我各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进犯，又由于蒋介石的主力大部分还远在西南等大后方，一时难以全部调到内战前线，所以在美国政府出面“调处”的情况下，蒋介石又玩弄起“和谈”阴谋，表示接受我党停止内战的主张。1946年1月5日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1月10日双方正式公布这个协定，并规定从1月13日24时开始生效。还成立了由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共代表和美国调处代表三方人员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负责监督停战，调处冲突。

但是，蒋介石并无和平诚意，他一面签订停战协定，一面继续密令部队在停战令生效前，抢占战略要点。党中央，中央军委对于蒋介石的阴谋，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停战协定达成前后，多次指示我们准备迎击顽军对承德的进攻。并决心保卫承德。

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我们在承德的东、西、南面，作了迎击敌人的具体部署。

正当我们紧张布防的时候，国民党军从三个方向对热河发起进攻，企图夺取承德。

西面古北口方向，国民党军第16军、第92军的3个师和伪治安军的一个师，沿平承铁路北进，企图夺取古北口，进占承德。古北口是长城要隘，雄踞雾灵山脉，是北平至承德的必经要点。1月上中旬，敌以主力在飞机掩护下向我古北口外围阵地进攻，与我在该地区的冀东14分区及冀、晋纵队，以及冀察纵队交战，我将蒋敌击溃，敌退至密云东北之石匣古城（现已没在密云水库中）固守。

古北口战斗的胜利，迫使停战令在我区生效。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了美

蒋的“和谈”，实际是为了配合军事进攻。有利则打，不利则谈，失利后利用停战令生效以保存实力，美蒋这种行动，也提高了我们的政治觉悟。

南面喜峰口及其西南方向，在停战令下达的当天，国民党第94军1个师、第43师两个团及伪军一部，由唐山出发，进攻我冀东腹地，并企图北出喜峰口，进攻承德。我冀东纵队第13旅及唐山工人总队、两个县支队，在民兵的配合下，以一部兵力在宽大正面上扼守阵地，主力则实施迂回，击敌侧翼。1月13日，敌进占丰润，随后又继续北犯，被我军阻击于遵化城以南的青草坞、古石城一线。停战令生效后，敌仍占我玉田县城棒子镇。15日，我军全线反击，至18日收回了玉田县棒子镇，敌人缩回唐山。

东面平泉方面，是承德保卫战第一阶段的主要作战方向。控制平泉，才利于保卫承德。1月11日，中央给程子华和我来电，指出：“国共停战命令已发表，你们应坚守承德、平泉、古北口、凌源及其他要地，坚决消灭进攻之顽军，不得轻易退让，以保持我在热河之地位”。这时，杨苏纵队只有一旅两团赶到平泉，我只好临时留下由山东开往东北的王兆湘旅（两团）参战。罗瑞卿又奉命去北平军调部工作，恰逢李运昌率原冀热辽军区指挥机关从东北来平泉，与我合成一个指挥机关，利于统一指挥。

国民党军急进至平泉城东20公里的杨树岭，这时离停战生效时间只有一天。从蒋军当时进攻的态势和平泉的地形来判断，必分两路，一路沿马路直到平泉城；另一路将从杨树岭向东南经山谷人行道至小寺沟，从南面迂回。我决定分两路迎战。

平泉战斗是十分紧张的。主要是蒋军全是美械装备（不仅武器，就是运输、通信器材也是美国造的），他们沿着日伪军修筑的平坦马路前进，速度极快。而我军装备仍是小米加步枪，部队又多是刚从华北其他地区调来、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加之有些部队，没有装备，不能参战，致未能有效地阻止住敌人。那天晚上打到1点多，停战令生效了，敌我各占了平泉城一半。但我们的阵地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很不利。次日晨，我们撤出城外，平泉便成为有争议的地区。

平泉虽然失守，但承德仍在我手。国民党妄图在停战令生效前抢占承德的阴谋破产了。这是承德保卫战的第一阶段。停战令生效后，国民党军继续蚕食我解放区，战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根据停战协定，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若干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点进行调处。当时热河是国共双方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先后派来了赤峰第2执行小组和承德第11执行小组。本来，军调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停战令执行情况，调处双方有争议的事宜，防止发生军事冲突。但事实上美蒋代表狼狈为奸，把执行小组作为扼制我军行动、扩大国民党军队占领区的工具，使调处工作处于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热河的调处活动，就是在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中进行的。

1月19日，第2执行小组到达赤峰。当天，国民党第13军的54师公然西犯，侵占了天义、乃林、平庄等地，企图抢占赤峰。由于我方的公开揭露，制止了敌人的这一阴谋。2月1日，第11执行小组到达承德后，国民党军仍不断地向锦承路两侧我解放区挑衅，并企图偷袭承德。2月上旬的一天，国民党第13军一个师，由天义进占平泉城以北约50公里的黄土梁子。不久，在冀东的国民党第94军第5师，又以开到东北“接收”为名，进至绥中后，折向热河，违约北犯，并不顾中共方面谈判代表的一再警告，连续进犯建昌、刀尔登等地，2月11日进至平泉以南的饽罗树，这样就在东面形成多路进攻

承德的态势。

这时，承德第 11 执行小组前往平泉，但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

国民党军即以 4 个师兵力，从平泉城分数路向承德进攻，冀热辽军民再次展开了保卫承德的英勇作战。在北面和东面，我杨苏纵队迅速击退了从黄土梁子和沿承（德）平（泉）公路向承德进攻之敌；在东南面的饽罗树地区，我冀东、冀晋、热辽等 3 个纵队的主力，由詹才芳统一指挥，给该敌以严重打击。

在饽罗树战斗前，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我于 2 月底乘美国的飞机从承德飞往北平，会商热察两省的调处问题。记得周副主席曾对我谈到美国的政策，说美国战后需要发展经济，中国是个大市场，所以他们不希望再打仗。但是美国帮助蒋介石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云云。

在北平大约住了四、五天，我与三人军事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人员飞抵张家口调处，当天又返回承德。这时，承德执行小组正准备赴平泉、叶柏寿、建平一带调查。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为中共代表规定的方针是，党坝协定未执行前，不与对方谈判任何新协定，并规定主要任务是调查 1 月 13 日 24 时前双方的位置。

在调查过程中，3 月 9 日，国民党中央社制造所谓“共军围攻平泉事件”，我当即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彻底揭露了这一谎言。但是承德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在谈判过程中，违背冀热辽中央分局规定的方针，不经请示，于 3 月 20 日签定了《叶柏寿协定》，竟然规定被人民群众赶跑的国民党派去“接收”建平的县长及保安队“回镇建平，并负责推行全县县政，所有八路军及地方部队均不得妨害。”接着，又于 3 月 22 日签订了《凌南协定》，承认热东土匪于大川部为国民党军队，驻守建昌，并保证凌绥公路的运输安全。这两个协定是片面的，错误的。

4 月 3 日，经中央分局讨论，决定由我召见承德执行小组，严正声明不承认这两个协定，并向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提出备忘录抗议。中央分局为改进我方在承德执行小组的工作，决定撤换这位中共代表身份，改由段苏权接任。北平军调部又派出第 26 军调执行小组前往朝阳，谈判《叶柏寿协定》和《凌南协定》问题。朝阳小组到达后，美、蒋代表要求执行两个协定。中共代表强调两个协定是承德小组超越职权签订的，不能算数，必须重新谈判，并说已由冀热辽军区司令向承德军调小组声明在案。由于美蒋代表害怕在热东、辽西一带蒋方军事上处于不利状态，才终止这两个协定的执行，我们取得了朝阳谈判的成功。这时，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加紧内战部署。在北面，蒋介石的企图是“稳住华北，抢占东北”。到 4 月底，已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国民党开始抽调在热河的部分兵力投入东北战场。为策应东北作战，牵制热河敌人东调，中央于 4 月 30 日致电晋察冀军区首长和我们，指出：蒋介石拒绝在东北停战，继续调兵向东北进攻，已将冀热辽方面第 195 师调去，望你们立即准备，如顽方再调军队，聂荣臻、刘澜涛须对平古线及南口地区举行攻击，程子华、萧克须对石觉举行攻击。

根据中央的精神，冀热辽中央分局决定发动赤（峰）叶（柏寿）战役。我根据四、五个月来在热河作战的经验，感到对石觉作战，不能正面打，最好打他的侧后。承锦铁路横贯热河南部东西两面，叶柏寿正处于承锦线之中站；赤叶铁路既联承锦路，又处热中南北，成丁字形。打赤热线有两利：一是敌后之敌兵力分散，好各个击破；二是控制赤热线，就能打通热河东西两

面，而控制了两路接合部，承锦路也打开了大缺口。这样，热河全省就基本上成为整块根据地。

我在作战室和副司令陈奇涵及副参谋长彭寿生，还有几位参谋，事先研究战役的利害和打法，我的意见不仅他们深为赞许，在中央分局讨论中，也完全通过，并报中央批准。赤叶战役于是全面展开，经一周作战。黄永胜纵队将国民党军第13军54师162团全部及师属炮兵营大部歼灭，控制了赤峰至叶柏寿间铁路130公里；赵尔陆纵队切断了凌源至平泉的交通，使热东铁路和公路交通完全瘫痪。詹才芳部在辽西也先后占领小松岭、沙河、石河桥及高岭等车站和据点，炸毁北宁路山海关至锦州段大部桥梁，迟滞了国民党军及其军火物资的调运。这次战役不仅在赤（峰）、叶（柏寿）线上进行，还有冀东及北宁路的配合，不仅控制了通往东北的铁路，达到配合东北作战的目的，还使热河中部被敌分割的东西两片联成一片。这是承德保卫战的第二阶段。

赤叶战役后，我们在承德战略上取得了优势，得以抽出一部分兵力分散剿匪，并协同地方进行减租反霸、发动群众等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对于热河的发展和承德的巩固起了很大作用。

承德保卫战，历时8个月，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攻我防，这一阶段敌人的目的是夺取承德，以截断我华北与东北的联系；第二阶段是我攻敌防，从我发动

赤叶战役起到撤出承德。我发动赤叶战役的目的，是截断承锦铁路，打通热河东西两面，使热河全省联成一片，以利于发动热河广大群众，建立城乡各种群众组织、人民武装直至革命政权。第一阶段的苦战，制止了敌人猖狂的进攻，又为第二阶段我军转入进攻创造了条件。

承德保卫战，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控制热察两省，才能争取东北。蒋介石在与我和平谈判的同时，密令国民党军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在北面，首先就是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分割和压缩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如果东北及热河、察哈尔被蒋介石

所控制，那么我们在敌后许多革命根据地将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相反，如果东北及热、察两省被我控制，许多革命根据地便可与当时北方的友邦呼应，这样，我们长期被敌人四面包围的态势就基本上结束。日本投降时，蒋介石在东北无一兵一卒，他的主力远在西南，与东北隔开一个辽阔的解放区，交通不便，运兵困难。但我冀热辽解放

区与东北相连，是进军东北的前进基地。因此，中共中央当时一再强调，保持热察两省在我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后，迅速决定“为了控制热察、发展东北、必须调兵北上”，又决定调集各解放区地方党政干部两万余人进入东北。晋察冀军区为保证各解放区派往东北的大批部队和干部开赴东北，当时布置了两条交通线，一条是经冀中、冀东到东北；一条是由张家口、古北口、承德到东北。承德保卫战的胜利，使我们控制着联结华北与东北的交通枢纽，保证了大批部队和干部顺利进入东北。其中从延安派往东北的1万多部队和干部，以及其他一些战略区去东北的干部，都是经承德到东

北的。同时还完成了从东北调往关内的武器装备的转送任务。

在承德保卫战中，我们先后抗击了国民党5个军的猖狂进攻。承德保卫战的胜利，不仅粉碎了国民党企图隔断华北与东北联系的企图，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也暴露了美国以中间人身份进行调处而实际是“助纣为虐”的帝国主义面孔，使我党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牵制了国民党军开入东北，支援了东北新解放区的开辟和巩固。

保卫承德的斗争，涉及党政军各个方面。不仅在热河内部，还要同美帝国主义的和国民党许多方面作斗争。我和许多老兵，当兵多年，过去主要是同公开的敌人斗争。在热河还学会用其它方法与敌人作斗争。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本职是宣传教育。但这时以军队“高参”的身份参加谈判。高参者，在交际或谈判场合可以与对方高级人员对等谈话和争辩，赵为高参，有利于我方的谈判工作。

第十九章平绥线之战

1946年8月间，热河的战局基本稳定了，军区调我回张家口，负责平绥铁路东线防御的任务。我从承德北面，经围场、多伦赶回张家口。路上经过大草原，看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美景色，心情激动。当小学生时候我就读过那首“敕勒川”的诗，很想亲眼看看大草原的苍茫和辽阔。没想到，这个愿望竟在戎马倥偬中实现了。

我们驱车前行，晚上就借宿在蒙古包里。热情好客的蒙族群众，烧了热腾腾的奶茶招待我们，还点起了明晃晃的电灯。当时我们挺奇怪，这人烟稀少的大草原怎么能发电？蒙族同胞告诉我们，他们是利用风力发电，很方便。我们赞叹不已，感到蒙古族真是一个勤劳智慧的民族。

8月下旬，我回到了张家口。此时，军区的主力正在进行大同、集宁战役。

提到大同、集宁战役，还得从夺取“三路四城”的决策说起。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对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击，全国解放战争开始后，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晋察冀解放区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军第11战区孙连仲部、第12战区傅作义部和第2战区的阎锡山部，共计38个师，约33万余人，部署在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周围。敌人的企图是：首先在北面占领热河的承德和冀东地区，切断关内关外的联系，尔后以孙连仲和傅作义部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张家口，以控制平绥线和同蒲、平汉路北段及北宁路、锦承路，分割我晋察冀、晋绥、东北解放区。

对于蒋介石蓄意打内战的阴谋，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就有高度的警惕。6月19日，中央在致各战略区的电报中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6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则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基于这一估计，中央在这个电报及随后给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领导人的几个电报中，就大打后北线的作战部署，提出了意见，其要点是：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军区除以主力准备对付热河、平津方向和河南方向蒋军主力外，其余各以一部分别夺取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北段，并相机夺取保定、石门（即石家庄）、太原、大同。我们当时将此方针概括为夺取“三路四城”。

对于中央这一战略方针，我们开始是完全同意的，因为全面内战爆发后，大家都想快些消灭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而夺取“三路四城”正是一个主动出击的进攻方针。6月26日，聂荣臻、刘澜涛和我给中央发电报，表示完全同意，并提出为适应这一方针，须调整兵力分布，采取“西攻东防”之策，西攻：主要是协同晋绥军区，进行晋北战役和会攻大同；东防，就是在平绥路东段阻击北平之敌向张家口的进攻。

6月28日，中央在给我们的复电中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热河四个独立旅，冀东、冀中备两个旅，商都两个团及其他地方部队，均为保卫地方之用。当敌进攻承德时，你们的主力不是保卫承德（因为这将劳而无功），而是乘敌北进，集中四个纵队及冀中、冀晋全力举行平汉战役，占领从长辛店至石门整个平汉路，相机占领保定石门两城。平汉路胜利后，即以主力3个纵队不少于24个团4

万人入晋，充当夺取山西之主力，首先配合山西各区，夺取正太、同蒲两线，扫清太原、大同以外一切敌据点，使冀晋、晋绥、吕梁、太行、大岳五区打成一片，然后相机夺取太原、大同。最后还规定：夺取三路四城须准备6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

根据中央赋予的任务和当面的敌情，晋察冀和晋绥军区确定采取三个作战步骤：第一步，以晋察冀军区的部分兵力配合晋绥军区部队组织晋北战役，夺取同蒲路北段诸城，割断太原、大同之敌的联系，主力则置于冀东地区，打击东线敌人。第二步，集中晋察冀、晋绥两区主力会攻大同，同时阻击敌第12战区傅作义部的东进，并以一部兵力在平绥路东段阻击北平之敌的西进。第三步，视情况发展进行平汉战役，夺取平汉路北段，并相机攻占石家庄。保定等城，然后，再夺取正太路和太原。

在这个战略意图下，晋察冀军区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平绥线，保卫张家口。这时，由晋绥军区组织的晋北战役已经结束，我军攻克和收复了崞县、五台、原平、定襄等10座城镇，给阎锡山部以重大打击，控制了同蒲路忻县以北地段，使大同之敌陷于孤立，实现了夺取“三路四城”战略计划的第一个作战步骤，并已开始进行第二个作战步骤。但攻打大同却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大同是平绥、同蒲两铁路的交会点，因其地理环境的险要，历史上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国民党军在原来的方正而坚固的旧式城墙基础上，加修了适应现代战争的完备防御体系，使这座古城成为易守难攻的坚城。当时敌人在大同及其外围的兵力，有阎锡山的暂编第38师，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两个骑兵师及其他武装，约近2万人。我军参战部队虽有30个团，但是由晋绥和晋察冀两个战略区的部队刚刚会合，又缺乏攻城经验，一开始就形成了拉锯战。到9月初，打了一个多月，才扫清大同的外围据点。大同久攻不下，东西两面都成胶着状态，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我在这年的六七月间，随军调处小组返张家口时，看到军区正在部署打大同，当时并未感到有什么问题；八九月之间从承德回来，大同已打了20多天，没有打下，就感到不大好，但也没有引起重视，觉得能打下来最好，打不下来也没有多大关系；现在又过去10多天了，仍没有打下，我军陷入被动，我才开始感到打大同有问题。这时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装备和兵力都居优势，我们应该“避其锐气”，争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而现在却攻打坚城，与敌人挤消耗，使自己陷于被动。聂荣臻对打大同也有看法，我回张家口后，就听他讲了几次，说攻又攻不动，撤又不好撤，大同这一仗不该打。但夺取“三路四城”是中央定的方针，我们也不好临时改变前线指挥员的决心。

大同的战况越来越不利。9月7日，傅作义部3个师进至集宁城下，企图经集宁南援大同。本来，我军经两天一夜激战，已将敌人的3个师打得支离破碎，但由于我军没有组织连续进攻，傅作义部主力101师来增援。这时，我军本应先消灭集宁城下已被打乱之敌，再打援兵；但前线指挥员却令主力转兵西进，先歼来援之敌。各部因临时变更部署，地形、道路又不熟悉，未能统一协调行动，既不能歼灭城下残敌，又不能消灭援敌，敌军得以重新调整，在空军的配合下，攻入城内、集宁失守。集宁既失守，大同更不宜再攻了。9月16日，我军遂从大同撤围。原来预定的西攻方针，未能达到目的。

当我军主力集中大同、集宁方向作战时，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指挥第13军、93军及53军共7个师开始进攻热河。从8月21日起，敌三个军分别由天义（今宁城）、凌源、山海关、锦州向承德、青龙、建昌进攻。8

月 28 日进占承德。接着，敌第 11 战区孙连仲也集中主力 14 个师，连同其他部队共 10 万余人，向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至 9 月 21 日，我迁安、乐亭、丰润、遵化、平谷等 15 座县城先后被敌占领，冀东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一部分只得就地转入游击战争。

国民党在占领集宁、承德和冀东各县城后，北平行辕以“彻底摧毁匪热、察、绥根据地，收复张垣（即张家口），打通平绥路巩固华北”为目的，集中第 11、12 战区的主力对张家口实行东西夹击。

在集宁失守、大同撤兵，敌主力进攻平绥线情况下，对于张家口这一解放区人口最多、政治影响很大且有些现代工业的城市，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是坚守，还是放弃？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领导在大同撤围的那天开会讨论。大家分析了战略态势及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部队经过连续作战，损耗较大，需要补充、整顿，当前的态势不利于我坚守张家口。

记得中央局开会，在决定放弃张家口时，聂荣臻提议举手表决，我首先举手。之所以如此，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方面我认为敌 3 个主力军，全部机械化来进攻，我必须避强；只有避强，才能集中兵力去击弱，另一方面也是对聂荣臻领导的支持。1944 年 9 月晋察冀边区曾召开过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某些同志受延安“审干”运动的影响，在会上对边区的主要领导人聂荣臻进行了不适当的批评，使他的领导威信受了影响。在高干会开了不久，前方有位高级干部到延安，他说前方的同志认为聂不能回边区了。我当时就感到是高于会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对当时和以后工作是不利的。我们离开延安前，刘少奇曾对我们说，边区高干会在聂不在场的情况下对他进行批评是不好的。后来毛泽东也同我说过，聂在晋察冀的工作是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三十的问题，不该上到“路线”上去。尽管这样说了，但高于会所造成的影响还在。

举手表决通过后，中央局向中央军委建议，在敌人进攻张家口时，能守则守，不能守就主动撤离，以争取今后战局的主动。9 月 18 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我们的建议，认为“依南口至张家口之地形及群众条件，我事前进行充分准备，各个歼敌，打破此次进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同时指出，应“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如届时敌数路密集，不利于我，可以临时决定不打”。军委还指示我们，对张家口的机关与物资应秘密进行疏散，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之。

我们对保卫张家口进行了具体部署。估计敌人的主攻方向将是平绥路东段，可能以康庄、怀柔地区的两个军西进；集宁之敌则可能在东线敌人占领怀来后沿平绥路东进，与西进之敌相呼应。因此，决定以歼灭由康庄、怀柔西犯之敌为主。

为保卫张家口，组成了野战军前指，由我和罗瑞卿指挥。我们的部署是：以第 2 纵队主力及地方武装一部在怀来、延庆地区正面抗击敌人；以第 1 纵队和第 2、第 3 纵队各一个旅，隐蔽集结在怀来以南地区的山沟里，待机出击。另由军区直接指挥第 4 纵队和地方武装一部会同晋绥军区 4 个旅，位于张家口以西之柴沟堡，阳高地区，抗击大同、集宁方向东进之敌。

大的布局定了，主要是注意东面敌人的主攻方向。我在东面采取攻势防御的方针，以 2 纵队于战前进至怀来，选择地形，基本上构成了战役防御体系。

9月29日，敌第16军及第53军1个师，共4个师1个炮兵团，分两个梯队，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沿平绥路向怀来地区发动进攻。我军官兵沉着应战，凭借野战工事，抗击优势装备的敌人，10月2日，敌人进到东、西花园等地。10月3日拂晓敌又增加两个师，向我怀来东面火烧营地，展开了全线猛攻。

这天，敌人出动飞机一百多架次，炸弹、炮弹向我阵地倾泻下来，真是“万炮齐轰”。我军官兵以短促火力向敌急袭，用集束手榴弹和汽油瓶打敌坦克，以小分队对进至我阵地前沿之敌行反冲锋、反突击，甚至插入敌群，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从拂晓到黄昏，打退了敌人三次大的进攻，制止了敌人陆空联合攻击，迫使敌人又退回到东、西花园等地。

我们摸到了敌人一个作战习惯，不轻易打夜战。敌人进至我正面预设阵地之前，在受我阻击不能再前进时，就会退回到进攻出发地，我则乘其安营未定，战后饥疲交加时，从侧后夜袭其驻地，即“击其惰归”之意。当晚，我们按预案执行。执行夜袭任务的是第1纵队，他们预先在我正面的右侧后10里处待机。黄昏后，即向敌左侧的突出东花园和旧村突袭，约一个钟头，歼灭敌一个团和一个营，完全恢复了火烧营阵地。这次胜利，是在我预谋中取得的。

敌人从正面进攻怀来受阻，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陈诚和北平行辕副主任陈继承亲自到南口，部署从侧面迂回怀来。10月7日，傅作义第94军两个师，从怀来东南20公里的马跑泉、横岭城向我侧背迂回。我们觉察敌人的企图，决定由杨得志、苏振华率第1纵队和第2、3、4纵队的两个旅另一个团，在马跑泉地区设伏。8日傍晚，进入我伏击阵地，我军迅速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担任突击任务的各部队居高临下，发起冲击，经4小时战斗，全歼敌军一个团和三个炮兵连约1600余人。

敌人又分别经镇边城和横岭城迂回怀来，我先后在南石岭，镇边城东南的两次阻击战中歼敌1600余人，两战共歼敌3000余人，敌人从侧翼迂回怀来的企图也失败了。

我军主力在平绥路东段打了三个胜仗，歼敌6000人，将敌阻止于怀来以东地区。与此同时，野战军一部和各军区独立旅在平汉路北段发起大规模破击战，5天时间攻克保定南北之定兴、徐水、容城、望都4座县城，歼敌8000余人，控制铁路120余公里，有力地策应了野战军主力在平绥路东段的作战。

正当平绥、平汉路前线不断告捷，而傅作义部乘我张家口西北方向兵力空虚，以主力第35军、暂编第3军及骑兵团，于10月7日由集宁经张北袭占张家口。这时候，我们在平绥路西部的军事形势处于很不利地位，就按中央局预定的方案，放弃张家口。

张家口的得而复失，在当时不仅使美蒋反动派得意忘形，喧嚣一时，而且也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震惊，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同志中也众说纷坛。对张家口保卫战的认识，我认为应与内战爆发后北线（晋察冀、晋绥地区）的战略计划联系起来看。战争的胜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看谁能掌握主动权。在张家口为中心的平绥线战局处于不利情况下，主动放弃张家口，缩短战线使军事战略开始从被动转到主动。

平绥线之战进行了两个多月，虽然打了几个大仗，也未能巩固，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有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党当时对日本投降后形势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和平民主新

阶段”的提出，特别是停战协议生效后，有些同志滋长了和平麻痹思想，在战争爆发之前，边区部队复员转业约10余万人。占军区全部军队约一半。战争一来，兵员不充实，有的兵工厂停产甚至炮弹也停产了，这些都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第二，我们对中央北线战略计划的指示，即军委关于“三路四城”的指示与认识，要重新考虑。从当时内战的大势来看，战争初期，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不仅在全国军事上，还有经济财政舆论上等等，都处于优势。就是在各战略区（含晋察冀区）也大致如此。在各种形势下，要晋察冀军区攻占“三路四城”这个只能在战略进攻时才能采取的计划，是不适当的。按照这个计划，就要夺取大同，控制平绥线，保卫张家口，这样，势必形成东西两面作战，不能不分散兵力。后来的战争实践也证明，由于战线太长，各路迎敌（含我方进攻），虽然消灭了不少敌人，但没有大量歼灭敌人，自己却消耗不少。

第三，在夺取“三路”与攻取“四城”这两个不同的军事范畴来说，先后行动顺序要恰当。我们是先攻城（大同）后取路的。假如我们不先攻城，而是先打路，结果可能不同。因为铁路点多线长。敌人分散，便于我们歼灭；打路，对敌人的运输交通破坏也大，可能影响他们的战略部署，先攻城，尤其首先打大同，就要攻坚，把自己的力量消耗了。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到，大同为晋北重镇，兵多城坚，军资充裕，当时我军既缺乏攻坚作战的经验，也缺乏重武器和攻坚器材，显然这是个失着。聂荣臻这段话，是正确的军事总结。再如集宁作战的前线指挥上，也有问题。我们在敌军增援的情况下，未能对已被打乱之敌组织连续攻击，却在部队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临时改变计划，转兵西进，打来援之敌，致使部队失去了在集宁城下歼灭溃败之敌的良机。在张家口保卫战中，我军在平绥和平汉路北段给敌人以有力打击，但未乘机扩张战果。而对敌人从集宁经尚义、张北迂回张家口的进攻路线又估计不足，使敌乘隙而入。

第四，战前地方与军队有些矛盾和隔阂，未得到解决和消除。如当时军队与地方双方都有抱怨情绪，这样就使得老根据地的优越条件未能在战争中充分发挥。后来中央局安国会议将改进军队与地方关系，作为一个突出问题，并明确指出，军民关系解决得不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胜利。通过开展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使矛盾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前述诸点，互相关联。由于“三路四城”的方针，使晋察冀、晋绥两个军区对大同都急于攻下而后快，确是失着。即便执行“三路四城”方针，在顺序上也应先打路后攻城（在解放战争初期不要攻坚）。集宁前线指挥的失误，更加重了这种不利的形势。至于战前领导上思想的缺陷，中央局和军区有责任。但上面的指导，影响不小。

第二十章安国会议前后

我军撤出张家口后，相继向南转移。10月底，敌人在占领了平绥铁路沿线城镇后，又分路向南进犯。在此期间，军委曾指示我们最大限度地集中主力，歼灭敌第16军，但因当时部队连续作战，伤亡较大，主力未能集中。我军在放弃张家口后，仍处于敌我对峙状态，尚未摆脱被动。

我军撤出张家口后，中央曾一再鼓励我们：我之作战重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一城一地之得失无关大局。的确，撤离张家口，我们是放弃一个包袱，换取了军事上的自由和主动。但由于撤退仓促，没有解释理由，军队和地方有些同志有埋怨情绪，甚至骂街；有的对平绥线的优越条件恋恋不舍，不愿向南转移，这对于团结和争取胜利都是不利的。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并布置张家口撤出后全区的斗争方针和任务，晋察冀中央局于10月下旬在涞源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议由聂荣臻主持，首先组织大家学习了中央不久前刚发出的《三个月总结》和《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等指示，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初步总结了张家口撤退后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

聂荣臻从战争的全局和敌强我弱的形势及作战的目的等方面，谈了对放弃张家口的看法。他说，我们决定撤离张家口，就是决心丢掉一个包袱，回到根据地，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张家口这个地区，敌人集中了那么多兵力，从东西两面夹击，如果我们把主要的兵力都纠缠在张家口，要守守不住，想走走不脱，不利于今后的行动。我们作战的目的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我们放弃张家口，取得了主动和自由，可以在运动中歼灭更多的敌人，这才是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

我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过去我们有夺取“三路四城”的担子在肩上，包袱太重，现在包袱让敌人去背，是件好事。我还特别强调，由于部队连续作战，兵力削弱了，要补充人员，加强后勤建设，还要关心爱护部队，要克服悲观情绪，树立胜利的信心。

会议对今后的行动方针和任务进行了讨论，作出了《关于张垣失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定》，决定强调：必须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关于运动战、歼灭战的作战方针，只有主动地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从根本上转变我区的军事形势。决定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动员全体军民力争取战局的转变而斗争。

通过这次会议，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心克服悲观、埋怨情绪，树立战胜敌人的信心，团结一致，战胜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战争胜利。

涞源会议后，部队没来得及休整和补充，又投入战斗。当时，敌人占领张家口，在重新占领了平汉路北段后，又侵占了察南地区。敌人的企图是：以第11和第12战区的兵力，深入晋察冀根据地的腹地，占领要点，封锁关隘，把我军主力困在山区，进而包围歼灭。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敌人首先把攻击目标指向易（县）涞（源）地区。以第53军和平汉线上维护交通，以第94军准备攻占易县，然后西出紫荆关，与侵入察南的敌人会攻涞源。

从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间，我和罗瑞卿指挥晋察冀野战军在保定南北连打4仗，多数打得好，俘虏、缴获不少；也有的打得不好，打成平局。第一仗是易（县）涞（水）战役。这一仗从11月2日至16日，连续进行了两次战斗，共毙伤俘敌3800多人，但在易县，涞水间的二十里铺、门墩山一

线最后合击敌第 94 军时，未将敌分割切断，致失各个歼敌之机。打成平局。

易涿战役后，敌东撤涿县、定兴一线，我野战军遂转至易县、满城、完县山区边沿地带，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了 20 多天的休整、补充和练兵。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在此期间，调整了野战军和军区的原有战斗序列和编制，将新参军的三四万新战士补充到野战军，使各纵队由原来的 2 个旅改编为 3 个旅；野战军指挥机构合并于军区机关，前线的作战指挥，由军区按照具体情况临时组织前进指挥所实施。第 1 纵队回归晋冀鲁豫军区建制；其他各纵队及二级军区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大部分仍旧。根据新的区划，对有关独立旅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12 月 16 日，敌军又以 6 个团从保定、漕河一线分路向满城进犯，企图策应敌第 94 军再次攻取易县。我们决定消灭该敌前梯队。敌人这次的行动非常谨慎，采取缩小间隔，齐头并进，步步为营的战术。我们以一部兵力从休整地域转至徐水以南牵制第 94 军，集中主力于 20 日晚围歼进犯满城之敌，战至 21 日，分别在相庄、道口地区和后大留将敌军 3 个团全歼，残敌仓皇逃回保定。由于敌先行部队受挫，第 94 军龟缩原地，战斗即告结束。这次战斗，毙敌 400 余人，俘敌 2200 多人。

满城战役重创进攻之敌，鼓舞了部队的信心。战后，我们一面令部队休整待命，一面严密监视敌情，寻找战机。当时，敌第 11 战区主力在易县、满城地区受挫后，收缩于保定以北的平汉路沿线，保定以南的望都到正定百多公里的铁路上，仅有敌保安第 5 总队侯如塘部的 6 个团和一些县“自卫队”守备，虽号称万人以上，但分散，战斗力不强。歼灭这些敌人，不仅可以切断保定与石家庄的联系，还可以掩护我军从冀中向冀西运粮。于是我们决定主动出击平汉路，发起保（定）南战役。以第 4 纵队为主力，另以冀中和冀晋的各 1 个分区配合，其他主力部队以战备姿态继续休整，准备打击出援的敌人。

1947 年 1 月 21 日拂晓，战役开始，这天正值农历除夕，第 4 纵队的指挥员们冒着风雪严寒向保南地区的敌军据点突然发起攻击，一举攻克望都城和王京村，全歼守敌。与此同时，参战的分区部队也分别破击了定县城至新乐县城间的铁路。

初战告捷，我们继续向南攻击，乘胜扩大战果。当晚，第 4 纵队分路隐蔽南下，转至定县、新乐间，以奔袭分散孤立之敌先打援后攻城等灵活战法，至 1 月 28 日，先进占新乐又夺取定县。这次保南战役，共歼敌 3200 余人，解放了望都、定县、新乐 3 座县城，切断了保定到石家庄敌军的联系，使我冀晋与冀中两个解放区联成一片。

敌人在保南吃了败仗，急于向我报复。2 月 6 日，保定以北的敌军乘我主力南移之机，以一部又从涞水向易县进攻；一部在徐水、固城一线策应。为了诱敌深入，我军主力撤离易县，向西南方向退却，准备在塘湖地区歼敌。但敌人进至塘湖后，只作短暂停留，便东向与进到姚村策应的敌军靠近。由于敌军猬集一团，我们原定在塘湖歼敌的计划难以实现。为了创造新的战机，我们当即以一部向平汉线固城、漕河段出击，威胁敌之侧后，并围攻徐水城。这样，果然吸引了敌人，2 月 15 日，敌人急忙回援徐水。16 日我们以主力向姚村急进，当晚，我军各部队进入战斗，经 3 小时激战，歼敌约两个营。正当重新调整部署，准备发起总攻时，由于有的部队战场观察不实，把敌人向姚村收缩误认为是向东撤退，以致错过战机。18 日，由于敌军增援，我们撤

出战斗。这一仗没有打好。

我们在保定南北连打四仗，挫败了敌人自占领张家口以来的锐气，但由于未能大量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整个战局仍未取得主动。

姚村之战后，军区机关驻地由冀西移到冀中的安国县。安国，古称祁州，为北方最大的药材集散地，是个物产丰富，市场较发达的地方。由于姚村没有打好，我们如实向中央军委报告。2月21日军委给聂荣臻和我发来电报，对我们进行了批评，指出：你们最近时期在保、易间的争夺战是在被动情况下进行的，故打不出好仗。今后应大踏步进退，不拘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

我感到军委对我们的批评是中肯的，指出了我们在前一阶段作战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是机械地执行夺取“三路四城”的方针。从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来看，是不适当的。首先打大同，更是失策；大同久攻不下，又不撤围，就更被动。

我从承德回到张家口后，奉命组织东线战役，这时我开始感到平绥线的战略形势很紧张。大同久攻不下，西面有傅作义、马占山两军，东面是蒋军的主力，均为美械化装备。因此，我在接受东线指挥任务后，想打好一点，来缓解边区北线的形势，摆脱被动局面。我率军区主力在东线进行了两个多月的作战，虽严重地打击了东线敌人的3个美械化军，但仍未大量歼灭敌人。后来中央局决定撤围大同，放弃张家口，这时北线的形势已是相当被动，但有些同志还不愿从平绥线东段撤出。我当时虽然看到平绥线军事形势不利，但对久围大同将造成的严重后果看得不够。从张家口撤退后，主力转到南面，在保定南北连打几仗，除保南战役外，都是敌人主动进攻。而保南战役，也是在敌人进攻我根据地的态势下，我们不得不采取的反击行动。这一时期的军事行动，有保守倾向。

二是没有大量歼敌。从内战爆发以来，晋察冀军区部队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英勇作战，共歼灭了敌军8万余人，堪称战果辉煌。但没有整师、整军成建制地歼灭敌人，没有打出有较大影响的胜仗。罗瑞卿后来在政治工作会议中，用“胜利不足”4个字来概括当时的战局，我认为是恰当的。

军区的同志都在考虑怎样克服这些缺点和不足，认为必须打出去，争取主动。为了争取主动，3月底，晋察冀中央局在安国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在聂荣臻的主持下，根据中央2月1日发出的《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和军委一段时间来对我区作战的多次指示，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检查了军事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讨论了土改和生产问题，研究了今后斗争的方向和任务。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力争战局的根本转变。会议认真总结了内战爆发以来我们的经验教训。我在会上谈了前面说的几个观点，并与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经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认为：军事上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领导层（主要是中央局）对全面内战爆发思想准备不足。在“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下军队复员过多（全军20万人，只保留10万），临战前动员太迟太慢（主要是兵员征集）。胜利不足的直接原因是运动战的思想不够，不敢大踏步进退和集中兵力，根本原因是怕丧失土地。从张家口撤退时虽有觉悟，但这种观念还没有根本转变。

会议明确了今后军事斗争的方针，是坚决执行军委关于运动战、歼灭战的指示，大踏步进退，主动向敌人守备薄弱的战线出击，调动敌人，集中绝

对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会议特别强调，我们应当从整个战局着眼，通盘筹划，不被眼前敌人的局部行动所左右。同时要发动群众，对地方军、民兵进行游击战的领导和训练，以便更有力地配合野战军的作战行动。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顺利。军队和地方的同志也交换了意见，加强了团结。我认为安国会议起到了统一认识，增强团结，使军事思想更解放的作用，成为晋察冀转变战局的一个重要契机。

根据安国会议确定的作战指导思想，我们分析了华北的敌情，认为东面的津浦路和南面的正大路敌人比较薄弱，特别是正太路，除石家庄、太原两点敌人兵力较多外，其他主要是地方保安团队，分散守备铁路沿线。正大路以娘子关为界，分属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和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两个指挥系统，这就便于我们各个击破。打正太路是大胆的军事行动，要离开基本区到根据地南面边缘区作战。我对司令部的同志说，即便敌人到了陈南庄（当时晋察冀根据地的中心区）也不管它。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在抗战时期就有丰富的反“扫荡”经验。只要打下正太路，即便敌人深入也好办。

大家的思想都一致了，就决心以野战军主力向正大路沿线的敌人发动全面进攻。整个战役拟在一个月完成，分两期进行。

第一期，扫清石家庄外围的敌人。以主力第2、3、4纵队及地方武装一部，首先歼灭滹沱河左岸正定及石家庄东南栾城等地区之敌，孤立石家庄守军第3军；以地方武装一部于完县、满城和阳高以西地区，积极向保定、满城活动，并准备阻击南援之敌。战役第一期预定于4月8日开始，12日结束。

第二期，以两个纵队主力分经石家庄南、北地区，沿正大路向西攻击，首先歼灭井陘、获鹿等地之敌，尔后继续西进。同时以冀晋地方武装一部积极破袭正太路，以1个纵队主力控制于正定附近，另以一部和地方武装于石家庄以东佯动，钳制石家庄之敌。第二期作战定于4月15日发起，25日结束。

为了保障战役的顺利实施，计划中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战斗发起时，必须以神速、秘密动作透入敌防御纵深，发挥突然性；针对敌依据其深沟高垒与多样式的防御工事的特点，各级指挥员、参谋人员要到预定战地进行侦察，并研究制定攻坚之战法，做好准备；要破坏与控制正定城西之铁路，以利攻城；注意保密，战斗发起前停止电台联系；严禁以电话传报行动部署；部队运动一律夜间进行；注意对空隐蔽，并组织对空射击。

3月31日，我们将上述计划报告军委。军委复电同意，并要求尽可能提早举行及缩短作战时间。

4月8日，第一期作战于石家庄外围展开。10日，第4纵队在冀中军区部队配合下，攻克了栾城。12日，第2、3纵队攻克正定城。两城附近的90余处敌军据点也随之扫清，并破袭了正定至获鹿段铁路，歼敌1.5万余人，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期作战的预定计划。

这时，敌第3军龟缩在石家庄，固守待援，而平津和保定的敌人没有直接南下救援石家庄，却于4月8日以第94军、16军、整编第62师等部，向我大清河以北地区进攻。该敌在攻占我胜芳镇后，还继续增兵。我们接受了以往的教训，没有理会这股敌人，除以冀中军区部队和民兵与敌周旋外，主力在完成了第一期作战任务后，继续挥师西进，于4月14日发起西进正大线的第二期作战。

21日，我军夺取井陘。对北来之敌，仅以地方武装民兵阻滞之，军委来电：“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并认为：“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我第2、3纵队相继攻克井陘、获鹿，沿正太路及其两侧向西进击。第2纵队攻占盂县后，向寿阳方向迂回。第3纵队攻克娘子关后，包围了平定，直逼阳泉。阎锡山感到我军的严重威胁，急派第33军增援阳泉。为了歼灭该敌，我们让援敌开进阳泉。阳泉守敌为防我继续西进，在阳泉以西的寿阳附近也集结了1.2万多人。我军采取迂回包围，穿插分割、断敌退路的战术，以第2、第3纵队从正面牵制阳泉守军，并切断敌人向西、向北退路；第4纵队从井陘地区西进，3个纵队互相配合，逐步压缩包围。敌人企图夺路逃跑。5月2日和3日，我军分别在阳泉、寿阳及其周围地区将该敌大部歼灭。日本投降时被阎锡山收编的一个日本保安大队500余人，也向我军投降。这是日本军队侵华以来向我军投降的最后一支军队。

我第2纵队主力向西逼近榆次。至5月4日，东自获鹿，西至榆次180余公里的正太路被我控制，并解放了山西的盂县、阳泉、定襄、平定、寿阳和河北的正定、奕城、井陘等城，以及河北、山西两省的井陘、阳泉、黄丹沟煤铁矿区。战役前后历时近一月，共歼敌3.5万余人，完全达到了预定的战役目的。

正太战役的胜利，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基本连成一片，孤立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要点石家庄，军队扩大了，武器弹药得到大量补充，士气更高了，我区战局全面主动。实现了安国会议“力争主动，大量歼敌”的作战指导思想。

正太战役后，为了配合东北我军的夏季攻势，6月12日，我军又发起了以破坏津浦铁路青县至沧县段为主的青沧战役，解放了青县、沧县、永清3座县城，歼敌1.3万多人，一度控制了津浦铁路80多公里。6月25日，我军又发起保（定）北战役，全歼徐水、固城、满城、定县等据点守敌7000多人。

安国会议后，我军三战三捷，为即将开始的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

1947年4月下旬，刘少奇和朱德率领中央工委机关到达阜平县之城南庄。中央工委的到来，我们认为对晋察冀的工作会起到推动作用。

5月4日，正太战役刚结束，朱德来到军区机关驻地平山县封城村，了解当时敌我双方军事活动的情况。朱老总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后，就同聂荣臻、罗瑞卿和我商量，决定由聂分别召集纵队、旅、团级干部会议，总结作战的经验教训。随后，他又几次出席晋察冀中央局会议，听取边区工作情况的汇报，并找指战员谈话，了解干部情况和部队存在的问题，讲我军的光荣传统，讲如何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并学会带兵、养兵、练兵、用兵，当时给军区的部队以很大鼓舞。在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朱德还介绍了全国的军事形势，并提了加强军区工作的意见。

经中央批准，晋察冀军区利用正太战役结束后的休整间隙，对部队进行了整编，重新恢复野战军领导机关，由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杨武成分别任第一、第二政委，耿飏任参谋长，潘自力任政治部主任。我调回军区，专力于军区工作。

这次整编，野战军首次成立了炮兵旅，旅长高存信、政委李呈瑞。炮兵旅是以军区炮兵团为基础，把各纵队的炮兵营集中起来扩编而成的，其装备主要是缴获的火炮和军区自造的重迫击炮。在整编中，还建立了军区后勤部，部长由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兼任，政委由军区副政委黄敬兼任。后勤部统一领导全区武装部队的供给、卫生、兵站、军工生产、交通运输、补充兵员、训练俘虏等工作。同时对各部队的后方机构进行了整顿，规定“小家务”和过去开展生产运动时期办的商店一律归后勤部门统一管理。通过这次整顿，加强了整体观念，使散存的物资集中，闲置的武器装备得以调剂利用，腾出不少人员，充实了战斗部队。增加了灵活性和机动力。军区明确规定野战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打仗和训练。

整编以后，我军又接连发起青沧战役和保北战役，并取得胜利。接着，于10月11日至22日，又在清风店战役中全歼蒋介石嫡系第3军主力，俘虏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和军副参谋长吴铁铮，以及该军第7师师长李用章，连同在保北地区阻击战的战果，歼敌总数达1.7万余人。

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全军欢欣鼓舞。我们认为夺取华北战略中心——石家庄的条件和形势成熟了，决定乘胜夺取石家庄。

10月23日，军委复电同意我们的决心和部署。同一天，朱德、刘少奇也复电，同意乘胜攻打石家庄。

在石家庄战役的准备中，朱德到安国视察炮兵旅，并亲自宣布打石家庄，说打下石家庄，可以学会攻坚战，学会打大城市，“要把石家庄当做一所难得的学校”，“要从这个学校练出一套能攻善守的本领来”。他还提出了“勇敢加技术”的口号，要求指挥员认真发扬军事民主，通过打石家庄学会攻坚战。强调要对部队进行入城教育，严格入城纪律；要用事实证明：我军不但能打下大城市，而且能很好地管理大城市。

11月6日至12日，晋察冀野战军攻克了石家庄，歼敌2.4万余人。党中央致电祝贺，朱老总在嘉奖电中称之为“夺取大城市的创例”。

在我军接连取得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挽回华北败局，11月底亲自飞北平，撤销孙连仲，把华北5省军事指挥大权交给傅作义。傅作义上台时，蒋政权已摇摇欲坠，但他却向中外记者宣称：国军将要反攻，不仅要收复点线，而且要全面收复“匪区”，消灭共军主力。这种不要兑现的预言，当时中外人士都明白，徒遗人一晒而已。

形势日益发展，地区不断扩大，兵员及缴获、俘虏增多。12月上旬，又新组建了第1、第6、第7野战纵队，这样，晋察冀军区就有4个野战纵队，两个地方纵队，机动作战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了。此后不久，在破击平汉路北段作战中，又重创敌35军，给傅作义以迎头痛击。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陕北东渡黄河，经晋西北到达晋察冀解放区，与刘少奇、朱德等会合。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来到晋察冀军区驻地城南庄。在城南庄期间，毛泽东多次听取了聂荣臻的汇报，对华北军区及聂本人的工作给予支持。

5月上旬，中共中央还在城南庄召开了书记处扩大会议。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同时成立相应的党政军机构。5月9日，中央公布了各机构领导人的任命，将晋冀鲁豫和晋冀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以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为

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以刘、薄、聂及董必武、彭真、叶剑英、徐向前、滕代远、罗瑞卿、刘澜涛、赵振声、王从吾、萧克、黄敬、杨立三、赵尔陆、杨秀峰等 17 人为委员。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徐向前、滕代远和我为副司令员，赵尔陆为参谋长，罗瑞卿为政治主任；下辖两个野战兵团，第一兵团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王建安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第二兵团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兼第一政委，杨成武为第二政委。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边区政府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未召开前，暂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董必武为主席，黄敬、杨秀峰为副主席，宋劭文为秘书长。同时，中央还委托华北局创办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及华北大学，并分别任命了主要领导人。

这时傅作义、阎锡山企图联合偷袭石家庄，我于是受命指挥保卫石家庄的作战。

第二十一章 两度空城守石门

石门，石家庄市的旧称，1947年11月中旬我军解放该市后改称此名。石门地处平汉、正太、石德铁路交叉点，是华北重镇。我军解放石家庄后，这里正在成为当时华北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工商企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支援着华北解放区。这里还集中了很多物资，是我军在华北进行革命战争的兵站基地。这时，党中央已搬到距石家庄西北约70公里的西柏坡，正在筹建中的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也将在石家庄宣告诞生。

石家庄解放后，仍然受到傅作义、阎锡山几十万大军的严重威胁。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处心积虑要把石家庄从人民的手中夺回去，并扬言夺不回去，也要把它炸平。同时，华北的许多城市和交通要道，还为敌人所盘据；城周边有些残敌与地方反动武装勾结骚扰。

4月底的一天，华北军区得到情报，敌人企图趁我主力出击察南、绥东之机，准备偷袭石家庄。据悉，参加这次袭击的部队是傅作义的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共约3万余人，分乘汽车、坦克、装甲车正秘密地从北平向保定一带集结。山西的阎锡山也派出1个师约万余人，准备从寿阳取道盂县向石家庄突袭，策应傅作义部的正面进攻。敌人想倚仗其大量汽车和机械化的优势，隐蔽突然，从东西两面夹攻，一举夺取石家庄。

当时石家庄的部队除了警备司令部不多的兵力和正在组建中的补训兵团的一个新兵补充旅之外，几乎没有战斗部队，附近也没有主力部队可供调遣。距石家庄最近的冀中军区只有一个步兵旅三四千人可供调遣。最快也得三四天才能赶到，还有远在山西应县一带的第六纵队，距离很远。要赶来石家庄作战，“远水难救近火”。当时的石家庄，就好像是座空城！

中央局和军区决定由我去指挥保卫石家庄的任务。临危受命，我感到只能由自己去临机处置了。于是提议：“立即令冀中军区一个旅和在山西的第六纵队，昼夜兼程，赶往石家庄，下令沿途地方武装和民兵阻滞敌人。”接着，我又提出：这次保卫石家庄之战，在战区范围内，党政军民的指挥权都归我。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这时的石门，是军区最大的城市，有边区党政军民各个系统的领导和领导人，都有最高指挥权，如果不集中统一，各行其事，就不利于军事行动。我虽以军区副司令和中央局常委去石门工作，有条件做到集中统一，但要在中央局会议上领导同志面前明确这个观点。

刘澜涛首先说：“你是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又是中央局常委，还是军区民兵武装部长，总揽指挥大权，名正言顺。”接着，在座的其他领导人也表示同意。

最后我表示：军情紧急，有什么问题，我到石家庄之后将及时报告。

对保卫石家庄的作战，在作了这些原则的研究和部署之后，我马上做出发的准备工作。回来后因午饭还未做好，就去毛主席住处汇报，也是辞行。

毛主席自半个多月前从陕北转移到城南庄后，我们同住一排房子，平日里常常相遇和交谈。但今天来见毛主席心情却有些忐忑不安。

我径直朝毛主席的住房走去。一进门，他见我来了，忙问：“听说你要去石家庄？”说着，示意我坐下。

我说：“是的，军区决定我去保卫石家庄，我准备吃过午饭后就走，想听听主席有什么指示。”

“附近没有主力部队了，有顾虑吗？”毛主席关切地问道。

我回答说：“是的。石家庄是华北解放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是大城市，若丢在我的千里，不好向党交代。”

“不能这么想。”毛主席稍停一下说：“石家庄是我们从敌人手里拿过来的，如果丢了，再从敌人手里拿回来就是了。”

听毛主席这么一说，我如释重负。立即起身告辞：“主席，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力保住石家庄。”

从毛主席那里回来后，我一面做出发准备，一面选定了我考虑的守城部署和方案。当天傍晚，我和有关人员乘卡车星夜去石家庄。

天刚亮，我们到达目的地。这时，市委书记毛铎、市长柯庆施等市委、市政府和警备区的领导同志已在等着我的到来。听了他们关于市内情况的简单介绍后，我感到市内正是风声四起，人心惶惶。

晚饭后，党政军民领导人都到市政府开会。

我首先传达了毛主席和中央局、聂司令员的指示，向大家介绍了我对这次守城作战的部署和考虑。

我说：“这次守城，我也没有什么良策。大家知道，我们的先人曾经演过空城计，不管是真是假，诸葛亮成功了。我们今天也要演一出空城计，就是动员大家把重要的物资和设备搬出去，把石家庄先变成一座空城。”

“这不是一走了之吗？”有人小声议论。

“不，我们还不走。这只是从最坏处着想。诸葛亮守城，只有几个老兵，几个侍童，如果这是真的，那太冒险了；我们今天不能这么干。先把东西搬走，万一敌人来了，也是空城，捞不到一点东西。这是作最坏的打算；但我们守城战斗还要靠实力。我从军区来，军区已经命令保定府到石门沿途及两侧的民兵、游击队赶快动员起来，他们的地雷战、地道战很有经验，可以阻滞敌人；主力部队也正在昼夜兼程，很快就会赶到石家庄。此次战斗，我负总责。所有党政军民的行动，都由我调动。由于情况紧急，部署和方案没有来得及同大家商量，如无不妥，就照此执行。”大家都没有意见，都说听我指挥。

我在此会之前，先到补训兵团司令部，向曾涌泉、叶楚屏等同志说：“保卫石家庄这个战役，我要以你们的司令部兼我的司令部”。这些老兵，听到我宣布任务，立即接受。

我要参谋人员迅速沟通与有关方面的联络，随时掌握和报告阻击迟滞敌人的情况及主力部队的所在位置；督促沿途各区县的民兵和地方武装按时到达指定地点。

同时开始物资疏散的准备工作。我把当时石家庄市及各机关单位的物资按战争时期的使用价值分成五等，第一天搬最重要的为第一等，次重要的为第二等，然后是第三、四、五等。各重要通道口都派警戒部队检查，是否都按规定的等级搬迁，否则扣留并处分有关人员，并限五天之内搬完。我反复强调，搬东西一定要按规定的等级次序搬运。先搬重要的，如银行、兵工机器、弹药、粮食、被服……至于办公用品则在后面搬，尤其不允许先搬沙发和床之类。无论是谁，必须严格执行命令。

警备部队必须坚守岗位，加强对重点目标和重要方向的保护和警戒，保证和掩护物资的疏散。补训兵团的部队应分别协助各单位进行物资的搬迁和看护。

市广播电台应大力配合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安定人心。

待我把各项工作布置完毕，已经是午夜之后两点了。

第二天，石家庄就开始喧闹起来。各大街小巷只见人们赶着大车，推着小车，有的还开着汽车，装载着各种物资，紧张而有秩序地向各个方向搬运。

市民们见状，有些惊慌。于是市内顿时谣言四起：

“共产党要撤了。”

“傅作义到了滹沱河了。”

“国军就要进城了。”

有些人惶恐不安，我决定马上去向市民作宣传。

首先我和柯庆施市长在晚饭缓步走上石家庄街头，约七八里，一去一回。人们看见军区副司令和市长并排在大街上行走，还不时地同过路的行人打招呼，许多人便窃窃私语：“看来没啥问题，首长们还在呢！”

随后，市内的广播喇叭里不断重复播送着：“市民同志们，下面通报敌情，请注意收听。敌傅作义部现进至唐河，被我民兵迟滞阻击，进展缓慢，……”

敌人在继续前进，进到那里，同样如实报道。一连几天都这样。这近乎违背军事常规，然而，全市人心反而稳定下来了。那时石家庄刚解放不久，敌特活动还比较频繁、猖獗，有些作保卫工作同志曾一再劝阻我们不要轻易走向街头，认为太危险了。我告诉他们，为了安定人心，必须这样。

城内的调动和安排井然有序。正面阻敌的民兵和地方武装步步抗击，使傅作义的部队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冀中部队按时赶到了，立即部署在正面迎敌，守城的指战员们士气更加高涨。

北面文年生、向仲华率领第6纵队兼程南下，5月8日进到孟县城附近。与此同时，吕梁军区和太岳军区的部队也相继北上，箝制太谷地区的敌人，准备配合第6纵队歼灭阎锡山部的暂编第49师。5月9日，6纵队发现阎锡山部分路进到孟县西南并继续向孟县城推进。他们请求打还是不打。我立即复电：“敌人送来的运动战，立即迎击。”第6纵队得令，乘敌人分兵冒进之机，迂回穿插。将敌分割包围后，发起攻击，一举全歼阎锡山的第49师，活捉敌中将师长张翼，并相机进至寿阳城。

傅作义得知阎锡山的策应部队第49师被歼，他自己的部队又沿途被我阻击，进展缓慢，判断石家庄已有准备，就悄悄地缩回去了。事后有人高兴地说：“聂荣臻唱了一出‘空城计’”。是的，是空城计。然而，和历史上“空城计”内容又不相同。

这时，华北军区成立，我被任命为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石家庄保卫战结束不久，我回军区工作一时期，就去华北军大了。

1948年10月，华北军区野战军第2、第3两兵团为配合东北作战，抑留傅作义部于华北，以便继续在察绥地区打击敌人。两兵团在平绥路东西两线互相呼应，频频取得胜利，使敌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傅作义为配合东北蒋军行动，为缓和北线压力，企图再次偷袭石家庄，威胁我党中央和华北领导机关的安全，迫使我抽兵回援。

10月下旬，敌人以郑挺锋第49军，新编骑兵第4师及骑兵第12旅等部为先头，并配属爆破队及汽车500辆，携带大量炸药，从涿县向保定集结；接着敌人又将第35军、第16军、第92军的3个师调到平汉线策应。敌人企图凭借其机械化部队和轻骑兵的快速行动，突然袭占石家庄，把华北最早解

放的城市的工业、交通基地彻底毁坏，尽管当时沿线铁路、公路均被我破坏，但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和骑兵沿着乡村土路仍能迅速向前推进。

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一面以冀中第7纵队并指挥地方武装节节抗击，动员20余万民兵埋雷破路，阻击敌人；一面调第2兵团兼程南下，预定在定县以北地区歼灭进犯的敌人。这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中央军委还令东北野战军第13兵团迅速入关。这次保卫石家庄的任务，军区又决定由我指挥。

在一个将近午夜的时候，我在华北军大（在石门市西约三十里的南北辛城村），突然接到军区司令部值班员的电话，说聂司令要同我讲话。聂司令在把敌人又要袭击石家庄的概略情况告我后，指定我去指挥石家庄保卫战。我没二话，“军令如山倒”呵！

我立即打电话给石家庄补训兵团司令部，说了一下情况和任务。又告叶剑英校长办公室主任薛子正，请他明天上午向校长报告一下。我立即去石家庄，与市里的党政军领导一起，分析敌我形势，迅速制定了作战方案。我认为，这次作战与上次相比，虽有不少有利条件，但敌我兵力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我还多了一个弱点，就是疏散工作比上次更多更繁杂。因石家庄市已成为华北地区物资集散地，各种机关、团体更多了。我们制定了作战方案，并报告中央，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看后认为很好，用电话相

告。

又一次紧张而有秩序的备战工作在石家庄市展开了。

我仍以军区补训兵团的机关作为这次作战的指挥机构。同时组成石家庄市备战指挥部，分设经济、宣传、战争动员、武装治安等各部，市区各机关团体统一调遣，统一行动，全市军政人员和人民一道投入战斗。为预防不测，我还把附近的华北军区步兵学校（训练班排长）调来，临时改名教导团，有战斗兵2000人，能征惯战，可谓劲旅，布置在石门市北的滹沱河南岸，作宽大正面布防。

接着，同上一次一样，我们仍然把物资分成五等，逐次疏散。在疏散期间，狠抓社会治安工作，清除内部的敌特分子，对那些散布谣言、哄抬物价等不法行为者进行有力的打击。我因有上次的经验和习惯，这次的行动，比较顺利。

我们刚刚部署完毕，敌军于10月28日，在1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由保定出犯。我地方部队和广大民兵在方顺桥、望都和清风店一线阻击，迟滞敌人的进攻速度。第二天，敌人进占清风店。30日，敌又以两个师沿铁路线向唐河北岸的奇连屯等处攻击，冀中第7纵队英勇抗击，毙伤敌千余人，使敌人无法越过唐河。这时，我北岳、冀中各分区部队密切配合，在保定以北破坏铁路、公路和桥梁，民兵则广布地雷，使乘坐汽车的敌35军两昼夜才从涿县进到田村铺，还不及我军徒步调动的速度。

与此同时，我们还利用为我控制的敌人通讯设备，开展无声的战斗，配合军事行动。

敌人收到一些复杂的情报，不敢妄动，只派一部分骑兵南下。骑兵出发不远，在望都以南的唐河遭到我军的阻击，受了损失。傅作义听说其先头轻骑遭受袭击，知我军在石家庄已有准备，便按兵不动了。

这个军事成就，是我们地下工作者善于欺骗迷惑敌人，他们达到了孙子说的“兵者……弱而示之强……”的水平。他们凭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独

立活动，甘当无名英雄，可敬可佩。

对保卫石家庄另一个有力的配合，是以新闻为武器，打击敌人。这场没有枪声的战斗，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当时，已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毛泽东，得知敌人进攻的消息，决定充分利用广播、报纸等新闻工具为武器，公开揭露敌人的偷袭阴谋，起“先声夺人”的作用。

1948年10月27日，正当敌人调动集结之际，新华社立即发表一条消息，报道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消息说：“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保石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利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这则公开发布的消息中还把敌人的兵力部署、企图及行动日期和盘托出，明确指出：“只要大家事先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消息中还特别提到：“今年5月，阎锡山、傅作义曾有合扰石家庄的计划，保石线及正太线各县曾经一度动员对敌，后来阎军一师在孟县被歼，傅军惧歼未动，但保石线人民已有了一次动员的经验。”最后还指出，此次因蒋介石在北平坐镇，傅作义不敢不动。但只要我们做好准备，就不怕敌人的偷袭。

消息发出后，立即见效。当晚，敌49军军长郑挺锋告傅作义，他收听广播得知，“匪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所警惕。彼方既有所感，必须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次日，郑挺锋只得以小部队向南作试探性推进。

10月30日，从平绥线南进的我军第二兵团，以三昼夜急行军200余公里的速度，突然出现在完县、唐县地区，使敌人为之一震。31日，新华社又发表了一篇题为《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述评。述评在分析了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背景内幕及其兵力部署，指出其必然归宿之后说，“从这几天的情报看来，这位郑将军似乎感觉有些什么不妥之处，叫北平派援军，又是两家合股，傅作义派的是第35军，蒋介石派的是第16军，正经涿县南下，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8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了，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这一招又果见效。傅作义闻讯，次日更坚定地放弃了偷袭石家庄的计划，赶忙收兵回营了。

这一着，真正做到了“先声夺人”；我军采用无声战斗法，正是“兵不厌诈”，也是孙子兵法讲的“兵者，诡道也”。毛泽东之善于运筹，决胜千里，为古今兵家制敌之一绝。

第二十二章再办军校

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联成一片，1948年5月9日，中央发出文件，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并成立了华北局、华北军区等机构，同时，中央还提出要创办大党报、大党校、大军校。两区合并，华北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解放区，对于全国的解放战争极为有利；华北这些机构的组建，为未来新国家的建立打基础，这是中央当时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

5月上旬，我正在前线指挥保卫石家庄的战斗，接到军委任命我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的通知，5月30日，石家庄保卫战结束不久，我即前往设在石家庄西郊南新城村的华北军大就职。华北军大是根据中央关于办“大军校”的指示组建的，所谓“大军校”，就是将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二分校和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等单位合并。我们当时分析，组建“大军校”也是为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建设打基础。校长政委由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兼任，朱良才为副政委，我为副校长。谭家述为教育长，陶汉章为训练部长，李钟奇为校务部长。

受命之后，我深感肩负任务的重要。红军时期，我作为军事指挥员曾经两次办教导队，一次办红军学校兼任校长。对治校与治军的关系，有切身体会。

1928年3月。我在湘南起义中组建宜章独立营，这支部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军，既缺乏军事知识，也没有战斗经验，当时办教导队，由我任队长，将部队中有点文化的青年集中起来训练，训练了一个多月，这些人分到各连队，在后来的战斗中，都能带领班排圆满地完成任务。特别是在井冈山的“八日失败”中，红四军29团几乎全部溃散，只有我带的那个连还保持建制，采取的办法就是抓住排长、班长，通过他们抓战士。使连队保持整齐不乱，在旧军事典籍中叫做“层层节制”。我那连为什么能做到“层层节制”？那是经过教导队训练的排长、班长起了重要作用。

1930年春，我在红四军1纵队任参谋长的时候。又办了一次教导队，培训连、排、班长。当时正是游击战争的紧张时期，我们利用战斗间隙，抓紧进行军政训练。这年夏天，我被任命为红四军3纵队司令，这个纵队又是一支农民军，政治素质好，但军事素养差。这时，我任队长的那个教导队快结业了，我就向军长林彪提出，把教导队全部调给三纵队。林彪同意了。我立即把大部分分到各连任职，部队整编不久，就出发打南昌，我们边行军边训练，两个月后参加打文家市，我纵队俘敌200余人，缴步枪270支，重机枪4挺，这中间教导队的学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不仅在战斗中能身先士卒，还善于带兵和练兵。部队很快由松散的农民武装变成令行禁止，进退自如的正规红军，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们而实现的。

1934年冬，红二、六军团创建了湘鄂川黔边根据地。次年夏，我们将从湘赣苏区带来的红军学校加以扩大，校址设在桑植县城，我以军团长兼任红校校长。当时从二、六军团各部抽调了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员和班长战士800多人入学。设高级班（训练团、营干部）、普通班（训练连、排、班长）、指导员班；地方武装干部大队，（训练地方武装干部和游击队长），还设机关枪、迫击炮班。

红军学校是很有特点的。首先是理论紧密联系实际。战争环境，训练时

间短，课程内容少而精，注重演练和实际操作。没有器材，就采用代用品，如练习破坏敌人电话线，就埋起杆子，拉上草绳子代替电线。战术课，讲完要领就练习动作。前线打完仗，就派人到学校来介绍战斗情况和战术运用。政治课，如建立政权、建党、政治工作等，都与当时的实际需要相结合。我们对教员很尊重，教员的生活照顾从优，伙食有补助。学校负责培养和储存干部，一旦部队需要，马上派去补充。

这所红军学校，存在时间虽不到一年，却训练了不少骨干。尤其是在桑植办的最后一期，人数最多，水平也较高，毕业后立即分到部队，不久即开始长征。在极端艰苦的战略转移中，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们都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回想自己亲历的这些办军校的历史，我深深地体会到，打仗靠兵和指挥官。而一支军队是不是能征善战，关键要看指挥员的军政素质。因此，先教后战，或边教边战，对于部队的建设和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也可

以说治军必先治校，治好校才能治好军。

中央决定让我再办军校，我感到与红军时期相比，责任更加重大了，红军时期，战事频繁，条件艰苦，不可能有较长时间和正规的训练，只有边打边训，才能应付战争环境。而华北军大建立时期，全国战局正在不断变化，共产党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大势已经明显了。军校不仅要直接为战争服务，还要从不久将要建立新中国国防建设着想，为我军未来的正规化的建设培养人才。

我到华北军大时。叶剑英校长、朱良才副政委等都已先到了。我尊重他们先到一步的成就，并着手建立和健全各级组织机构。学校设政治、教育、校务三个大部和校首长办公室，校首长和三大部直接领导各学员大队。同时学校自上而下成立了党的各级组织。校党委由叶剑英、我、朱

良才和教育部长谭家述、校办公室主任薛子正、政治部副主任李克如等6人组成。叶剑英为党委书记。校党委实行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叶剑英负责全校总的领导并主管教育。我分管行政，朱良才管党政。6月11日，召开全校连以上干部大会，宣布华北军政大学正式成立。7月1日，学校正式开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学校初建，工作很多。主要工作由叶帅负责。我们是助手。根据我在红军时期的经历和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对几个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并在不同场合加以强调或提出建议。

第一、要把华北军大办成正规学校，并使其首先成为全军正规化的模范。这是当时我们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必然要求。正规化，对于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新名词。但我认为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取得政权后，都会把管理国家的一套规章制度建立起来，这就是正规化。当时我们在华北已有大部分政权，因此在这个时候搞正规化也是适宜的。我们过去在战争中办学校，往往是“现炒现卖”，课程不完备，不系统，现在要办成正规学校，就要制定明确的教学方针，培训有专门知识的教员队伍，统一教学行政制度，编写成套的教材，以及制造各种教学用具，等等。

第二、为战争服务。这时解放军节节胜利，不久就要南渡长江，解放全国，需要大批干部。办正规学校，是从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基础上考虑的，但当时还在战争中，要及时输送大量干部到前线。因此，办学的宗旨还是为

应付当前战争所急需。

第三、要使教员成为专家，精通一二门专门知识。教员不仅要有“诲人不倦”的态度，首先要有“学而不厌”的精神，才有本钱去诲人。前述几个问题，得到大家赞同和支持，并逐渐贯彻到办学校的实践中。

古代有一句军事名言：“以不教而战，是谓弃之”。当时叶剑英把这句古语加以展开，提出“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学而教，是谓害之”的警句，激励干部安心办校，动员大家努力学习，他认为军队一定要有教育，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如果把不经过教育与训练的部队拉出去打仗，那就是等于让部队去作无谓的牺牲。我们的军队一向重视教育和训练，无论在前方还是在后方，只要有一点时间，就抓紧进行军事、政治教育。创办华北军大，就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加速为我军培养干部、造就人才。确实，取得全国政权后要办更多学校，办学校就要准备教育人材。人们提出：“教育者应先受教育。”

根据当时对战争形势和发展前景的分析和预测，军委确定华北军大的教育任务是：尽快培养团级干部 500 名，营级干部 1000 名，炮兵、工兵、摩托、参谋、政工干部约 2000 名；还要培训一批旅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随后，朱德总司令来校视察，又指示要培养军事教员 500 名，为战争结束后将要创办高级军事学校准备师资。这样，共约收学员四、五千名。我们当时还没有正规营房，任何干部和学员都住老百姓家。

学校成立初期，学员文化程度、工作经历各不相同，从旅团级干部到战士都如此。他们之中有军事指挥员、政工干部、后勤和地方武委会干部，还有刚解放过来的青年军官。学员和学校工作人员，当时的思想情况也比较复杂。不少人认为，华北军大的成立，不过是精兵简政，合并几个单位而已。有些机关干部，不安心学校工作，想到前方去；有些学员有种种个人考虑，不安心学习，其中一些工农出身的学员，又担心文化程度低学不好。还有一些旧军官，对革命形势认识不清，思想不稳定，等等。

针对学校中存在的各种消极思想，开学前后，我们召开了一系列党政会议，进行思想和纪律整顿。说明我军正向着大规模正规作战的方向迈进，中央军委和华北局要求部队与学校教育，必须严格正规，强调纪律、集中与统一，反对无政府主义、无纪律现象，反对游击习气。号召全校同志要认清战争的大好形势，认清自己的职责，克服不利于工作、学习，不利于团结的各种消极情绪，愉快地接受党赋予培养干部和来学校学习的光荣任务。要求教员和各级领导，要从政治上、军事上以及科学文化知识上帮助学员，使他们经过短时期的训练，奔赴战场，当好指挥员。

针对学员中有些人怕南下的思想，我专门作了一次以《打到全国去》为题的讲话。那时三大战役正在胜利进行，整个华北即将全面解放，人人都意识到我们就要统一全国，要南下过长江。华北军政大学的学员绝大部分为华北籍，不少人怕毕业后南下，主要是怕南方的气候热，怕吃不惯大米。他们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多是从历史上的战例和传说中（如曹操南下不服水土等）推测而来的。也有的人怕家里无人照顾等等。我很注意他们的这些思想情绪，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人民解放军是全国人民的军队，敌人退到哪里，我们就要追到哪里，即便天涯海角，也要跟踪追击。如今南方尚未解放，我们在北方能睡得着觉吗？我说，南方确实比北方热，但也和北方比南方冷一样。长征时期，红军大都是南方人，但到了北方照样能打。吃大米也是如此，很多南方人到了北方，多年吃馍、吃小米、吃包谷，也一样打仗。生活习惯问

题可以逐渐适应，最主要的是精神上不要泄气。使学员既安心学习，又随时准备行动。

为了保证学校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还要求各部门制定党政工作制度。同时，还通过创办《华北军大》校刊，组织开展竞赛、立功创模和各种文体活动，使学校各项工作进行得生动活泼，激发了学员的学习热情。

叶剑英校长对当时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了解得快而准确。这是因为他对国际国内军政情况知道得多，又具有卓越的分析能力。这对军大领导和工作安排很有好处。中央军委和华北局认为，华北军大第一期毕业将是 1949 年的秋天，那时革命战争可能在江南山区、水网地区以及西南、东南山区进行。要求华北军大的教学应着重进行山地、水网地作战的战术技术训练，还应当加强攻坚战的战术技术和各兵种合同战术的教育。据此，华北军大提出的教学方针是：培养成千上万的政治上坚定、能掌握与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正规建军和正规作战的军政干部，以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开学后不久，由于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工作经历不同的特点，对学员进行了考试和分科编队。然后召开有各大队领导参加的校党委扩大会，公布考试成绩和编队名单。全校学员共 7238 人，编成 8 个大队和 3 个直属队。即两个营级干部大队，还有团级干部、炮兵、工兵、政工、参谋、预科学员各编 1 个大队，以及台湾、华南、高干等 3 个直属队，军大还附设一所步兵学校，这时有学员 4948 人，两校合计，共有 12186 人。

为了既考虑当时战场的需要，又着眼于未来战争发展的要求，我们确定教学的基本内容是：军事教育讲授“战术概则”，包括进攻战、山地战、水网河川地作战的战术及各种合同战术。在技术上，着重训练炮兵和工兵。炮兵以山炮为重点；工兵以爆破和架桥为主；其次进行坑道作业与筑城训练。当时还打算成立摩托化训练班，准备建立摩托化部队。政治教育，除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专门课程外，特别强调党的政策教育，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总政策、土地政策、城市工商业政策、新区政策、俘虏政策等。部队管理教育，主要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及管理部队的方式方法。

建校之初，没有现成的教材，就把国内外军事学校的基本教材收集起来，然后按照军大的教学要求，组织力量，自己编写。经过半年的努力，全校有计划地编译了 30 多种通俗的军事教材，编写了 20 余种政治教材。为充实教学内容，我们还抽出一部分有军事理论又有文化的教员组成参战组，先后参加了太原和济南战役，收集作战经验和有关资料，回来帮助教员和学员及时了解前线的最新情况，以战教战，使学校教育 with 战场实际紧密结合，也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华北军大建校后，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根据我们对教员队伍状况的调查，当时几个单位合并起来，能够担负教学任务的只有 30 余人。按教学单位计算，军事教员就缺四分之三。我们当时曾提出解决教员不足的两个方案：一是向上级请调，补足缺额；二是开办训练班，培养新教员。但前者不现实，后者一时办不到。

怎么办？叶剑英当时明确地提出：“在那些脱离敌人营垒的旧军官和被我们俘虏过来的人中，吸收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来学校任教。”他称之为“搬师请贤”。这件事缘起于朱老总的指示。在我到军大之前，朱老总有一次到学校来，他对叶剑英说：“我们很快就要胜利了，但许多同志过去没有时间

学习，有文化的不多。战争结束后，我们还要准备办个高等军事学府，招聘一些起义军官来任教。”叶剑英把朱老总的指示和他的想法告诉我，我觉得朱老总对今后培养高级军事干部很有远见，积极拥护。我们除了在我军中挑选一些有文化、有知识、有实战经验的干部来当教员外，还挑选有文化和军事知识的俘虏和起义人员。不仅在晋察冀范围内挑选，还派人到就近解放区去挑。学校陆续接受了许多军事人才，他们有自愿来报考的、有起义的、有解放过来的。对来到华北军大这个华北当时最高的军事学府并准备当教员，非常高兴。到校后的第一个春节，有的还把家属接来。过春节那天，我们设宴与他们一起欢度节日。席间，猜拳行令，都很融洽。

对于使用旧军事人才，开始有的同志不大理解，曾有过一些议论。个别学员甚至说：“常败将军教常胜将军，这是给自己抹黑！”有的老教员也说：“过去没有他们，我们也一样办教育。”

听到这些反映，我们及时做思想工作。叶剑英还在校党委会上专题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争取、团结、改造、使用旧军队和旧军官问题，在党的‘七大’文件中，已有明确的论述。中国的旧军队、旧军官，有几百万人，不能简单地对待，必须争取、改造和使用他们。因为这不是少数人的问题，我们的眼睛要看到几百万。”

叶剑英在讲到争取、改造旧军官的可能条件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叶剑英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来统一大家的认识，并要求学校各级党的领导人及有关同志，对旧军官要做到思想上重视，态度上诚恳，政治上平等，生活上关心。因此，这些旧知识分子都能心悦诚服地接受帮助、教育，政治思想水平不断提高，在教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曾任傅作义的中将参谋长郭宗汾，是个工兵专家，根据他的表现和能力，我们还让他当了军大的工兵主任。曾经当过国民党广西整编军军长的韩练成（后来加入共产党，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已病故）原在国民党陆军大学教过战略课，到军大后我们安排他教统帅（战略）课程。他们亲身感受到人民军队对他们的信任，积极发挥自己的专长，做好教学工作。

在争取、改造、团结旧军官中，叶剑英的言传身教，起了好作用。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尔后在黄埔军校执教，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是广州起义主要领导者之一。后又去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回国后，到中央苏区任军委参谋长、红军学校校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又搞过多年统战工作，军事政治、外交，行行俱能。旧军官出身的教员，虽然大都出自于中外各种军事学校，但在叶剑英面前，多属晚辈。他们敬佩叶帅，听从他的教诲。如当时有些教员，一时还放不下过去的“官架子”。叶帅就诚恳地对他们说，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旧军队那个样子再拿到革命队伍中来，有多大意思呢？人过来了，架子也要放下来；架子放下来，才能从思想上站过来。他的话很有份量，能启发人。叶剑英不以云南讲武堂和黄埔的老资格和留学生自居，而是以诚相待，使一些原来对共产党有成见的人，逐渐消除了成见。记得有一位姓周的教授，资格老，水平

较高，在同行中有一定威信，人皆呼之为周老。叶帅尊重他，常同他商量教学中的问题，并通过他做旧军官的思想工作，效果较好。

在华北军大任教的旧军官，经过革命思想的教育和熏陶，成为我军建设的有用之材。1950年3月我到军委军训部工作，将这三百多人一分为三：大部分去刚创办的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员；有一小部分约20名较年轻的到北京参加军训部工作；一部分仍留华北军大（改为训练中、高级干部）任教。过去我就赞成使用旧军人中有知识、有技术的人为革命做工作。但对争取旧军人的思想认识还不高，经过叶剑英的言传身教，思想提高了，方法也改进了。在华北军大我又读了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更认识到华北军大对旧军人的使用和信任，是列宁主义作风。

过去我办学校，全为适应游击战、运动战。这次到华北军大，意识到我们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现在打仗，消灭敌人，缴获的多为美日现代化的装备。将来有全国政权和经济基础的时候，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必然会提到我军面前，因此，我们就开始考虑夺取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军队训练的问题。

原来的晋冀鲁豫和晋察冀军区的学校，培养的对象主要是连、排、班基层干部和战士，教学内容一般以班排战术和技术训练为主。华北军大则以培养营、团指挥员及炮、工、参谋、政治工作等专业干部为主，教学内容除本级战术外，还有合同战术，而且更理论化了。这样由原来各学校来的教员的教学水平和教学经验，都感到不够。教与学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有的学员感到学的还是老一套，没有什么可学的；有的怕学的东西到前线用不上，急于想走出校门参战；有的教员用来说明原理原则的事例，与学员经历的作战经验不一致，等等。

针对教学中出现的这些矛盾，叶剑英提出教学要走群众路线和教学民主。教员教什么，如何教，要征求学员的意见。学校教育小组的同志，要深入课堂和训练现场，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集中群众中的好意见、好经验，加以推广。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总结，重点抓了教学过程的三个阶段。

一是教学准备阶段。教员在授课前，深入调查学员的实际水平，听取学员对所授课目的意见和要求，然后根据学校的教学计划，拟定授课提纲。提纲写好后，召开有学员代表参加的教育准备会进行试讲，然后讨论、修改授课提纲。

二是教学实施阶段。上课时，规定教学组的教员要全部参加，主讲教员讲完后，其他教员可以补充，学员可以质疑。这样，有利于教员把握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把教材和教法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一阶段，还规定营团两级学员，每人准备一份自己指挥或亲自参加的典型战例，待教学进度到某一问题时，教员只作启发诱导，由学员来讲战例。这时，学员成为教员，教员也是学员。采取这种方法，使原理原则与实战经验结合起来，弥补了无实战经验教员的不足，取长补短，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三是教学检查阶段。主要是通过定期召开教育检讨会和学员代表座谈会，对全校的教学计划、教材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保障工作进行检讨，肯定成绩，找出问题，及时改进教学工作。随后，不论是军事科目，还是政治科目，都实行期中和年终考试（考核），以检查教学效果。

为了加强教员队伍建设，提高教学水平，我们要求全校干部和教员，加强自身的学习。要有刻苦钻研的精神，主动接收新鲜事物，不断提高自己的

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提出教员要当专家，要精通一两门业务。叶剑英提出的“不学而教是谓害之”的警句深入人心，使干部和教员都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叶帅反复强调要虚心好学，号召教员与教员、教员与学员、学员与学员之间，要相互学习，相互为师。他说，每个人都要有不耻相师的精神，不论对方身份如何，级别高纸，年龄大小，只要“闻道在先”在某一方面比自己懂得多，就应当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向他学习。这样，才能做到在任何地方都有老师，在什么场合都可获得学问。

叶剑英还要求大队以上领导干部，每个人都要结合业务选学一门课程，并力求精通；要进一步提高领导思想，改进工作作风，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充分认识到学习是党赋予的光荣任务，是时代对于部提出的迫切要求。

在全校开展的学习热潮中，叶剑英以身作则，他不仅受过正规军事和政治学校的教育，而且长期从事革命战争，有丰富的工作和战争经验。最使我敬仰的是他爱读书。在华北军大与他共事的时间不长，这方面感受最深。有一次，他对我说，列宁对恩格斯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这本书评价很高，对他写作这本书非常敬佩。我想列宁都敬佩的著作，我也应该读。就在这个期间，认真地读完了这本书。80年代，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军事百科全书要我写《战争》条目，我又再读这本书，受益不浅。叶剑英这种认真读书的精神，使我受到不少启发和教益。使华北军大出现了浓厚的读书的空气。也使我能坚持“手不释卷”的习惯，以及更注意读马列的著作。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叶剑英奉命前往北平当军管会主任，次年春，我也调离军大，随第四野战军南下。

第二十三章进军中南

1948年11月23日，刚刚进行完辽沈战役的东北野战军主力，取捷径隐蔽地挥师入关，紧接着，在华北野战军的配合下，又取得了平津战役的胜利，至此，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已全线崩溃。1949年1月15日，根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番号改为按序数排列，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当时安阳、新乡还有一部分国民党正规军驻守，第四野战军于2月底派出两个军先行南下，为进军中南扫清道路。

1949年4月，我由华北军区调到四野任参谋长。当时，正值国共开始和谈。我党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国民党举行谈判；而国民党政府并不甘心失败，企惕利用和谈，争取时间卷土重来，或“划江而治”、“守江谋和”。毛泽东早在1948年底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中就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所以，我到四野时，四野正在厉兵秣马，准备大举南下。

进军中南，是中央军委赋予第四野战军的光荣任务，也是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进军。我在接到通知后，就从石家庄赶到北京，四野司令部就设在北京饭店，我见到了罗荣桓政委，当时他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已决定留在北京。罗荣桓对我说，四野的两个副参谋长（陈光、聂鹤亭）都是资格较老的同志，你到四野来，能团结他们一道工作。四野及各兵团的领导人，多为我的老战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在一起打过仗，现在又到一起了，我想，在夺取全国胜利的进军中，我们一定会更好地团结协作，打好仗。

当时与我同到四野任参谋长的还有赵尔陆（称第二参谋长），我主要管军事工作，他则主管大军南下的后勤工作。因北方人马向南方进军，供应问题十分复杂和艰巨，林、罗就建议调他来负责此项工作。

4月11日，四野主力自平、津地区分三路南下。开始进军很顺利。13兵团先出发的部队，消灭了驻安阳的敌人两个军约1.4万人，又和平改编新乡守军1.6万余人，胜利结束了安（阳）新（乡）战役，这时河南已全部解放，以邓子恢为书记的中原局正积极准备，迎接四野大军的到来，以便解放江南、江西、两湖和两广诸省。

我们很快进至当时中原局所在地开封。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第二、第三野战军强渡长江，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23日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

5月，中央决定以中原局为基础组成华中局；将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与四野领导机关合并，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以林彪任华中局第一书记、华中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政治委员，邓子恢任华中局第三书记、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统一领导中南地区党政军工作。

我们到开封后，华中局领导人聚会在一起，分析研究了敌情和我情，认为四野进军中南，争取胜利的条件是优越的。

第一，国民党大势已去。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的统治已经走向崩溃，其在长江中下游防线已被突破；西北战场、华北战场的防御体系，也已彻底崩溃；尚存150万兵力，分布在福建、台湾以及西北、西南、东南诸省，军事上难于联系和协同。四野当面之敌，主要是盘踞在中南地区的白崇禧和余汉谋两大集团及国民党划归他们指挥的军队，共28个军73个师，总兵力约

40 余万人，由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主任白崇禧统率。这些敌人中，白崇禧嫡系第 7 军、第 46 军、第 48 军等少数部队尚有一定的战斗力。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自退出武汉后，图谋在五岭以北取得若干战术上的胜利，以求控制湘南，确保两广。他的嫡系部队，熟悉五岭南北的地形、风俗和人情，习惯山地河川作战，轻捷善走，常欲伺机一逞。但是，他所指挥的部队，有些是被我歼灭或遭受严重打击之后重新组建的，内部派系复杂，湘桂系之间，白崇禧与宋希濂之间，矛盾重重。他们虽然从宜昌、沙市到广东北部沿线布置了几道防线，企图阻止我军南进，不过，这些防线大部分是不坚固的，部队战斗力并不强。

第二，人民军队兵强马壮。全国解放军此时已达 400 多万人，主力 210 万人编为 4 个野战军，战斗力强。第四野战军约 70 万人，多来自东北地区。自 4 年前中央决定收复东北时起，各方面、各战略区都选派了优秀的党政军干部去东北，使这支部队人才济济。四野各部门、各兵团、各军师的领导大部分是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的将领，多属能征惯战之将；抗战时期培育的干部，多属各兄弟部队转来的进步分子或揭竿而起的英雄，他们带着队伍进至东北，经过一时期的整顿和大兵团的作战，也出类拔萃。他们是我党 20 多年来武装斗争的精华，而且大都出生于中南 6 省，曾经在这些地区打过仗，风土人情较为熟悉。两三年前国共合谈时撤到华东的两广纵队，这时也从华东来河南，与四野会合南下，两广纵队本产生于两广，对那里的情况更熟悉，会合后增大了四野的声势。

士兵大都是北方人，多属翻身农民，即使是解放来的士兵，也大都是贫苦出身，经过教育和训练，特别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不仅在思想上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在军事技术上也有很大提高。四野在出发前，首先从思想教育入手，进行了新区政策教育和以反对无组织无纪律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使新战士完成了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老兵更为老练；其次，按照中央军委的计划，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组建了兵团，补充了兵员，并针对南方地形气候特点，开展了水网稻田地区作战的训练。可谓兵是精兵，将是强将。

第三，战区条件有利于我。中南 6 省，大部位于长江以南，面积广大，气候温暖，农村绝大部分是自然经济。平原丘陵地带，为鱼米之乡；山地多森林，物产丰富。人口约 1.5 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有现代工商业的大城市武汉、广州，工矿业虽比不上东北、华东，但高于西北、西南地区。这些，都有利于大兵团的运动和军队给养装备的补充。不仅如此，这 6 个省，在中国近代、现代，都是革命发展的地区。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都在这些地区产生过深远影响。大革命时期，这里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也是最活跃的农民运动，北伐军从广东打到河南，影响很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若干次大起义都发生在这里，并创造了许多著名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一开始，在这里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或编入新四军开赴前线，或就地坚持武装斗争。五指山的红旗一直飘扬到解放战争；粤赣湘边纵队、粤桂边纵队、粤中纵队、闽粤赣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等也在这些地区长期坚持斗争，人数达 8 万余人，这些武装，在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下行动起来，同人民群众一起迎接大军南下。

但是，我们也估计到了南下作战的若干困难，主要是自然条件。大别山及豫西以南直到五指山，大部分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不利于大兵团行动。

夏季炎热多雨，秋季阴凉、多雾，空气潮湿，蚊蝇虫蚁滋生，容易传染疾病，北来人马，可能一时不服水土。还有少数民族多，社会情况与北方有很大差别，各地区语言复杂，交往有不少困难。其它如饮食、洗澡等生活问题，北方人马，都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适应。

我们继续南进，直到鄂北边境广大地区，除有敌残余据点，须在进军中扫除外，大部地区都已为友军解放。5月14日，四野先遣兵团在湖北团风至武穴（今广济）地段横渡长江。16日和17日，解放武汉三镇。

在这期间，国民党军第19兵团2万余人，由兵团司令官张轸率领，在湖北金口、贺胜桥一带起义。张轸是国民党元老程潜系统的人，我们通过李明灏事先做了他的工作。李原是国民党驻重庆的一个军长，他有眼光，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就辞了军长，到华北解放区来了。他与张轸在北伐时期同在程潜的第6军任职，又都是日本留学生，我12兵团就利用这个关系，又通过其他周密的工作，争取了张轸兵团起义。张轸兵团起义后，湖北就解放了。6月上旬，四野及地方主力近百万大军先后到达长江以北的襄樊、安陆、孝感、浠水一线，准备渡江。6月20日，四野领导机关到达汉口。

在此期间，我们积极筹划两件大事：

第一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我们掌握的情况，决定发动宜（昌）沙（市）战役和湘赣战役，消灭布防在西线的宋希濂部和布防在东线的白崇禧部主力，然后乘胜南进。

第二件，策动长沙国民党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1兵团司令陈明仁起义。

第二件事进展顺利。1949年8月4日，程潜和陈明仁率领长沙绥靖公署司令部、兵团部和3个军共7万余人起义，长沙宣告和平解放。长沙起义，影响深远。程潜是老同盟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入参机密，出主兵戎，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又属方面重寄，是国民党的元老。四野南下时，他担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虽无太大实权，但有高衔和声望，旧部及追随者不少。陈明仁自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东征北伐，战功卓著，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远征军，解放战争时期守过四平街，与四野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对阵，曾得蒋介石嘉许，是国民党有名的战将。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毅然率部起义，实现湖南的和平解放，也影响大西南及大西北的地方实力派，诚属难能可贵。

这固然是他们看清历史的发展作出明智的抉择；也是我党中央统一战线政策和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以及四野和湖南地下党的同志们努力工作的结果。这件事也与李明灏有关系。早在1949年春夏之交，李明灏就到武汉，同四野领导人商议策划和平解放湖南事宜。李与程潜、陈明仁是旧友，有同袍之谊。他对这件事很热心，多方奔走，从中联络。为了有利于和平解放湖南，四野还派出以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此外，湖南地下党组织也活跃，他们早已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经多方协同，终于促使起义成功。

第一件事则收获不大。

宜、沙战役发起后，敌发现我军击其两翼，为避免被包围，就全线收缩，南渡长江，向鄂西山区撤退。我立即追击，由于山路泥泞、狭窄，东北部队南下，全是北方装备，行动迟缓。只歼敌1.5万余人。

湘赣战役更不理想。在赣西北，当我军追击江西奉新、高安地区之敌，诱敌增援时，敌先期退走了。在鄂南之通城及江西新干，我军向萍乡地区迂

回，拟在创阳、醴陵以东地区歼敌，敌看出我军意图，就在星夜后撤至湖南攸县、茶陵地区，跳出了我预定的包围圈，此役仅歼敌 4600 余人。

两个战役未达预期目的，给我们以很大警惕。因这两战役是四野主动南下的第一次作战，未获大捷，敌有可能利用南方自然条件顽抗，就会迁延南方的解放。我们分析两战未获大胜，有主观和客观原因。主观方面，对白崇禧集团力避与我决战的特点认识不足，对其实力也估计不够，采取了通常情况下的诱歼和近距离包围（也就是战术包围）的战术，而敌人惯于山地河川战斗，兵少而机动性强，行动积极，数次主动避战，致使两次战役未达目的，说明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术效果不好。

从客观上讲，部队从北方到南方，不服水土，不熟悉水网稻田地区和山地作战，加之天气炎热，蚊叮虫咬，生病的多，一般连队发病率占四分之一，严重者达四分之三，非战斗减员大，严重地影响了战斗力。不仅如此，部队成员，大都是东北和华北籍，到南方后，衣食住行均不习惯，吃不惯大米，而面食又不够，也影响了部队的精力和情绪。这些都是我们事前没有充分估计到的。更没有料到的是牲口也不习惯南方生活。马不吃或不大吃稻谷和稻草，一吃就拉稀，体力不支，车炮也拉不动了。从湘潭到衡阳大道两侧，仅特种纵队的炮兵，有二、三千匹马在休息。

事后我想，人们对历史上甚至自身的经验是容易忘记的。我们在江西时期，有些人喜欢谈“三国”，谈到赤壁之战，大家都笑话曹操，说他军队是北方人，一到湖北，不服水土，加上别的原因，打了大败仗。他战前没有看出来，倒是周瑜看出来了，5 万军队敢于打他 83 万。四野的高级指挥员，大部分是南方人，长征到北方才十多年，便忽略以至忘记了南方的气候和生活特点。对北方和久居北方的人马到南方后的生活习惯，没有注意，耽误了前进的日程。后代人也有充分的理由笑话我们这些老兵，尤其是我这个运筹帷幄的“幕僚长”。我说这个故事，不外使人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而已。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在宜沙、湘赣战役之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自 8 月 1 日起，除 48 军在江西发动赣西南战役之外，全军转入休整。在休整期间，发动干部战士总结经验教训，进行适应性战术训练；还广泛开展以治病、防病、增强体质为中心内容的“兵强马壮”运动，以利于部队继续行军作战。同时急电东北调来 1500 吨豆饼（东北很快用火车送来了），掺和在铡短的稻草中，逐渐把马的胃口换过来。部队穿布鞋，不适应多雨的季节，我们就要求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就地取材，教部队打草鞋。这种手艺，红军干部大都会，到部队一示范，战士们很快也会了。我曾致电驻来阳之 46 军军长詹才芳，驻沅陵之 47 军军长曹里怀，要他们开办打草鞋训练班，老兵当教员。这样，就解决了一部分部队（主要是 46 军和 47 军）鞋子不足的问题。另外，还注意改善部队的伙食，尽量让战士们吃好，吃饱，以保持体力。

在休整的一个月中，我们抓紧群众工作，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优良传统，在新区积极参加了接管、建政、剿匪以及恢复交通、筹集粮草等项工作。大军向两广进军时，还留下 5 个军，分布于河南、江西、湖南等地担任工作队任务。他们与四野南下工作团合作，为新解放区的民主改革创造了条件，又从人力物力等方面为主力进军提供了保障。

在此期间，四野司令部建设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四野的各级司令部在入关前有较好的基础；但入关后，特别是渡江作战以后，敌情、地形、气候都有很大变化，司令部必须适应这种新情况才能担负新的任务。为此，我对司

令部工作提出了要求：

首先，司令部工作要具有较高的思想性。所谓思想性，主要是指预见性。司令部门要根据本军的军事政治任务，对战争发展进程有预谋和预见。如怎样与南方军队作战；怎样在水网、稻田、山区作战；在阴雨连绵或赤日炎炎的气候下怎样运动部队；军队在新地区交通运输条件变化的情况下怎样行动，等等，都是各级司令部门要预先考虑和设法解决的。

其次，要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司令部要善于运筹帷幄，才能决胜千里。战争瞬息万变，司令部要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参谋人员才有章可循，能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工作。就像一部发动机，各个部件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和功能，一经发动，就运行无误。我特别强调司令部门的人员都要各负其责。如侦讯谍报人员的工作中心就是“知彼”，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要围绕这个中心；作训人员就要“知己”，要对各部队人员武器数目和战斗力状况、所处位置等，了如指掌。工作有了明确规定，就不会交叉打乱仗。当时，我们叫做职责分明。

第三，提高工作质量。军事行动贵在神速，司令部门只有提高工作质量，才能保证高效率。刘伯承说过多次，参谋人员不要多，关键要质量高。他还举上世纪普法战争的例子，说毛奇 30 万军队，只有 6 个参谋，照样能打仗。为了提高参谋人员的工作质量，我在红军游击战争时期，以身作则。每到一地不等宿营就去看地形，林彪也常同我一起去，边看边定，哪里宿营，哪里放警戒，哪里作紧急集合场，哪里作出发集合场，等等。我身上带着笔和纸，地形看完了，命令也起草好了，回去后，让书记官一复写，就下发部队。这些技术性的工作，我自己干，动作快，对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也有好的影响。事过 20 年，我用这个例子来启发司令部的同志，也说明我们没有忘记红军的优良传统。

第四，加强技术工作。古代技术不发达，只能用简明的文书和标记，利用驿站、传骑和递步哨，来达到迅速确实的目的；四野南下，缴获了日军和美蒋的大量武器装备，从这方面讲，可以说是接近现代化了。因此，司令部的工作就要有更高的要求，以适应新的技术装备。

前述几点，我在大军南下途中，曾向司令部人员讲过，以提高工作效率。

1949 年 9 月，中央军委指示第四野战军除留下的 5 个军外，其余 10 个军分东、西、中三路向两广开进。东路军由第 4 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统一指挥第 13、第 14、第 15 军，以及第 43、第 44 军和两广纵队，由江西南进，待歼灭广州余汉谋部之后，由广州向桂南前进，迂回敌之右侧后，成为合围白崇禧部的南路军；西路军由第 13 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率第 38、第 39 军取道湘西，沿湘黔边直下柳州，迂回敌之左侧后，与第 4 兵团形成对白部的大钳形包围；中路军由第 12 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率第 40、第 41、第 45 军经湘潭、湘乡南下，迫敌向桂林撤退；尔后，三路大军在广西会歼白崇禧主力。

为便于指挥大军南下，华中局决定，野战军指挥机关分为前后两摊子。林彪、谭政和我在前方，率精干机构进至衡阳；赵尔陆、陶铸、陈光，仍在汉口，领导留守部队和地方武装及军队后勤事宜。

军委的指示是基于“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的判断作出的，要求我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湖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并明确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

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的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

根据军委指示，9月10日部队结束休整。中旬，分东、中、西三路，开始向南进军。四野总部令位于湘西北的第47军监视宋希廉部，保障湘桂前线我军侧翼安全，并规定了部队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注意事项，等等。

白崇禧发觉我军主力南下，急忙将已调到乐昌、耒阳地区的第46军、48军等部调回衡宝沿线，同原在该地区的第7军以及第1兵团等部靠紧，阻止我军南进。

根据敌人兵力调动集结的情况，我们判断白崇禧想在衡阳、宝庆（今邵阳）一带与我决战。10月5日，四野总部命令已进入青树坪、永丰、白果市一带的中路军停止待命，并指示：“如敌大举向我进攻，各部可采取诱敌深入方法，以一部抗击敌人，主力后移”。同时，命令已进至湖南芷江的西路军，折向宝庆、祁阳。协同中路军作战的第46军和48军向耒阳、常宁西进。我们预定在衡阳、宝庆地区与敌主力决战。

中路军大部于当晚停止待命，只有第45军的135师因在急行军中没有接到命令，继续向宝庆东南的灵官殿，楔入敌纵深，对敌侧后受到严重威胁。6日，敌人集中几个师围攻该师，未逞。而我四野的东西两路军已分别进入广东，逼近韶关和靖县，威胁广州和桂林。白崇禧鉴于形势不利，6日夜令所部全线收缩，向广西方向撤退。四野总部立即命令尚在灵官殿地区的我135师坚决阻敌南逃，命令第12兵团迅速追击。9日，我军在祁阳以北的白地市、黄土埔一带，把敌第7军军部及其所属的171师、172师和临时归其指挥的第48军的138、176师共4个师1个军部团团围住。10日，开始总攻。我第40军、41军、45军、49军，从东、北、西三面展开向心突击，激战至次日，除敌138师师部率一个团逃跑外，其余为我全歼，国民党在湘南的其他部队退入广西。

衡宝战役共歼敌主力4.7万余人，是进军中南的大胜利。虽然曾一度被白崇禧以进为退的临时部署所迷惑，延误了歼敌时间，但由于135师没有接到停止命令而深入敌纵深，并奋勇抗击，有效地迟滞了敌人的撤退行动；还由于发现敌人撤退，立即追击，得以将其全面包围，并全部消灭，沉重打击了白崇禧集团，为尔后进军两广，全歼中南地区之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衡宝战役的胜利，是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和四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指挥以及广大指战员奋勇作战取得的。在讲这一胜利的时候，不能不说到林彪。前些年，有人问我，衡宝战役林彪怎么写？我说：“应该实事求是地写。”当时，他是四野司令员、衡宝战役的指挥者。在战役中，抓住机会消灭白崇禧的主力，打得对，打得好，他注意抓白崇禧的弱点，以自己的优势兵力和指挥的灵活性，有力地打击敌人。他善于集中兵力，也谨慎，即便自己处于优势，也不轻敌，战术上总是以优势对劣势。从战术上集中兵力抓较孤立的敌人，与军委大包围的指示也没有多少矛盾，在大包围中可以采用战术包围，如果不注意大包围而专从战术上抓敌人就不好了。初到湖南时，他有这种倾向，经军委指出后没有看到他有不同意见。衡宝战役，是他指挥的，整个进军中南也如此。

但在这次进军中，我也看到了林彪的老毛病——过分自尊，仍没有改。

衡宝战役结束时，我情报机关掌握歼敌数目，有两个材料：一个是敌第7军全部加46军之38师，一个是第7军全部加38师1个团。当时尚未查清，林彪就向上报告，说歼敌第7军全部及38师。几天后发现敌38师仍在全县附近，但他不更正。我认为，林彪在战果未查明前，夸大战果以邀功；查明之后，又不改正以保面子，大不老实！

对于林彪，我比较了解。从井冈山起，我当连长、营长、纵队司令，他都是我的直接上级。我还先后两次当过他的参谋长，第一次是1929年，林任红4军1纵队司令，是年秋，我由他属下的第2支队长调任纵队参谋长；第二次就是这次进军中南，他是四野司令员，我又当了近一年的参谋长。有人说我到四野是林彪点名要的，我不清楚。有的说我后来调到北京，又是林彪把我挤走的，我也不清楚，反正都是军委的命令。我从入党以来，担任任何工作，都是党和行政安排，长期如此，形成一个观念，我是为党工作。从自己的性格来说，也不屑为个人驱策。

当林彪还在革命阵营的时候，我认为他政治上开朗，有军事指挥才能；同时也感到他有两个缺点“一是过分自尊，二是不大容人，性格上偏于沉默寡言，城府很深。”自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后，他以“紧跟”自居，有些人便认为他一贯正确。

在进军中南过程中，我和林彪合作是好的，他在工作上、业务上对我是信任的，但也有过一次争议。那是在1949年6月中旬，我们同到汉口。有一天，林彪同我谈中南地区的工作重心问题。他说中南地区几年之内应以农村工作为中心，并说了若干理由。我听了以后不以为然，因为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提出了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我也讲了些理由，但林彪听不进去。过几天，他便在中南局会议上通过了他的提法。7月1日，他又在武汉地区纪念党的28周年大会上大讲了一通。次日，《长江日报》就将他的讲话全文刊登了。听说当时他将这个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表示可以按照自己所设计的几个步骤去布置城乡工作。

1950年2月，邓子恢从北京回来，在华中局传达中央意见，中央认为华中局去年夏天那个口号（即中南地区以农村为中心）与中央精神不衔接，要华中局自己讲一下，否则中央要讲话，因为“你们登了报”的。我在会上发言，中心是同意中央的意见，还讲了我的看法。但林彪在两天的讨论中含糊其辞，对中央的指示不置可否，却说我“否定一切”，从此产生嫌隙，耿耿于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无端或夸大其辞，加以指责。1952年冬对改变全军军训计划的批评，1958年军队开展所谓的反教条主义，庐山会议后的所谓批“右倾”，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超乎常情地对我进行指责。以他的当时的地位和影响，那种指责对我造成的危害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我始终认为自己对党、对人民是忠诚的，即便被无端指责，也泰然处之。当然，也无可奈何。

我同林彪共事多次，知道他的个人尊严很重。在革命游击战争时期，军队的民主作风好，同事问即便上下级也可以互相批评，可以争论。在当时对这种方式是无人非议的，林彪也如此。但他成为一方重寄后，名望大了，地位高了，自尊也更严重了。他把自己的缺点推向极端，就不习惯于过去那种党内生活了，但我还是用老习惯同他打交道，他不能容忍，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解放以后，由于党的“左”倾错误，他从政治上的投机心理和个人野心

出发，大搞个人崇拜，把领袖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从而扶摇直上，成为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利令智昏，直到仓皇出逃，暴死沙漠。想到他的过去，难免慨然；看到他的晚年，不禁发指。至于他为什么走到如此地步，人们可以从他的经历和思想意识，以及党内倾向和人际关系去思考。

在衡宝战役进行中间，我东路军第4、第15兵团也挥戈南下，挺进广东。10月14日，15兵团一部解放了南部

名城——广州，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头目李宗仁仓皇逃往昆明。广州战役结束后，全军立即进行广西战役的准备工作。

退入广西的白崇禧集团，虽大败于衡主战线，但仍然

纠集了5个兵团12个军约15万人，连同由广东逃至粤桂边的余汉谋部，总兵力近20万人，企图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路及其两侧组织防御，以“确保左右两江，增援黔省，屏障昆明，及支援雷、琼”，妄图负隅西南小半壁。

四野总部综合各方面情况，认为：敌人已成惊弓之鸟，一触退逃，欲求全歼，关键仍是取大迂回，切断敌人后路，尤须注意他们逃往云南或其他地方的道路。我们拟定了具体作战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军委在批复时要求第4兵团“应着重切断白匪退越南的道路。”

当四野各路大军进军广西时，白崇禧还想利用他们在广西的特殊关系，以其主力第7军、48军、126军南下博白、郁林、岑溪，发动所谓“南线攻势”，企图在余汉谋残部的配合下，再图一逞。这是他在1929年和1936年军阀混战中对付蒋介石的办法。

敌人的“南线攻势”正利于我打歼灭战。四野总部根据军委的指示重新进行部署，令第4兵团及第15兵团的43军迅速进入罗定、信宜、茂名、化县、廉江一线，阻敌南下并相机歼灭该敌；以第12兵团及第13兵团的39军分路南下，击敌侧背，配合南线作战；令第38军继续挺进百色，抄敌后路。

11月24日，白崇禧桂系两个军向初到博白之第4兵团进攻。我军坚守阵地，敌攻击不利，进退两难。我在博白北面和东北面部队日益靠近，正面乘势反击，其他部队同时行动，经3日激战，将敌击溃，乘胜猛追。于30日围歼敌第3兵团于博白地区，敌兵团司令张涂彼俘。

与此同时，四野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昼夜兼程，不让溃退的敌人和当地国民党驻军与党政人员，得到喘息收容与准备逃走的机会，有的部队一直追到南宁。国民党近20万军队在半个月中绝大部分被歼，只有两万多人逃入越南。“小诸葛”白崇禧，把赌本输掉了，只好从他经营了20多年的老巢落荒而逃。这是一切反人民的军阀的必然结果。广西全境解放，实现了中央军委在广西境内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广西战役结束后，四野又组成了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兵团，由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统一指挥，经过两个多月的教育与训练，在思想和物质上做好了渡海作战的充分准备。1950年4月，渡海作战兵团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与接应下，以木船为主，配以部分机帆船为航渡工具，突破敌由陆海空军组成的“立体防御”，越过琼州海峡，登上宝岛，横扫残敌，直奔天涯海角。1950年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

四野进军中南，前后15个月，先后进行了6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歼灭了中南境内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诸部共43万人，解放了湘、鄂、赣、粤、桂5省，取得胜利的主要经验是：第一，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即军委指示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但在一定时机，

也注意战术包围，不失时机歼灭敌人。第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援，没有地方党委直接领导的游击队的配合，要想以较小的代价和不长的时间取得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与过去的陆地作战有许多不同，由于有琼崖人民武装的接应，就比较顺利的完成了作战任务。第三，认真掌握政策，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四野进军中南，有两起在政治上、战略上影响很大的和平起义，就是党善于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第四，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战役、战术发挥了灵活性、顽强性，攻击勇猛，追击迅速，善于战场包围等等。这和其他野战军一样，都有可贵的经验。

第二十四章主持全军训练工作

1949年底，衡宝战役刚刚结束，我在衡阳碰到了刚从北京来的黄克诚。一见面，他对我说：

“老萧，你可能要调动工作。”

我问他：“调到哪里？”

他说：“一是到军训部；一是到英国去。”

在此之前，我曾听有人说，新中国建立后，要往各个国家派大使，英国是世界上最老的帝国主义国家，也要派人去。

我问黄克诚：“究竟去哪儿呢？”

他说：“朱老总属意于你去军训部。”

从个人心愿讲，我还是希望留在国内，留在军队。作为一个老兵，毕竟对军队、对军事工作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向往之情。

1950年3、4月之交，我在汉口正式接到通知，调我到军委军训部任部长。

林彪夫妇在东湖为我和先佛送行。林彪平时言语不多，也很少流露感情。那天，他说了些勉励的话。我到四野近一年，一直处于大进军作战中，军事上和林彪配合得不错，看得出他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个时代，全党“一盘棋”、全军“一盘棋”的思想很明确，我接到通知后很快就动身了。大约在4月初，来到北京。

4月的北京，春意浓浓。迎春花开着，柳树泛着嫩嫩的绿色。建国伊始，万象更新，街上的行人都显得朝气蓬勃，让人觉着兴奋、开心。

调四野前，我在华北军区工作，华北军区司令部此时驻在庆王府。这是一座很大的院落，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司令部的人多数是我熟悉的战友，我们相见，非常高兴，当得知我调任军训部长时，主要负责人表示，有困难尽管找他们，即一定帮助之意。

我在华北军区司令部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去总参谋部报到。总参谋长徐向前当时正在养病，由聂荣臻代理总长。聂帅是我的老领导，南昌起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都在一起工作。聂帅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来得正好。军队建设正面临着重大的转折，百业待举，担子很重啊。”

我说：“我想早点到军训部上班。”

聂帅笑起来，说：“你以为军训部在哪里啊？就在你的脑子里，在你的手上。”

这时我才知道，任命我当部长的那个军训部，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没有办公地方，没有工作人员，一切都没有。

担子确实很重。

不久，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长和我，一起研究军训部的工作。周副主席说，各个国家都有很健全的军训部门，德国有训练总监部，日本叫陆军三部，国民党也有个训练总监部。我们建国了，随着作战任务的逐步减少，今后军队将以训练为主，因此，也要成立一个统管全军军事训练的部门。

讲到这里，大家都非常兴奋，你一句我一句他说起来。总的意思就是，过去我们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运动战环境，现在我们夺取了全国政权，人民解放军成为国防军，随着这种形势的发展，就不能沿袭过去那种不集中、

不统一、纪律不严和游击习气。军队要向正规化、现代化走，要由低级建军阶段走向高级建军阶段。

周副主席、朱老总和聂帅都反复强调一个思想，要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就必须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我记得朱老总打着手势说：“不搞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就是有现代化的装备也不成。今后，不能练兵的指挥员，也不能指挥打仗。军队平时就是以训练为主。”

大家一起研究确定了军训部成立后的几项主要工作：一是制定全军军事训练计划；二是组织编写条令条例；三是筹备组建陆军大学，而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军训部组建起

来。

周副主席对我说：“具体方案由你提出，荣臻同志审定。”

我从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一直在沙场征战，20多年来，枪林弹雨，从南方打到北方，又从北方打到南方。如今，南下征尘未洗，又受领了新的使命。作为一个参加过人民军队初创斗争的老兵，我为自己能够在历史转折关头担负这样神圣的使命而感到光荣，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说实话，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我缺乏现代化知识，担心不能胜任工作。

当我正想说出自己的顾虑时，见朱老总和聂帅正用信任的目光看着我，话到嘴边又咽回了。还在解放战争进行当中，我同朱老总、聂帅以及叶帅等接触时，就听他们谈起军队的训练问题。他们这些老军人，深知训练对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性，那时就在为新阶段建军的训练方针和任务筹划着。有他们支持、帮助和指导，我还有什么顾虑呢？

在战争年代，我虽然主要是领兵打仗，但也有过主持军事训练的经验。红军时期，我三次带农民军，从立正、稍息、端枪、瞄准开始，硬是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训练成了能攻善守的红军战士。下井冈山后，我担任过红军教导队的队长；湘鄂川黔时期，兼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解放战争中，兼任过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对于军队训练工作不算太生疏。特别是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喜读兵书，注意古今治军经验，对于训练军队有些想法，想到这些，我坚定了信心。

组建军训部，一切要白手起家。第一件事是找“落脚点”。好在当时房子并不紧张，军队进城时，占了一些旧兵营和官僚的房产。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与我看了几个地方，最后选中东四六条的一座院落。院子不大，房子也不多，但环境僻静，适宜办公。人民军队胜利后第一个军训部便设在了这里。

有了办公地点，紧接着就是选调干部。选人比选房子要复杂得多。我们定了选调干部的两条标准：一是政治强；二是有作战经验；三是有文化。当时从华北军政大学选调

了一部分懂训练的人员，还从各方面选调一些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如李钟奇、刘光弟、吴伟、叶楚平、陶汉章、蔡铁根等，他们勤奋实干，成为军训部初创时期的骨干。

干部调齐后，根据工作任务，建立了部办公室和训练局、军校局和出版局等。几个局大部新建的，只有出版局是原有的，它是由在延安时期建立的军委四局改称的。局长是童陆生，是一位对中国的古典文史和中外军事典籍，都有涉猎的人。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组织人陆续翻译一些苏

军的教材和收集中外军事资料。军训部成立后，更系统地翻译了苏军的条例、条令。此外，他还组织人员广泛收集各种军事图书资料，包括国民党的操典、条令，还有日本、德国的操典等。后来军训部编写条令，大家都到他那里查阅资料。

经过近5个月的筹建，军训部的框架终于搭起来了，各项工作也准备就绪。6月，军委正式下达任命我为军训部部长的命令。9月，我们召开了一个大会，宣告军训部正式成立，公布了全体干部的任职命令。

这里要特别提到，当时军训部的编制中，还有个高级研究室，也叫参事室。这是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设的，主要是安置国民党起义将领和解放的高级军官，如周亚卫、高树勋、廖安邦、翟建新、马鹏飞等，都在这个研究室，这也是当时军队中唯一具有统战性质的机构。军训部初建阶段，这个机构曾起过一些咨询的作用。当时的主任周亚卫，曾任国民党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我请他写一份介绍日本陆军情况的材料，他笔头很快，几天就搞出来了，其中关于“野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预备役部队）部分，我感到很有参考价值。他们虽然不参与决策，但经常介绍中外军队的一些情况，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开阔了视野，也打开了思路。

军训部成立之后，我们立即着手抓编写条令、制定全军训练计划并组织实施，以及筹建陆军大学。这三项工作都是开创性的，任务十分艰巨，调来的同志齐心协力，都想把工作搞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了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这一要求自然地成了建国后军队建设的纲领。当时提出四个统一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这支军队过去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环境，残酷的斗争使各部队必须独立自主，各自为战，虽然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是统一的，但从指挥上、制度上、编制上、纪律上都是根据当时当地战争的传统习惯制定的。当时五大军区都颁布了自己的条令，这在战争年代十分必要。但在建国以后不久，1951年军委制定了“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建军方针，就是适应这种新的历史任务提出的要求。后来毛主席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更明确地提出了“五统四性”，即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以及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并指出“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必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可以说，这些就是当时我们编写条令以及组织部队和院校训练的指导思想。

编写共同条令，是实现全军统一的首要措施。记得1950年的夏天，我们在东单大华电影院（当时军训部没有礼堂，开大会只能租用地方电影院）开大会，我作了动员。会后组成了精干的班子，专门负责编写条令。开始就是编写纪律、内务、队列三大条令。我们编写条令，除了参考各地区的材料以外，还参考了古今中外的条令。中国军队只有国民党时期有较为完备的条令，我们当然不能以他们的条令为蓝本，主要是参考苏军的条令。苏军的三大条令这时都已经翻译出来，又结合中国历史上一些好的军队管理办法，加上我们自己的优良传统和经验，拟出了初稿。夏天开动员会，冬天便送审了。

周恩来总理当时指定由刘伯承审定三部条令，总理对我说：“只要刘伯承点了头，就算通过了。”刘帅此时还在西南，我们编写出一部分，就派专人送去给他审一部分。12月22日，刘帅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说：“内

务条令已研究完了，讨论中所提的问题均由张戈同志面告，总的原则应该是：1.以苏军内务条令为蓝本；2.以我军优良传统及其好的历史习惯为基础；3.一般的应简明易行；4.适合现在，照顾将来，特别加强陆、海、空军的建设及备战的观点。”

过了一个星期，他又给我来信，写道：“对纪律条令之草拟，我们意见：1.应以苏军纪律条令为蓝本并照顾我军优良习惯与作风；2.条令内应注重教育，多讲理少惩罚。”根据刘帅的指示，我们又反复讨论并向五大军区军训处长和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征求意见，草本先送196师去试验，他们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摆排。精心修改后，又送到刘帅审查。1951年1月15日，南京军事学院开学。在开学典礼上，我见到刘帅。此时，他已调军事学院当院长了，一见面他便对我说：“你不要急着走，等两天我就全部看完了。”

听了这话，我非常感动。修改稿送给他也就几天时间，厚厚的一摞，他竟快要看完了。开学典礼后，我到扬州走了一趟，回来后，刘帅捧着三部条令的稿本对我说：“好了，可以拿走了。”

回到北京以后，我把刘伯承审过的条令，送给总理和聂帅，他们都表示伯承同志审过了就可以定下来。这时，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来，我又把几个条令的稿本拿给他看。我对他说：“我们把条令搞出来了，从华北军区调一个连来，给你演示一下吧？”

他说：“好！”

我就从华北军区调了一个连，从立正、稍息，到连的队列动作，一项一项地演练，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把条令的主要内容演示完了。

彭总看了很高兴，说：“可以，就这样！”

2月1日，总参谋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队列条令和纪律条令（草案），在全军试行。毛主席在颁发三大条令的命令中指出：“全国胜利后，为了实现国防军正规化、现代化的新任务，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动作、统一制度就成为全军一致要求。”条令颁布的那天，我真是高兴啊！人民军队几十年风风雨雨，艰难奋战，终于有了自己的共同条令，有了军队建设的准绳。后来，这三部条令草案又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和颁发执行，但基本内容没有变。

三大条令颁发后，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贯彻条令也是正规化的养成教育，从军人一举一动，部队的一日生活制度入手，培养军人和部队严格正规的良好作风。从贯彻三大条令开始，全军各部队逐渐走上统一的轨道。

在编写条令的同时，第二项工作是部队训练。军训部成立后，一直把部队训练作为主要的工作来抓。我曾指定陶汉章负责组织编制一个全军的训练大纲。在此之前，全军没有统一的训练大纲，各军区各搞各的，为了便于将来统一指挥和统一管理，军委指令制定全军的训练大纲。1949年和1950年部队大部分在执行消灭蒋介石残部的战略追击任务；1951年和1953年又赴朝参战，作战任务仍很紧张，没办法全面实施正规化训练。我们从实际出发，前面仗怎么打，后面兵就怎么练。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战争规模大了，武器装备也更加先进了，特别是炮、装、工、通、化、铁道等兵种，还有空军都参战，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成为新的作战方式。这就对部队的训练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于是，我们在制定训练计划和组织实施训练时，就强调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训练。

1950年11月，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

会议主要是研究训练教育大政方针的。我在会上讲了两次话，对全军的训练方针进行阐述。这个讲话事先搞了很长时间的调查，又对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任务、特点进行研究，写成稿子报到军委审定后才讲的。

记得会议开始前，周总理找我去，要审查这个讲话。那天，我到了中南海总理的办公室，只见那里已等了许多人，有外交部的、总参的、总政的……，大家都有事情要向总理请示，就排队等候。轮到我时，已是夜里12点了。我先把讲话稿念了一遍，总理很认真地听着。念完，他又把稿子拿过去，一段一段地看，一句一句地推敲，真是字斟句酌啊！我们对训练方针的制定，是很认真的。除事先与北京有关方面商量外，还多次请示刘伯承，概括于下：“在解放军现有素质基础上，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队学会掌握现代化兵器及其他军事技术，使指挥员学会组织与指挥各兵种联合作战与协同作战，了解参谋与通信勤务，以加速我军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

我对总理说：“这是比较完整的表述，有些复杂，不大好记，我概括为两句简单的话，‘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联合作战’”。

这两句话，前一句着重于技术方面的学习。后一句是在现代技术基础上学会诸兵种合同作战。

总理听后，琢磨了很长时间，然后点点头说：“行，就这两句话吧。”

当我从总理办公室出来时，天已经亮了。几个小时的紧张工作，才觉得有些倦意，而周总理从白天到黑夜已经整整干了二十多个小时。

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都要总理亲自处理，他的辛劳是可想而知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也常常加班加点。虽然紧张劳累。但心情却异常兴奋，也十分舒畅。几十年艰苦奋斗，终于打下了江山，大家都抱着要好好干一番事业，造福于国家和民族的心愿，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累？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之后，我又根据在会上的总结讲话，正式写了“关于全国军事学校建设问题与部队训练会议向军委的汇报”。总理对这个报告作了修改，1951年4月19日，他在报告上批示：“已改好，照发。”当天下午，军委正式拟复：“军训部萧克部长：送来1950年12月关于全国军事学校及全国部队训练会议的报告阅悉。我们同意这一报告所提的各项原则，望由军训部将此报告印发给各军区，各兵团、各军、各师、各特种兵部队及各军事学校研讨施行。会议中所决定的三类文件：（一）军事学校教育类；（二）部队训练类；（三）军事出版类，亦望由军训部印发全国部队及军事学校试行。”

从此我军部队训练和学校教育都有了明确的方针和依据。

1953年6月以前，部队训练主要还是以学技术、学文化为主。当时苏联援助了我们许多武器装备。但是，部队广大指战员多文化不高甚至没有文化的农民，掌握这些武器装备就发生了困难。所以，学技术、学文化就成了当时十分迫切的问题。1950年我们在全军掀起以学技术为主的技术训练热潮；1951年总政治部又把文化教育作为全军训练的中心任务，提出向文化大进军的口号。

当时全军广大指战员学技术、学文化的热情高涨。新中国成立了，在政治上翻了身的人们，更希望在文化上翻身，以便成为真正的国家和军队的主人翁。正是这种精神动力，使部队的文化素质提高得很快，许多指战员在很短的时间就掌握了难度较大的技术。记得有这样一件事：50年代初期，苏

联曾帮助我们训练了一个坦克师。过去我们没有坦克师，也没有这方面的训练经验，苏军在提供装备的同时，还派人来帮助我们培训人员。由于指战员刻苦认真，仅用半年时间就把装甲部队的战术技术基本掌握了。苏军教官很惊讶，也很满意。

当时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什么都学苏联。这在当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那时世界上真心真意帮助我们的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是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苏联给了我们物资和军事装备援助，我们只能学苏联。当然，任何一件事强调过了，就难免有失偏颇，如有的同志主张“不走样地学”，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完全照搬苏联，这都是不足取的。那时，各个单位都请苏联顾问，部队的特种兵学校和师以上单位都有顾问，有些顾问不了解中国情况，有些意见也难以实行。但总的来说，那时对于学苏联的问题，我们是把握得好的，苏联顾问大部分起了好作用。

提起苏联顾问，我十分怀念曾一起共过事的格拉兹诺夫。他是我们军训部的首席顾问，我刚到北京时，他就来了，住在一个旅馆里。那年他已经 57 岁了，是苏军的一个中将军长。我每次去他那里，都见他在伏案工作。旅馆的条件不好，连个写字台也没有，他就趴在茶几上写教材。他为人坦诚，忠厚，我们常在一起交谈，我曾问他：“您在哪里读的书？”他说，他是雇农出身，只读过小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十六七岁，沙皇征兵把他征去了。在寒冷的战壕里，他听到了十月革命的炮声，当时列宁号召所有的沙皇士兵扔掉枪回家去，他响应。回家后又出来当了红军。他说，他的文化和军事知识都是在红军中学的。

听了他的话，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个只读过小学的小雇农，当红军后，派到苏联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毕业当了高级将领，还来中国当军训部首席顾问，真值得人们学习，工作中我们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但这种情况毕竟不多。当时，我们与苏联顾问彼此都很真诚，一方真诚地学，一方真诚地帮。在南京军事学院时，陈毅和刘伯承也曾对我说起苏联顾问的事，说军事学院的教材都是他们编的。陈毅与那位 60 多岁的首席顾问谈话，认为顾

问有知识。要认真的顾和问。

1952 年 12 月，第一次全军参谋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根据毛主席关于要“开展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现代作战能力”的指示，确定了从 1953 年 6 月开始全军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训练方针，并拟定了一个以战斗训练为主的正规训练计划。

在这期间，我们着重抓了高级干部集训和机关演习。记得 1951 年在河南明港由军训部主持搞了一次加强步兵团演习，这是军训部第一次抓的诸兵种合同作战演习，规模虽然不算大，但为即将展开的正规化训练做了示范。1952 年在南口又搞了一次战术演习，也为 1953 年的训练创造了条件。类似的演习以后就多了，规模也越来越大，像 1954 年 11 月由军事学院在山东半岛主持的抗登陆演习，1955 年 11 月在辽东半岛由叶剑英主持的抗登陆演习，都是全军性的。和平时期练兵，就是要搞好演习，因为这种近乎实

战的演习，对组织指挥和战术协同能力，是一种综合训练和检验。我们开展正规化训练，必须下大力抓演习，在这点上，军训部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为各部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953 年底，我们在年终总结时，对这时期的工作做了这样的评论：

“1953年下半年我军按正规统一计划进行部队训练，这是我军向正规化一个重大的成就和正确的措施。”我认为，这个评语反映了我们这段工作的实际情况。

组建军事院校是我在军训部期间做的第三件大事。最初是筹建陆军大学（1950年11月军委正式定名为军事学院）。全国解放前一年，军委在华北曾建立了一所军政大学，叶剑英任校长，他说，要注意收罗有知识的旧军人，朱德总司令来校巡视，曾说，全国解放后，我们要办高等军事学府。这些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为此做了些具体工作。

从人民军队创建那天起，我们就希望有一所自己的高等军事院校。因为我们这些老军人深知治校对于治军的重要性。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有过几所很重要的军事院校，如保定军校、黄埔军校，还有云南讲武堂等，中国一大批有才华、有影响的军事将领都出自这些军校，共产党的军事将领也有相当一批来自这些军校，像叶挺、董振堂毕业于保定军校，徐向前、林彪是黄埔生，朱德、叶剑英来自云南讲武堂，彭德怀、黄公略来自湖南讲武堂等。

在战争年代我们没有条件办自己的高等军事院校，虽然各时期、各地区都创办了一些红军学校、抗大、军大等，但并不正规，学习内容也多以政治为主，学军事学得比较简单，不系统。新中国一建立，中央军委就在筹划创办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了。朱德、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等对这事最热心、最认真。

记得我到军训部不久，成立了陆军大学筹备委员会，指定我为筹委会主任。有一天，朱老总听说我们要为陆大选校址，就说：“我和你们一起去看。”他和我坐车先到府佑街附近原北洋军阀陆军大学的旧址，一看，过去的建筑不大适合于现代教学，同时，房子太破，一下子修不起来，不行；又到五棵松一带，还不行；后来又跑到现在国防大学所在地红山口，一连跑了四五个小时，他老人家还兴致勃勃，边走边给我们讲战争年代看地形的笑话。

开始，朱老总主张军事学院办在北京，但一直没选到合适的地方。后来我到南京去，发现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校址比较好，就提出军事学院的校址设在南京。这时，军委已决定由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的院长。

提起这事还有段故事。当时，刘帅在西南军区当司令员，谁都知道，这是个有职有权的岗位，但他对军事教育事业却情有独钟。一次，他来北京，见到总理和朱老总，诚恳他说：“我年纪大了，想教教书。”朱老总早就想请刘帅来当军事学院院长，但还没有提，刘帅一说，他非常高兴，连说：“好，好，你来当校长。”早在二三十年代刘帅就留学于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西方的军事理论，又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是我们党内文武兼备的大军事家。现在请缨办军事学院，完全是为了我们军队的建设，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这种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我和刘帅在工作上有过较多接触，当我提出在南京办军事学院时，他欣然地说：“这事你定就行了。”那时我的思想上很少有顾虑，有什么想法直接就向总理、朱老总、刘、叶、聂几个老师提出，他们很快就拍板决定。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听说要在南京办军事学院也很热心，对刘帅说：“你在南京办军事学院，我当后勤部长，后勤保障的事我包了。”后来确实如此。

校址选定后，接着就是选教员。除了从部队调一批有作战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军事指挥员外，主要是从华北军政大学调教员。我们早就准备了一批教员在那里。前面说了，1948年朱老总就对叶帅说过，要准备将来办军事

院校的教员。我们那时打胜仗多，俘虏也多，就派人到各地去物色解放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找了 200 多人。

在利用旧军人这个问题上，曾有过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怎么能让打败仗的人来教打胜仗的人呢？也有人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能向旧军人学习呢？

我认为军事理论、军事原则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属于哪一个阶级、哪一党派，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比如争取主动的原则，集中兵力的原则，重点防御的原则等等，任何一支军队打仗都要坚持这些原则。正因为这样，一部《孙子兵法》，古代人学，现代人也学；中国人学，外国人也学，超越了时代、阶级和种族的界限。

1928 年湘南起义时，朱德指挥工农革命军同许克祥的部队在砵石打了一仗。当时，革命军用的是段祺瑞政府的《步兵操典》（北伐军即用这个操典），而许克祥用的也是这个操典，结果，我们以一个团打垮了他一个师。那时我就想，一本操典，北洋军阀用、北伐军用、国民党用、共产党也用，战争结果却不一样，说明军事原则是相同的，关键是看什么阶级、什么人领导和运用。

1930 年 8 月打长沙时，我那个部队缴获了 5、6 挺机关枪，组织起一个机关枪连，但没有人会使用机枪，我就让一个被俘的国民党机枪排长来当连长。这位解放过来的排长，经我们一宣传，就报名参加了红军。他技术很好，经他训练，部队掌握了机枪的射击技术，很快投入战斗，起了作用。当时我还没有理论上的认识，只是感觉战争需要知识和技术，既然这位排长有，为什么不能用呢？当然，是在改造教育的基础上使用。1935 年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战场俘虏了国民党中将师长张振汉，我在同他多次谈话中，看到他战争经验多，有军事知识，请他到红军大学当教员，讲军事课，那时的思想就比较自觉了。

有时候我也去听课，一为让张放心讲课，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我是当时红军的高级指挥，听课时也和一般学员一样，以“师礼”对他。另为使听课的学员，他们是战争的胜利者，在这位俘虏来的老师面前，不以胜利者自居，而要虚心听课，从他那里学到知识。我还虚心的听课，我的部下就更虚心了。起点学习带头作用，当然，我在听课之前，也考虑过听他的课，可以看出老师的水平和态度。

筹建军事学院时，这个思想更明确。当时周总理、朱老总以及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等都是这个思想。我听朱老总多次这样讲：“过去我们没有条件学习，而国民党则不同，他们有条件，很多人经过正规学习，有理论、有知识、懂技术，我们要利用他们来教学。”刘伯承也讲过：“旧军人经过改造，就可以来教我们，因为军事原则，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外大体是相同的、一致的。”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1951 年 1 月 15 日，南京军事学院开学了。学员是由总干部部负责招收的，由军委批准。我军一些著名的将领像陈锡联、杨得志、许世友、陈再道、杨勇等，当时都是第一期的学员。军事学院的学习正规、严格，学员不论职务多高，一律按统一要求，过紧张的集体生活，按规定的教材上课，参加考试。有一些老干部适应不了这种严格的学习生活，他们从游击战争的环境过来，习惯于带兵打仗，坐不住，特别是到考试便叫苦。他们向刘伯承院长反映，说这样学下去受不了。刘伯承院长很幽默他说：“天

底下只有饿死的，没有学习学死的。”他们都照刘伯承的指导，继续努力学习，也学好了。

从思想上说，这些同志倒不是怕苦，长征那么苦都走过来了，学习上的这点苦怕什么？主要原因还是过去战争的生活习惯没有转变过来，对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特别是骄傲情绪作怪，认为过去没有学习，也打了胜仗嘛！这种想法在当时比较普遍。

我认为，军官必须要有知识，高级军官，知识要更高些。古今中外那些有影响的军事将领，都是有知识的，孙子如没有知识如何写得出千古不朽的兵书？蔡松波（蔡锷）如没有知识，又如何编得出曾胡治兵语录？凭经验能不能打胜仗呢？能，但不会总能。经验毕竟是有限的，不自觉的，比如，不懂得电子的使用，又如何能指挥现代战争？所以，我始终认为，军队干部必须学习，要成为有知识的人。当时，我们军训部配合军事学院，针对有的干部不爱学习的思想障碍，做了一些工作，慢慢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学习氛围。

那个时候，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干部的学习。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学习就不要当军事干部。这也使全党全军学习蔚然成风。

在筹建军事学院的同时，军训部还抓了全军其他各级各类院校的组织工作。建国初期，我曾对全军院校排队，发现陆、海、空军和防空军都有院校，陆军中的步兵、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工程兵也有院校，只有化学兵没有院校。我认为化学兵是个重要的兵种，在现代战争中不能缺少，而当时又特别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我就向军委建议组建化学兵学校。

组建一个学校首先要选校长，我马上想到了张乃庚。张是北京某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抗战初期到晋察冀参军，当过教导队队长，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和副政委。我向聂荣臻代总长建议，聂也知道这位同志，我一说他就同意了，我便给总理写报告。很快，报告转到主席那里。1950年11月29日，毛主席批准了我的报告，又过了一个多月，化学兵学校在四川江津成立，以后迁到北京的南口。

随着部队正规化训练的全面展开，军事院校也不断发展，各大区、各军兵种还要创办各类院校。为了统一规划，我组织军训部的同志分赴各大区，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认真调查，对院校的数量和分布进行科学论证。当时我们摸清了三个情况，一是全军有多少个排长；二是有多少干部要提升；三是有多少干部要转业或退伍。这样也就摸清了全军共需要各级各类院校的总数和各类院校的规模、招生数额等。我们把全军院校分为“三级制”，即培养初级指挥员的基层军事学校；培养中级指挥员的军兵种高级军事学校和培养军以上指挥员的全军最高学府——高等军事学院。后来我们又提出，基层军校培养的排长、连长、航空员等要达到大学水平，上可以一直提升到国防部长；如果退伍回到地方，其文化水平也可以当教员、当经理、当厂长等建国干部。

我们这样考虑问题是从当时的国情和部队干部队伍长远建设出发的，我认为把院校招生同干部的进退结合起来；把干部任命和复转结合起来，军队院校培养出来的军官，既能治军，又能治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用人才”，就能使干部队伍像活水一样流动，保持生机。

为了建设好全军的军事院校，我们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院校建设调整方案。

我把这个方案拿给刘伯承和叶剑英看了，他们都同意。刘帅还说：“你

去向主席汇报一下！”

我就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的叶子龙，说：“我要向主席汇报工作，能不能安排一下。”

叶子龙说：“等我通知吧。”很快，叶子龙打电话来，说主席要我去汇报。

我拿了早就准备好的五张大表，到主席那里，我说：“主席，我要在你的墙上挂几张图表。”主席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样可以一目了然。”主席说：“那好，你就挂吧。”

我把图挂在毛主席面前的墙上。这五张图把全军军事院校的布局、纵向和横向的关系以及教学内容、训练计划等都反映出来了。毛主席一边看，我一边解释，他随时提问，我指着图一一回答。很快，他说：“你要汇报的问题我已经清楚了。很好，很好！”那天，主席显得特别高兴，临走时还对我说：“你以后再回来嘛！”

1952年6月，毛主席批准了我们提出的全国军事学校进行统一调整的方案，将全国五所高级步兵学校缩编为一所总高级步校和两所高级步校，将17所步兵学校缩编为9所，并决定在哈尔滨筹建军事工程学院，培养陆海空军高级技术人员。经过调整后，全军共有各级各类院校91所，各院校的训练对象、学制、训练计划、教学内容等，都趋于正规化。

1952年11月，军校部成立。从此，全军院校工作有了专门的机构进行统一领导。

从1950年6月到1954年11月，我担任了四年多的军训部长，主持全军的训练工作。回想起来，这段时间无论从我们党、我们军队还是从我个人来说，都是一段难忘的岁月。那是一个真正齐心协力搞建设，全心全意干事业的时期，大家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到处充满了朝气。

第二十五章 1958 年反教条主义

1954 年 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第二年 4 月间，以总参军训、军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组成了训练总监部。训练总监部以刘伯承为部长，由于他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就由叶剑英代理。训总下设 6 个部，部长都是由训总的副部长兼任。李达任计划和监察部部长；我任战斗训练部部长；张宗逊任学校管理部部长；彭绍辉任科学条令部部长；周士第任外军训练部部长；郭天民任军事出版部部长。一个部门任用这么多高级将领，足见中央和军委对军事训练工作的重视程度。

训总的成立，对全军的训练工作是个很大的推动。领导力量加强了，又充实了很多有军事理论知识和工作经验的干部。以前送到军事学院培训的十几名干部，这时也回来了。工作范围（主要是军队，还包括地方人民武装）更加扩大，面展得更开了。由于叶剑英是军委副主席，便于与各军区和各军、兵种协调，对组织合同演习等事情，比过去更顺利了。

在训总，我除了继续主管部队训练外，还分工负责训总的常务工作，协助叶剑英部长处理一些日常事务。

叶帅抓训练，是立足于现代战争的，他极力主张在全军开展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指出，现代战争具有发起的突然性、战况发展的迅速性、组织协同的复杂性等特点，人们就要根据这些特点组织训练。在叶帅的建议下，军委颁发了“在加强特种地形的训练外，更要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军队行动特点和军队夜间战斗的训练”的方针。后来叶帅又亲自主持制定了“在党的建军思想和人民解放军固有素质及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学会在现代——原子时代——条件下及复杂情况、复杂装备条件下的诸军种兵种合同作战，以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训练方针，这就使训练方针的表述更加准确和完善，也使军训工作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

根据前述方针，我们重点抓了现代条件下合同作战的演习。记得训总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就在北京阳坊地区连续组织了 9 次防化演习，全军有 3000 多团以上干部来参观见学，国防部长彭德怀也到了现场。6 个月后，由叶帅亲自担任总导演，在辽东半岛组织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抗登陆演习。参加这次演习的有陆、海、空三军指战员 4.8 万人。

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组织进行的在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演习。目的在于摸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经验，用比较标准的动作，形象教育的方法来训练军队指挥员和军队。在演习中苏联、朝鲜、越南、蒙古等国都派了军事代表团来参观，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到了现场。通过这些演习，丰富了我军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知识，取得了诸军兵种合同战术训练的经验，从而把我军的训练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57 年年终，由于叶剑英忙于军事科学院的筹建工作，由我来接替他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和党委书记。然而工作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开始了。

提起这件事可以回顾一下当时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

全国解放后不久，我党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

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艺术,批判胡风反党集团等,到1957年反右派,1958年批判反冒进及“少慢差费”等,一浪高过一浪。由于1957年9月召开的中央八届三中全会,确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斗争始终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成为当时的指导思想。在其影响下,人们观察与分析问题总要戴上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于是,许多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被混淆了,许多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了。

这时期的国际形势对我们也有影响。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方面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贯正确的迷信;另一方面也由于否定斯大林,引起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思想混乱。不久,我们连续发了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澄清了国内外的思想混乱。毛泽东也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提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还明确指出,学术界、经济界都还有些问题。

建国初期,由于我们当时的处境,政治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毛主席提出“苏联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一定要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当时各行各业都请苏联顾问,全党、全国掀起了学习苏联的高潮。五十年代前期我军正规训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就是向苏军学习。当时陆、海、空和陆军各军兵种,翻译了苏军战术、技术等教材有几千种,各部门都选择与自己有关材料,认真学习。在学习中,带来了一些脱离实际、照搬照套的偏差。经过一段时间,逐渐察觉了,正在注意纠正,如到1956年底大部分教材,除兵器部分外,都已重编,这实际上是对“一边倒”学习中产生偏差的纠正。即使是那些偏差,也是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何况正在纠正中呢。

但是,由于当时党在指导思想的“左”倾,影响了军队对学苏联问题的看法。本来是“一边倒”时期的个别偏差,被上纲上线,夸大成方向性、路线性的问题,甚至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纠偏。

1958年军队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56年6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训练总监部在组织学习中央这个通知时,回顾了建国以来学习苏军经验的情况,检查了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随着学习的深入,对全军的训练工作,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在向苏军学习过程中,存在某些不切实际、机械搬用和形式主义的毛病。比如,对苏军条令、制度中某些不适合我军实际的东西,没有加以选择地套用。同时,也认为,我们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学苏联的,因抗美援朝急于用,不抄不搬一部分也不大可能。因为那时我军的武器装备大部分是从苏联引进的,技术教材和战术教材自己一时写不出来,只能用他们的。这样,必然带来一些副作用。但总的看,建国6年来,军训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只是前进中的支流,也是能很快纠正的。但也有少数同志认为,教条主义在军队训练和教育系统已成为一种主要倾向,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已是方针、路线问题。

与此同时,南京军事学院在学习五个文件时,也产生了分歧意见。一部分学员对当时实行的“六个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近似“三堂会审”的考试形式,反映强烈,认为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太紧张,太严格,受

不了。也有的学员给上级写信，反映军事学院“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教条主义倾向。

当时训总主管院校工作的副部长张宗逊带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他本来在学习苏联高潮时期，曾提出了一些过火的口号，引起了不少同志的反感。这时或许是出于想摆脱些责任，挽回影响，又不切实际地夸大教条主义在军队和院校中的严重性。他把训练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都同教条主义联系起来。由于是带着框框去军事学院调查的，张宗逊对少数同志的意见未经核实和分析，形成了军事学院教条主义严重的结论。同去的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还在学院政治部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这时期还传出一种论调，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

这样一来，军委对学习苏军经验也引起了重视。1957年2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又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两个月后，彭总给中央和军委寄来一份报告，对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做了这样的评价：“……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想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显然，彭总的报告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是基本否定的。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组织讨论这个报告，我参加了。我对那种认为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是不同意的，特别是把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军事学院在教学方面有生搬硬套的东西，但还不能说是在整个教学内容上都“与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

主持会议的黄克诚认为报告对军事学院的评价是适当的，不赞同我的意见。我坚持认为，应当肯定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黄克诚则认为，报告并没有否定学院的成绩。我认为，说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逻辑上就是全称否定，这样就近乎全盘否定，至少容易产生全盘否定的感觉。

黄克诚说，那就是把这句话改成“有些不适应”（后来印文件时，又改成“不大相适应”。当时作者并不在场）。这样改动后，我也不再说什么了。

尽管不说了，但认识并没有统一。我感到，当时的分歧并不是要不要学苏联和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对建国以来中央和军委制定的建军方针以及依据建军方针制定的训练方针如何看的问题。训总内就有人对当时全军正在执行的训练方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在我军的装备还很落后的情况下，“要使我们的军队完全像苏军那样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短期内是达不到的”。有一位同志还说，“我没看过你们搞的训练计划，但我就是感觉到你们做的训练计划，内容多，时间少，消化不了。脱离我军实际。我们的实际是有枪无弹，有车无路，有路无油。”“脱离这个实际，搞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训练，就是教条主义。”有的同志还以质问的语气说“你

们的原子弹在哪里？！”没有原子弹就不应该实行“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训练”的方针。

我认为，军队的训练方针，都是经军委审定、批准的，而“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训练”的方针，是叶剑英提出由军委正式颁发的。这些方针又是根据中央和军委关于向现代化、正规化战略转变的建军方针拟定的。不能一反教条主义，连训练方针甚至连建军方针都加以否定。训练方针之所以规定在原子武器条件下训练，一则是美国已有原子武器，在二战末期已使用了；二则我国也快有这种武器了；三则中国在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已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取得全国政权后，我们接收并正在改进与扩建中（如146项建设）。即便手中的武器，在战胜现代化的日本侵略者和半美机械化的蒋介石军队后，也不全是小米加步枪了。因此要学会在现代及原子武器条件下的攻防作战。

1958年2月，彭德怀送来一篇文章，征求我的意见。这篇文章是他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作报告的初稿，文中说：“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我对彭总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感到有必要同他交换一下意见。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写到：“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正规化是对游击性说的。当着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农村，生产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他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其中有百分之几十的现代工业，而且比重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而逐渐增大）的支援，又有苏联等国家对我的援助，前述情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乎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的口号，理由也是如此。”

我又引证了政治协商会议总纲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以及彭本人过去对两个口号的论述，指出“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是党中央、军委及许多负责同志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从要具有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和学术来提的，而且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的本身。”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想把这段时间自己思考的问题，系统地向彭老总谈一谈。那时，党内军内的风气还比较好，可以提不同意见，我也没有什么顾虑。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就在我给彭总写信后不久，训总召开了机关四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中央的“双反”决定，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会议由我主持。在反贪污浪费的问题上，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我们对全军的训练经费精打细算，把能节约的都节约下来，共核减经费一千二百多万元，

这样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

讨论到反右倾保守和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又发生了争论。本来，我和训总的几位副部长都想通过这个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一下。因为自从军内传出什么“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等后，沸沸扬扬，我们都认为要从思想上澄清一下。

我们认为这不是事实。建国以来，军事学院培养一大批忠实于党的高级军事干部，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军队建设中发挥了作用；从军训部到训练总监部，领导全军开展现代化、正规化训练，在学习苏军中，也注意结合中国的国情，如主要是学习苏军的技术与合同战术，没有学他们的政治工作和军队制度。又根据我国不同地形和气象等条件，将全军部队区分为六种不同类型进行训练等，目的在把我军训练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的坚强柱石。怎么能用“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或“教条主义的司令部”来否定这些成绩呢？

当时，大家对张宗逊的意见比较大。过去，他对学苏联叫得最响，提出了什么“不走样地学”、“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学活用”、“不愿学苏联的滚开”等不实际的口号；而现在他又把学习苏联都说成是教条主义，说学习苏联“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军事学院几年来的教学是教条，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引起了训总许多同志不满。

张宗逊这时已调到总参任副总长去了。考虑到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多，我们也想把前段的工作总结一下，就请示军委秘书长黄克诚，要不要请他回来听一听？黄克诚明确表示，让他回来，参加会议。

张宗逊回来后，大家无形中把矛头指向了他。现在回过头看，对他有意见转达一下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他请回来；请回来后，又不是和风细雨提意见，不利于解决党内的不同意见。

然而，在四级干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事情突然起了大变化。总政派工作组来。他们一到，就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工作组组长刘其人（当时的总政组织部长）还宣布说：“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刘又接着说：“彭总说了：‘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张宗逊自己也说，他的思想就是彭总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军委，就是反党反中央。”这种以抽象的推测作根据，层层向上、向下、向旁挂靠，以推测得出结论，根本不是实事求是作风。自从我给彭总写信后，一直在等回音。我也担心这样直率地提意见，会不会引起他的反感。但他没有找我。没想到现在他表了态，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总政工作组来后，会议风向急转，反教条主义成了会议的主流。就在这时，我接到了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训总的四级干部会便暂时休会。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中央成都会议提出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各地区、各部门争相提出跃进计划，中央就用地方来鞭策军队，说军队落后了，要赶快跟上来，建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用整风的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

会议开始时并没有把反对教条主义当做中心议题，因为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但那时北京的军事机关中，反教条主义的空气已经很浓了。

在一次会议上，我听到彭总讲了一段话。他说：“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并说，“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这番带有情绪的话，使我震动，我觉得彭总的话里有话。

刚刚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党的副主席的林彪，也煽风点火，含沙射影他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以隐喻的口气说这番话，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领导人。

军委扩大会从5月22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这次军委扩大会开始时发的文件，所批评对象都是×××、×××（当时被批评的人不点名，用×表示）三个字的名字，××两个字的名字。批判的矛头也逐渐集中到我和李达的身上。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我当时并不清楚。一年后，林彪在1959年8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讲的一段话，才搞清楚。

林彪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我刚回京时，刘其人同志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萧克，……萧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指有人向他讲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这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

林彪这时候已是军委扩大会议的主持人，而彭德怀则是批斗的对象，这里显然有打击对方，抬高自己的成份。以我过去对林彪的了解，认为他会这样干的。他在人民内部惯于利用矛盾，达到个人目的（在江西时，有些同志就认为他要耍政治手腕）。

6月9日，黄克诚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

6月20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一开始就提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我们扣上了“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

6月23日和2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

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作了不适当的评论。当时，领导会议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毛主席还说到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

毛主席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我、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当时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带病来京，一下火车就直接到会作检讨。因身体不好，特别眼病加重，眼压很高，住进医院。

住院期间，刘帅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讨。7月10日，刘帅由别人搀扶着走上讲台。他的检讨，既有实事求是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除了迫于压力，更重要的还是想尽快平息这件事，保护一批同志。然而，他的愿望太善良了。因为那时党的生活很不正常。

斗争愈演愈烈。我和李达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并编造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我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会议还批判我在1958年2月上书彭德怀，是只要现代化、正规化，不要革命化。还批判我主持编写共同条令，是不要“党的领导、民主制度、群众路线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则”。

事实上，共同条令是军委组织的条令委员会编撰的。编写的稿子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多次讨论通过后，又报送毛主席审定的，毛还作了批示：“萧克同志，三部条令我审阅了。请你注意将有学习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字样。改后即颁发全军执行。”我将毛主席这个批示向彭总作了汇报，并提出：“共同条令是草案，先试行，待试行修改完善后再颁布执行。”彭总说：“草案也必须坚决执行。”然而，在军委扩大会后，训总的批斗会上，刘其人、甘泗淇、张宗逊等人却说：“共同条令是反党反中央，反对军委领导，反对军委正确路线，企图改变我军面貌的纲领。”

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利。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人连哄带扭，诬为大右派，当场摘掉帽徽领章，赶出会场，关押起来。后开除军籍，下放常州。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又要蔡认罪，蔡说我在军队训练工作中没有罪，他们诬我为大右派，是他们有罪。造反派便以现行反革命罪把蔡铁根这位坚持真理的硬汉子，无法无天的杀害了，真令人痛心！

这是我入党以来在党的会议上曾未见过的，既感到震惊，也感到痛心。更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他们逼着我承认是“反党”。我在大革命时期就向往党，两年后入党，几十年来，为了党的事业置生死于度外，即便南昌起义失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也从未产生过离开党的念头，而是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党，回到组织的怀抱，即便在长期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也绝不会“反党”。

我无论如何不接受这个不合事实的批判。那段时间，我常彻夜不眠，眼望天花板，一直到天亮。我多次跟他们说：“我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入党的，从入党起，决心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

但是，在那种斗争的气氛下，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军委扩大会议开了两个多月。彭德怀在总结中给我定性为：“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

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此前几天，军委已撤销了我和李达在国防部和训总的一切职务。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对我们的批判并没有结束。总政又派甘泗淇、刘其人等组成的工作组到训总领导开展斗争，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了新的临时党委，继续对我们进行揭发批判。他们采取专政手段，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宗派成员”，分别隔离、禁闭、监视，威逼利诱，无所不用。

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始终没有承认“反党”。这时，他们就用高压政策，逼迫我检讨。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连晚上也不能休息。从5月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到8月，我已经挨了四个多月的批斗，身心疲惫，加上精神紧张，心中窝火，在一次批斗会结束从礼堂回办公室时，路程并不远，走到半路，忽觉胸口难受，就蹲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回到家里又吐了不少。

医生见我这个样子，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他们不但毫无同情之心，反而给医生扣上了“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的帽子。

这时，我心里很痛苦。入党30多年了，我还想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还想继续于革命事业，如果就这样死了，岂不冤枉？我想，只要人在，“戴帽子”又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是被打倒的人了，全部承认也不过是打倒。我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两次北伐、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长征等，人可以打倒，历史是打不倒的。

我决定作违心地检讨。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人，违心地承认强加给自己的污蔑不实之词，那种痛苦是不堪设想的。当时只好这样做。“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我要以我毕生的言行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我按照他们的需要写了检讨，才算过了关。

记得检讨交上去后，一次开会见到彭总，他说：“萧克，你这个人经得斗。”我不知他这话是褒义还是贬义，苦笑一声说：“我的检讨还可以根据事实核查。”话外之意是我的检查是否合事实，还可以核查。

那年秋天，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我心里是不服的，发言时就说“基本上同意”，这下又遭到批驳。他们说：“你说的基本是指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黄克诚很严厉他说：“他不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谓开会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强火力再斗一场而已。我不说话了。当时参加会的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位老师没有表态，才作罢，那个决定就算通过了。

还有一件令人不快的事，军委扩大会议后，他们指定郭天民担任训总临时党委书记。本来，郭天民与我们在部队建设、战斗训练等问题上的看法、做法，大体一致，他们却让他来领导揭发批判我和李达。在那种情况下，郭天民只能表现积极，但是，我们的结论刚作完，郭天民马上又成了批斗对象，给他戴的“帽子”，与我们的一模一样，而且，他成了我们这个“集团”的“第二副帅”。

直到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团及地委，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才算结束。

在运动中，除了我、李达、郭天民外，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十几人都被打成“反党

分子”。这些在训练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辛勤工作，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贡献的同志，有的被撤职，有的降职降级，有的降职降级后被送地方安置。特别是对陈绪英处理得更重，因陈绪英在工作组的威逼利诱下，拒绝揭发在军委扩大会议中被点名批判的高级领导人的所谓反党活动，他们便说他是坏分子，把他赶出军队，送到边疆劳动改造，使他在地方受到误解，长期被歧视没有安排工作。

由于反教条主义开了恶劣的先例，使全军各级主管训练工作的干部和院校工作的干部，大部分受到错误的批判；院校教员特别是教研室主任一级的干部，被指为“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而调离院校，改行做其他工作或处理转业。严重打击了为部队现代化建设刻苦工作的干部的积极性，使他们长期心有余悸，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学习外国经验，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活动，建国以后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挫折。这就是那次军委扩大会议反对教条主义，开展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恶果。

反教条主义也开了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坏头。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仅一年，主持批斗我的彭德怀元帅，又成了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批斗的主要对象，遭受严重的打击、磨难。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像我好意给彭总写信，却成了“反党”的把柄一样；不到一年，彭总好意上书毛主席，也被说成是下“战书”。过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等同志。至于“文化大革命”，更是变本加厉，登峰造极。

也许是一腔忠心耿耿反而被冤屈的痛苦，使彭总对“左”的错误有了认识，他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彭起超经总政联系找到我家，对我说，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既在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其实，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没有气了。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对党内斗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我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当时我不是也违心地承认是“反党”吗？

历史毕竟有着自己不可更易的规律。一切颠倒的真伪、善恶、是非，终将会回复他们的本来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反教条主义运动越来越被证明是错误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们也向党组织提出对1958年反教条主义处理结论的申诉。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于1978年

11月7日发出通知，对当时的结论作了改变。通知指出“萧克同志在训练总监部工作期间，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批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鉴于当时萧克同志已作了检讨，彭德怀和林彪别有用心，借机整人，过重的打击了萧克同志。因此决定撤销‘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结论”。总政这个结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军队教条主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八十年代以后。

1980年，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明确他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徐向前在全军后勤部长座谈会上又说：“建国以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对正规化吃了亏，二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聂荣臻晚年也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

1986年10月16日，在刘伯承元帅追悼会上，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党中央对反教条主义作了彻底否定，明确指出：“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1987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

1987年11月25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发了文件，决定撤销总政治部1978年11月7日通知中的内容，为在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彻底平反，总政治部对这些受错误批判及错误处理的同志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也是对他们在人民解放军这段历史中的贡献作出了公正的认可。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已成为有公认的历史。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是有很多深刻教训的。1980年9月，我曾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一封长信，谈了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认为现在要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必须安定团结，使党的生活正常化。必要的批判斗争，也要从实际出发，绝不可扩大化。过去搞运动主要领导人有个口头语：‘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而‘严’是在‘矫在必须过正’的错误原则指导下的‘严’，就必然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政治上、思想上一经拔高，所谓‘组织处理从宽’，就是十足的虚伪。这是二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了的。今后对政治情况切不可凭空臆造，或一处出了问题，就举国兴师，经久不息。要分清问题的性质和主流与支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期出问题，就在当地及时及有关单位解决。把过去那种无穷无尽地写大字报、写批判稿、写检讨稿，开大、中、小批判斗争会的时间，去读书学习，搞业务，做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作吧！”

总结这段历史，正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第二十六章在农垦部工作

1959年5月，中央批转了总政关于所谓反教条主义的报告后，对我的批判基本上结束了，我和李达在国防部和训总的职务被撤销，我们等待着重新分配工作。李达先接到通知，是到国家体委某俱乐部当主任。李达是个耿直的人，即使在“左”的高压之下，也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接到通知，就去体委报到了。

我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如何，但有一个信念坚定不移，那就是不管到哪里，不管干什么，我不会消沉。尽管写了检讨，但那是压服的。我常常想起孟子说的那句话：“以力假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他们给我扣上“反党”的帽子，又不容我申辩。我想，既然没有申辩的自由，我就

用行动来申辩，用努力工作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这期间，贺龙、王震、张子意、张启龙等来看我。他

们都是我在红二方面军时期的老领导、老战友，我说：“我是共产党员，永远不会消极。”

王震说：“黑龙江准备造一个水库，正缺少人手，我给省委书记欧阳钦打个电话，你去那里建水库怎么样？”

我说“行，干什么都行。”

王震就给欧阳钦挂电话。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时，欧阳钦从上海中央调到江西苏区，我见过他，虽不太熟悉，但也互相认识。王震同他一说，他表示欢迎我去黑龙江。

当时，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俗称庐山会议），我是中央委员要求我参加了会议。因此没去黑龙江，而上了庐山。

上山时，正好传达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像上一年彭德怀批判我一样，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被说成是向党进攻，而对彭德怀意见表示赞同的人，有些也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资产阶级军事俱乐部”等“莫须有”的罪名。庐山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回北京开军委扩大会议，深入揭发和批判彭德怀。会议的规模和参加的人数也都和上一年批判我的时候一样，只不过主持会议的人换成了林彪。

当时，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批判彭德怀使我出了口怨气；另一方面对党内这种批来斗去的局面也感到难过。特别是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议，在批彭中，又把矛头指向了朱德总司令。林彪肆无忌惮地污蔑朱老总从来都没有当过总司令。我真难以抑制心中的气愤。我知道，林彪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编造谎言，而党的会议，却允许这种不正常的作法肆行。这时我还没有认识到党内已经形成了“左”的思想路线，只是对从前一年批判刘伯承和我们开始，老革命家一个接一个地挨批，感到很困惑，不理解。

1959年的“十一”是建国十周年大庆，我照例被邀请上天安门，参加庆典活动。当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的队伍通过检阅台时，我真是百感交集。看到人民军队展现出现代化、正规化的雄姿，我自豪，因为这中间也有我的一份心血；而想到从此以后，将脱下军装，离开这支从创建起我就投身其中的队伍时，又不免有些感伤。但我克制住了，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生涯，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不悲观，不失望。

国庆节过后，我接到通知，让我到农垦部当副部长。当时，我已经做好

去黑龙江修水库的准备了，我本想到最基层去，重新干起，不知为何又这样安排。

到农垦部工作我是高兴的。农垦战线是国民经济建设中一条重要的战线。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们的国家是农业大国，历代有作为的军政人物，都重视农业，我既分配作农业工作，也要重视农业。不懂就学就问，边学边干，期望必成。中国农业，历来是以分散的小生产来经营的，建国以后，我们搞了些国营农场，开始向农业现代化前进。而国营农场大部分集中在农垦系统，这些农场多数以成建制的人民解放军转业官兵为骨干建设起来的，与部队有着天然的联系。到农垦部工作，既是直接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又没有完全脱离我熟悉的部队工作，我感到对于我是合适的。

我同老战友王震说了心里话：“我要重新做起！”王震很赞成我的志气。我到农垦部工作，由在部队搞训练转到搞农业，而且分工搞农业机械，工作上两个大变动，而且又是在军队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情况下，以待罪之身来的。这些，都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如何办呢？我早已下决心从头干起。我要把军队工作中的经验用到农业。把在军队搞现代化的经验来搞农业机械化。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都是耕战相提的农战政策。我多年治军，现在转到农业方面，我就利用过去搞军队是从基层连队着手的经验，应用到农场和生产队。

当时，农垦部直接管辖有新疆、黑龙江、广东、云南四大垦区。部里的几位领导经常深入到各个垦区，或调查研究，或现场办公。我上班不久，就去广东垦区，先在湛江，接着又去海南岛，就住在琼中县一个农场，白天同农场职工一起开荒，晚上就坐在油灯下读《列宁选集》。

从北京出发时，我还在吐血。家里人和医生都有些担心，怕我到生活艰苦的边远之地，又从事多年未干过的体力劳动，身体会吃不消。但我和过去打仗一样，精神振作，参加些劳动，心情愉快，加上空气好，干了一二十天，吐血止住了，身体也结实多了。

农垦工作对于我是陌生的。我虽然生长在农村，但早年读书，只在寒、暑假时放放牛或干些揽禾、晒谷等季节性的劳动，长大成人就投身革命，摸了几十年枪杆子，对农业生产已经淡忘了，特别是农工商学兵一体化的国营农场，过去都没有听过。刚到垦区时，一切都感到生疏，我还是下决心从头学起。

学什么呢？根据农垦工作的特点，我重点抓了两方面的学习，一为学农业知识，如土壤、气象、栽培等；二为现代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知识及技术等。就像北伐时期学立正、稍息一样。

海南岛农垦局机务科长徐文，拖拉机开得好，我就拜他为师，学开拖拉机。从加油、起动、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很快学会了。那位科长说，再学一学就可以挂犁、耕地、耙地了。我本想继续学下去，但部里让我回北京，就搁下了。这段学习对我后来主管农场机械化工作有很大帮助。

许多年来，我一直记着那位科长。“文化大革命”后，我去海南，曾去农垦局找过他。人们说他已经死了，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的。我很奇怪，他们告诉我，这个科长自恃是工人出身（解放军司机），不满意“文革”中的一些作法，就直言不讳，被打成“反革命”，我很难过，对农垦局的人说：“他是我的老师，见不到他，看看他家里人也行啊。”他们就带我去见他的妻子，她去哈尔滨了。我向徐文的同行表示了对徐科长的怀念之情。

为了尽快熟悉农垦工作，我还抽时间阅读农业方面的书籍，包括育种学、耕作栽培学、土壤学、气象学等等。王震告诉我，有一本《齐民要术》是讲农业的，可以读读。我知道这本书是北魏时期杰出的农学家贾思勰写的，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古农书中最完整的一部，就托人去找。

这本书内容丰富，包括耕田、播种、作物栽培、蔬菜、果树、林木、蚕桑、畜禽、养鱼、酿造、农产品加工、储藏等方面技术，就像是农业的百科全书。由于是古文写的，不好懂，读起来也困难，我硬着头皮一字一句地读，终于全都读完了。书中提出的农业生产必须遵循“顺天时，量地利”的原则，给我很大启示，如果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严格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东方农业的经验总结，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所以，历史上都称赞这部作品。

后来我又读了明朝末年著名农学家徐光启著的《农政全书》。这也是一本内容齐全的大型农书，连牛拉犁都画了插图。徐光启是个大知识分子。提倡西学，同时又研究农业，并把西方科学与东方农业的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业理论。这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使我认识到，开荒种地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要有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

到农垦部的头半年，我主要是学习和调查研究。那时正是庐山会议结束后不久，各地都在反“右倾”，掀起了新的大跃进高潮，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到处泛滥。

在海南岛农场时，我曾遇到一件事。

海南岛是我国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已种七、八万亩，当时农垦部提出要在海南岛开荒 300 万亩种橡胶，过了不久又提出再开荒 300 万亩，加在一起就是 600 万亩，而海南岛全部耕地当时只有 600 多万亩，即便多开荒，也达不到这个数目，有一次开会，我看到女生产科长与会。据说，她是懂得橡胶树的栽培和橡胶园的经营管理的。但她在讨论时一言不发。我觉得奇怪，会议休息时就问她：“讨论生产计划你为什么不发言呢？”

那位女科长很为难他说：“生产计划不能实现。”

我了解到她是从澳洲回来的华侨，一位有经验的农艺师，就说，“你认为不能实现，就提出来嘛！”

她说：“现在是只能说多，不能说少。说少了就是‘右倾’，我怎么说呢？”

听了这话，我也不再说什么。的确，当时大家的头脑都挺热，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唯心主义横行，动则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像我这样的“待罪”之人，又能说些什么呢？

当时，我刚从部队转到农垦系统，不了解情况，处于盲目状态。随着情况逐渐熟悉，头脑慢慢清醒了，从 1960 年下半年开始，对我印象较深的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针对橡胶种植的高指标，提出“两五、一六”的计划。在海南岛农场时，那位女生产科长对开荒植胶 600 万亩的指标不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曾向她详细询问了橡胶种植的情况。她告诉我，橡胶生产周期长，在海南岛一般要 6、7 年才能达到割胶标准，而且栽培技术要求高，首先要选择适合橡胶生长的土地，然后育苗，苗长成后，要与优良品种芽接，才能移栽到大田。开荒 600 万亩种橡胶根本做不到，就连定植 100 万亩也做不到，因为即使有那么多能植胶的土地，也没有准备那么多经过芽接的胶苗。

这位女科长的活使我感到，部里的计划和指标与实际相差得太远。后来，我又跑了几个橡胶农场，发现由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有的农场只顾完成开荒指标，忽视现有胶园的管理，胶园中茅草长得比橡胶树还高，单株产量和亩产量都很低。有的开了新胶园，荒了老胶园。有的农场只开荒不植胶树，造成水土流失。严重挫伤了农场职工的积极性。本来是想大干、快干，结果欲速则不达。

六十年代，聂荣臻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会议，在会上他曾指出，有些地区国营农场水土流失，不利于生态平衡，也不利于农场的发展。我想起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说的“顺天时，量地力，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的话，又想到种植橡胶盲目地追求多和快，不量力而行，其结果不正是“劳而无获”吗？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我深受不顾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害，深感实事求是的重要。虽然我是戴着犯错误的“帽子”下放到农垦部进行改造的，看到这些做法，还是想讲话。

我先向王震汇报了橡胶种植上存在的问题，建议更改计划和指标。后来又向中央和国务院主管农垦工作的谭震林、邓子恢两位副总理反映情况，有时见到周恩来总理，也同他说几句。1960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党中央已开始觉察到计划和指标脱离实际的问题。7、8月间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时，农垦系统的工作，也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1961年4月，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周总理对橡胶种植的高指标提出了批评，他说：“去年以前定植的橡胶，荒得那样严重，草比苗高，有110万亩草不很好锄，你们采取什么措施？去年和你们（指王震和我）两位谈了，我那时看到后果不会好，这不是瞎指挥？陈嘉庚是个爱国的华侨资本家，他对橡胶的荒芜就很不满意，他的经验，种橡胶必须把橡胶园的树根杂草清除。……现在广东的橡胶树管理问题很多，主要是把现有的管好，否则一面定植，一面荒芜是不行的。”

周总理的指示很实际。我认为，要从我们现有的生产水平出发，量力而行，做计划、定指标要留有余地，使下面有产可超。这年1月，王震部长因病休养，部党组决定姜齐贤代理党组书记，由我代理部长。我们接手工作，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橡胶种植指标进行调整。

当时，我对广东橡胶垦区生产能力作了调查研究，又让有关人员就橡胶种植规程进行了科学论证，提出将国营橡胶种植指标压缩为“两五、一六”，即定植60万亩，消灭荒芜50万亩，补植50万亩（指一亩地不够30株的要补植；没有优良品种进行芽接的要换植）。“两五、一六”的指标，其着眼点是管好现有胶园，在提高单株产量和亩产量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发展，不盲目扩大种植面积。这个观点，我事先与农垦部主管热带作物工作的刘型同志（井冈山时期老战友）商量，不仅得到他的同意，并得到他的具体指导。就在1962年2月在南宁由邓子恢主持召开的全国国营农场会议上，这个建议得到认可，橡胶树种植指标由原来和开荒600万亩，定植100万亩，改为“两五、一六”。

第二件事是减少北大荒耕地面积。1960年夏，我从海南岛回来后，11月份又去了黑龙江垦区。

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流地区的三江平原，小兴安岭以南的松

嫩平原，以及从完达山到牡丹江的平原上，有纵横千里的大片荒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北大荒”。解放以后，有十多万人民解放军的转业官兵，陆续参加了北大荒建设，建起了以生产粮食为主的机械化国营农场。

初到北大荒，看到广大转业官兵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开荒建场，使这片荒原变成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很受鼓舞，但后来发现，北大荒的国营农场播种面积达1千万亩，但是粮食总产量只有5亿多斤，我问北大荒同志：“你们的机械化程度很高，为什么亩产量这么低呢？”

他们说：“地种的大多，管不过来”。

有一位曾给我当过公务员的老农工悄悄他说：“地里的草长得比庄稼还多，打不下粮食。”

我问：“怎么不锄草？”

他说：“哪里锄得过来？刚种上就命令到前面去播种了，谁还顾得上锄草？”

这使我想起了《齐民要术》中“顺天时，量地力”的话，1千万亩的播种指标是不是违背了“量力而行”的原则呢？

我又想起那年夏收发生的一件事：为了增加农场的财政收入，部里决定从北大荒抽100台联合收割机，到华北地区帮农民收麦子。当时算了一笔帐：一台收割机一天收800亩，100台收8万亩，按10亩地一块钱计算，1个月下来可一台机器收入20多万元。部里决定让我办这件事。

过去我在国防部和军训部经常调动部队，知道坦克、汽车运动，道路条件很重要。拖拉机和坦克差不多，做计划也必须把道路考虑进去。我就在北京找了一些有经验的拖拉机手，征求他们的意见。有一位有名的女拖拉机手（可惜我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同我说：“一天收8万亩是办不到的，因拖拉机要擦油；在田间转场，要先看路；路不好还要找人来修；再说，开机器的人也要休息，吃饭啊！”

我问她：“一天能收割多少？”

她说：“一台拖拉机最多能收120亩”。

120和800亩相差六、七倍，悬殊大得令人吃惊。

从这件事再联想到北大荒播种1千万亩指标，显然是不行的。

部里开会时，我提出北大荒播种面积多，粮食产量少。有的同志认为，那是天灾造成的。我查了一下，没有自然灾害的年景，产量同样不高，说明并不是纯客观的原因。我就向谭震林反映，说北大荒种地大多了，管不过来。

后来，各地农场又暴露了一些问题，如有的在不宜开荒的草原开荒，造成沙化；有的在未经治水的沼泽地开荒后，又不得不撂荒；有的为了出口，提出“以大豆为纲”的口号，80%的耕地都用来种大豆，造成种植结构严重失调。特别是农场机械化程度高，而粮食产量很低，经营亏损，甚至大量拖欠职工工资，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

1962年夏，谭震林召集我、冯纪新（黑龙江省委书记）、张林池（农垦部副部长兼合江地委书记）和王观澜（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等（王震出差，未到会）汇报，并研究黑龙江垦区的问题。经大家研究，决定1963年北大荒农场的播种面积由1千万亩减少到570万亩。过了几天，他又专写报告，向周总理、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并得到批准。这样，北大荒的播种指标就压缩下来了，农场能腾出人力锄草、耘田、收获。肥料也多了，产量随之增加，做到收支平衡，还略有

节余。

第三件事是还农场职工的帐。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长期存在产量低、劳动效率低、商品率低和成本高的“三低一高”现象，亏损十分严重。而那时“浮夸”成风，报喜不报忧，国营农场严重亏损的情况长期未得到解决，以至恶性循环，问题越积越多，到1962年春，大部分国营农场发不出工资，职工生活困难，情绪不满。

当时，海南区委书记林李明、副书记杨泽江、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等认为，海南岛的橡胶农场应种些粮食，不能完全靠岛外运送。海南岛橡胶农场不种粮食，这是林彪的一次谬论造成的，1960年元旦后，林彪来海南，同王震说中国只有海南这个地方可种以橡胶，应该全部种橡胶树。林彪这个意见，当时看不出结果，到了六月农场职工闹事，矛盾出来了，后来虽然平息了，但没有从思想上解决。

7月，我回到北京就向谭震林和周总理反映，说海南岛不能只种橡胶，也得种粮食。后来周总理主持全国橡胶会议，确定在建立橡胶基地时，要坚持“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凡适宜种水稻的地方，要基本自给。以解决橡胶工人吃饭问题。

这件事也给我一个重要启示：不管做什么，首先应该想到群众的切身利益，要为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生活条件而努力，否则就会脱离群众，甚至会激化矛盾。

我大致了解了一下，从大跃进以来，整个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亏欠约5亿多元（大跃进前已有亏欠，但不多）。这么巨大数额的亏损，当时农垦部本身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只有如实向中央汇报。

次年春我直接去找周总理，向他反映我们几年来欠了农场职工一大笔帐。周总理很吃惊，说：“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亏损？”他马上把有关人员找来，对我们说：“不管怎样，也得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先从国家财政拨款5亿元，把欠帐还上，但下不为例。这样亏损还了得啊！”

5亿元发下去后，我满以为问题解决了。但下年又发现还有亏空。我就和管财务的处长管文彬一笔一笔地算，发现很多数字是虚报的，实际还差2亿多元。我只好又去找总理。总理说：“上一年你们说亏了5亿，现在又出了2亿，还有没有啊？”我说：“我们查过了，但虚数大多，也很难保证没有。”总理又批了2亿，这样一共补贴了7亿。后来果然又查出一些虚数，但数目不大了，就采取紧缩的办法，总算把欠职工的帐还了。

第四件事是装备机械化生产队。1962年1月，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后，邓子恢在南宁召开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农垦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调整、整顿和稳步发展的具体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发展机械化，以机械化为中心因地制宜地贯彻农业“八字宪法”。

本来，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多数是用机器装备起来的，但由于管理不好，长期存在“三低一高”的问题。如1961年全国农场粮食平均亩产117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降低了31%。中央认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粮食工作的决定中指出：要切实整顿国营农场，使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每年能向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中央提出，在今后5年中要每年平均向国家提供3至5亿斤商品粮，到第三个

5 年计划末期即 1967 年，全国国营农场应完成向国家提供 22 亿到 32 亿斤商品粮的任务。

我们认真分析了国营农场的状况，感到中央提出的这个指标可以完成。关键是要对现行的管理体制进行整顿，重要一项，是发挥机械化的优势。

当时，部党组分工我主管农业机械化工作，我在日常工作中与谭震林、邓子恢、王震闲谈，看到他们对农业机械化都有兴趣，有年冬天，在浙江余杭县国营农场水稻田开机械化现场生产会议，我和谭震林都去参观。南方有些产水稻地区经管人员也去了，认为农业用机械化的优越性是劳动力用得少而生产效率高，也可先装备一批重点生产

队，使其具有较高的机械化水平，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成为国营农场全面实现机械化的先锋。机械化生产队实行“四固定”，即耕地、人力、农具和拖拉机固定，上级部门不得随便改变生产队任务。在生产上，生产

队有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权力，同时制定以包、定、奖为中心的生产责任制度等。

1963 年 2 月 5 日，我在哈尔滨主持黑龙江垦区 100 个机械化生产会议，根据各个农场的实际情况，明确了办好机械化生产队的思路即以机械化为中心来建设国营农场，

以办好机械化生产队作为整顿国营农场的基础，但要有综合性措施：第一，制订农场总体规划，做好土地综合规划设计补课；第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加强管理，贯彻“八字宪法”，因地制宜建立农作制度，包括轮作制度，耕作制度，施肥制度，良种繁殖制度，排灌制度，植保制度等；第三，加强机务工作，建立健全机务管理机构，加强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工作，做好技术保养、机具保管和油料保管工作，合理安排修理网点等；第四，实行农林牧副结合的体制，多种经营；第五，加强计划、财务管理，提高经营水平；第六，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开展以“五好”（完成生产任务好、经营管理好、政治思想好、干部作风好、生产安排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根据过去的教训，我们在规定生产指标时采取谨慎的态度，要求黑龙江机械化生产队在 1963 年实现每个农业工人年产 3000 斤粮食；粮食平均亩产达到 200 斤左右；粮食商品率达到 80% 左右，以后则根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要求有所上升。

3 月 14 日，我回北京，与谭震林一起向周总理汇报农垦工作，当我汇报到东北搞 100 个机械化生产队，实行“四固定”时，总理说：“这样好，农场、地方、农垦部三级都不准对生产队瞎指挥，应当为生产队服务。”当时，除东北建立了 100 个机械化生产队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建立了 84 个机械化生产队，其他 9 省一市还有 44 个，全国总共 200 多个重点机械化生产队，由于全部是机械化作业，劳动效率高，很快提高了国营农场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商品率，从而促进了全国国营农场的机械化进程，成为国营农场的龙头。

第五件事是建立健全农垦工作的规章制度。1961 年 1 月 27 日，农垦部党组决定由我兼任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当时正是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时期，部党组要求科委在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建全国营农场的各项规章制度。

这项工作我早就想过了。到农垦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有一个突出的感觉，

就是农垦系统很多国营农场在重大决策上无章可循，造成工作的杂乱无序，我在部队长期抓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对这种状况很不适应，也很焦虑，曾设想过搞些规章制度，但当时人们头脑发热，视主观随意为正常。可是连续三年经济困难，证明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到这时我们也才有可能坐下来搞些规章制度。

我对搞规章制度有些经验。在军训部时就主持编写过人民解放军的三个基本条令，1958年批判我的“教条主义”，是罪行之一。那时，人们都知道我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且是从国防部下放到农垦部改造的，现在又主持搞农垦工作的规章制度，有些同志就好心劝我不要“犯忌”，但我认为干任何事情都要有条有理，如果说制订科学的规章制度是“教条主义”的话，那我宁肯再戴一次“教条主义”的帽子！我这句话是带很大气愤的话，文化大革命被揭发出来，又是一条挨斗的罪状。

《国营农场工作条例》是我们搞的比较重要的综合性规章。在起草这个条例前，我先写了一个调查研究提纲，列出了主要的调查题目，然后派5个调查组到各农垦区，一面帮助做好春耕、春播及田间管理，一面搞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基础上，4月8日组成了由部办公室主任彭达章牵头的《国营农场工作条例》起草小组，很快起草了一个初稿。

这期间，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邓子恢副总理曾先后两次听取农垦部党组的汇报，并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北京南郊农场、牡丹江农垦局、黑龙江省宁安农场等地做调查，对条例起草作了明确指示。他指出，《国营农场工作条例》要把重点放在调整农场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提了四个要点：第一，农场对各生产队坚决实行四固定，即耕地、耕畜、人力、农具等固定下来，不要经常变动；第二，农场对生产队实行总承包超产奖励制度，实行上死下活的办法；第三，生产队在生产上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权力，上级不得瞎指挥；第四，采用5种工资形式，以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对改进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有很强的针对性，为起草《国营农场工作条例》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对条例初稿作了修改，又两次送他审示，并发往各地征求意见。1962年2月经中央同意，这个条例草案印发各重点农场试行。在试行中，国营农场长期解决不了的产量低、劳动生产率低、商品率低的问题有了明显改进，受到广大职工的普遍欢迎。

在制订《国营农场工作条例》的同时，我还主持起草《国营农场领导管理体制的决定》。1958年以来，原由中央和省投资的农场，除山东、江西外，大部分下放到专区和县领导，管理体制比较混乱。一方面，政出多门，农场感到“婆婆”太多，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党政部门乱调农场耕地、机器、人力，而且国家统一调拨的优良品种又受到限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明确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生产计划权、产品处理权、人员调动权（所谓四权）集中于国家指定的管理机关，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同时还对农场的党、政、财、物等关系作出具体要求。1962年11月22日中央批转这个规定后，国营农场工作逐渐得到了改进。

除了制订综合性规章外，我还制定专业性的规章。如《国营农场机务工作制度》，《国营农场建场程序暂行规定》，《畜牧生产规章》，《农业生产规章》，《农业机械田间作业技术规程》，《橡胶技术规程》，《割胶、制胶劳动保护》，《国营农场经济核算试行办法》，《农业机械、油库和修

配厂安全技术规程》等。从 1961 年初到 1962 年底，制订和修改的规章制度共有三、四十个。其中有些是我亲自起草或修改的，有些是我主持搞的，虽然不尽完善，但使农垦系统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对改善和加强国营农场的管理起了积极作用。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各行各业认真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济困难不断得到克服。从 1962 年到 1966 年，随着国民经济情况的好转，农垦事业也在稳步发展。到 1965 年底，全国国营农场已由 1957 年的 916 个发展到 2310 个；职工队伍由 44 万人扩大到 260 多万人；耕地面积和机械化程度以及大牲畜、猪羊存栏数大大增加；粮食总产量由 14.5 亿多斤提高到 71.6 亿多斤；棉花由 36.3 万担提高到将近 142 万担；盈利企业由过去的 30% 提高到 41%。农垦企业到 1965 年盈利总额已达到 1.5 亿多元，从根本上扭转了亏损局面。

然而，正当国民经济走出低谷，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了。

第二十七章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6年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其中援引了毛泽东的一段论述：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单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信号。

当时党内的许多老同志，包括我自己，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我们经过28年的武

装斗争，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

又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

到了这年夏秋，问题进一步清楚了，原来革命的对象是“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重点是整“党

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当时的话说就是“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我虽然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人物，但在反教条主义中是作了犯错误结论的，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而且会成为新帐老帐一起算的人。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大约是9月10日，谭震林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把我找去，交给我一项紧急任务，马上到黑龙江垦区抓两件事：一是当年黑龙江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一定要保证颗粒归仓；二是设法保证交通运输，把收上来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指定地区，特别是轻重工业多的地区。

我即领命北上。到哈尔滨后与省委书记杨易辰商量，具体落实两位副总理的指示。当时，黑龙江垦区成立了很多群众组织，群起造反，使党委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我出面找了三个群众组织的头领分别做了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于9月底返回北京。

在北京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因黑龙江还有些遗留问题，我又回去了。这期间，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全国一片大乱，普遍展开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残酷斗争。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煽惑下，各级党政机关都遭到猛烈的冲击。

我在东北已不能继续工作了，返京之前，和部办公室一位同志通了电话，了解到部机关也大乱，出现了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和名目繁多的“战斗队”。农垦工作的一些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领导同志的讲话，以至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或被视为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加以肯定，或被当作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彻底否定，而我成了几个群众组织急于揪斗的对象。

12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从齐齐哈尔返回北京。一路上心情沉郁，想到革命一辈子，现在却成了“革命对象”，受到批斗，实在弄不懂是怎么回事。但我相信党，作好了接受群众批斗的准备。

一下飞机，部保卫处长李朝山和我夫人蹇先佛早已等在那里。他们领我上了汽车，然后径直开到北京饭店。他们说，周总理指示让我住到北京饭店的。当时，造反派到处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老干部，气氛很紧张。总理为了保护我们这些人，就对造反派说，北京饭店是接待外宾的地方，对国内外影

响很大，必须保持安定，不允许冲击。

我在北京饭店的四层住下。外面大批判搞得昏天黑地，但里面很安静。服务员对我也友好，有时还把在外面拾到的批判我的传单拿给我看。我也把秘书送来的农垦部及所属单位的群众组织批判我的传单给他们看。

他们问我：“是不是真的？”

我说：“你们自己分析吧！”

他们笑了，什么也没说，对我同样关心。平时，我有事外出，他们就在一层的同志打个招呼，开侧门，让我乘车出去；回来时先通电话，按约好的时间到门口，他们看是我的车，很快开门，我进去后立即把门关上。就这样，我在北京饭店隐藏了近一个月，避开了狂暴的揪斗风潮。我常想，若不是总理保护，那些造反派，真不知会把我怎样呢？

1967年1月初，我接到上级通知，让我出去见群众。我想，群众要批我，是他们不了解情况；我越是不见，他们就越不了解我。再说，40年来，多少风雨雷霆都经过了，还怕见群众？

1月5日上午，我让秘书通知住农垦部的28个群众团体，说下午三时我到农垦部与他们见面。当我准时出现在农垦部二层礼堂临时设置的批斗大会会场时，他们显出吃惊的样子。很快，他们对我大加声讨，纵情叫骂。过了个把钟头又给我挂上牌子游街，从砖塔胡同步行一直走到国务院西门口。

这时我眼前浮现出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景。当年我们就是这样斗争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现在他们竟用这种方法来斗争我们。一切似乎都颠倒了。是与非，真理和谬误，好像在一夜之间都翻了个。

我来农垦部后抓的几项工作和对农垦工作的一些主张，都成了“反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这使我感到很迷惘。60年代初，在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过程中，我曾建议不要盲目播种，应根据现有人力、物力、财力，适当缩小开荒面积，实行精耕细作，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我的建议，受到谭震林和邓子恢副总理的肯定，得以付诸实现，并获得了较好的效果，这有什么不对？我主张建立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条例，使农垦工作有章可循，少打乱仗，以提高工作效率，这又错在哪里？还有，发展农垦教育事业，提高农垦职工队伍的文化、技术素质，以及建立机械化生产队，发展国营农场的劳动生产率等，为什么竟成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苏哈诺夫的“唯生产力论”？

列宁早就说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的东西”。作为国务院一个生产部门，农垦部如果不去抓好这些保证社会主义制度胜利的实际工作，能算是真正“突出政治”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吗？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就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八大”这个精神全党都认为是正确的，也是我长期坚持的，现在却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我真百思不得其解。

但他们不管这些，就是批判。游完街又开批斗会；这个团体批斗完了，那个团体接着来，连续不断，近乎车轮战。我回家的时候，好些团体都要对我说一句：“明天还要来啊！”

我说：“一定到”。

他们问：“几点钟？”

我说：“上班时间八点半”。

每天都斗到半夜，有时到凌晨5点钟，一个团体斗完，还问：“明天几点钟到？”我仍回答：“八点半”。

回到家，先佛还在等我，看到我疲惫不堪的样子，她也不多同我说话。我在沙发上靠了一会儿，八点多又走了。

第二天又是午夜才斗完，临走前仍问明天几点到。我 不加思索地回答：“上午八点半。”

他们不信：“真能来？”

我说：“我是老红军，说话算话。”

我任何时候都以自己是“老红军”自豪，在造反派面前，也是如此。

次日，我按时到，过了一天，还是如此。有些人不无善意他说：“你这个人还讲信用。”

我说：“我是老红军，说话算话。”

在批斗的时候，我有时故意走题，讲点红军的历史故事，不少青年人竟听得入了迷，也离开批判的主题，问我一些红军怎样打仗的问题。我感到这些青年很纯洁，他们完全是盲目地于着自以为革命而实际上却是损害革命的事情。我想，这不能怪他们，他们转入到“左”的潮流中，是不由自主的。

这时，全国形势进一步恶化。自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无政府主义状态日趋严重。公、检、法系统被彻底砸烂；党纪国法被恣意践踏。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难的关键时刻，谭震林等几位副总理和几位老帅在政治局会议上挺身而出，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围绕着“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保护老干部和要不要稳定军队等原则问题，义正辞严地展开了面对面的辩论。

然而这种在党的会议上，依照党章规定的权力进行的正当抗争，竟被诬为“二月逆流”，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谭震林成为“农口的最大走资派”。

由于我对农垦工作的一些主张，曾受到谭震林的支持，反击“二月逆流”后，对我的批斗也随之升级。什么“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一贯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反党老手”等等大帽子一个接一个扣到我的头上。其中对我最严厉的定性语是“资产阶级分子”。对于这类“雅号”，我当时虽然很不服气，但也无可奈何，只有听之任之。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同往年一样，上面仍然发来请柬，我应邀参加了“五一”庆典，登上天安门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见到毛主席。他拉着我的手，谈起了40年前在龙溪洞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亲切热情的态度一如既往。这使身处逆境的我，心情激动，胸中的郁闷顿时为之一扫。想当初我年未及冠，即在北伐战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在40年的革命历程中，或由于自己认识不足，或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发生过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然而对党、对共产主义信念却从未动摇。毛主席在井冈山作的关于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报告，我至今记忆犹新。多年不见主席，而此时此地不期而见，思想上感受到的鼓舞是不言而喻的。

也许是为了抵消我“五一”观礼的影响吧，回来之后对我的批斗更加厉

害了。从历史到当前，从军队到地方，“老账新债”一起算，似乎非把我打成“一贯三反”的“老手”不可。凡此种种，我心想不会没有来头的，所以并不责怪群众。但有一次确也忍不住了，脱口顶了一句，说“党中央、毛主席从没给我作过这样的结论！”于是立即招致了一片怒斥，说我态度不老实，要好好整整我的态度。然而我的态度还是那个：坚持实事求是，决不随便乱说。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八一建军节前一天的上午，突然来了一批学生，与农垦部的造反派一起，把我抓到北农大临时监禁起来。他们对我说，过两三天要召开万人大会批斗我。我意识到这将是更加残酷的斗争，作好思想准备，并拟了个答辩式的发言提纲。

过了两天，我在院子里看大字报，听到有个声音在轻轻地喊我。回头一看，是我熟悉的一位老红军祝子新和他的小侄女江平。

我很奇怪，怎么会在这里相遇？他们说，我被抓后，大家非常焦急，谁也不清楚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以到北农大看大字报的名义，来打听我的消息，没想到竟遇上了。我们不能多谈，彼此心照不宣，他们匆匆回去了。

又过了十几天，批斗大会没有开，看管我的人也不见了。我索性自己跑回家。先佛告诉我，我被抓走，不知去向，她急得没办法，就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请聂荣臻元帅转递的。我这才意识到，造反派之所以没有开万人大会批斗我，并放我回家，是总理又一次保我。

回到家，正好是八一建军节的前一天，我又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的招待会。建国以来，这种招待会我出席不止一次，而这次能够出席，其感受自然不同于往常，说明党和军队仍然承认我这个老兵，并没有把我看成是什么“分子”，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八一”过后，又专门对我开了两次批斗会，内容大部分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批判我的结论。只是在我的“罪状”中又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说我“一贯反对林副统帅”。说解放战争后期，我任四野和中南军区参谋长时，不尊重林彪的领导，不与林彪合作，因而被撵出四野和中南军区云云。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然而“空穴来风，良有以也”。当时林彪对干部“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利用窃踞的高位，培植亲信，排除异己，今天污蔑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现在终于整到我头上来了。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

我与林彪多次共事，无论是在井冈山红四军，还在第4野战军，我自信为对他的领导没有不尊重，与他合作也是好的，根本谈不到反与不反的问题。如今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滥用权势；对于旧部和熟人，能拉就拉，拉不过去就打，手段恶劣，居心叵测。

我在挨批斗时，不能讲这些情况，只好硬着头皮听着。可是对林彪无端加之于我的污蔑不实之词，心里确实很难平静。想不到这个人竟堕落到如此地步，倒真引起我对他的愤慨和反感了。

有一次，又有人来找我核对林彪污蔑我的那些不实之词，我一时激愤用了几句狠话，说：“在军队里像我这样级别的干部，工作安排是由中央军委毛主席决定的，不是随便哪个就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他（林彪）当时还不是副主席，要不要我在四野和中南军区当参谋长，只有中央、军委、毛主席才能决定”。

此言既出，我就横下心来准备承受更大的打击。幸好我这番话没有扩散出去，否则可能招致更严重的灾难。

1967年下半年，社会秩序已经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特别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之后，“内战”在全国范围爆发，而且是真刀真枪、有组织地互相厮杀，在不少地区酿成了武斗惨案。老师们和一些老干部，有的被游斗，有的被迫害致死，而林彪却说什么“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

我当时心情极为愤恨，深感这伙狐假虎威、丧心病狂的奸佞之徒可恶、可恨，同时又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那时候，像我们这些人，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欲哭无泪，欲诉无门，除了把愤怒和焦虑深深埋在心底外，又能做些什么呢！然而我深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古语。社会主义社会既是人民的天下，终究要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有朝一日“天道好还”，广大人民群众必将起来清算这帮丑类，向他们讨还公道。

领导上可能考虑到社会混乱状态不能再任其发展，国家机器必须恢复正常运转，社会生产必须正常进行，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向各部委和工交企业派出军事代表小组“支左”，对各要害部门实行军事管制。

1968年1月24日，军代表小组进驻农垦部，即遵照上

面的统一部署，着手抓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很快就成立了“大联委”，接着又在这一基础上成立了“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的农垦干部革命委员会，组织开展“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等工作。

“清队”开始后，我便被隔离审查，实行“群众专政”。审查内容相当广泛，40多年的政治、历史、思想表现，凡被认为与“三反”、“四反”（加上“反林彪”）能沾上边的，统统在审查之列。

“四清”运动初期，毛主席提出要对干部进行再教育，反对高高在上、闹特殊化和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我想起了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一首五言古诗《凶宅》，觉得其中有些句子颇能发人深省，意思是说国家的兴亡不在于宅上的吉凶，而在于官员们的作风行为正与不正，所谓“凶宅”其实是“人凶非宅凶”。由于记忆不清，便请图书馆的同志帮助查找一下原作。结果也被推导成“借古非今”、“发泄对党对毛主席的严重不满”和“影射攻击三面红旗”等等。

当时与我一起关进“牛棚”受审查的，还有其他几位副部长和一些局、处级干部，共计22人。我们除接受不同范围的批斗、审问和写交代材料外，还要按指定的篇目学习毛主席的某些文章和语录，如《敦促杜幸明等投降书》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等等。无非是要被审查者按照专案组既定的“走资”、“反党”和“叛、特、反”等既定的框框交代问题，提供材料。

专案组提审时，总是不厌其烦地先交代一通政策，诸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如不端正态度、顽固到底，就会“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等等。对这套说词，起初还曾引起一种逆反心理，听得久了则神经近乎麻木。表面上针对性很强，实际上是无的放矢。因为我们虽被隔离审查，但毕竟不是淮海战场上的杜聿明，更不是非打不倒的“反动东西”。这种对批评对象用“乱点鸳鸯”和形式逻辑推理办案的一套搞法，完全违背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对于这种学习我毫无兴趣，倒是觉得趁机认真地通读一下《毛选》更好，

同我关押在一个房间的，是基建局一位叫陈琳的处长。他青年时代曾在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读书，因为向往陕甘宁边区而北来参加共产党。此时则为历史问题被当作“特务”给“专政”的。以前我对他不很熟悉，只知道他曾在牡丹江垦区当过规划设计院院长。现在由战友成为难友，朝夕相处，学习之余在一起谈谈哲学，交流一下学习心得，倒能抒发一点胸中的郁闷，排遣一下枯寂的时光。

10月中旬，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我作为“八大”的中央委员，当然希望能够出席会议。然而我和陈漫远（中央候补委员，农垦部代部长）却都未能获准参加，因为我们是“群众专政对象”。在被隔离审查期间，当然被剥夺了出席中央全会的资格和权利。

当时思想上确实有些想法：中央并没有立案审查我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出席？为此，有时就想起刘少奇的遭遇和处境，我们过去就听说刘是创党时期入党，并与李立三等参加安源工人运动。以后在白区工作，颇有建树。但文化大革命却被炮打为资产阶级司令部主角。那么，我们这些人又何足道哉！当然，这种想法，也是在自己处于无法解脱的遭遇中的宽慰之词。

听说在这次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残缺不全的全会上，康生、江青等人又一次大批“二月逆流”，会议还批准了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诬陷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审查报告，并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这种倒行逆施，都穿上了合法的外衣。历史上类似的冤案何止这一桩？人们在不明真相之前除了内心存疑之外，又有什么可说的。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10月5日的《人民日报》介绍了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的一条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这条指示被视为“反修防修”和搞好“斗、批、改”的“伟大战略部署”。农垦部机关立即掀起了学习柳河经验，走毛主席指示的五七道路的热潮。军代表小组和部革委会很快派出专人去江西老革命根据地选择未来于校的校址，最后定点在赣北永修县云山垦殖场下属的新丰大队和小里村林场一带。

部里的大多数人都作好了下干校去搞斗、批、改的思想准备。到1969年春节前，机关工作人员除少数留下外，其余被编成3个连。机关党委、政治部和行政、物资、生产、计划各局部分人员组成的先遣连，春节一过即整装出发。

春节期间，所有隔离审查对象，全部放假4天，并规定不准随便外出、不准互相串联等若干纪律。2月17日，节后上班第一天，打前站的一连离京赴赣。一个多月以后，二连、三连也先后南下，直接投入了春耕生产劳动。

这年的4月1日到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林彪俨然被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党章总纲，林彪、江青的一批亲信和骨干也被塞进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却被排斥在外。这期间，原谭震林主管的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中央农林政治部和农业、农垦、水产三部及中央气象局，根据中央精简的原则，合并成农林部，部机关设在西单原水产部。我们这批人仍留在原地继续接受审查。

第二十八章赴江西“五七干校”

1969年11月下旬，组织上通知我，准备去江西“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所谓再教育，对我这个具体人是继续接受批判和审查。

当时，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感到江西是造反派称霸的地方，远离中央，也远离家人，遇到紧急情况，很难与同情我的人取得联系。另一方面，我又对江西有难以割舍的情感。我最早参加战争（北伐战争）是在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在江西；井冈山时期跟着朱毛打游击主要在江西；湘赣时期我指挥红军游击兵团作战的主要地区也在江西……。可以说，在我此生的革命历程中，江西是我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和一名军事指挥员的起点。江西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让我依恋；江西的父老乡亲，多少年来总萦绕在我的梦中。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我一想到江西，便会从心底涌起一股乡土般的恋情。的确，我早就把江西看作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1969年12月初，我随一批老弱病残和少数因故滞留的家属，最后离京赴江西“五七干校”。此去吉凶难卜，真是“战地黄花衰，孟冬西风疾”啊！

我随身携带的行李不多，除被褥和换洗的衣服外，就是一只大书箱，里边装满中央编辑的马克思主义30本书。还有《史记》、《资治通鉴》等文、史、哲、经方面的书籍。当时我想，干校生活无非两条：除继续接受审查，参加劳动外，其余时间就是看书，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认真地学习一点马列主义，弥补几十年来无暇系统学习理论的缺憾。

在赴江西永修的火车上，望着窗外匆匆闪过的景色，我仿佛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时代，逝去的往事，此刻又历历映现在眼前。抚今追昔，不觉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遂即兴默吟五古一首：

我自江西来，
又回江西去。
昔日草鞋行，
今朝飞车遽。
轻装怀马列，
悠然赴“五·七”。
战地黄花衰，
孟冬西风疾。
云山赋归欤，
老骥兮伏枥。

此诗当时不敢公开。我信仰马列主义40多年了，此时虽然处于“孟冬西风疾”的环境，但仍不失“老骥伏枥”之慨。

大约是12月上旬，我们来到了修水河畔的云山垦殖总场场部周田镇。这里离校部所在地新丰大队约14里。我被编入离周田最近的3连。连部驻小里村。我们这些老弱病残和外单位来校的带小孩的女同志，被安排住在周田公路旁边小山包上废弃的云山总场职工医院旧址。

我一个人单独住在最东头一间约十平米的小屋里。旁边住着当时的人事宣教局局长张继璜、副局长李玉昌，计划局局长黄家景和另外几个机关干部及其家属。那时我61岁，是这个“北京新村”居民中最年长的一个，大家都叫我老萧或萧老头，孩子们叫我萧伯伯。

“文革”以来，我的心脏一直不好。出发前，周总理指示要给我带个炊

事员。我由衷地感激总理的关怀，但谢绝带炊事员。我想，既然是重返江西，那就一切从头做起。尽管我已年过花甲，但我还是那个气概，不服气，不消极，更不悲观。

到干校后我坚持自己买菜、烧饭、砍柴，衣服破了，能补的自己缝补。有时柴米不继或不想动手，就到食堂去买饭买菜。粮食没有了，就跟邻居们一起到4里外的罗店去买米。饮食起居完全自理。“缺腿方桌倚陋室，锅碗瓢盆皆杂陈”，便是我在一首诗中概略描述当时的处境和自炊自饮的生活情况。其实，那个只有三条腿的四方桌上，何止摆锅碗瓢盆，读的书籍、写字用的纸张，也都堆放在上面。除了当饭桌，还要当书桌用。刚来时，闹了几肚子，在邻居们的照料下，身体渐渐康复，生活也习惯下来了。

赣北山区的冬天，潮湿阴冷，凉气常从墙缝、屋顶乘隙而入。室内无火取暖，我想起过去徐特立曾跟我说过，当年他在长沙教书时，冬季，室内寒冷，便在屋里就地跑步取暖，不失为驱寒之一道。于是，我也仿效徐老的“保暖术”，在房间里就地跑步，果然一会儿身上就有了暖意。

不知是哪位同志向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连部派人送来了一篓木炭。室内生起了火盆，顿时暖意融融，心情也随之豁然起来。然而好景不长，尽管节省着用，40斤木炭很快还是烧光了。有时冻得不行，就躺在床上，盖起被子捂捂。我想这终究不是长远之计，总得想个门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是。

我看到我们住的房子前后、山包附近，有不少齐胸高的树桩，这是人们在伐木时站着拉锯留下的，有天在室内又感到冻得难受，便拿着斧、锯去伐树桩，把砍回的木桩破成劈柴，这样既可以驱寒，又解决了烧饭、取暖的薪炭

问题。

从北京出发时，我就作了不再回领导岗位的准备。我想，将来不论到哪儿，总得学点劳动技能，以安身立命才是。到干校后，我根据自己的体力和爱好，开始学木工手艺。先买来一套大、中、小号的木工工具，自己又做了一把立式皮带锯和一条木工凳，就试着当起“木匠”来。好在云山既是农区又是林区，食堂的薪柴堆里就可以挑选出有用之材，向他们买来锯成家具材料。我试着做了几件板凳、桌子、书架之类的家具，看起来还满像回事。

俗话说：“三分木工七分油”，油漆是非常关键的一道工序，油漆上得好，可为木工增光；油漆上得不好，木工的缺点全暴露出来。为此，我专门去向一位老木匠师傅请教。他告诉我：油漆之前，先要刮好腻子，把刨面抹平；上油漆的秘诀是“横刷竖顺”。我按照师傅教的诀窍一试，果然不错，油出来的家具色泽匀亮，没有气泡，像个“鲁班师傅”的作品。1972年回北京时，我把自己做的四方桌和长方形折叠桌也带回来。几十年过去了，除因北方房间里有暖气，使桌子稍有收缩和裂缝外，色泽仍然光亮。

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像模像样，打心眼里感到喜悦和自豪，我跟邻居说：“有什么东西要做的话，我可以帮忙。”大家只是夸我的手艺不错，却不好意思麻烦我。

我们这几户人家的到来，颇受小镇人们的关注。江西老表本来就热情好客，我们这些外来户每到饭堂吃饭、买东西，他们就主动上来搭话，大家很快便混熟了。

周围的群众，像售货员赵万贞、广播员陈步云、理发员小张夫妇以及他

们的父亲——烧开水的老张等，见面时总要打打招呼，聊几句家常，关系相当融洽。有时他们也到我的住地来玩，谈谈镇上的情况。商店的日用品进货时，小赵就会来通知我去买。

我不抽烟，平时也很少喝酒，但对江西土产、度数不高的米酒却有兴趣。特别是冬天夜读时，喝上几口，驱风御寒，胃中很舒服。腊月将尽，有一天小赵跑来通知说来米酒了。我便和张继璜同去，两人抬回一坛，不光是备以自酌，也准备用来招待到周田办事的不速之客。

农历春节，是我国人民合家团聚的传统节日。“文革”3年，尽管大破“四旧”，但这个传统却很难破。道理很简单，这是中国人千万年来的风俗，并非什么“旧”。邻居们盛情地邀请我跟他们一起过年，而我总觉得自己仍在受审查，“待罪之身”不宜给别人添麻烦，都婉言谢绝。

除夕之夜，山区小镇一片静谧。我独居斗室，展读灯下，四壁孑然，形影相吊。遥想全家5口分散在北京、江西、湖南、河北等处，天各一方，不得团聚，心情不禁怆然。于是取酒自酌，聊以排遣对家人的思念。尽管这样，我仍坚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总是有希望的，眼下种种不正常现象，迟早会改变。我有时就默诵白居易《凶宅》中的诗句：“权重难持久，位高势易穷……”，以表达对造反派前途的看法，也宽假当时窘迫的处境心态。

到干校后，不少搞专案的外调人员找我调查，问的多属历史情况。于是写检查、交代和写证明材料就成了我的主要工作。我始终抱定“实事求是”的宗旨，坚决不夤缘时会，以免害人害己，贻患无穷。比如在井冈山时，红军指战员一人一条扁担挑谷子的事，朱德挑了就是挑了，林彪没挑就是没挑。当时，林彪说是身体不好，没去；这些都是事实，不容改变，更不能把“朱德的扁担”硬说是“林彪的扁担”，欺世盗名。伪造历史。

外调人员让我交代的历史材料涉及面很广，从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都有。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事情记不清楚了，便不得不认真地重温一遍历史，从而使脑海中早已淡化湮没了的人和事，又逐一生动地浮现在眼前。

我想起当年在江西扩兵的情景。那时，连队干部和战士都希望自己的部队满员，满员了，打仗和服勤务做群众工作的人多，就能打胜仗，多办事。所以每到一地尤其打了胜仗，抓到俘虏，官兵都愿意去做扩兵工作，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扩兵。每扩到一个兵，哪怕是“解放战士”（俘虏兵），大家都欢呼啊，我们队伍又增加新同志了！那个高兴劲儿真是没法形容。

忆昔抚今，不禁又想起自己目前的处境。从“文革”开始，我已“靠边”近5年。5年来，除了挨批斗、写检查，不允许干任何工作。当年，我们为了扩大革命力量，把能动员的人一个一个都动员进来了；而今天，我们这些老兵却一个一个地被赶出革命队伍，成了“革命对象”，纵有一腔热情，浑身力量，也只能空对青山嗟叹。

想到我已是61岁了，文化大革命不久，就停止了党的生活，已五年了。我今生还有几个5年啊？不禁怆然。于是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倾吐心中郁结之言。写到激动处，两行老泪竟跌落纸上。

那个年代，像我们这样人写信，是很难送到毛主席手中的。我把信送交军代表，请他们转递，他们慷慨答应送北京。

在沉闷和孤寂中，我就读马列的著作。通读《列宁选集》时，特别喜欢第四卷中《十月革命四周年》这篇文章。它那高屋建瓴的磅礴气势和勇于作

自我批评的求实精神，深深地感染和教育着我。

列宁在肯定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最重要最困难和我们根本还没有完成的事业，就是经济建设”，“在这一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中，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犯的错误也最多”。而错误的原因，在于企图“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在他看来，要克服这些困难和错误，必须实行新经济政策，使无产阶级国家“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努力提高生产，发展商品经济，把千百万小农联合起来，把他们引导到更高阶段，“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对照列宁的话，我想起1958年“大跃进”的情况。那时，我们不就是滥用行政命令，“刮共产风”、“吃大锅饭”；漠视农民个人的经营兴趣和对生产“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违背价值规律；忽视经济核算；有意无意地把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终于导致了3年经济困难。（也有水灾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更是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重视经济建设；单一抓粮食生产，限制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动辄割“资本主义尾巴”，致使农村经济停滞不前，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列宁把发展经济，当作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立经济基础”的根本任务来抓；而“左”倾错误却把“突出政治”当作“一通百通”的灵丹妙药，别有用心地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

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只能是掩卷深思、独自遐想，然而通过学习，思想上、精神上得到了一种解脱和慰藉，胸怀也随之而开阔。这时，我深深体会到“《列宁选集》一开卷，斗室油然起风云”了。斗室之中，风云一起，就产生当年在江西打游击那种气概了。在“五七于校”的两年多时间，我虽然处于受审的境地，但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情绪，认真地读了些马列的书（内有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由鲁迅翻译的《艺术论》等），这也是我一生中的大快事。

读书和劳动之余，我也不时到附近走走，了解一下当地农村生产和生活情况。云山，全称“云居山”，高达千米，峥嵘云上，巍峨挺拔，气象雄浑。在其东南的山腰上，有一个名为“横岭”的小村，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村民利用大山斜面的小缓坡种些药材、蔬菜和少量粮食，生活虽不富裕，但气氛安定祥和。我有时信步走到这里，深为其幽雅的景色和淳朴的民风所动，觉得颇似“文革”中的世外桃源。有感于此，即景赋七律一首：

幽居陋室望青天，
暇日常思远市廛。
涉水登山行草径，
穿林破雾见炊烟。
鸡鸣犬吠村邻睦，
菜嫩花香空气鲜。
清酒相迎不速客，
几疑身到武陵源。

古人虽云“诗言志”，然而我这首诗，却并不说明我愿意寄迹林泉。几年来的社会动乱搞得思想烦闷，心绪不宁，如今能有机会到这些地方走走看看，接触群众，感受一点真诚和睦的人际关系和自然状态，放松一下绷紧的

神经，无疑也是山居生活的一件快事。不仅当时是如此，就是事后很久也很难忘怀。1987年我去云山，到周田后，要上山到云居寺看看。路经白石港，盘山而上。到云居山寺后，从原路而返，看到横岭，我问司机，汽车能否到横岭，他说，不，还有一里山路。我叫他在分路口停下，又叫他回周田。他说，在路口等您回来。我说，不要等。由横岭到周田村的路我早就会走，他们相信就不多说了。我步行到横岭村，见到景色和许多故旧，就下山了。直到现在，还有时想到这个村庄。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紧张进行中，我想，什么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才能恢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心协力、和和睦睦地进行经济建设呢？

我喜欢孩子，只身到干校后更是如此。周围邻居中随父母一起来走“五七道路”的孩子，大约有一个班，最小的一个还在吃奶，其余的都在上初中、小学。他们经常在身前身后转，央我讲故事，教他们写毛笔字，或看我做木工活。

小家伙们求知欲很强，王伯强的儿子王伊争就是一个。他当时只有八九岁，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常向我提一些关于红军时期和长征的问题。我指着地图告诉他，井冈山在哪儿，红军从井冈山下来又去了哪儿，长征是从哪儿出发的，先后经过哪些省份，走了多长时间，最后到达什么地方，等等。他听得很用心，也喜欢想问题，样子文静而腼腆，我挺喜欢他的。

他的姐姐王伊力，当时也不过十二三岁，在云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初中。“共大”虽名为大学，实际上是中专，学生除在课堂上学习书本知识外，一个共同课目就是参加力所能及的农牧生产劳动。

孩子们经常上山下田，鞋子穿得很费。那时候，我经常打草鞋，除了自己穿，也送给孩子们和老表。这门手艺当年红军指战员人人都会，我也在行。

有一次我打草鞋，伊力站在旁边看。我看她很想要草鞋，就对她说：“你跟妈妈要件穿不着的旧衣服，扯开成七八分宽的布条条，我帮你打双布草鞋。”她很高兴，一会儿从家里拿了些布条来，我就给她打了双草鞋。她舍不得穿，一直保存在箱子里留作纪念。前些年他们父母子女来看我时，伊力还特地把草鞋带来，说：“萧伯伯，您还记得吗？这是在于校时您给我的。”

重睹当年旧物，引起我对于校生活的许多回忆。昔日那个扎小辫的女孩子，转眼工夫已长大成人了。她告诉我说，她在某个单位当会计，弟弟伊争搞电视宣传工作，现在已经是导演了。想想当年那一帮小家伙，有如一株株柔幼的小苗，“文革”的风风雨雨虽然没有摧残到他们，但也跟着父母受了不少锻炼，甚至磨难。

在邻居们的孩子中，张继璜和王敏芝的小女儿张青，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是江西老表，老红军，他们平常总是关心我，因此对孩子也有影响。云山虽是山区，夏天仍然很热，白天气温经常在摄氏三十多度。为了凉快，我便将长袖衣服剪成短袖，长裤剪成短裤，王敏芝帮我用缝纫机把毛边一轧，看上去就整齐多了。

有一次，我陪张继璜一起到赤石岗中学去接小青回家，走到半路我腿上的旧伤又犯了，他搀着我到几里地外的总场医院挂号、上药，事后又扶我回来。这一切，小青都看在眼里，主动帮我干家务活，还帮我拆洗被子。

她们母女二人上山拾柴时，她主动对妈妈说：“萧伯伯腿上有伤，又有心脏病，不能让他也上山拾柴。咱们多拾点，分些给他就够烧的了”。我感到这孩子心地善良，特别懂事。她自己从小患小儿麻痹症，腿脚不太方便，

还处处关心他人，使我颇受感动。

还有几个当地小青年，如总场革委会主任的女儿，有时也到我这里来玩。有一次，她同另外两个女孩子一起来了，她们都是云山机械厂的工人，请我到她们单位去讲红军故事。

她明知我当时的特殊身份，却并不介意。对我说：“您是江西游击战争时期的老兵，什么审查不审查，那是在北京的事；现在来到江西，老百姓早就审查通过了！”

我有些犹豫，怕连累她们。而她却毫不畏惧，说“我们是工人阶级，工人请您，谁能斗我们工人阶级？”

孩子们的信任，我终于去了。

我不仅和工人、农民、青年、孩子交往，还同知识分子交朋友。到江西的第二年，我膝关节踝关节患骚痒溃烂症，日夜不宁。一天上午，一位男青年来找我，他说他从中央卫生部的“五七干校”（离周田15华里）来，是医科大学毕业生，名张祖济。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听说我病了，让他来看看我，为我治病。他给我扎梅花针。几天之后，病痛减轻了。钱信忠同志和这位医务人员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一个身处逆境的老同志的同情，令我十分感动。以后，张祖济常来我处，我们交了朋友。我回北京不久，他也回来了。他现在又在河南经商，赚了钱，做些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事，我赞赏这位知识分子的气节。

到江西后，还有几个不期而至的老人来找我。第一位是当地的一个老表。那时，正是1970年春节刚过。一天早晨，张继璜到山下食堂吃早点，看见一个50多岁的农民，

肩背一支鸟铳，手提一只麂子，进门就向食堂服务人员打听：“萧克在哪里？”

继璜见此人来得蹊跷，没有马上搭腔。过了一会儿，食堂有位湖南籍炊事员悄悄对继璜说：“这人就住在附近，一直在找萧克，能不能让他见见？”

继璜了解了一下情况，便把他带到我住处。坐下来一谈，原来是1930年我在红一方面军当师长时，他在师部当过伙夫，因为打摆子打得厉害。回家养病，就与部队失去联系了。

我们聊了一阵子过去的人和事，他便起身告辞。临走非要把那只麂子给我留下不可。我推辞不掉，便拿出50元钱说：“你送我的我收了，我送你的你也不必客气”。他推辞再三，最后把钱收下，高高兴兴地去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从古安南面的泰和县来了一个农民模样的老人，提着一块腊肉，在周田街上打听我的住处。当地老表摸不清他的来意，便兜圈子盘他的底。

有的说：“听说那萧老汉被打成了走资派，你找他有什么事？”

来人一听就火了：“我管他是什么派！他是我的老师长，看看也不行吗？”

他找到我以后，见面就喊“萧师长”，说当年在江西独立第5师曾跟我当过通信员，后来也是因伤病离队，痊愈后不知部队去向。几十年来，一直在家当农民，前些日子听说我又回到江西，就特地赶来探望。

他是从泰和步行到永修的，中间隔着好几个县。为了见我一面，他专程由江西中部来到赣北，盛情实在令人感动。

第三位来找我的，是一个从南昌来的姓魏的湖南籍女同志。一见面就亲切地叫我“萧连长”。听到这个称呼，我就断定她是井冈山的老同志，因为

1928年我在朱、毛红军任连长。我详细地询问了一下，原来她是彭儒的嫂嫂。彭儒是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那时我们就认识。农垦部成立后她在人事宣教局任副局长。我到农垦部后，与她常有接触。

经她这样一说，我们很自然便聊开了。她说她在奇石彭家湖南宜章县和在井冈山时就认识我，她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负伤离队的，谈起这些年来的经历，不免有些伤感，我听了也不禁为之黯然。

回想当年红军初创时期，敌强我弱，战斗频繁，伤病员颇多，医疗条件差，一些负伤生病的红军战士不得不回家或留在老乡家治病养伤，不少人竟因此失散，流落各地。解放后，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过去的这段革命经历，有的由于得不到证明不被承认，有的甚至被误解，思想上的委屈和苦闷无从倾诉，一见到过去的老战友，便倍感亲切。仅我到江西这年把时间，通过外调来找我写证明材料的不算，直接找到我的这三位同志基本上都是这种遭遇。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其经历之艰苦曲折，情况之错综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经过一年的审查，在1970年秋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恢复了我的公民权（没有恢复党的生活）。这时，原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老红军刘俊秀，被结合进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他邀我去井冈山参加老干部学习班，并要我在班上介绍一下当年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经过。

我事前准备了讲话稿，于9月中旬欣然前往。这个学习班有130多名老干部参加，其中有30多位是我的老熟人。大家劫后重逢，感到格外亲切。我的发言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这件事被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知道了，他认为让我参加这个学习班并讲有关党史、军史方面的问题不合适，就直接打来电话进行干预。但这时我已经讲完了。

为此，刘俊秀挨了三次批评。当时我所讲的内容，后来都写进《朱毛红军侧记》一书，完全是史实。程世清之所以要横加干预，想来他是省委书记和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很需要表现一下“造反有理”的精神。

我虽然还在受审查，但有同情我的人。一天，有人告诉我一个消息，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利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手法，发动突然袭击，加紧抢班夺权。毛主席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在全国普遍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给林彪一伙以沉重打击。

从那时起，我的政治待遇有了改善，军代表小组常通知我到校部去看文件，14华里的路，上坡下坡，走走歇歇，一般要两个小时左右才能到。军代表考虑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同时为了安全起见，便派出唯一的一辆“华沙”轿车接我去看文件，组织上的关心照顾，既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心安。因为那时农垦部的领导干部还有好些人没有“解放”，我个人虽“解放”了，仍显得有点不大自如。

后来，我搬到山下广播站附近住。连队盖起新房子后，其他各户陆续也搬了。我被安排到离新丰大队两华里、与校部隔河相望的2连住，以利于参加政治生活。

1971年9月，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消息传到干校，我深为党和国家、军队感到庆幸。正所谓“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如今这个庆父式的人物还没等到人民起来除他，竟可耻地自毙于异国他乡，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然而，下一步情况会是怎样呢？我和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听传达。

大约是10月上旬，副军代表张致敬、校革委会主任李更新等从北京回

来，带来了中央有关文件。干校的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我也被扩大进去，并在会上发了言，会后我向中央专案组写了揭发批判林彪的材料。1972年5月我参加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会议，我写的那份揭发批判材料，与朱德、聂荣臻等的揭发材料被列为7个主要材料之一，在党内公布。

不久，在于校范围传达、学习，展开了肃清林彪反革命集团流毒的群众性大批判。“文革”以来，我的心情从没有这样舒暢过。因为高兴，又一次登上了云山。

我一早开始爬山，雾气很浓，人在雾中穿行，走一段，停一停，近午方始登顶。凭高眺望，眼前白云苍茫，随风幻变，时阴时晴，气象万千；阵阵山风吹来，松吟蝉鸣。面对如画景色，不觉心旷神怡，因得七律一首：

山居又是沐秋阳，
唯读唯劳且自宽。
晨出家门穿雾上，
午登山顶看云翔。
青杉作伞蝉鸣晚，
绿草如茵野菊香。
一任乱云随风舞，
抬头凝目望东方。

这时我唯一感到不足的，是党的生活尚未恢复，内心还是有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

我入党后，只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一度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经过千辛万苦寻找，终于又恢复组织关系。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开除”出党。此次去江西，原以为能通过整党恢复组织生活，然而整整5年多，一直置身于党外，就同当年与组织失去联系，形如孤雁的感觉基本一样。

1972年元旦到了。这是在于校度过的第2个元旦。放假期间不断有同志来我处，大家在一起聊聊，节日过得比头年还热闹。谈得最多的是林彪的叛逃。我与林彪工作时间久，了解多些，自然就成为谈话的中心。

新的一年刚刚过去半个月，1月16日那天，张致敬来电话通知我：“农林部党的核心小组决定恢复你的组织生活。”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上的一块石头顿时落了地。终于又回到党的队伍中来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过了20天，校部又来电话，通知我回北京。我又惊又喜，忙追问一句：“带不带东西？”对方答：“带，全带上！”我明白了，是召我回北京了。

林彪的1号命令，把许多老干部及其亲属都赶出了北京，在我去五七干校不久，我的岳母和姨姐也到了江西抚州。岳母是一个通晓革命大义的妇女，她有4个儿女参加了革命，其中两个儿子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牺牲，两个女儿也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虽然她是家庭妇女，但对儿女参加革命，不仅不阻挠，而且积极赞助。她从直观的影响中对共产党产生了朴素的感情，又从这种感情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她常说，我的儿女们是好样的，他们参加的党也一定是好样的党。我被批斗并被抄了家，姨姐姐（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也被幽禁，她虽然紧张，但无怨无尤，她相信共产党。

在云山接到回北京的通知，我想先到抚州，把这个消息告诉岳母，宽慰她老人家。我向军代表和部革委请假，他们立即同意，并派了一辆小车，让五七干校一位精干的同志随我同去。

到了抚州，母子、姐弟相见，心情分外激动。她们听到我回北京的消息，

好高兴啊！虽然她们不知道自己何时

才能回京，但为我的问题开始得到澄清而兴奋不已。在抚州住了一晚，次日赶回云山，准备回北京。

盼望日久之事竟来得这样突然，一时反倒不知先做什么好了。消息传开，有些同志来帮助我整理行装。我决定不仅是铺盖、书籍，凡是我个人的劳动成果，能带的都带，包括斧、锯、凿和门前那条斧痕累累、又长又重的木工凳，以留作两年多于校生活的纪念。

校领导想得很周到，为了路上有个照应，决定提前安排军代表小组成员孙瑞林探亲，顺便送我回北京。

可是天不作美，正当我们要启程的那天凌晨，赣北地区下大雪。漫天皆白，公路上雪深盈尺。孙瑞林特地出去踏察了一番，回来告诉我，不用说是开车，就连步行都有困难。没办法，只好卸下行李，直等到路上积雪开始融化才登程。

可能是由于天气骤变的缘故，一上路我患了感冒。多亏有孙瑞林照应。3000多里路程，历时两天两夜，终于在春节前回到了北京。全家三代，分别从各地归来，劫后重聚，畅叙别情，颇有恍若隔世之感。最令人高兴的是见到了才一岁半的小孙子，使我感到格外亲昵，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隔代亲”吧。

回到北京后，干校和云山地区不少同志还陆续来看望过我。周田的小赵、小陈等及云山垦殖场总场的领导同志，到北京时都到我这里来。他们未来之前，先打听我的情况，想叙一叙，又怕给我“添麻烦”，大概也是担心我重新任职后不像在云山时期那样了。

我知道这个情况后，便通知门卫：凡是江西来找我的人，请立即通知我。他们的到来，不仅使我有一种亲切真挚的故人之情，同时，也帮助我了解一些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与群众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直接联系，有利于密切党群和军民关系。可以说，这也是我走“五七道路”的收获吧。

第二十九章军政大学时期

我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住在水电部宿舍先佛处。春节过后，大约是4月20日左右，叶剑英来电话，让我到他那里去一下。这时，他主持军委工作，我们见面后，他对我说：“军委决定，让你到军政大学工作。”

这又是一个好消息。从1958年离开军队，已有13年了，作为一个老兵，我对军队怀有深厚的感情，人虽离开了，心却不能忘记，对建国初期，我所从事的军队教育与训练工作一直十分怀念，从不认为有所谓的教条主义错误，我盼望有一天能继续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这一天竟随林彪反党阴谋的败露而到来了。

从叶帅那里回来不久，又接到让我参加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会议的通知。当时，参加中央的会议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待遇，这说明“文化大革命”以及1958年强加给我的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表”等等大帽子，无形中被摘掉了。

会议期间，毛主席约我和苏振华谈话。虽不知谈什么，但有个感受，认为毛主席还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兵。我们等了两天，汪东兴来说：“主席有别的事不能来了，他让我向你们转达他的话。他说，你们恢复工作了，今后要好好工作。”

这两句话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从1958年被打倒后，虽事过境迁，但是，我忠诚于党忠诚于革命，得到党和毛主席的继续信任。我们当时所进行的事业，也应该说是得到了党中央的重新认可。所以那时我没有想别的，就是想怎样好好工作，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有一句成语可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夙夜匪懈，矢诚矢忠”。

我去军政大学时，唐亮已在那里工作了半年多，他是红三军团的，过去我与他不熟悉，但在接触中感到他稳重，细致，好商量问题，这使我增强了信心。我们决心顶住压力，密切合作，搞好军政大学的工作。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端正办学方向，恢复南京军事学院的好传统。德高望重的刘伯承元帅，是中外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他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时，为给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他却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那次批判，把我军刚刚开展起来的现代化、正规化训练反掉了；把全军刚刚发动起来的研究外军军事科学的积极性反掉了；实际上把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方针反掉了。所以，我一到职就想到要恢复南京军事学院的传统。

为此，我专程去看望了刘帅。那时，刘帅已近80高龄，

当我向他汇报，他只是说：“你去教书，好！我年老了，你年轻，好好干吧。”

刘帅的话使我很受感动。我想，有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一定能恢复南京军事学院时的局面。

当时，使我产生迫切恢复南京军事学院的想法，还因为全军训练教育状况实在令人担忧。1960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以“突出政治”为名，制造军政对立，大砍大减军事训练时间，提出，其他工作与“政治”发生矛盾时，都要给“政治”让路，“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文化大革命”期间，“突出政治”的观点被推崇为部队全面建设的指导思想，而“突出政治”就是抓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待一切”。在这种

政治压力下，广大指战员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抓业务，不敢钻研科学技术，否则就要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白专道路”、“脱离政治”等等大帽子，部队的军政素质严重下降。对这种状况，我虽然还不能从理论上阐明军、政二者的关系，但总感到，军队毕竟是军队，不学好军事算什么军队？毛主席当时也说过：“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我下决心，军政大学一定要恢复军事教学，要办成像南京军事学院那样培养文武全才的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并推动全军的军事训练。

我和唐亮商量，在抓好清查与林彪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同时，全面整顿学校的教学工作，重点抓好恢复军事教学。6月份成立了军事筹备组，10月派出四个调查组去部队考察军政训练情况。

“文化大革命”，对院校建设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长期积累的珍贵教学资料和图书被销毁或散失，大量器材设备损坏，多年培养的优秀教员也流散了。恢复军事教学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我感到最难的是缺少会治校的领导干部和懂得教学工作的教员。好在叶剑英对我们很支持，当我提出把原在院校工作过的段苏权、陶汉章、贾若瑜、陈中民等同志调回来，充实学校的领导班子时，军委都批准了。后来，何长工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我又向叶帅建议，请他到军大来工作。我知道何长工在江西苏区红军学校和延安抗大任过职，有院校工作经验。

这些同志陆续调来后，军政大学领导班子加强了，懂教学的人多了。11月我们又以军政大学党委的名义给军委写报告，要求重建和加强教员队伍。之后，陆续从全军各部队调了100多名教员，又从军政大学机关干部中挑选了一些可以作教员的，共有军事教员76人，政治教员141人。

这些同志由于长时间不在教学岗位，有的又长期参加“支左”，多年没有接触军事理论，过去掌握的东西也生疏了。为了尽快使他们适应教学特别是军事教学工作，我们于1973年1月举办了军政教员学习班，培训陆续调来的教员。军事教员班，以学习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作战原则，研究外军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特点为主，并着眼于未来战争的特点和发展，着重研究战争初期作战行动，反空袭、反空降、打敌人集群坦克，以及战争初期我军军师进攻作战（运动战）和防御作战（阵地战）组织指挥等。政治教员班，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年又开办了师以上干部读书班和马克思主义著作辅导班，我同哲学教员一起研究哲学课程并写讲授提纲。

当时的政治形势虽因林彪垮台宽松了一些，但党的路线还没有脱离“左”的轨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空气仍然笼罩着全国各行各业，人们的思想还受着严重的束缚。虽然不再提“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但对抓军事、抓业务、抓教学，仍然心有余悸，总怕犯路线错误。在工作安排上，还是把政治运动摆在首位，作为中心工作。

1973年3月31日下午，朱德委员长到军政大学视察。他在谈到批判林彪路线时说，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起来了，工农业生产的形势很好。要给受林彪打击的同志平反，做出正确的结论。他特别强调，学校是搞教育的，要向前看，搞辩证唯物论，不要搞唯心主义先验论，希望我们把搞错的东西纠正过来。

这些话语重心长、含义深刻。想起20年前，我陪他老人家为军事学院选校址，曾经来到这里。那时他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描绘着蓝图，对即

将成立的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寄予厚望，充满信心。20年过去了，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但老一辈革命家殚精竭虑的，仍然是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允许他敞开心扉，倾心明言，但从言简意赅的话语中，我完全明白，他希望军政大学办成名副其实的军事政治大学，成为像南京军事学院那样的全军最高学府。在这一点上，我，也包括许多我这样的老兵，同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老师们的心是相通的。

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准备，1973年9月，第一期师干读书班正式开学招生了。这个班除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还设了部分军事课。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十大军事原则》以及“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战略问题”等。我们还组织学员参观北京军区在张家口举行的打敌集群坦克实兵演习和反空降演习；结合介绍上甘岭阵地防御战的战例，要求学员搞师防御想定作业等。

这是从1966年以来，全军最高学府第一次开设军事课，其中“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战略问题”又是军政大学最先开设的军事课程。教材是由校领导亲自带领部分教员编写的。算算时间，一个国家的高级军事学校，七年后才恢复开军事课，多荒唐，这是由于林彪搞“空头政治”，不研究军事，军队广大干部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如何组织和采取什么打法，心中无数。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和现代战争的特点，我们在教材中着重讲了几个问题，即未来反侵略战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持久战争；严加戒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还是诱敌深入才好打；重点设防，重点守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将来打仗主要还是靠步兵，建设后方，准备建设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在战时能独立作战；兵民是胜利之本等。

师干班开设军事课后，学员感到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的课，很受启发，学到了军事知识，也开阔了视野，很有收获，也促使他们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一些军队建设的方向及军事训练中的问题。

10月份，我们又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著作辅导班，为部队培养政治干部。这个班也改变过去把路线斗争作为主要内容的教学，以读马列原著为主，以自学力主，以抓精神实质、领会基本观点为主。教员对马列原著的基本观点作启发性的讲解，引导学员下功夫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纠正和克服“文化大革命”长期形成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学风。

总的看，从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特别是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在一段时间恢复和加强了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工作，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好形势。我到军政大学的第一年，正好就是这个时期。记得在1973年10月间，叶帅发出了“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的口号，各部队很快出现了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和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综合性大练兵运动。全军还广泛开展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活动，各部队进行了多年不曾搞过的近乎实战的对抗性演习。12月，军委又决定全军恢复增建41所院校。各有关单位立即行动，很快就把院校恢复和建设起来了。正因为有这种大背景，军政大学才比较顺利地开展了以教学为中心和恢复军事教学的工作。

到1974年1月，我们向军委正式呈报军政大学的编制报告。军政大学分为4个部：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理论研究部和军事、政治、后勤、外训4个系。系下设教研室和学员队。军政两个系主要担负培训全军师以上军

政领导干部；后勤系担负培训全军师后勤系统领导干部；外训系接待建交国家的军事留学生。课程大体比例：军事系，军事课 70%，政治课 30%；政治系，政治课 70%，军事课 30%；后勤系，军事课 30%，政治课 30%，后勤课 40%。至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乱了的院校体制编制和课程才得到了调整。

但是，这个大好形势没能保持多久。从 1974 年初开始，江青反革命集团又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把蓬勃开展起来的军事训练再次打下去，军政大学刚恢复的正常教学秩序又受到了严重冲击。

1974 年 1 月 24 和 25 日，江青等人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阴谋打倒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2 月 8 日，王洪文有个乱军的“批示”，要军政大学的学员到各军兵种去参加运动。我和唐亮感到王洪文这个指示不大对头，虽然那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有个“四人帮”反党集团，但对企图乱军的人的行为极为反感。在当时的情况下，既不能顶，也不能完全照办。我们两人商量，决定采取谨慎的办法处理。我们以校党委的名义作出决定：学员到各军兵种去，只参加会议或看大字报，并作了 3 条口头规定：不发言，不表态，不向上反映问题，如果有人要反映问题，由个人去反映，党委不看也不代转。

粉碎“四人帮”后，据“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死党交代，1973 年 3 月 20 日，王洪文曾对他说：“我到处放火，把军队机关的批林批孔搞起来了，把军大的学员也放到各军兵种去了。”王洪文这个阴谋，我们当时看出来了，由于党委及时采取上述措施，使“四人帮”妄图借军政大学学员力量搞乱军兵种的阴谋没有得逞。

1974 年 2 月以后，根据上面的指示，军政大学也展开了批林批孔运动，像过去搞运动一样，教学和其他工作都停下来，集中搞阶级斗争，搞揭、批、查。当时我们对批林批孔运动很有看法，孔夫子死了两千年了，为什么要批一个古人呢？难道仅仅是算历史的旧帐吗？绝不是。这是借古喻今，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周总理。

由于我们大致上看出江青、王洪文这些人的险恶用心，因此在批孔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抵制态度。我们着重批林，批孔只批孔夫子思想中一些消极的东西，像“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等，不批他对中国文化有积极作用的东西。在批林中，我们则把军政大学一些消极现象和林彪联起来批。也批评了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总之集中批林，不着重批孔，更不批“周公”。

然而，军政大学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人很不满意我们的做法，还有人给“四人帮”写信告状。1974 年 3 月 3 日，江青在一个人的告状信上“批示”：“军政大学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

我和唐亮收到这个“批示”后，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告状信是与江青召开的“一、二四”“一、二五”大会相呼应的，所谓揭开军政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实质上就是想搞乱军政大学，利用这个重要阵地进行打倒周恩来和叶剑英的阴谋活动。当然，告状信和“批示”的矛头是直接对着我和唐亮的。当时我们的压力很大，但又想到江青的“批示”是直接送来的，没有经过军委叶副主席，不符合组织程序，完全有理由不闻不问，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

于是我们一面向叶剑英副主席报告，一面给江青写信解释推迟传达的理

由：说告状信所反映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军政大学当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林彪、黄永胜、张秀川等人利用军大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这才是需要揭的阶级斗争的盖子，而告状信避重就轻，是干扰斗争的大方向。江青的“批示”，本意是想整军政大学的领导人，而我们则利用这个“批示”动员全校人员揭发批判林彪、黄永胜、张秀川等篡党夺权的阴谋，并清查与他们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样就把江青等企图搅乱军政大学的矛头指向给扭转了。

由于江青“一、二四”，“一、二五”两次大会的煽动，师干读书班一个学员（原空军某师参谋长），公然在校内贴大字报攻击周恩来总理。事情发生后，我们都非常气愤。我说：“这是干扰大方向，我们军政大学不能要这样的学员，应该开除。”当时我就给叶剑英副主席打电话报告，并请示能不能将他开除？叶副主席说：“你是校长，你有权处理。”

叶帅当时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不好明确说同意，但话中的意思很清楚，是支持我们的。于是，我们召开大会，开除了他的学籍，理由是他反对周总理。“四人帮”也只能哑口无言。我们还把这个情况书面向周恩来、叶剑英作了报告。

还有一次，我们学校有些同志从外面搞到一个江青的讲话，其中有攻击周总理的内容，一位领导同志不加分析，以为是中央领导的讲话，就在学校里进行传达。周总理当时还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江青却大造反周的舆论，我感到这件事不对头。但由于江青还是“权威”，我们也难以公开抵制传达她的讲话，我就直接给周总理打电话，说：“最近有人从外面搞到一个江青的讲话，内容是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这个讲话在军政大学执行起来很难啊！”

总理说：“批林整风是中央决定的，以中央文件为准，不要听信外面传抄的东西。”

总理的话，给了我们很大支持，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抵制传达江青的讲话。然而，有人又写告状信，说学校有人（政治部主任王焕如）攻击江青。1974年2月28日，王洪文在信上批示：“王焕如的这些活用意恶劣，军大党委要严肃追查，认真处理。”过了一天，3月2日，王洪文又在另一封诬告信上批示：“军政大学党委对王焕如的这些错误如何对待？军大不应该联系实际揭一下盖子吗？”

王洪文的这两次批示都是经过江青、张春桥圈阅过的。我们压下了没有传达，也没有按照他的“批示”去办。我向叶剑英副主席报告了这件事和我们的处理办法。叶帅同样用默许的方式支持了我们。

1975年周总理病势加重，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并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小平同志一上任就抓军队各项工作的整顿，开始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作法。

1975年6月24日至7月5日，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作讲话，针对部队存在的“肿”、“散”、“骄”、“奢”、“情”等问题，提出要整顿和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建立和健全有效的规章制度、编制体制，保持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提出要把教育训练放在战略位置上。

这次军委扩大会使我们非常受鼓舞，会议作出的重大决定，正是过去我

们想做而难做的事情。会议一结束，我们马上组织传达和学习贯彻，并根据会议精神和决定的原则，对军政大学从校党委到支部进行整顿，把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从领导班子里撤下来，有的调动，有的交流，有的降级使用。对教学工作也做了调整，进一步加强教员队伍。1974年底，我们决定把军事教学完全恢复起来，成立军事系、政治系、后勤系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军事系筹备领导小组下设战略、战役、战术教学领导小组；另外训练部还直接抓了军种、兵种、外军等几个教学领导小组。

1975年2月，军事系第一期开学，首届招收425名学员，学制半年。学习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介绍军兵种，研究外军情况及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若干问题等。进行师防御、军运动战进攻的图上作业和沙盘作业，研究人防、城防等问题。为了使学校教育同部队训练相结合，我带领军事系学员到大连学习城市防卫课题，在旅顺海军基地学习海军知识，之后到沈阳军区参观加强步兵团平原地防御打敌坦克实兵演习。

1975年，军队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领导下，各方面工作出现了生机。军政大学也发生了大的变化。这年秋，叶剑英副主席要我多关心一下军队的训练，多到部队作些调查研究，向军委提出改进意见，我遵嘱办了。同时也有些担心，主要是对江青他们几个人不放心。我深思熟虑了几个月后，决心向毛主席写封信，要他提防那几个人插手军

队。信还没有发出，接到唐亮的电话，要我回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什么内容，他在电话中没有谈，等我回到北京

才知道是“批邓反右”，要我们“转弯子”。一听到这些，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想给毛主席的信，也就不敢再发出了，一把火烧掉了。接着全国、全军也掀起了所谓“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一搞运动，教学秩序又被打乱了，训练计划也被挤掉。

1976年2月，军事系、政治系第二期和后勤系第一期开学，原定三个系学制均为一年，但由于运动的冲击，训练计划

大部分没有完成。如军事系原定军事训练时间为60%，结果只完成了45%，很多课程走了过场。

军政大学党委一班人在对待运动的认识上比较一致，就像上一年搞批林批孔一样，不明着反对，但也不积极行动，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搞些面上的学习和批判。当时，北大、清华和一些地方单位把邓小平当作敌我矛盾批判，我们也收到两本所谓批判的靶子，但没有印也没有传。有人提出要印要传，我们托辞顶住了。奉命到清华大学去听“四人帮”同伙迟群、谢静宜的所谓教育革命介绍，我们派人去听，但根本不表态，回来也不传达，不宣扬。

当然，学校内部也不是一池静水，社会上的风吹草动在校内也会引起波澜。1976年2月，有人收集北大、清华的一些东西，要塞进政治教学里去；本来训练计划是经过校党委讨论决定的，“四人帮”一搞“批邓”，有人就提出要修改训练计划，反反复复搞了几次；还有人企图以不突出政治，不抓阶级斗争来打我和唐亮。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校党委和部系党委总的说是团结的，稳定的，也是经得起考验的，少数人想跳也跳不起来。特别是唐亮和我，在抵制“四人帮”的问题上，完全一致，互相默契，且互相关心。

批林批孔时，王洪文总是想挑动军政大学揭所谓的“阶级斗争盖子”，

有人企图把揭批的矛头引到唐亮身上。当时有人同我谈话，说唐亮怎么怎么不好，我一听就知道他们的用意，不表态，示以抵制。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上面要求各大单位开“声讨会”，并要求将主要领导谁参加了、谁未参加的情况，向上面作报告。我对开“声讨会”很反感，就有意不去参加。唐亮为了保护我，特别交代办公

室起草报告的同志，要写上：“萧克因病没有到会”。报告起草好，唐亮看了觉得还不行，又改为“萧克同志因病发烧了没有到会”，使我免遭“四人帮”的纠缠。这也说明，办公室许多干部，也同我们一致抵制当时“左”的淫威。

军政两领导团结一致，就利于党委的团结，形成政治上较一致的领导集体（客观上是党委多数同志对“左”的不满），对“四人帮”进行了必要的抵制和斗争。同时也花了很多精力整顿和恢复教学工作。教员队伍建立起来了，教材、器材和设备慢慢搞起来了。我们认真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军事教学，培养了数千名学员。军政大学时期，全校绝大多数同志是认真工作的，并给我们很大支持。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在政治斗争形势复杂严峻，政治运动连续不断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稳定，坚持优良的建校传统，为以后的分校建院打下了好的基础。

1976年，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多事之秋。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辞世，“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广大人民群众对“左”的路线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越来越不满，反抗情绪不断积聚。

1月8日，周总理去世，举国哀悼。追悼会那天，我跟着总理的灵车，一直到了八宝山。一路上，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自发地站在马路两边，送别总理。那个场面，我是第一次看到，路两侧是黑压压的人墙，街道两旁三层、四层楼和楼顶上也都是人，秩序井然。人们发自内心地呼唤着总理，为这位长期为党、为人民工作，又在“文化大革命”极为艰难处境中支撑局面的伟人去世而哀悼不已。当时我就想，人民群众这样怀念总理，也是寄托着一种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不满的情绪。

果然，总理去世后，越来越多的人到天安门广场以悼念总理为名，宣泄这种不满情绪。我和唐亮当时与广大群众心情是相通的。上面通知不让去天安门，我们传达了，却并不严格执行；军大有不少人去天安门，有的还抄回一些反“四人帮”的诗词，我们都知道，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后来发生了“四五”事件，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很不得人心。虽然中央发了文件，但我们心里都不赞成，感到，“文化大革命”是最脱离群众的。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也犯过“左”倾错误。但那时毕竟是打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而“文化大革命”是打从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干部，是打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群众，是打国家急需的掌握了科学文化的知识分子。这样打下去，岂不要把我们党打垮，把我们国家和民族打垮？所以，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虽然不公开说，但在行动上采取不同方式加以抵制。这个办法在军政大学是成功的。我是校长，同政委有默契；我们又同若干人有默契，事情就好办多了。在共同的思想状态下，我们对许多事都心照不宣。

“天安门事件”后，上面要求各单位清查去天安门的人。虽然我们知道什么人去了，只要大家不讲，我们也不去追

查。一方面是想保护一些同志，一方面也是为了抵制“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

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领导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真是大快人心。华、叶下决心办这件事，是顺应了民心，也顺应了历史潮流。当时大家都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历

时10年的一切浩劫终于结束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摆脱了严重危机和动乱，有了新的希望。

粉碎“四人帮”后，大约用了一年时间，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对他们篡党夺权、反党乱军的阴谋

活动进行彻底清查。在这期间，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开展教学活动。1976年秋冬，在连云港举办了一个抗登陆研究班，

为部队培训军事干部，沿海军区派了130人参加。

从1972年6月到1977年6月，5年时间，军政大学共招收12个班次，学制少则3月，多则一年，共训练军事、政治、后勤学员6600多人。1977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

以军政大学军事系、政治系、后勤系为基础，分别组建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三所学院，均隶属中央军委，

由三总部分别进行业务指导。军委任命我为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唐亮为政治学院院长。这样，我们又分赴新

的岗位，开始了新的征程。

第三十章军事学院八年

1978年1月，军事、政治、后勤三个学院正式开始办公。三个学院的新成立，是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军队的教育重新被提到战略地位的结果。1977年下半年，军委连续召开会议，作出整顿军队，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决议，并通过了“办好军队院校”和“调整、重建院校”的文件。到1979年，全军共新建33所院校，连同原来的84所，共计117所，大体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状况，同我主持全军训练工作时期的情况也差不多。

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会议，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也是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为我们在各方面工作中的拨乱反正，提供了思想理论和组织保证。

拨乱反正，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打破“两个凡是”的框框，清除“左”的流毒，解放思想。

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危害我们党长达10年，他们倡导个人崇拜并设置很多禁区，长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当时，有两句话：上了书的不能改，也不能发挥；没有上书的不能说，也不能想。这实际上就是“两个凡是”在教学上的框框。我感到，不打破“凡是”的禁锢，不肃清“左”的流毒，不从思想上彻底拨乱反正，是办不好军事学院的，也就不能完成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的历史任务。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从此掀起了全国性的大讨论，我们在全院也开展了这一讨论。为了取得好的成果，除召开了有各级领导干部、教员、学员和基层分队代表参加的大会外，还办读书班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学习和讨论。全院举办了师以上干部读书班5期，各部、系分别举办了团以下干部读书班14期。军、师、团领导干部参加学习班的达92%。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联系实际开展讨论，大家从基本原理上弄清了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加深了对“两个凡是”错误的认识。

当时，我在全院大会和各期读书班上多次讲话，反复强调了要搞清以下几个问题：

如何看待已有的定论。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不能停滞不前。任何定论都不是终极真理，因为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正确与否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例外，它从实践中产生，又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在实践中发展。凡不符合新条件的定论，就不能拘守。要彻底改变那种把领袖著作、言论当作现成公式，到处乱套的作法。要改变那种凡是上了书的、作了决议的就不能更改的错误观念。如果后代人被前代人的具体结论所限制，为“凡是”或类似“凡是”的框框所限制，不注重现状，不注重发展，思想就要僵化。

如何看待党的历史。林彪、“四人帮”惯于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他们以宣传毛主席为名，对党的其他领袖和历史人物，一概否定。好像党的历史就是一个伟人的活动，对这种作法我早就从心里反感。我认为，解放思想就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

目。讲党的创始人，首先要讲李大钊、陈独秀；作为缔造者，毛泽东是其中之一。讲井冈山斗争，讲红军打仗，必须讲毛泽东，也要讲朱德。讲历史，既要讲成功，也要讲曲折，既讲胜利的经验，也讲失败的教训，一句话，存真求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历史中获取真知。

如何看待传统。当时，解放思想，还有一个障碍，就是把过去的经验当包袱，不善于研究新情况，接受新观念。对战略学、战役学不敢研究讨论，一讲战略，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我认为，传统和经验是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当然要继承，但继承的意义在于运用和发展。如果把红军在江西时期诱敌深入的办法，机械地搬到现在，就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情况。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城市，没有现代工业，一切取之于敌，敌人来了就“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撒开两手，请你进来”。未来反侵略战争情况不同，必须根据新的形势，研究新的作战方法。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因循守旧，树立创新意识。

如何看待外国的经验。从 1958 年反教条主义以后，就不敢提学习外国经验了，致使多年来对外军的状况若明若暗。要迎头赶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就必须打破军事上的闭关自守，敢于向外军学习，特别是敢于向敌军学习，“以敌为师”，为我所用。我始终认为，先进的军事技术、现代化的指挥工具和手段是没有阶级性的，任何军队都可以利用。今天，我们要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就必须了解外军和外国科学技术状况，做到知己知彼，同时更要吸收外军一切有利于我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才能使我军真正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1979 年 2、3 月份，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这些思潮也反映到学院来，但大多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如有些人对地富摘帽、改正错划的右派、退赔“文革”中没收资本家的财物等政策不大理解，担心变右了；有些人把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立起来，从而对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到底好不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对还是不对，解放思想应该不应该等，产生了疑虑。

我们在全院范围内反复深入地进行了三中全会精神的教育。大家认识到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是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各级干部对解放思想感受很深，能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党的政策，敢于想问题，敢于讲真话，思想活跃了。总之，随着学习的逐步深入，也随着党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效果，三中全会的精神越来越深入人心。

但是，当时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军委有位领导人在一次干部会上讲话，说有人反映政治学院有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三中全会的路线，军事学院也差不多。这个讲话传达后在干部中引起了比较大的震动。当时我也搞不清楚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后来听说是某报社记者在参加政治学院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听一位学员讲的，他就整理成“内部参阅件”上报了。

为了实事求是地摸清情况，我们在全院进行了一次思想总结，并组织了两个调查组，同总政宣传部的同志一起，在机关、教研室、学员队召开了 12 次座谈会，还听取了 10 个党小组的思想总结。在此基础上学院党委于 1979 年 9 月 10 日至 12 日召开了全委会，汇报分析三中全会以来在职工干部和学员的思想情况。我在会上提出，对于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人，要有名有姓，有具体事实，不能估计和推测。经过三天的汇报和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全院绝大多数同志是衷心拥护三中全会路线的；有 8 个同志对于纠正过去的

冤假错案，对于落实政策，对于理论务虚会，有过怀疑，其中有5个人更严重些（有4个是学员）。

会后，我们将全院干部的思想情况向总政治部写了书面报告。对这件事的处理，军事学院党委统一了思想，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件事也使我感到，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最重要的还是肃清“左”的流毒，不能像过去那样随意打棍子、扣帽子，伤害革命同志。

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同时，我们要负责三个学院的落实政策工作。因为三个学院是从军政大学分出去的，而历史遗留问题又都是军政大学以前的。我们在原军政大学复查的基础上，彻底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

一些重要的案件，我常常亲自去翻阅材料，分析研究。比如原高等军事学院副政委林浩，在“文革”中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我把他的材料调来看，罪状无非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那套不满。如有个材料揭发他说过“拿着语录像菩萨念经”，还说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就像读总理（孙中山）遗嘱一样，还得背下来”。我感到，他说的是心里话，也不夸张。因此，为他平反，还向军委作合乎事实的建议。

我们除了解决“文革”中的问题外，还对“文革”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也进行了清理，甄别平反。这项工作比较复杂，因为牵扯到50年代中后期。十二届六中全会前，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定论。但我们始终掌握一条原则：实事求是。

记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要为彭德怀平反昭雪，并将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我最先表示同意。当时很多人都感到惊奇，因为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使我蒙受的冤屈尚未平反。我认为，不论彭德怀过去对我怎样，庐山会议批他右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又置之于死地，都是党内“左”倾错误制造的冤案。既是冤案，就该昭雪！

同样，我也始终认为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那条思想路线和做法，是错误的。当时，总政虽然撤消了强加于我的“反党宗派集团”、“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表”等诬蔑不实之词，但并没有从政治上彻底平反。我感到，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错误处理了许多同志，20多年来，蒙受不白之冤，应该让这些同志解放出来。于是，我向中央和军委反映情况，要求平反。军事学院在1978年和1979年两年，先后为756人平反昭雪（其中一部分是错划的右派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另一部分是1958年以来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被冤屈的同志）。这样做，既有利于党的工作，也使他们本人和家庭成员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在平反冤假错案前后，我们还为“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正名，全面恢复以军事为主的教育训练。

军事学院一成立，我们就提出要为“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正名。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还没有明确提出，但对连年不断地搞政治运动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上上下下都很反感了。我总感到，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科学家不搞科研，国家就失去了经济命脉；同样，当兵不习武，军人不学军，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而军队院校是搞军政文教学的，理所当然应该以教学为中心。

“以教学为中心”这个口号，是50年代初提出来的。

1951年5月由我主持召开的全军第二次院校会议，明确提

出“为了完成教学计划，还要贯彻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军事学院的

基本任务是培养学员成为现代战争中智勇双全的指挥员，所以首先要做好教学工作。从校党委到支部必须明确树立一切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发挥组织力量，将所有部门所有人员的精力，集中到教学上去。林彪上台后，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颠倒“红”与“专”的关系，使有些人产生了鄙薄业务的思想，出现了“抓政治保险”，“抓业务危险”的错误倾向，部队不敢搞军事训练，院校不敢抓教学。“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利用党的“左”倾错误，不仅砍掉军事院校，还大批所谓“教学中心论”等，把从50年代开始形成的“以教学为中心”的院校建设的优良传统彻底否定。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许多人仍然不敢理直气壮地抓军事，抓教学，总怕被扣上“单纯业务观点”和“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我认为，要从思想上为“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正名，使所有部门和所有人员的精力集中到教学上去，才能恢复以军事为主的教育训练，也才能真正办好军事学院。5月底，我在检查总结开学3个月的工作时明确提出，学院的工作要以教学为中心。这同工厂、矿山以生产为中心，医院以医疗为中心，研究所科研为中心一样。

我们要求学院各级党委和各级领导，必须以主要精力抓教学和教学保障工作。贯彻上级指示，布置安排工作都不能离开教学这个中心。领导者不仅要做好组织领导工作，还要亲自主持重要教材的编写，担任一些课题的讲授。各机关、部门都要牢固树立为教学服务的思想，通力抓好教学。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明确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澄清了政治与军事，“红”与“专”问题上的思想混乱，也使全院人员真正树立起“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从过去以搞政治运动为主转移到以教学为主，学院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

以教学为中心，首先当然要建立一支有足够数量，又有优良质量的教员队伍。

1972年我到军政大学后，开始部分恢复军事课，从部队和地方支“左”人员中陆续调回一些军事教员，但数量不多。1977年底军委决定恢复军事学院，当时给军事学院的任务是1500学员。这样，原有的教员远远不够，我们又从原在院校任教、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较高的同志从其他岗位上抽调回来，继续任教员，同时也从部队选调了一些文化程度高，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年轻干部充实教员队伍。这样就解决了教员的数量问题。

新的教员队伍组成了，一方面通过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使之热爱教学工作；一方面在调家属和住房等生活方面给予关心和照顾，使他们安心工作，而更重要的则是从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和施教能力等方面下功夫。

提高学术水平，主要从两方面下手，一为提高专业知识，二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前一方面采取4条措施：一是以老带新，以强带弱。我们有一批老教员，在院校工作多年，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让他们带新来的教员，在实践中提高。我一再强调，要注意发现和培养学科带头人，每个学科都要有二至三个热爱教育事业、精通业务、有实践经验的同志。他们是学术研究、编写教材及教学的骨干，由他们把教研组整个教研室带动起来，整个教员队伍就活了。二是在学术研究中提高。编写一部教材，研究解决教学和部队训练中一批难题，教员水平就会提高。我们经常结合教学活动和编写教材，召开学术讨论会，举办学术报告会，在总结工作中探索学术，使教研人员从中

得到提高。三是组织教员到部队调查研究，参观见学。通过参加部队训练、演习和作战指挥，学习战役、战术训练经验，熟悉武器装备性能，以提高教员教学水平。四是有计划地送本校或军兵种院校培训，以及采取兴办讲座和报告会的办法，扩大和更新知识。我们先后请了钱学森、华罗庚、朱光亚等著名科学家和各军兵种专家来作各门学科最新发展的报告，使教研人员拓宽了视野，开阔了思路。

在抓教员队伍时，造成尊师重教，讲求真才实学的风尚，制止弄虚作假，投机钻营的坏风气。我对教研人员提出两条：一是要达到“两通”、“六能”。“两通”就是通晓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基本著作；通晓古今中外著名的军事理论和战史中著名的战役、战例，熟悉敌军战略、战术特点。“六能”是能有较高的专业理论和现代军事科技知识；能出色地完成本专业的各门课程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能组织团以上规模诸军兵种协同作战演习；能独立编写高质量的专业教材；能独立地解决教学和学术研究中的疑难问题；能写会讲。“两通”每个人都要达到，只是深浅不同而已。“六能”不要求条条达到，至少要达到三四条。

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不仅对教员而言，也包括在学院工作的全体干部和职工。因为作为中国的最高军事学府，要求所有的教职员工都应具备高层次的知识结构。1982年9月，院党委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文化教育的决定》，还专门成立了文化补习学校，分期分批为没有达到高中文化的干部、职工补习文化。到1985年，全院600名45岁以下干部及年轻职工全部达到高中文化水平。

在结束补习高中文化以后，我们又对全院干部提出新的要求，45岁以下干部到1990年都要具备大专以上文化水平，教员还要掌握一门外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45岁以上干部，结合自己的工作任务，学习军事科学技术知识、现代管理、军事、政治理论等。要求二级部和学员队的干部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由1985年43%到1990年达到90%以上，教研室的领导干部，由66%达到100%。

为了给干部创造学习条件，学院于1984年成立了自修大学，开设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班、军事大专班、干部进修班、电子计算机班、外语班等14个班次，有640多人参加学习。

全院教员和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形成了浓厚的学习风气。各部队来的学员一到校，在这种空气熏陶下，也都认真学习，努力提高。这也就是“水涨船高”了。

为了好的师资队伍，还要抓好教材编写工作。军事学院成立后，教材几乎是白手起家：有的课程没有教材，有的教材是50年代编写的，许多内容已经过时了。编写和修定教材是开展教学工作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当务之急。

我们首先抓基础教材的编写，把教材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院领导亲自组织编写审定；第二类由训练部和政治部牵头编写审定；第三类由各教研室负责编写。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共编出从营到集团军的合同作战战术教材162种，军兵种教材12种，政治教材34种，科技教材29种。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编写了全军通用的8本战术教材：《陆军师坚固阵地防御战术》、《陆军师野战阵地防御战术》、《陆军师热带山岳丛林地带防御战术》、《陆军师海岸防御战术》、《陆军师反合围和突围战术》、《陆军师反空降战术》、《陆军师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进攻战术》等。另编

全军通用的 8 本战役教材：《战役学总则》、《阵地防御战役》、《城市防御战役》、《抗登陆战役》、《反空降战役》、《运动战役》、《阵地进攻战役》、《登陆战役》等。这两套教材不仅解决了教材配套问题，而且结合未来战争的特点，吸收全军学术研究成果，解决了多年遗留的许多有争议的学术问题，质量较高。

编这么多教材，也不容易。但我们有人才，有胆量，我深信中国一句古语：“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军事学院不是十邑百邑，而是千邑万邑，是中国军事理论人才集中的地方。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两千年前就写出了《孙子兵法》，在我党领导下打了那么多胜仗，要敢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写出新的《战略学》。从 1979 年开始准备到 1983 年 5 月，经过 4 年的努力，终于编写出了全军第一本《战略学教程》，接着又编写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这本战史对中国战场专辟章节，详尽地叙述了中国人民 8 年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大贡献，这在所有战史书中也是第一次。

编写的教材注意突出现代战争的特点，根据培养高层次军事人才的要求，强调合成训练和合成作战。无论是战役教材，还是战术教材，都是合成本，既有陆军内兵种的合成，也有陆、海、空各军兵种的合成。作战指挥和部队行动，既有指挥员的活动，也有司令部的工作；既有军兵种的任务，也有后勤的协同，使战役战术与司令部、军兵种、后勤融为一体。

高水平的教材是建立在有一定高度和深度的学术研究之上的。学术研究对教学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是促进教研人员的知识的提高与更新；二是以新的知识来充实提高教材的质量。从军事学院成立起，我们一直把开展学术研究，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学院一成立，就组成了军事、政治两个学术委员会，任务是，审查学术研究规划和年度计划，组织重要课题的学术攻关，统一教学中重大学术观点，审查重要课题的教材，审查学术成果，决走奖励等级等。前述教材的成果，就是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号召下产生的。

学术研究要有重点，我提出学院的研究工作有两个重点，一是解决教学中急需的学术问题，直接为教学服务。当时教学和训练中有急需解决的 200 多个问题，分配到各教研室，组织教员研究，研究的成果直接体现在教材和施训过程中，用教学带动学术研究，以学术研究促进教学。二是着眼发展，着眼未来，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军事科学，学习如何打赢现代战争，诸如现代条件下如何使部队保持生存能力，增强快速反应能力，提高合同作战能力，加强后勤保障能力等，还要对未来战场进行设计和研究，包括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军队的技术装备、编制、指挥、战略指导等的推断和论证，等等。

我对研究人员提出，要有胆有识，有胆就是要有独创性的见解，对于出现的新事物要敏感。有识就是要有知识，知识渊博，视野就开阔，想象和逻辑思维能力就越强，越会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为扩大学术研究队伍，我们除了发挥教员的作用外，还让有研究能力的机关干部参加学术研究。同时发挥全军校友的积极性，吸收他们参加学术研究。有时还把重大题目通报全军，征集研究人员。

为了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以刘伯承名义设立学术奖。刘伯承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他自身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又从古今中外的军事典籍中吸取广博的知识，学习勤奋，运用灵活，为人谦虚，深得全院教职员工的崇敬，所以用他的名义设学术奖。我们在校内筹集 10 多万元，建立刘伯承学术奖励基金，以银行利息为奖金，奖励学院忠诚于教育事业并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中

取得突出成绩的教员、研究员、学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1984年7月，军事学院召开了学术研究成果授奖大会，对1978年以来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一次检阅。在这段时间里编写教材427份，教学参考资料210份，学术文章和专著771份，翻译资料193份。从这些成果中评出一等奖3篇，二等奖20篇，三等奖176篇，共199篇，占参评作品12%。颁奖活动对全院学术研究工作是很好的推动。

1982年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是一场海空立体战争，使我们看到了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对战争形态的改变，看到了现代战争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也使我们更深切地感到加强学术研究的重要和迫切。为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把原属于训练部的理论研究部升为大部，统管全院的学术研究工作。研究部作出近期和长期研究规划，提出措施，列出题目，组织攻关。

战略学是军事学院的主要课程之一。为了以先进的研究成果带动这门重点课程的教学，1985年5月我们又成立了战略研究所，以研究战略为重点，广泛研究全球和地区性的战略问题、世界各国的国家战略、国防政策、军事战略和几个主要军事集团联盟战略，以及与战略有关的重要学科。

军事领域是对科学技术成就利用最多、最快的一个领域。组织学习高科技知识与建立现代化的教学设施，是院校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特别是60年代以来，以核能、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等一系列新技术为重要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对军事与战争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军事思想、作战理论、行动原则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军过去打仗主要靠轻武器，就是在抗美援朝中，飞机大炮也不多。建国后我们建立了军事工业，生产坦克、大炮、飞机等重型武器装备，开始正规训练、研究现代战争问题。但一反教条主义，把这些都冲了。十年动乱，教育训练和学术研究都处于停顿状态，使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本来就有的距离更加拉大了。

未来战争不仅是双方人力、物力、财力的较量，也是新技术的较量。高新技术的运用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标志。使用武器的人，如果没有科学文化知识，就不能掌握并发挥武器装备的效力；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不具备广泛的军事科技知识，就无法指挥现代战争。为此，军事学院一成立，我们就提出要努力学习高科技知识，并从全军选调军事科技人才，组建军事科技教研室。在总课时中用10%的时间对学员进行军事科技教育，介绍核武器、导弹、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军用卫星、电子对抗、夜视、激光、传感侦察技术、统筹法、运筹学、军事气象学，以及电子计算机、自动化指挥和未来武器发展趋势等。此外，我们还举办军事科技学习班，让全院在职人员，包括院领导、训练部领导和所有教研人员，分期分批参加，补上军事科技这一课。

实行教学内容的现代化，必须要有相应的现代化教学设施和设备，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物质保障，军事学院成立时，我提出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解决电化教学问题，一是课堂教学设备现代化；二是应用电子计算机搞作战模拟；三是建立一套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有的设备自己做不了国内又买不到，就从国外进口。到1985年建立了投影幻灯、闭路电视、电动图板、复式幻灯等课堂电化教学设备，还开发出了电子计算机大屏幕模拟团坚固阵地防御、电子计算机辅助首长司令部对抗演习及集团军防御战役教学等现代化教学设施。

1985年我们又建起了一座具有相当规模、设备完善的图书资料馆。我认为，军事学院必须建立一座好的图书馆，才有利于工作。马克思创立了指导世界革命的伟大理论——马克思主义，就是有藏书丰富的大英博物馆供他使用。军事学院要开展对现代军事科学的研究，对与军事有关的各学科的综合分析，要及时了解外军的情况，也必须有供教职员使用的图书馆。为此，我向有关方面多次请求，使更多的同志理解和支持，图书馆1985年建成，1986年投入使用，后来一些外国军事代表团来参观，都对我们图书馆有羡慕之意。

我在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期间，在考虑如何把军事学院办好的同时，对全军如何建立起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面向世界，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院校体系，也作了些研究和思考。

1978年和1980年，我先后出访了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当时我是以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份作礼宾性访问的，但我在访问时注意对这些国家军队特别是院校作调查研究。看到许多国家都把办军事院校看作是对未来战争的投资，把它摆在三军之首，选拔著名的军事将领主持院校工作，学校的体制都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凡担任军官的，都经过院校培养；凡军官要提升的，也要经过相应院校深造。尤其是注重军官的科学文化教育，如美军军官学校要学习与军队有关的大学课程，经考试毕业，达到大学程度，才能担任军官。由于基础打得好，各兵种军官，可以交叉调动，部队军官与院校教员及机关参谋，定期交流。服役期满退役，都可以在社会上担任职务和找到职业。

我感到，外军的这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军院校主要是基层院校，培养人才的角度太窄，没有很好地考虑军队发展的需要，更没有考虑干部退出现役以后国家建设的需要。当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绝大多数干部文化科技知识太低，对我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不能很好地运用和掌握；另一方面，大量超编干部，转业到地方不受欢迎，文化水平低是原因之一。同时，在干部提拔使用上由于不强调院校培养，盲目性很大，加上没有严格的制度，给不正之风造成了可乘之隙。

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提高军官培养起点，建立严谨的教育体系，初级、中级、高级指挥院校和专业技术院校，必须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学科和课程必须与学员未来担任的职务相适应。将来培养出的干部，第一有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和使用新装备的知识；第二转业后能胜任四化建设多方面工作的需要。一句话，既能治军，又能治国。

为此，从1980年起，我多次向老师们汇报请示，争取他们的支持，经常与一些高层领导研究，并得到他们的理解。我多次在军委机关总部召开的一些会议上向军委陈述我的意见，提出改革军队院校教育制度的具体建议，主要是：

把基层军官培养成大学水平。从现在起把基层院校逐步纳入大学教育轨道，学制为4年，以大学层次为培养目标。学员毕业发大学本科文凭，这样就可做到每个基层军官都具备大学文化程度，全军干部的文化水平就提高了。

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并请专家论证，提出4年制陆军初级指挥学校科学文化课程设置方案。用60%至65%的时间学习大学的基础课程（理科、文

科、外语等)；20%至25%学军事(学会使用营以下兵器技术，学会从单兵、单车、单炮到营的战术，养成教育和体育训练贯穿学习始终)；15%学政治(党日在外)，如果加上党团日时间则政治活动时间占22%强。地方大学政治教育为10%，考虑军队的特点，应加强政治课的比重，主要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史、军史和政治工作，党的基本路线和时事政策等。

采取这样的教育制度，干部的基础打好了，干部文化科学知识和业务水平高了，也就解决了我军干部工作长期存在的难题。干部知识面宽，工作适应性就强，在部队、机关、院校以及军兵种之间交流，能很快地熟悉业务，适应工作。如果转业到地方也会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成为国家建设人才。

改革教育制度，也受旧的习惯势力影响。有的看不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军队已经成为知识密集的社会集团，对军人的素质要求更全面了，特别是对军官的要求更高了。说什么战争年代没有进学校学习还不是照样打胜仗？这些同志既没有看到变化了的情况，也没有看到那时领导我们打仗的人都是有学问的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剑英和许多领导人都是懂政治、懂军事、知识渊博的人物，许多是经过国内国外军事、政治或其他学校培养出来的有学识的高才。我们是在他们教育培养下学会打仗和治军的。

另外还有一点，我党我军历来就重视办学校培养人才。不论战争多么频繁、环境多么艰难，我们的军事学校、随营学校、教导队等一直没有间断过。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军队的作战指挥和训练管理变得异常复杂，干部不进学校培养很难具备全面的素质和技能。

1980年3月，我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就着重讲办好学校是训练好军队的先决条件，是战略问题，关系到我军建设的全局。要办好学校，一要思想上重视，二要多下点本钱，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应多支持和保障学校。根据现代战争的要求和未来战争发展的趋势，必须建立起完整的院校体系。学校要上下左右相衔接，不遗漏，不重叠。基层指挥院校学制为4年(海军、空军为5年)，中级为2年，高级为1年或2年。要大力提高干部的知识水平，尤其是基层学校，要根据现代战争对干部科技文化知识的要求，设置必要课程。干部的使用要同学校培养挂上钩。

1982年底，在为召开全军第12次院校会议作准备时，我又提出三个问题：

一、院校训练体制。全军指挥学校要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招生、统一分配。重申了各类基层干部要由军事院校培训和各级主官须经相应院校培训的制度。建议从1983年起，步兵排长一律由陆军学校培训。指挥院校实行三级制(陆军学校训练尉官、高级陆军学校训练校官、军事学院培养将官)，专业技术院校两级制。地方能办的院校军队尽量少办，如医务学校，可招收地方医科院校毕业生到部队服役。

二、从1982年起，用7年时间使全军基层指挥院校达到大学水平。

三、办好学校要舍得下本钱。在人力上，要把优秀干部调去办院校，教员要在全军范围内选调；学员要择优选送，学校有淘汰学员的权力。在物质上，保证训练经费、图书资料费等，新式武器装备优先发院校。

1983年，召开全军第12次院校会议，我在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根本问题是办好院校，培养干部。我认为，当今时代在新的技术革命浪潮下，国防建设和军队作战变得越来越复

杂，对战争驾驭者的素质要求空前的提高了，培养一支军政素质高，专业技术造诣深，指挥能力强，知识渊博，完全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军官队伍，是搞好军队建设和进行胜利战争的关键。

各国都非常重视军官的培养，干部训练主要靠院校，这是各国军队建设中的一条共同规律。我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各国办院校培训军官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苏联在卫国战争中，战事那么紧张，还坚持干部要经过院校培养，只是缩短学制，训练强度加大。仅总参军事学院就培养了1354名中高级指挥员，对卫国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我军有自己的长处及特点，但在办好军事院校与军队现代化的关系上，在干部队伍的结构上，则与外军有许多共同的规律。我军应该借鉴。

在这次会议上我还着重讲了提高干部科学文化水平的问题。我感到我们的领导干部，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工作也很努力，但有些人文化水平低，科学知识不够，与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相适应。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我军将有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人才的培养是比经济建设周期更长的“基本建设”。如果不从现在起抓紧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尽快改变我军干部队伍科技文化水平低的状况，就会延缓我军的现代化进程。一句话：“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蓄……终身忧辱”。应该只争朝夕，尽快起步。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不行的。一部战争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和智谋不断运用于战场的历史。缺乏知识的军队总免不了要吃亏。日俄战争时，速射武器的威力早已显露出来，而俄国军队仍采用密集队形冲击，结果遭受大量杀伤。列宁在1905年1月写的《旅顺口陷落》一文中，对沙皇俄国军队失败原因作了生动的论述。他说，尽管俄国用“亿万卢布购置和建造顶好的军舰”，但由于“军官们都是些不学无术、不熟练、缺乏训练的人”，“在不会使用现代军舰的情况下，缺少能够熟练的利用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况下，这些花费是没有用的”。“因为现代战争和现代技术一样，要求质量高的人才”。这就说明科学文化知识对军事现代化建设何等重要。有了好的武器装备，还要通过有知识的人去使用，管理，并运用于各种战斗活动中，才是真正现代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能不对干部的科学文化知识提出严格的要求。陈毅说过一句很好的话：“现在我们党需要科学文化，就和1927年需要军队一样。”这句话有多么大的现实意义啊！

经过许多同志的努力，从1982年开始全军部分初级指挥学校纳入了大学教育的轨道，开了一个令人快慰的好头。

1985年国防大学成立，我从军队训练教育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我还是认为，对于一支军队，一个国家，乃至整个民族，文化是重要的。这个思想，我和不少同志交换过。现在，在回忆录中，把这个问题记下来，以备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志参考。